中央电视台知名谈话节目的案例分析
权威专家的调研报告和一线记者手记

电视谈话节目研究

■ 主编 陈永庆

The Research on TV Talk Show

知识产权出版社

NEWS 新闻夜话

北京广播学院文学院院长 / 苗棣

现在电视荧屏需要一些“硬核谈话节目”，每一个话题不是空泛的设计，而是有目的的探讨，得出确凿的结论用于实践。这类节目，尽管娱乐性差，但它一定会拥有一批忠实观众。

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 吕岩梅

主持人的情怀很关键，除了文化功底、新闻素养等因素，还需要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人尊重和关怀。智慧和学识来自天赋和学习的积累，而“情怀”则要从心灵深处打造。

浙江大学新闻系 / 高博士

我国目前的电视谈话节目属于内向和保守性的大众传播文化，栏目运作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模式。除新闻时事类谈话节目，其他类型的谈话节目应该拿到社会上进行制作。

ISBN 7-80198-108-1

9 787801 981080 >

ISBN 7-80198-108-1/C · 023

(10031) 定价：54.00 元

电　视
谈话节目研究

顾　　问　吴明训　童　宁

主　　编　陈永庆

编　　委　荆慕瑶　李品华　董雯嫣　刘昊天　杨红叶
　　魏　鸿　黄　刚　庄庆飏　胡彩阳　宋　楠
　　曹　琳　杨燕怡　李东明　崔亚卿　吴雪峰
　　刘　宏　宁小鸿　刘　进　樊红叶

文字统筹　杨燕怡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电视谈话节目研究/陈永庆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11
ISBN 7-80198-108-1

Ⅰ.电… Ⅱ.陈… Ⅲ.谈话—电视节目—制作—经验 Ⅳ.G2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696 号

本书的所有版权受到保护,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和方法复制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违者皆须承担全部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

电视谈话节目研究

责任编辑:翁翼中　国晓健

封面设计:刘　昱

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编:100088)

http://www.cnbod.com

(010)82000890 (010)82000860-8127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印刷

中国按需出版网直销

2004 年 1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89mm×1194mm　1/24　印张:22.625　字数:117 千字

ISBN 7-80198-108-1/C·023

定 价:5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电视谈话节目的形态构成与操作理念

3　电视谈话节目概说
19　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三种基本类型
27　电视谈话节目的主持人
47　电视谈话节目的选题与嘉宾
57　电视谈话节目的现场与后期制作
65　电视谈话节目的可持续发展

●电视谈话节目操作实务

85 《新闻夜话》三好论　/陈永庆
97 《新闻夜话》三度论　/陈永庆
105《新闻夜话》三段论　/陈永庆
113 新闻访谈的魅力
——突破平面追求纵深　/魏鸿
119 我们要什么样的新闻类谈话节目　/杨红叶
123 我们将走向何方
——对《新闻夜话》选题定位的一点思考　/胡彩阳
129 论电视新闻访谈的原生态　/董雯嫣
137 论访谈节目的气场　/刘昊天
143 论新闻采访中“霍桑效应”的发生与应对　/庄庆飚
149 论质疑式采访风格　/荆慕瑶
153 论“道具”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的运用　/陈永庆　蒋乐进
161 我看《新闻夜话》　/崔亚卿
169 论访谈节目中嘉宾角色的多元化选择　/宋楠

目　录

173 寻找“接近点” /杨燕怡
179 构筑《新闻夜话》的谈话语境 /崔亚卿
185 山重水复中的柳暗花明
——新闻角度浅析 /刘进
191 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外观形象与自我表达 /黄刚
195 随笔:由一次聊天想到的 /李品华
199 我和电话 /宋楠
203 难舍《新闻夜话》 /魏鸿
209 我的《新闻夜话》之路 /李东明
215 我在《新闻夜话》的“第一次” /曹琳
221 我谈《新闻夜话》宣传推广工作的感受 /吴雪峰
225 烙印 /樊红叶
227 电视新闻类节目合成初探 /宁小鸿

●制片人访谈

237 《新闻会客厅》制片人包军昊访谈
255 《时空连线》制片人刘爱民访谈
277 《讲述》制片人梁红访谈
297 《艺术人生》制片人王峥访谈
319 《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访谈
343 《对话》栏目操作流程

355 后记

电视谈话节目的形态构成与操作理念

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从中央电视台到地方电视台，各种样式的谈话节目被大量地制作出来，如潮水一样冲击着受众。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就显得更加重要——及时总结电视谈话节目的特点和规律，进而指导实践，已成当务之急。

为了满足实践的需求，中央电视台研究处成立了“电视谈话节目研究”课题组，对中国电视谈话节目面临的诸多问题以及发展前景进行了研究。

该课题内容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中外电视谈话节目的兴起原因、发展过程以及主要特点进行介绍和分析；第二部分介绍了电视谈话节目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三种基本类型——叙事型谈话节目、辩论型谈话节目、讨论型谈话节目，并对它们各自的特点、操作理念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分析了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的地位、作用和功能，对谈话节目主持人应当具备的素质和修养进行了探讨。第四部分分析了选题与节目定位的关系，对成功的选题应当具备的条件进行了探讨；同时分析了嘉宾的功能与作用，对嘉宾的选择、搭配进行了探讨。第五部分对电视谈话节目现场的各种元素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对后期制作如何体现谈话节目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探讨。第六部分评估了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现状，勾画了其追求目标，进而指出：只有建立工业化的节目生产流程，电视谈话节目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研究处课题组

电视谈话节目概说

一、电视谈话节目的魅力

在西方,电视谈话节目被称为“Talk Show”,港台的翻译家把它翻译过来,就成了现在电视从业人员都很熟悉的一个词:“脱口秀”。这个译出来的新名词不仅在读音上与原词极为相似,而且意思也很传神。

顾名思义,“脱口秀”的意思是指“脱口而出的谈话表演”。这种脱口而出、现场即兴发挥的特点正是电视谈话节目的主要特征,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由于是现场的即兴谈话,电视谈话节目就不可能事先写好脚本,因此也就不可能像其他类型的电视节目那样可以完全按制作者的安排进行。即使主持人事先作好了大量准备,对每一个问题都胸有成竹,谈话现场还是常常会出现一些出人意料的情况。

在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中,《实话实说》的历史相对而言算是比较长的,策划和制作者都比较有经验,主持人崔永元也以谈吐幽默、反应敏捷而著称。但是即便是这样,在节目的现场还是会出现一些令人始料不及的场面。《实话实说》曾经做过一期“儿童节”特别节目,名字叫做《童言无忌》。这期节目本来的设想是让孩子们作为嘉宾来谈一谈自己过节的愿望。为了让孩子们放松一些,编导和策划们特意在节目现场放置了一些玩具,想营造点气氛。没想到在录制时,孩子们根本就不紧张,他们不仅拿走了玩具,而且在五分钟内就把玩具的芯子给掏出来了。再看那几个为嘉宾设置的沙发,横七竖八地坐满了孩子,有的甚至坐到了沙发的扶手上,还有一个孩子在崔永元的后面踢着他的背。最让崔永元感到无可奈何的是,孩子们根本不像大人那样一本正经地回答问题,他们总是答非所问,让崔永元没法接过话茬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让主持人和策划觉得最不像节目的节目却受到了观众的喜爱,有的观众甚至说就喜欢看崔永元在孩子们面前束手无策的尴尬。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期节目最真实地表现出孩子们天真的情态,孩子们的答非所问不是导演事先安排的,而是现场的真实反应。

美国的电视谈话节目在这方面比中国电视谈话节目表现得更为突出。在一些表现人们情感隐私的“脱口秀”里,几位有着矛盾的嘉宾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同时邀请到现场,当其中某位嘉宾因为受到伤害而无法抑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时,现场常常会出现厮打的场面。这种无法预期的状况固然因为满足了观众的偷窥心理而使节目的收视率有所上升,但是对当事者的心理却造成了伤害,有时甚至会酿成严重的犯罪事件。1995 年,在《杰尼·琼斯节目》中出现的一位嘉宾被意外地告知:暗恋着他的人是他的同性恋邻居。由于忍受不了这种“屈辱”,这位嘉宾在节目结束后不久闯入他的邻居家并枪杀了他的邻居。由此可见,走向极端的即兴谈话也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即兴”是电视谈话节目的生命。正是在即

晚年的金庸先生有如神龙，行藏有道。而每当他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时候，往往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其魅力连影视明星也望尘莫及。2003年7月份，一本由金庸本人主编的杂志《金庸客栈》问世，这本杂志将专门讨论金庸的武侠小说，有些媒体则开始质疑：老年的金庸是否开始自恋了？

《新闻夜话》对金庸先生的专访就从这个话题开始。当主持人问他是否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师，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痛快地承认自己是前无古人，但却未必后无来者；他否认了自己出杂志是自恋，因为“自恋只需要每天翻自己的作品就行了”，不需要公开出来；而对于那些粗制滥造的改编电视剧，金庸坦承自己很不满意。对自己作品的价值，金庸先生认为：只要世界上还有小说，中国人大概就还会看金庸的小说。而当记者问起他对自己在人间百年的评价，老先生则乐观地说现在自己只有八十岁，还没有到评价的时候。

《新闻夜话》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导播间里站满了平面媒体的记者，主持人与金庸先生机智的问答不时引起他们的笑声。其后，此次采访的内容也被这些媒体所引用和转载。



金庸 作家



兴谈话中，主持人和嘉宾的个人魅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那些在碰撞中产生的奇思妙想、奇言妙语给观众带来了新的启示和美的享受。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电视谈话节目的最佳形式应该是“现场直播”。在现场直播中，嘉宾、主持人、现场观众的一切言谈、反应都是原汁原味、未经修饰的，同时，现场直播能为场外的观众带来“现场感”，参与的意愿更强。在国外，许多电视谈话节目是现场直播的，国内的电视谈话节目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很少现场直播，但是在制作中，制作者们还是以“准直播”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尽量让节目呈现出“谈话场”的原貌。

二、中国电视谈话节目

1992 年，上海东方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名为《东方直播室》的节目。这个节目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邀请嘉宾和观众在演播室就某个话题展开讨论。这个节目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电视诞生了一种新的节目形态——电视谈话节目。然而，由于《东方直播室》是地方台制作的节目，传播的范围十分有限，因此并未引起全国性的轰动效应。

自《东方直播室》出现后，各地方电视台也出现过一些谈话节目，如黑龙江电视台的《北方直播室》、广东电视台的《岭南直播室》、广州电视台的《夜谈》等，但这些谈话节目同《东方直播室》一样，都没有引起广泛的影响。

谈话节目真正引起观众和理论研究者的关注，并在电视节目制作中形成一股浪潮，是从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的热播开始的。

1996 年 3 月 16 日，经过精心策划的电视谈话节目《实话实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开播。第一期播出的节目名称是《谁来保护消费者》。著名的打假人王海戴着墨镜、贴着假胡子出现在节目现场，与四位嘉宾及现场的几十位观众一起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消费者在买到假货后该如何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之后，《实话实说》还陆续播出了《鸟与我们》、《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不打不成材》等一系列节目，这些节目的播出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实话实说》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人们争相谈论着节目主持人崔永元的风趣幽默，以及嘉宾们的言谈举止。万众瞩目的春节联欢晚会甚至把《实话实说》搬上了舞台，由崔永元、赵本山、宋丹丹一起，采用《实话实说》的现场谈话方式合作表演了一个小品，人们对《实话实说》的喜爱以及《实话实说》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不可否认，中央电视台的强势话语权为《实话实说》的轰动奠定了基础，主持人崔永元与众不同的外貌与主持风格也是《实话实说》引起轰动的一个原因。在中央电视台庞大的由俊男靓女组成的主持人队伍中，相貌平平但语言幽默的崔永元无疑让观众感受到了与众不同的另一种风格。在他的自传《不过如此》中，崔永元记述了第一期节目播出后观众反馈中存在的两种极端反应：一些观众十分欣赏崔永元的主持，认为在他身上看到了中国电视主持人的未来；但也有一些观众认为崔永元不应当成为一个主持人，他的出现是对中国主持人形象的一种破坏。这种围绕主持人的争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实话实说》的收视率。

但是《实话实说》最终能得到观众的喜爱和肯定，而不是昙花一现，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喜欢这种即兴谈话的新型节目形态，它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人们喜欢看到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敞开心扉，真诚地交流，在即兴的言谈中闪烁出智慧与幽默的火花。

《实话实说》的成功，把电视谈话节目这种新的节目形态带到了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视野



张艺谋 电影导演

2002年岁末，几乎所有的国内观众与媒体都将目光投射到了电影《英雄》和张艺谋的身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新闻场”。因为电影《英雄》不仅意味着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的转型，某种意义上也标志着中国电影界的市场化和商业化转型。为此，《新闻夜话》独家专访了张艺谋。

记者尖锐而不乏深度的提问，让这位名声远扬但又屡受批评的大导演说出了心里话。他坦承自己的新作《英雄》就是在用大制作、大明星来吸引观众，因为这是一部纯粹的商业片；而各种苛刻的评论的确让他感觉到不快，甚至影响了他的心情；拍武侠片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但就在他筹拍《英雄》的时候，传来《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的消息，这差点打消了他拍《英雄》的念头；而他也清醒地判断，《英雄》已经失去了奥斯卡所有单项奖的机会，并承认自己和所有的中国导演一样，也在乎奥斯卡，但这个奖是不能惦记的。

本期节目播出后迎来了栏目开播以来的第一个收视高峰。

之中。

1998年4月4日至7日，中央电视台专门举办了一次“《实话实说》暨谈话节目研讨会”。研讨会邀请了《实话实说》的总制片人时间、总策划杨东平、主持人崔永元，上海《东方直播室》的创办人王韧以及电视理论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朱羽君、任远、吴郁、叶延滨等参加。与会者分别从各个角度总结了《实话实说》取得成功的经验，并且就电视谈话节目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这次研讨会的举办不仅推动了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使中国电视理论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把眼光投向电视谈话节目上来。

《实话实说》的轰动效应推动了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在《实话实说》之后，如雨后春笋一般，从中央台到地方台都涌现出了大批的电视谈话节目。中央电视台开办了《相约夕阳红》、《当代工人》、《对话》、《艺术人生》、《聊天》、《爱心世界》、《朋友》、《影视俱乐部》、《边说边看》、《五环夜话》、《健康之路》等谈话节目。各地方电视台的谈话节目更是不胜枚举，其中一些较为观众熟悉的节目有北京电视台的《国际双行线》、《荧屏连着我和你》、《谁在说》；湖南卫视的《新青年》、《今日谈》；重庆电视台的《龙门阵》；上海电视台的《有话大家说》；河北电视台的《国人笑谈》；云南电视台的《周末夜话》；钱江电视台的《谈话》；济南电视台的《泉城夜话》等。据统计，中国现有的电视谈话节目已达160余个，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

除了这些纯粹的电视谈话节目之外，其他一些形态的电视节目也受到了电视谈话节目的影响，在节目中增加了许多谈话成分。融有谈话成分的节目的出现，使得电视谈话节目的界限变得有些模糊，但是由此也可看出谈话节目的巨大影响力。电视谈话节目还影响到了传统的电视晚会。现在有很多电视晚会都改变了以往以歌舞为主的形式，而代之以新颖的电视谈话，如近年来的“三·八”妇女节晚会，“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晚会等，采用的都是现场谈话形式，也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谈话节目的蓬勃发展使得有人惊呼，电视谈话节目正在成为继“综艺浪潮”、“纪录浪潮”、“游戏浪潮”之后冲击中国电视的“第四次浪潮”。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电视谈话节目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比起当年《实话实说》的一枝独秀，如今的中国电视谈话节目可以说是群芳竞妍。除了数量增多之外，今天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还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节目形式多种多样。

在节目的表现形式上，不仅有现场观众参与的谈话节目，如《实话实说》、《对话》等，也有无现场观众的谈话节目，如《今日谈》；不仅有带嘉宾的谈话节目，也有不带嘉宾的谈话节目，如《当代工人》；不仅有在演播室现场录制的谈话节目，也有利用卫星通讯技术让不同地域的嘉宾同时进行交流的谈话节目，如《时空连线》。

在节目播出形式上，不仅有录制播出的谈话节目，也有现场直播的谈话节目。

在节目的类型上，产生了辩论型谈话节目、讨论型谈话节目和叙事型谈话节目。

第二，节目制作越来越精良。

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和谈话节目自身的发展，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越来越精良。

我们把《实话实说》早期的节目与现在制作的节目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无论是舞台背景的设计、主持人与嘉宾座位的设置，还是灯光、摄像、切换、后期剪辑等技术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实话实说》的早期节目还带有当时颇受观众欢迎的《正大综艺》的痕迹，从主持人与嘉宾





“为什么不能吃它们？”这是反躬自问，也是扪心自省。2003 年 6 月，适值“非典”病魔在华夏大地肆虐之时，我们的医务工作者正在以医药为缰，想要缚住这个毒龙。而每一个经历过那个非常时期的人，都会问一句：“为什么？”

当人们发现非典型性肺炎与滥食野生动物有紧密联系的时候，这种疑问就变成了反问，而《新闻夜话》栏目则在国家级媒体上率先反问人类、尤其是中国人自己：为什么不能吃它们——我们的野生动物朋友们？九集特别节目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个问题。

节目播出后深刻地触动了观众的心灵，不少观众来信来电，表示他们今后再也不吃野生动物了，这也正是我们作为节目制作者所最感到欣慰的。

本系列节目获得了 2003 年度“福特汽车环保奖”的环保教育类二等奖。

座位的设置上就可以看出来。嘉宾坐在一个很高的桌子后面,被安排在舞台的一侧,主持人则站在另外一侧,这种设计似乎是要让嘉宾参加一场智力问答比赛,而不是参加一个谈话节目。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对谈话节目认识的逐渐加深,今天的《实话实说》已经改变了早期的设计,嘉宾不再坐在桌子后面,而是坐在舒适的木椅上,在演播室的中央直接面对现场观众,主持人则坐在嘉宾的旁边,舞台也设计得宛如一间古色古香的会客厅。这样的设计体现了谈话节目模拟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的特点,拉近了节目与受众之间的距离。

今天,越来越多的电视谈话节目开始自觉地追求节目制作质量的提高。在开播之前,许多谈话节目制作部门都会邀请专家进行精心策划,大到节目的定位、节目的样式、节目的结构,小到嘉宾坐什么样的椅子、用什么样的水杯都要经过仔细分析,力求节目一开播,就能以一种相对成熟的风格吸引观众。这种自觉行为推动着电视谈话节目不断走向成熟,用普通百姓的话来说,就是"节目越来越好看了"。

第三,谈话节目呈现出分众化趋势。

针对不同的受众需求来制作电视节目,是当今世界电视节目发展的一个潮流。这不仅是电视节目日益增多、竞争日趋激烈的结果,也是电视商业化进程的内在要求。

在电视发展的早期,由于节目数量少,供不应求,受众对电视这一新兴事物抱有强烈的新奇感,因此虽然电视节目制作者有时并不太在意受众的需求,制作出的节目也可以拥有数量众多的受众。随着电视的发展,频道不断增加,节目数量越来越多,观众可以选择的范围随之变大,从前那种死守一个频道从早看到晚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观众在不同频道之间转换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往往几秒钟就能决定是否看某个节目。

为了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节目制作者就必须重视观众的收视心理,把观众的收视需求作为自己制作电视节目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此外,靠播放广告赚取收入来维持节目播出,一直是电视赖以生存的商业经营模式,这样一种模式使得电视节目的制作单位非常重视商家投放广告的根本依据:收视率。在节目不断增多、受众总量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单个节目的收视率势必呈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收视率就成为节目制作者面对的最大问题。随着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发展,人们发现,受众并非像传统传播理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抽象的群体,而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的受众群,每个受众群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的层次。只有根据受众的不同需要,有的放矢地制作节目才会收到更好的收视效果,节目的收视率也才能相对稳定。

中国电视谈话节目也呈现了这样一种发展的规律。在谈话节目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应根据受众的需要对节目进行定位。举例来说,《相约夕阳红》、《当代工人》、《对话》、《五环夜话》都是针对不同受众需求制作出的较为成功的谈话节目。《相约夕阳红》的受众是老年观众,节目制作者"以老年人的需要为中心点,从他们的经历和体验入手,从他们身边的小事、家务事入手,说他们的'家长里短',谈他们的真情实感。"(参见《相约夕阳红》阚兆江主编,第 8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1 年版)由于定位准确,充分考虑到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和喜好,因此这个时长为 25 分钟的节目受到了老年人的欢迎并多次获奖,与《相约夕阳红》类似,《当代工人》、《对话》、《五环夜话》都对受众进行了分析,根据受众需求来寻找选题、制作节目,也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收视效果。



郭光允『反腐英雄』

2003年8月9日,中纪委公布决定开除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党籍,撤销他的正省级的职级待遇。在这个决定当中还第一次提到了一个举报人的名字:郭光允,他因为举报而遭到程维高的打击报复。这个已经被开除党籍又恢复党籍的普通的正科级干部和程维高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斗争,在河北省他被称作是新时期的反腐英雄,并成为2003年度的新闻人物。《新闻夜话》在中纪委的决定发布后,对重病缠身的郭光允进行了专访。

在这三期节目中,郭光允坦承自己和程维高从未见过面,也谈不上个人恩怨。但因为1995年他举报其他人的时候,牵连到了程维高的儿子,从此就开始受到这位前省委书记的打击报复。郭光允不仅被免去了工作,还两次遭到谋杀;他的家被抄了,亲人也受到此事的牵连。程维高又亲自下令成立了所谓的"9·26专案组",对一个普通机关干部郭光允进行残酷打击,判处其劳教两年。但郭光允并没有屈服,连续八年给相关部门写了上百封信,揭发程维高等人以权谋私的行径,并将检举信一直写到了中纪委,这对程维高问题的暴露和处理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节目播出之后不久,传来了郭光允得到平反的消息。2004年1月,郭光允的新书:《我告程维高——一个公民与一个省委书记的战争》问世,书的扉页上有这么一句引人注目的题记:"谨以此书献给那些误解我和怨恨我的人。"

面对中国电视谈话节目蓬勃发展的态势，我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电视谈话节目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

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电视谈话节目兴起的主要背景。

《实话实说》的总制片人时间曾经这样说过："社会的发展使谈话节目在中国成为可能，电视的发展同中国社会的发展，同人的解放紧密相连，可以说，谈话节目的出现是大势所趋。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一方面长期的封闭使人少有所思或思有偏颇；另一方面，社会转型给人们带来困惑，人们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因此，就需要加强交流加深理解。……可以说，实话实说已成为一种文化特征，它是社会的需要。"（转引自《现代传播》1998年第2期46页，《电视是让人说话的》何勇、潘可武）

的确，正是社会的发展与受众的需要才给谈话节目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改革开放前，中国人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思想相对单纯保守，再加上历史造成的不良影响，人们很少敢于在公共场合说真话、说实话，电视谈话节目当然不可能有生存的空间。改革开放打破了封闭的环境，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价值观念不断受到各种新现象、新事物的冲击，对此，人们既有困惑、又有烦恼，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渴望。但是，在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人们难免面临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与交流、人际关系越来越淡漠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电视谈话节目因其特有的互动性以及人与人之间面对面谈话方式的回归，受到了大众的热烈欢迎。大众的需求成为电视谈话节目蓬勃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力。

社会发展作为一种潜在因素呼唤着谈话节目的产生，电视自身的成熟则直接促进了电视谈话节目的繁荣。

首先，电视观众的成熟是电视谈话节目应运而生的前提条件。

电视作为现代科技的产物，发展历史并不长。1928年，在美国纽约通用电气公司总部所在地辛尼塔迪播出了一部情节剧《女王的信使》，一些观众使用最初的实验电视接收机收看了该节目，这可以看作是电视诞生的标志性事件。（参见《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第186页，吉妮·格拉汉姆·斯克特著，苗棣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新生的电视很快就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尤其在电视技术发展的早期，观众收看电视节目的状态可以用"狂热"两个字来形容。举例来说，美国曾经播出一部名为"我爱露茜"的情景喜剧，这部电视剧在美国颇受欢迎，收视率高达60%，这个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数字充分说明了电视观众早期的狂热状态。《我爱露茜》播出时发生的一些小趣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我爱露茜》播出的那段时间里，美国的一个小镇出现了自来水水压不足的现象，自来水公司经过调查发现，原来，在节目播出的空当，人们都抓紧时间上洗手间，同时用水因而造成了自来水的水压不足。

收看电视时照明强度的变化反映出观众收视时的精神状态由高度集中变得逐渐松散。电视刚刚进入家庭时，人们完全被这"奇异的小盒子"吸引，因此采用了电影院中的观看方式，把居室里的灯光全部关闭，全神贯注地观看出现在那个很小的屏幕上的电视节目。后来，人们开始亮上一盏小灯，以便在看电视时能够接电话、上厕所。现在，人们看电视时不但不再关灯，甚至还会看书、写东西、与别人聊天等等，还有的人习惯回家就把电视打开，在电视声音的陪伴

2002年2月，春节刚过。被誉为相声泰斗的马三立老先生，在天津不幸去世，享年九十岁。马三立老先生在生前是相声界辈分最大、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的表演艺术家。《新闻夜话》栏目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天津，在家中专访了马三立老先生的长子马志明。这是马老先生逝世后，他的家属第一次接受电视媒体的专访。

马志明回忆了马老生前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马老直到晚年还在坚持不断地创作，《逗你玩》就是在八十岁以后才创作出来的。

除了相声，马老留给孩子们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对这个问题，马志明毫不含糊，“艺术是不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的人品。”“如果在另外一个世界马老还会去说相声，他会说哪一段呢？”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马志明几乎没有犹豫，“应该是《逗你玩》吧，他就希望逗所有人乐，所有人乐了，就是对他最大的报酬，他最大的愉快。”





马志明 马三立长子

下做家务事，这时电视其实起到的实际是收音机的作用。电视逐渐由人们生活的中心退到背景与衬托的位置。

电视被高度关注时，人们的注意力完全被电视画面吸引，这时人们更希望看到动作性强、画面变化丰富的热闹节目。在中国，这种收视心理表现为各种综艺晚会的红火和各种电视剧的火暴。画面相对简单、缺少变化的谈话节目在此时自然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到了观众的收视心理较为成熟，能以平常心来对待电视的时候，电视画面对观众的吸引力就大不如以前了。相反，人们更倾向于“听”电视。人们常常是手里干其他的事情，耳朵里听着电视里传来的声响，再时而不时地看一下屏幕上出现的画面。谈话节目很适应现代观众的这种收视状态，其发生、发展其实是应运而生、应运而成的。所以说，观众收视心理的变化与成熟是电视谈话节目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

其次，节目制作的低成本也是电视谈话节目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电视谈话节目不像电视剧那样，要付给演员、剧作者很多的报酬，也不需要很多的拍摄时间。其制作人员数量较少，节目能够迅速合成，有的甚至采用直播形式，免除了后期制作的时间和费用，这些特点使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成本非常低廉。

以美国为例，制作一档片长为 60 分钟的电视新闻节目需花销 30~40 万美元；相对而言，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费用就要低很多，制作一档 60 分钟的谈话节目大约只需花销 5~10 万美元。中国各类电视节目的制作费用比美国又要低很多，而在各种电视节目的制作中，谈话节目的花费同样也是最少的。

目前，我国电视频道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且许多频道是以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的方式播出的，这就使得电视节目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在节目制作经费相对紧张的情况下，如何多快好省地制作节目就成为一个难题。谈话节目以其低廉的制作费用和相对简单的操作过程自然成了各类节目的首选。

三、美国电视谈话节目

了解国外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状况，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这是中国电视谈话节目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产生的必然要求。

相对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而言，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历史要长一些，已经发展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

在美国早期的电视节目中，就已经有了谈话节目的萌芽。在一些有观众参与的游戏节目中，主持人常常与现场观众和嘉宾进行一些即兴的机智对话。当这些谈话的片断逐渐发展，时间逐渐延长之后，就成为了一种杂耍谈话节目。这种融合了谈话、游戏、综艺表演等多种因素的节目形态在电视发展过程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这是因为“电视作为一种可视媒介，喜欢展示动作，而不仅仅是交谈。……从一开始，电视就想要人们在干什么的画面。”（参见《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第 193 页，吉妮·格拉汉姆·斯克特著，苗棣译，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1948 年，包含着名人访谈的大型杂耍节目《艾德·萨利文节目》与《米尔顿·伯尔节目》正式开播，节目先后邀请了许多著名的作家、演员和导演进行访谈。这两个节目的开播可以视为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开端。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电视谈话节目的数量仍然不多，这时受到大众热烈欢迎的是智力竞赛节目和电视剧。各种各样以巨额奖金作为诱惑的智力问答充斥着电视荧屏，吸引着人们的参与和观看。在为数不多的谈话节目



贝聿铭 世界建筑大师

贝聿铭是当之无愧的建筑大师，他设计的作品几乎每次都受到建筑界的瞩目，获得荣耀。他个人曾9次获颁美国建筑师学会设计奖、以及法国建筑学院金奖、日本帝赏奖和普利兹建筑奖，还有普里茨克建筑奖和法国荣誉勋章。其中普利兹建筑奖相当于诺贝尔奖，是建筑界最高荣誉。

2003年11月，由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正式奠基，引起了各方广泛的讨论和争议。争议主要在于选址上，质疑方认为拆除本体古建筑数千平方米来建造苏州博物馆新馆，无形中损害了忠王府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而贝聿铭同样表示，在这样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环境中建造一座崭新建筑，并将其打造成一片，真的很不容易。贝聿铭甚至感叹，“这是我五十多年建筑设计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挑战，也可能是我设计生涯的最后的一次作品。”

《新闻夜话》为此专赴苏州采访了贝聿铭先生。86岁高龄的贝聿铭先生在节目中告诉记者，只要身体允许，他将继续工作下去。

中，比较著名的有戴夫·加罗威主持的《今天》与琼尼·卡森主持的《今夜》节目。前者别出心裁地把一只黑猩猩引入节目中，从而使“明星闲聊”式的谈话方式得以确立，为今天的日间谈话节目奠定了基础；后者则把节目开头的独角笑话、同名流嘉宾的轻松谈话以及娱乐表演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种更为大众化的样式并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夜间谈话节目，为大卫·莱特曼和杰·雷诺所继承。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了日间谈话节目和名流表演脱口秀，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67年在俄亥俄州戴顿开播的《唐纳休节目》，主持人唐纳休以一种满怀关切的主持风格得到了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的喜爱，他在现场观众中来回走动和提问，从而把每一个观众联结在了一起，融入了现场的氛围，使谈话非常真实。唐纳休的成功推动了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进一步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期的这段时间里，许多谈话节目涌现出来，如《塞丽·杰西·拉斐尔节目》等等，其中，《唐纳休节目》的收视率一直独领风骚。

20世80年代、90年代是美国电视谈话节目迅猛发展的时期，大批的电视谈话节目活跃在电视屏幕，无论是日间谈话节目还是夜间谈话节目都进入了成熟的阶段。1986年9月，芝加哥一个名为《奥普拉节目》的电视节目进入全美辛迪加，在全国138个电视台播出，主持人奥普拉·温弗莉迅速地由一个地方节目主持人成为闻名全国电视脱口秀的明星。在那之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奥普拉节目》的收视率一直是电视谈话节目的冠军，奥普拉·温弗莉也成为当之无愧的“脱口秀女王”。

奥普拉的成功秘诀在于她改变了以往电视谈话节目以名人、明星为主角的模式，把普通人请到了聚光灯下。在以《唐纳休节目》为代表的传统谈话节目中，“歌手进行表演以推出新磁带，演员谈论他们的新电影，作家谈论他们的新书，政治家则得到了非正式露面的机会。普通人很少能出现在节目中，即使他们偶尔能够露露面，也是为了在节目的末尾激起一些幽默的小氛围。”奥普拉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模式，她把普通人邀上屏幕，“这些人来到节目里不是因为他们有一本书、一部影片、一盘磁带或是一种理念要推销，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饲养眼镜蛇的特殊爱好。他们来到节目中只是想要揭示一些让他们的心灵感到愉悦或烦恼的事，他们不过是希望在电视上、在上千万的观众面前得到某种‘心理治疗’。”（参见《Coming After O-PRAH--Cultural Fallout in the Age of the TVTalk Show》，by Vicki·Abt and Leonard·Mustazza，page58，publishedby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1997）奥普拉的这种革新带动了许多以揭露个人隐私为目的的谈话节目的出现，例如《莉基节目》、《杰尼·琼斯节目》、《杰瑞·斯普林格节目》等等。其中许多节目热衷于让人们公开他们生活中难以启齿的隐私，如虐待儿童、双性恋、乱伦、三角恋爱等等，从它们的话题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这种哗众取宠的倾向，如《偷了自己最好朋友男朋友的女人》、《十几岁少女与性》等，这些节目的主持人还热衷于让嘉宾们相互厮打，以满足电视观众的窥私癖，提高节目的收视率。这些节目招致了大量的社会批评，人们把称之为“垃圾脱口秀”，有许多专家学者甚至专门写文章探讨这些“垃圾脱口秀”对美国文化的负面影响。由于大量的谈话节目因话题低俗而招致批评，奥普拉从1995年起开始改变节目的定位，把话题集中在严肃、高尚的有关心理、家庭和社会等问题上。然而，从总体情况来看，美国严肃的电视谈话节目中仍然较少，大量的“垃圾脱口秀”仍然充斥着荧屏。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制作出的电视节目有着



吴仁宝　原华西村党委书记



吴协恩　华西村党委书记　吴仁宝之子

中国有90多万个村庄，但从没有哪个村支书退休，能像吴仁宝这样轰动。

这位76岁的老人，在长达48年的时间里，担任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华西村从1960年代开始成为“全国典型”，历经数十年风云变幻，始终屹立潮头“红旗”不倒，外界誉称“天下第一村”。

他在经济上同样创造奇迹：华西村从当初负债2.5万元起步，如今固定资产30亿元，拥有村办企业58家，2003年销售额预计100亿元。华西村村民人均年收入6000美元，每户都配备了小轿车，每家都建起了400平米以上的别墅。

吴仁宝曾说要在“书记任上干到80岁”，而2003年7月5日，他却出人意料宣布换届，他的四儿子——39岁的吴协恩经选举接班。新老交替的时刻，“天下第一村”在展望未来的命运。《新闻夜话》在这样的时候专访了这位老人。采访中吴仁宝语出惊人，承认自己这次才真正说了实话。

各自不同的特点，美国电视谈话节目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首先，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话题非常开放。

对言论自由的尊重以及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使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话题很少受到道德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因此大至世界大事、种族冲突，小至两性关系、人际矛盾等无不可以成为谈话节目的话题，甚至一些骇人听闻、稀奇古怪的事情也被作为谈资来吸引观众。利用普通人的窥视欲望提高收视率是许多谈话节目的惯用伎俩。

其次，美国电视谈话节目非常注重“栏目化”原则，十分重视节目播出时间、主持人和节目样式的稳定性。

除非有特殊情况，美国电视谈话节目总是在每周的某个固定时段中播出。因为稳定的播出时间可以形成稳定的观众群，避免收视率的波动。美国电视谈话节目还十分重视保持主持人的稳定。《今夜》曾有一位名叫琼尼·卡森的主持人，主持的时间长达 30 年。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样式也相对稳定，栏目的开头、结尾、段落数量、不同板块的组成方式都经过精心的设计，一旦得到观众的认同后就长期保持不变，这也造就了不同节目的不同风格。

美国电视谈话节目还十分注重品牌效应。一个谈话节目如果得到了观众的喜爱，收视率十分稳定，那么除非受到巨大的社会压力，或是收视率持续下跌，节目一般不会被随意取消或是大幅度改版。《唐纳休节目》持续了 38 年，《奥普拉节目》也已播出了 10 多年。

再次，美国电视谈话节目非常重视主持人的作用。

美国电视谈话节目对主持人采用的是“明星”策略。或是把主持人包装成明星，或是邀请已经成名的明星来担当主持人，总之是要千方百计地让主持人吸引观众的目光，以此来提高节目的收视率。奥普拉是在出演《紫色》一片，并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后才开始主持全国性的谈话节目的；另一位日间谈话明星莉基·蕾克也曾参加多部影视剧的拍摄；而大卫·莱特曼也凭借着主持 1995 年的奥斯卡颁奖晚会而提高了知名度。在互联网上和报刊上，人们也常常能看到由谈话节目主持人开辟的网页和专栏，这些都是“明星”策略的体现。

由于重视主持人的作用，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一般也赋予主持人很大的权力，由主持人决定选题、嘉宾乃至节目的种种设计，而节目的形式、对于话题的切入角度往往也充分体现出主持人的个性特点。

最后，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嘉宾和观众更善于表现自己，更具有荧屏魅力。

在美国谈话节目中，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发言都极为踊跃。有的嘉宾是第一次面对镜头的普通人，可是看不出他们有丝毫的羞怯。面对陌生的现场观众，他们敢于大胆地陈述自己的想法，投入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也敢于与持不同意见者激烈辩论，有时甚至出现对骂或大打出手的过火场面。这是因为美国文化重视个体价值的实现，提倡个性的张扬。相比之下，中国谈话节目的嘉宾和观众要温文尔雅得多，有些嘉宾不善言辞，在遇到激烈争论的时候，多数人也往往抱着“和为贵”的态度，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就算完事。这同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提倡“中庸之道”，强调喜怒不形于色，赞赏“讷于言而敏于行”有关。



蔡琴　歌手

一个歌唱家的声音好到了极致，会被形容为“她的声音如同天籁”，在华语歌坛有这种美誉的人凤毛麟角，台湾著名歌唱家蔡琴正是其中一位。她被称为流行歌坛的常青树，早在1979年，她以一首《恰似你的温柔》风靡台湾，成为华语地区的著名歌手。蔡琴也由于独特的音色，真挚的演绎而被称为唱老歌的第一人选。步入歌坛24年，蔡琴出版了四十一张唱片，她所演唱的300多首歌曲大都成了经典之作，并成为许多歌迷的时代记忆。2003年12月，她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首度举行个人演唱会，《新闻夜话》在此期间制作了本期节目。开朗的蔡琴自信地评价自己在华人的流行歌坛“是一个票房保证”。但她并不认为自己的嗓音是天籁之音，而是属于红尘人间的声音，拥有这样低沉而磁性的女中音，她觉得是自己的幸运而非骄傲。当评价新生代的歌手例如周杰伦，这位歌坛前辈则豁达地表示：“他（周杰伦）不是一个花瓶，我看到他一边打篮球，一边唱。我觉得那种炫，要是我是年轻人，我也爱。”在访谈的结尾，应主持人的邀请，蔡琴清唱了那首著名的《被遗忘的时光》中的两句，这两句曾经被2003香港最卖座的电影《无间道》引用，“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浮现在我脑海……”

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三种基本类型

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三种较为成熟的类型：叙事型谈话、辩论型谈话及讨论型谈话。它们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各有特点，了解这些特点，掌握不同类型谈话节目的规律，有助于更好地制作节目，提高节目质量。

一、叙事型谈话节目

自古以来，人们对叙事就存有一种热情。无论是孩童还是老人，都爱讲故事、听故事，人们通过故事认识世界，反观自身，获得对人生的经验。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人类的叙事活动就开始了。最早的叙事作品可以追溯到上古的神话、寓言，近现代更产生了无数小说、戏剧作品，而当电影、电视产生后，人类的叙事活动也扩展到了这些领域。电影在刚刚发明的时候，只是被视为纪录客观现实的工具，但是随着蒙太奇的运用，电影也得到解放，获得了叙事的自由，逐渐发展成为利用影像来叙事的一门新艺术。电视的诞生虽然要晚于电影，但电视利用影像来叙事的本领却不亚于电影，电视剧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更为方便和低廉的娱乐享受。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人可以说是生活在一种叙事的环境中，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从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甚至电视谈话节目中获得叙事的乐趣。

叙事型谈话节目正是顺应了受众对叙事的爱好与需求而兴起的。叙事型谈话节目是以讲述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谈话节目，与小说、电影、电视剧不同的是，叙事型谈话节目中讲述的故事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的，它常常由当事者亲口讲述，因此更具有现实的震撼力，也更能满足观众窥视的心理。

叙事型谈话节目的选题很重要，它讲述的故事一般应当具备如下两个条件：

首先，故事要有戏剧性。

戏剧性强的故事悬念不断，往往出现各种出人意料的转折，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举例来说，《相约夕阳红》制作的《为健康喝彩》与《走进墨脱》就是两个在这方面非常成功的节目。

《为健康喝彩》讲述的是一位年过 70 的老先生进行体育锻炼的故事。这位老先生从 60 岁开始练健美，每天都要坚持大运动量的锻炼，如今还能做头手倒立等高难度的体操动作。《走进墨脱》讲述的则是上海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冒着生命危险，翻山越岭，徒步进入位于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一侧的墨脱县，为当地建起希望小学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最大悬念就在于它们是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老年人是一个暮气沉沉、精力不济的群体。而这两个故事恰恰打破了人们的这种偏见，展现了两位老人身上旺盛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力，因而非常出人意外，具有戏剧性。

其次，故事要有争议性。

谈话节目是公众的论坛，人们在这里要进行相互的交流而不是作独白式的讲述。如果选



刘昌刚　湖南省凤凰县县委书记(左)
张永中　湖南省凤凰县县长(右)

凤凰城被称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它山清水秀，人杰地灵，风格独特，至今仍保存着较好的明清以来的朝阳巷，沙湾古民居区，回龙格吊脚楼群，以及沈从文故居等。沱江两岸，飞檐翘角的吊脚楼与清澈秀丽的沱江交相辉映。

在2001年凤凰城被国务院正式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个山清水秀，让人陶醉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国家重点扶贫县。那么怎么保护好这块风水宝地，就成了非常大的问题。在2001年的12月23日，也就是被国务院命名之后的第八天，湘西凤凰县人民政府以8.33亿人民币的价格，将凤凰古城的八个景点的经营权，转让给了某投资公司，经营期限是五十年。整整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凤凰古城的保护和开发情况又如何呢？《新闻夜话》为此专访了凤凰县的县长张永中和县委书记刘昌刚。

这两位凤凰县的行政长官承认："把保护跟开发利用这个关系协调好，就很有学问。"他们会像对待古画一样耐心细致地对待凤凰城的保护。目前他们已经采取了限制游客、外迁居民等措施，同时严格控制投资公司对它的开发，时刻警惕过度商业利用对古城的危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访谈在秀丽的沱江上进行，这为节目增色不少。



题没有涉及到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让观众关注的问题，讲述的只是非常私人化的经历，现场观众就会觉得无从谈起，相互交流也无法进行。在这方面，《实话实说》的制片人时间有着亲身的体会："我们曾经播过一期节目叫《日子》，讲的是东北的一个私营企业家高大权的故事，她是集体企业的一个工人，后来成为专门做饺子的企业老板。当她讲完故事我们请现场观众提问的时候，很多观众好像听了一节课，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她讨论的。这使我们意识到，如果这种个案故事非常个人化，就是说观众很难从这种个人的遭遇中产生共鸣，那么观众就仅仅成为一种看客而无法参与讨论。"（参见《〈实话实说〉的实话》第13页，时间、乔艳琳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可见，叙事型谈话节目不能仅仅停留在讲故事这一层面上。让更多的人进入到故事背后，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才能让节目获得真正的成功。

有了一个很好的故事并不一定能够制作出成功的节目，编导还要懂得如何利用电视谈话节目的各种手段把这个故事讲好。同样一个故事，技巧高明的叙事可以把情节组织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技巧低劣的叙事却让人感到如同记流水账，平淡无味。一般来说，叙事型谈话节目的叙事与戏剧、小说、电视剧的叙事有相通之处，它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是情境。

情境是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在叙事型谈话节目中，同样要把情境交代清楚，如故事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要一一向观众做出交待，有助于观众对故事更深入地了解。在节目中，编导可以把事先采访到的故事的背景编成短片，在现场用大屏幕播放出来，也可以让主持人通过简短的话语交代出来，还可以在主持人与嘉宾的谈话中叙述出来。例如在《相约夕阳红》的节目《孔英上学》中，主持人陈志峰与孔英老人有一段关于她小时候如何渴望上学的对话，有了这段对话，观众才能理解孔英老人上完老年大学又上高中的行为。又如在《走进墨脱》中，现场先通过大屏幕播放了一段短片，介绍了墨脱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教育状况和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望。放完这段短片后，现场谈话才开始讲述老人到墨脱建希望小学的故事。这个短片就起到了交代故事情境的作用，有了这个短片的铺垫，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老人的艰难与伟大。

其次是冲突和发展。

叙事型谈话节目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故事叙述得生动有趣。要达到这个目的，编导和主持人首先要分清内容的主次，该一带而过的部分不要费太多口舌，该详细讲述的地方则要层层展开。这样故事的叙述就有了基本的节奏，轻重缓急也会比较得当。此外，编导和主持人还要善于让故事在冲突和矛盾中展开，因为冲突和矛盾能够让谈话的过程变得跌宕起伏，富于趣味性。当然这种冲突和矛盾不能是牵强附会的，而应来自故事本身。例如在《孔英上学》中，编导和主持人没有一味肯定和表扬孔英的精神，而是围绕着老人热切的学习愿望与自身年龄、精力之间的矛盾，老人上学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老人上学引发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议论等几方面的冲突展开，使谈话内容非常紧凑，故事的内涵也得到了更深的开拓。

第三是高潮和转折。

在戏剧中，高潮是冲突最激烈的时刻，高潮一过，情节便立即急转直下，所以高潮又是最大的一个转折。成功的叙事型谈话节目也有高潮，这个高潮是通过层层矛盾、冲突的推动达到的。还是以《孔英上学》为例，节目先谈论了老人学习的情况、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她的求知愿望是



马季　著名相声艺术家

2003年1月4日，第二届CCTV全国电视相声大赛刚刚落下帷幕，仅仅一个多小时之后，《新闻夜话》即播出了对著名相声艺术家、本届大赛的监审委员马季老先生的专访。

这是一期快速反应与深度报道并存的节目，面对主持人的提问，相声名家马季承认现在相声的水平不理想，只能打80分，而原因则是现在的相声表演缺乏实践空间，缺乏与观众的现场交流，同时某些创作者也忽略了相声的本质是语言艺术。只有及时地把现实生活当中的东西搬上舞台，和观众产生共鸣，这才有相声的施展舞台；和观众产生共鸣，这才有相声的生命力。这些观点都是马季先生第一次对媒体提出。

马季先生对本次大赛精当的点评，对相声现状坦诚的剖析，加之恰到好处的时效性，使节目获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并被多家平面和网络媒体转载。

怎样产生的、她同老伴怎样相识相恋,通过层层的铺垫逐渐发展到老人上学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冲突。此时,主持人不仅让孔英的老伴大胆说出自己的意见，而且适时地引入了现场观众的参与,各种观点的碰撞一下使冲突变得激烈起来,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形成了全场的高潮。

第四是结局。

一个精彩的结局不仅能让节目在结束之前再次达到一个小小的高潮，而且能让观众感到意犹未尽,回味良久。

节目可以安排主嘉宾进行才艺表演作为结局。如《为健康喝彩》节目结束时,嘉宾就为观众表演了他拿手的体操动作，这场表演让观众直接感受到了老人旺盛的生命力，为节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节目也可以安排一个出人意外的惊喜作为结局。《相约夕阳红》曾经做过一期名为《敬老车的故事》的节目,邀请的嘉宾是一位让老年人免费搭乘自己出租车的司机。在节目中,这位司机曾经说到自己因为挣钱不多，有六年都没有回过家，非常想念父母的事情。当节目快要结束时,主持人突然告诉他,节目组已经把他的父母接到了北京，现在正在观看节目的录制，说完后，主持人就把嘉宾六年未见面的父母领入现场,一家人泪流满面地拥抱在了一起,现场的观众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这出人意料的惊喜把全场的情绪调动到了最高点，不失为一个设计得非常精彩的结局。

叙事型谈话节目可以从头至尾只讲述一个故事,也可以围绕某个主题讲述多个故事。前者多属个案型的节目,嘉宾一般是故事的主角,这样的节目有很多,如《父女之间》、《孔英上学》;后者则围绕一定的主题讲述多个故事。《影视俱乐部》就是这样的节目,它经常邀请一些影视演员来就某个话题讲述故事，例如有一期节目请了几位都长得很胖的演员，坐在一起讲述“肥胖”在他们的影视表演中带来的一些趣事。由于演员的表情很丰富,语言表述也很精彩,节目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二、辩论型谈话节目

辩论型谈话节目是展现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以及观点在交锋中带来的激烈碰撞，因此辩论型谈话节目的即兴色彩最为强烈，也最能展现语言的魅力。除了即兴的魅力,辩论型谈话节目的理性思辨色彩比较浓厚,它严密的逻辑、高水平的论争也十分吸引观众。

辩论型谈话节目做得精彩有一定的难度。首先难在选题。

辩论型谈话节目的选题应当是观众感兴趣的、有现实意义的。例如《实话实说》曾经做过的一些辩论型节目《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不打不成材》、《高山旅游区要不要建索道》等等就是人们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容易产生困惑的问题，这样的选题才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激起参与的欲望。

同时，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应当能形成两个鲜明的对立面,而且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能够自圆其说,能够经得起几个回合的交锋和较量。例如《高山旅游区要不要建索道》这个选题就直接构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建索道,因为这样可以极大地方便游客;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能建索道，因为索道破坏了原有的自然景观。双方的着眼点不同,各有所据,因此辩论起来也就分外激烈,现场氛围十分活跃。

此外，辩论型谈话节目对嘉宾的要求也比较高。

辩论型谈话节目要求嘉宾有很好的修养。观点对立的双方在辩论时往往感情非常投入,而且言语往来间往往也带着浓浓的火药味,在



中国金牌婚庆主持人得主王纪浩参赛现场



张国梁　中国婚庆主持人大赛组委会副主任

2004年6月29日，首届中国婚庆主持人大赛总决赛在北京揭晓，40名金牌主持人是从全国各地120多名选手中脱颖而出的，但是针对目前国内婚庆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在缺乏行业规范的前提下，金牌主持人的名分对于获奖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优秀的婚礼主持人是什么样的？除了口才好，能把婚礼仪式顺利完成，还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对于这些问题在节目中，本届大赛的组委会副主任张国梁和金牌得主王纪浩都作出了很好的回答。

录完节目后王纪浩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节目，没怎么准备，问什么就回答什么，回答得比较真实，节目挺好的。以前没怎么注意CCTV-12频道和《新闻夜话》，现在了解以后就经常看。节目内容真实、新鲜，经常抓住社会上比较突出、时尚的问题，态度不偏不倚，主持人很厉害。”

这样的氛围中,如果嘉宾没有很高的修养,不能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辩论会很容易演变成一场人身攻击。中国的谈话节目就曾经有过这样失败的例子,嘉宾在台上吵得不可开交,现场完全失去了控制,节目录制只能宣告失败。

辩论型谈话节目要求嘉宾的水平要相当。作为观点对立的双方,嘉宾的水平应该旗鼓相当,这样辩论起来才会有多个回合的对抗。如果其中一方的水平远远高于另外一方,现场就很容易变成"一边倒",这样当然不可能有精彩的交锋,观众也会觉得不过瘾。

辩论型谈话节目还要求嘉宾有很强的逻辑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在辩论中,嘉宾要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首先就要找到对方论述中的弱点,这就要求嘉宾要有很强的思辨能力,能够迅速分析对方的表述,找出"漏洞"进行反驳。同时,他还应能够清晰、严密、有层次地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让对方无隙可乘。

值得注意的是,电视谈话节目中的辩论应该是一场真实的辩论,即现场嘉宾与观众所表达的应该是他们一贯所持的观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谈话才是真实的,有意义的,节目也才能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如果像一些"大专辩论会"之类的辩论比赛那样,为嘉宾事先规定一个观点,或是让现场观众做"托儿",难免成为纯粹的语言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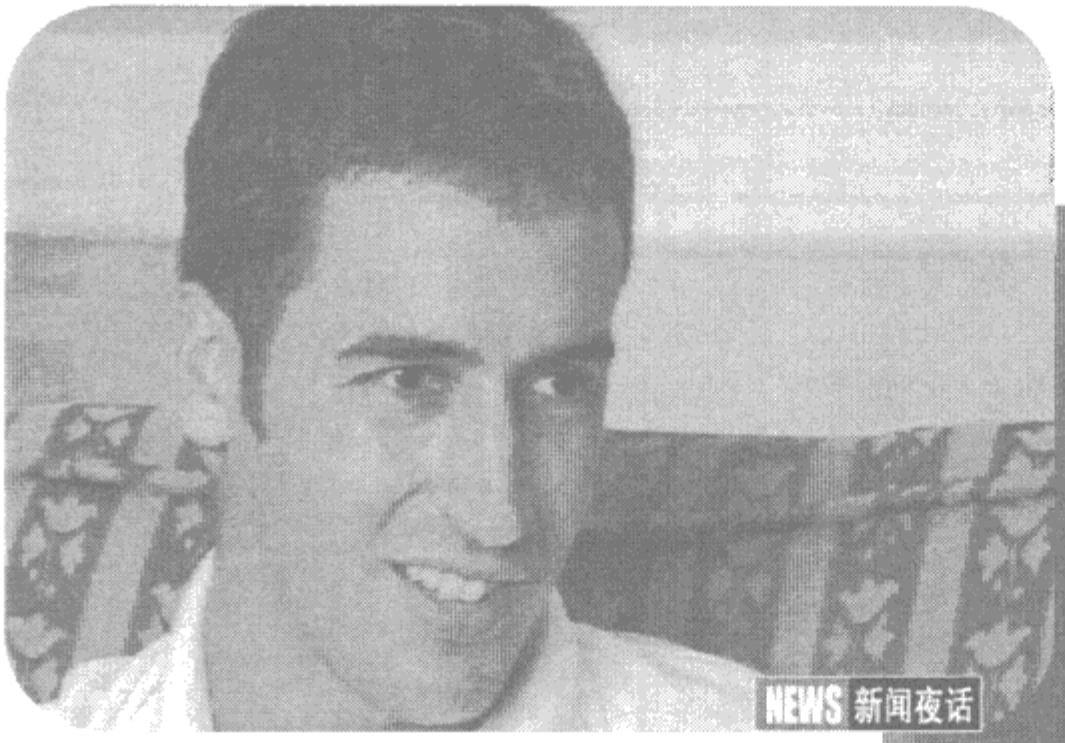
三、讨论型谈话节目

我国目前的谈话节目大多属于这种类型。早在1992年上海东方台开办《东方直播室》时,制作的节目就是采取专题讨论会的形式。讨论型谈话节目的争论不像辩论型谈话节目那么强,现场的语言交锋也没有那么激烈,它更多地展示的是嘉宾围绕某个问题所进行的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交流与探讨。观众在讨论型谈话节目中希望得到的主要是对问题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

同辩论型谈话节目一样,合适的选题也是讨论型谈话节目面临的难题。

节目的定位决定着节目的选题。目前,在中国的讨论型谈话节目中,感到选题压力非常沉重的,往往是那些把受众定位在适合所有人观看的节目。这类节目在创办初期比较容易找到大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节目也在很大程度上因谈论这些话题而得到很高的收视率。但是随着节目一期期播出,这样的资源越用越少,"众口难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同时由于宣传政策的限制,有许多话题虽然让人关注,却无法拿到节目中来讨论,因此节目往往越做反响越小,收视率也逐渐下降。针对特定受众群的口味确定选题相对要容易些。这类节目虽然不容易引起轰动、得到广泛的关注,但是收视群体比较稳定,因此节目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也相对持久。在当今电视节目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这类节目也更符合电视的分众化发展趋势。

讨论型谈话的选题不一定是某个具体的问题,也可以从具体的个案或是某种新现象入手,在谈话中逐渐深入故事或现象背后展开讨论。例如《对话》曾经做过一期关于少年作家韩寒的节目。韩寒本来可以作为中国教育问题、天才少年问题,甚至是当代文学创作的问题等话题的一部分来谈,但是《对话》没有围绕着这些较大的话题来操作,而是把韩寒作为了一个个案,直接讨论这个个案的意义。这期节目讲述了韩寒的故事,邀请了专家进行评论,也请韩寒谈了自己的感受,通过这些讨论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韩寒的成长进程只是一个特例,其他人不应该,也无法仿效;同时,一个成熟的社会也应平和地包容这样极富个性的年轻人,从而表现出了一定的文化深度。



劳尔　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队长



2003 年 7 月，全球排名第一的足球俱乐部队皇家马德里队访问中国，在国内球迷与媒体上掀起“皇马热”，连普通公众都言必称“小贝”“齐达内”“罗纳尔多”，而贝克汉姆所称的“西班牙的皇帝”，则是皇马的队长劳尔。由于皇家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训练，所以只安排了几场新闻发布会，全程唯一的一个专访机会就给了央视 12 套的《新闻夜话》。

“皇马”被称为最成功的足球俱乐部，但它也因为过度商业化而受到质疑。皇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推销自己的品牌，那么它会不会成为体育界的麦当劳呢？劳尔否定了这种说法。他列举了皇家马德里队五年以来获得的所有冠军之后，语气肯定地说：皇家马德里队更像是一个为荣誉而战的团体。至于他本人，他既不会像罗纳尔多那样，每次踢进球之后就高高挑起自己的食指，好为某啤酒做广告；也不会像贝克汉姆那样，每次接受采访都要收取高额的采访费。他还是保持了一个球员本色，不会让自己过度商业化。而谈起自己的职业，他说足球的魅力就在于射门，如果一场比赛有很多进球，无论观众还是球员都会乐在其中。

这两集节目首播时，正值中国龙之队与皇家马德里队比赛当晚，所以达到了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电视谈话节目的主持人

一、主持人的地位与功能

主持人是电视谈话节目的核心。这是由谈话节目的形态特点决定的。与其他形态的节目不同，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不能只是拿着事先写好的串联词，根据导演的要求进行一番职业化的处理后就面对镜头开始工作——谈话节目需要主持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如前所述，即兴交流是谈话节目的重要魅力所在。即兴谈话无法事先写好脚本，带有很大的不可预知性，编导与策划即使事先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考虑到了各方面的因素，现场录制时仍然会产生各种意外。面对现场的这些变数，编导与策划是无能为力的，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主持人。因此主持人的反应能力就直接影响到节目的质量。

美国的电视谈话节目十分突出主持人的号召力。许多谈话节目直接冠以主持人的姓名，如《唐纳休节目》、《奥普拉节目》、《莉基节目》、《与大卫·莱特曼共度夜晚》等等，许多谈话节目在挑选主持人时也倾向挑选为大众熟知的明星。采用这种“明星策略”是因为电视节目制作者在长期的实践中意识到：谈话节目十分依赖主持人的个性色彩和个人魅力，观众常常因为喜欢某位主持人而成为该节目固定的收视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主持人就是节目最有效的“金字招牌”，把主持人培养成为明星或由已经成名的明星来担当主持人，便意味着节目能拥有成千上万的崇拜者，节目的收视率、影响力也会随之上升。以著名主持人的奥普拉·温弗莉为例，《奥普拉节目》使她拥有了巨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以至在《奥普拉节目》中介绍的书籍常常名声大振。一本名为《爱的归复》的书经奥普拉的推荐，在1992年售出上百万册，成为当年的畅销书，该书的作者也因此而一举成名。明星主持人对观众所拥有的巨大的影响力也由此可见。

在中国，谈话节目的制作者们也充分意识到了节目主持人的重要性。《实话实说》的制片人时间曾说：“可以说，没有崔永元就没有今天的《实话实说》。”（参见《〈实话实说〉的实话》第11页，时间、乔艳琳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他的这个评价充分说明了主持人在该谈话节目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对《实话实说》而言，崔永元的主持让节目在创办初期迅速赢得大量观众的喜爱，使节目站稳了脚跟。直到今天，崔永元的主持仍然是节目保持高收视率的重要保证。有一段时间，《实话实说》曾经启用过其他的主持人，但这些主持人却难以获得观众认可，也无法像崔永元那样受到观众的喜爱。央视调查中心提供的1997年4月前的数据表明，比起其他同样主持《实话实说》的主持人来，崔永元主持的节目的收视率要“高出0.115个百分点，与当时的收视率平均值相比，这意味着收视人数增加了约9.3%。”（参见《〈实话实说〉的实话》第439页，时间、乔艳琳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这个数据表明，《实话实说》的相当一部分观众是为了观看崔永元的主



朴永浩和他的妈妈郝桂云

每100个孤独症儿童中，5~10人将在成年后可以独立；25~30人会取得好的进展，但仍然需要支持与指导；60%的人，终生伴随着严重的残疾而不得不依赖于他人。从半个多世纪前发现孤独症到现在，研究人员只知道这种病和脑部生理结构或神经病学有关，但不知道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这些孩子的父母一般都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面对公众。

但是一个患有孤独症的孩子，朴永浩和他的妈妈郝桂云决定接受《新闻夜话》的采访，以此唤起更多人的爱心和良心——不要排斥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节目中的另一位嘉宾田惠平则专门为这些需要关爱的孩子们创办了一所学校。

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一向是《新闻夜话》关注的重要内容，并且为此制作了大量节目，比如关注孤独症儿童。

在世界范围内，每一千名孩子当中就有一名患有孤独症。有人用这个国际比例推算出中国的孤独症儿童，大约有一百万，而且专家透露，近几年孤独症发病率还有急剧上升的趋势。



田惠平　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所长

持，他们认可的是崔永元那种机智、幽默、平民化的主持风格。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逐渐把《实话实说》与崔永元视为了一个共同体，由此而“爱屋及乌”，崔永元的风格也就是《实话实说》的风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谈话节目与主持人的关系可以称得上是互为表里。谈话节目为主持人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自己才华与个性的空间，而当主持人的风格逐渐形成，并与节目逐渐融为一体时，主持人就成为节目的灵魂，成为节目吸引观众的一面旗帜。

主持人作为谈话节目的核心，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主持人参与前期策划过程。

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作为现场谈话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事先必须对谈话的内容和参与谈话的人有一定了解，对谈话的范围、层次、脉络做到胸有成竹，这样现场录制时才能应付自如。所以主持人在节目的前期准备阶段就介入是非常必要的。

谈话节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主要包括选题的确定，对有关信息的收集整理，选择嘉宾，开策划会讨论谈话的结构、层次、表现形式，设计各种技术手段的运用等等。虽然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制片人、策划、编导各有分工、各司其职，但他们都要及时地与主持人进行沟通交流，以便于主持人全面地掌握节目的进展情况。

具体说来，在节目前期，主持人应做的有以下几项工作：

1. 掌握与选题有关的信息。

无论是编导、策划还是主持人，全面了解与选题有关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掌握得越充分，在设计谈话的内容、寻找合适的话题切入点时就能有更多的选择。主持人掌握的信息越多，他对节目的理解就越深入，现场主持时发挥的自由度也越大。

与选题有关的信息一般包括选题涉及事件的来龙去脉、相关的知识背景、人物的经历等。不同类型的谈话节目选题取向有所不同，主持人对信息的了解也应各有侧重。

知识类的谈话节目，其选题通常有很强的知识性和专业色彩，主持人就要根据选题的要求有针对性地、系统地了解相关的专业知识。例如《健康之路》的选题基本上是一些观众关心的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主持人就要针对选题涉及的疾病了解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对疾病的症状、发病率、危害等方面都要做到有充分的了解，这样在现场与专家谈起来才能听得明白、问得到位。

新闻类谈话节目的选题与新闻事件息息相关，主持人事先要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时时关心它的最新动态。同时由于新闻类谈话节目一般不仅限于就事论事，主持人还要阅读大量的与之相关的材料，对新闻事件的深层背景、内在原因、持续影响有一定了解。凤凰卫视主持《一点两岸三地谈》的陈鲁豫，还同时主持着另外一档新闻节目《凤凰早班车》，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报纸、资料，在头脑中储存了大量的新闻信息，因此，她在主持《一点两岸三地谈》时各种信息资料信手拈来，显得得心应手。

娱乐类谈话节目的样式有很多，有讲述故事的个案型节目，也有对焦点问题进行讨论的讨论型节目，还有“跑题跑不停”型的清谈型节目。不同样式的节目要求主持人掌握的信息是不同的。个案型节目要求主持人要尽可能多地掌握细节，对当事人的性格、经历也要有所了解。讨论型节目要求主持人吃透话题，从各种渠道了解人们对该话题的不同反应，还要向有关专家、学者请教，使自己的认识能更全面、更深入，达到更高层次的把握。清谈型节目的主持人则要重视日常的积累，从各种报刊、杂志中汲取



张福杰 《携手》总编



目前，一千多万人因为艾滋病而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在每一天又有一万五千多人成为了新的艾滋病感染者。在2002年6月，国家卫生部有一个统计的结果，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应该在一百万人左右。中国的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在1985年发现的，到现在已经有19年的历史了。

2002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们终于有了第一本属于自己的杂志——《携手》，这是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直接参与的读物。节目中我们专访了该杂志的总编张福杰，以及这本杂志的一个编辑小李，他是艾滋病防治工作圈里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人，他在一次输血当中意外地感染，采访时他已经和艾滋病斗争了七年。

自己需要的东西，做生活的有心人，因为经历过的各种事情、听到的各种趣闻甚至平时与朋友间的交流都能成为节目中谈话灵感的来源。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锵锵三人行》的主持人窦文涛，常常在在节目中拿着手机，念出朋友给他发送的短信息。

总而言之，主持人在前期对选题各方面的信息进行充分了解是十分重要的。随着主持人占有、消化各种信息程度的加深，主持人对节目的兴奋感会一步步加强，主持人对选题从理性到感性再到理性的把握也会越来越深入。

2. 了解参与谈话者的想法，掌握其谈话方式。

在前期准备过程中，寻找嘉宾、确定人选是一项十分重要也很艰巨的工作。一般而言，这项任务是由策划、编导去完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持人就不需要参与其中。协助编导找到合适的嘉宾，了解嘉宾观点、想法，熟悉其谈话方式，这些都是主持人进行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嘉宾是现场谈话的主要参与者，是主持人直接面对并与之交流的人，现场谈话的氛围如何，谈话的过程能否“出彩”，都与嘉宾有着直接的关系，主持人只有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够“百谈百胜”。

不同的谈话节目主持人与嘉宾事先进行沟通的方式也不同。

有的主持人在节目录制前一般不与嘉宾见面。《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崔永元就是这样。这主要是因为担心嘉宾在与主持人交谈后受到影响，进而改变原来的观点和态度；或是由于把要说的话提前说了，到现场反而少了新鲜感。但是主持人事先不与嘉宾进行交流，并不意味着主持人就放弃了对嘉宾的了解。《实话实说》采用的方式是：由策划先了解嘉宾的情况，对他的态度、个性、谈话方式了解清楚后再详细地反馈给崔永元，这样崔永元同样也能够详细地了解嘉宾的情况。这种间接了解嘉宾的方式非常依赖于策划的经验累积。

有的主持人则愿意直接与嘉宾进行交流，或者采取打电话的方式，或者与嘉宾见面聊天，在直接的语言交流中了解嘉宾。这种直接交流的优点在于主持人能够直接判断与自己交谈的这位嘉宾是否是现场谈话的合适人选。作为在录制现场与嘉宾面对面交谈的人，主持人对嘉宾的判断直接关系到现场谈话的质量，如果节目的编导不是很有经验，由主持人与嘉宾直接进行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主持人在前期与候选嘉宾交流时，充当的应该是“倾听者”的角色，要多听嘉宾的观点，多留意他的谈话方式和说话的特点，尤其要留意嘉宾的兴奋点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能让嘉宾提起兴趣。主持人不能向嘉宾灌输自己的意图，更不能让嘉宾改变他的观点来迎合节目需要。总之，主持人不能让嘉宾为了节目的需要成为一个虚假的谈话者。

3. 参与策划会，与策划、编导充分沟通。

策划会是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采用“脑力震荡”方法来对节目内容和形式进行设计的一种非常好的形式。现在大多数谈话节目都采用这种形式来进行节目的设计与策划。

一般而言，在选题确定之后，编导或负责选题的策划要根据搜集到的信息设计出一个最初的文案，再与制片人、主持人、节目组内部的策划或邀请来的专家一起开策划会，对文案进行修改，这样的策划会一般要开两到三次。在每次策划会后，编导与主持人还要就策划会上提出的各种建议进行沟通与交流，充分消化和吸收其中富于创造性的精华部分。

作为谈话的引导者和直接参与者，主持人参与策划会，有助于清晰地把握住谈话的脉络，

译制配音电影曾经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丁建华、施融的《茜茜公主》，把王子公主的故事推到了一个极致；童自荣、邱岳峰的《佐罗》，让人们知道了什么是“白马王子”的声音；而丁建华、毕克的《追捕》，让“真由美”成了真善美的代名词……

这些专业的配音演员以其专业的配音功底、良好的敬业精神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但是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观众对配音电影发出了质疑之声。他们宁愿承受语言的隔阂，看字幕版的原声电影。这些曾经让无数人痴迷、反复聆听的声音真的只能尘封在记忆里了吗？

在这期节目中《新闻夜话》的记者带领观众重新回到记忆深处，亲耳听听老艺术家讲述配音工作的真相，其中的艰苦、困难、执着、时下的困惑和无奈，听老艺术家谈对今天原版影片和译制影片欣赏方式的看法。



乔榛、李梓、丁建华　配音演员(从左至右)



第一代上译厂配音演员合影

更全面深入地了解策划和编导的意图。此外，主持人也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策划会上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构思和设想，主持人参与策划会，对节目最终操作性文案的形成和落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谈话节目以主持人为中心的独特表现。

4. 设计问题，完成节目文案。

节目文案是由编导、策划与主持人共同完成的。其中，编导和策划主要负责确定节目的内容、结构、话题层次以及切入的角度，主持人则要把具体的问题设计出来。

主持人自己设计问题是由谈话节目的特性决定的。现场谈话的即兴发挥要求主持人能够随机应变，根据嘉宾的反应和现场谈话的氛围来控制谈话的节奏、走向，保证既能把话题充分打开，又能在该“言归正传”的时候及时回到谈话的主脉络。这种对现场的控制常常是通过主持人的提问来实现的，一个谈话节目中主持人需要准备提出大量问题，如果所有这些问题都由编导、策划来设计，主持人仅凭自己的记忆力记下这些问题，他对节目的理解是不可能深入的，在现场往往会出现应对不及的尴尬场面。由主持人自己设计问题，既检验了主持人对前期资料、信息的掌握情况，又能够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主持人在设计问题的过程中常常要预测一下嘉宾和观众的反应，这其实也是对节目现场进行了一次提前的“演习”。有了这样一个设计问题的过程，主持人对选题的理解程度就加深了，在现场才能发挥得灵活自如，真正做到随机应变、反应敏捷。

第二、主持人是现场谈话的中心。

经过前期的精心策划，谈话节目的制作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部分：现场谈话的正式录制。

现场谈话主要依靠主持人来进行调度和控制，主持人对节目录制是否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一些谈话节目采取了现场直播的播出方式，主持人如果发挥不好，节目的失败将直接呈现在电视观众面前；即使采取了录制播出的方式，主持人表现不好也会给后期编辑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崔永元认为，“现场至少要占到50%以上，因为主持人的现场发挥直接关系到节目的成败。节目策划得再好，主持人现场变成了大傻瓜，这个节目就很傻，后期编导再有本事，也不能妙手回春。”（参见《<实话实说>的实话》，第108页，时间、乔艳琳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谈话现场的主持人发挥着三个重要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参与现场谈话的谈话者”。

与嘉宾和现场观众一样，主持人在现场也是一个谈话者，他用富有个性的语言与嘉宾或观众交流，表达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现场的人一同享受着谈话的乐趣。主持人与嘉宾共同构成谈话的主体。主持人以平等友好的态度对待嘉宾，向嘉宾提出问题，共同就某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并在适时的时候对嘉宾的发言进行总结或评点。同时，主持人还与现场观众进行交流，倾听现场观众的意见与问题，询问他们的真实想法。他与现场观众的谈话扩大了交流的范围，活跃了现场的气氛，推动谈话向更深层次展开。

第二个功能是“现场谈话的组织者”。

主持人掌握着现场的主动权。主持人通过提问、暗示等技巧调动嘉宾的情绪，控制谈话的走向，调节谈话的节奏。主持人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案诱导嘉宾进行谈话，最终使编导和策划的意图得以实现。

主持人在嘉宾与观众间进行调度和协调。在谈话中，主持人要注意让每位参与节目的嘉宾都有发言的机会，不能“厚此薄彼”。当嘉宾的



魏纪中　北京奥组委执委

雅典奥运会结束后，全国沉浸在一种喜悦的气氛中，各家媒体对奥运的报道接近尾声。但是大多数报道都是集中在比赛本身和冠军得主身上。从新闻的视角看，雅典的圆满结束就意味着北京2008奥运会进入了倒计时，特别是胡锦涛同志在接见奥运健儿时的讲话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提到，要学习雅典的成功经验把2008北京奥运会办成高水平的奥运会。但是当时似乎所有的媒体都忽略了北京奥组委的存在，他们中那么多人被派往雅典学习，雅典对于他们来说无疑等于热身，无论是从组织管理方面，还是与国际奥委会的交流方面，会有什么新发现吗？从这个新闻点入手，《新闻夜话》独家专访了北京奥组委执委、前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对他的采访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在演播室挖掘出了尚未被其他媒体发现的新闻：对雅典的反思和北京2008的思考。

观点或意见出现分歧时，主持人要让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并且有讨论的机会。当“交锋”过于激烈时，主持人要适时化解，使嘉宾的“口舌之争”得以平息。主持人还要在嘉宾与现场观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让现场观众参与谈话，鼓励他们发表观点，加入讨论，使谈话保持活跃的气氛。

主持人在节目中可使用各种技术手段为谈话服务，活跃现场气氛。大屏幕已经成为主持人经常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在谈话的进程中，主持人常常在适当的时机用大屏幕播放事先准备好的影像资料，主持人可以利用这些影像资料来设计悬念、加强观众与嘉宾对话题的了解、引发场内讨论。热线电话和互联网也被用于实现与观众的互动的手段。在节目中使用热线电话与网络，可以把生活在不同空间的场外观众引入节目中，扩大交流的范围，使录制现场与场外联结成为一个巨大的“谈话场”，也使节目具有强烈的“直播感”。目前国内许多谈话节目都同时使用这两种工具，《健康之路》就是其中之一。

主持人承担的第三个功能是“大众的传播者”。

录制谈话节目的演播厅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空间。说它封闭，是因为演播厅是一个有着固定容量的空间；说它开放，是因为通过电视转播，演播厅里的节目同时又被传递到千家万户，拥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尽管在录制节目时，主持人只能看到身处演播厅里的嘉宾和观众，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持人就不需要同场外的观众进行交流。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应始终把场外的观众装在心中，面对大众进行传播。这一点经常被许多谈话节目主持人所忽视，他们在主持节目时自始至终只注意与场内观众交流，没有一句话、一个眼神是针对场外观众的，这就使场外观众感到自己与节目没有关系，无法融入到现场的交流中。

缩短观众与电视之间的距离，把更多的受众带到演播厅所营造的情境中，主持人才能实现“大众的传播者”的功能。要实现这个功能，主持人就要学会有意识地面对摄像机镜头讲话，因为摄像机镜头代表的是场外观众的眼睛。此外，还应在整场节目的录制中要设计出几个点，一般是在节目的开头、结尾以及几个段落的开端，在这几个点上，主持人要有意识地面对摄像机镜头说几句话，向场外观众传递信息，吸引他们的关注。主持人还可以利用其他一些道具，例如一封信、一部电话、一台电脑等等，引入场外观众的问题与观点，从而实现场内与场外的沟通与交流。

二、主持人的必备素质

作为现场谈话的组织者与参与者，谈话节目主持人只有真正打开嘉宾与观众的心扉，让他们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流露自己真实的情感，才能营造出成功的“谈话场”，节目才会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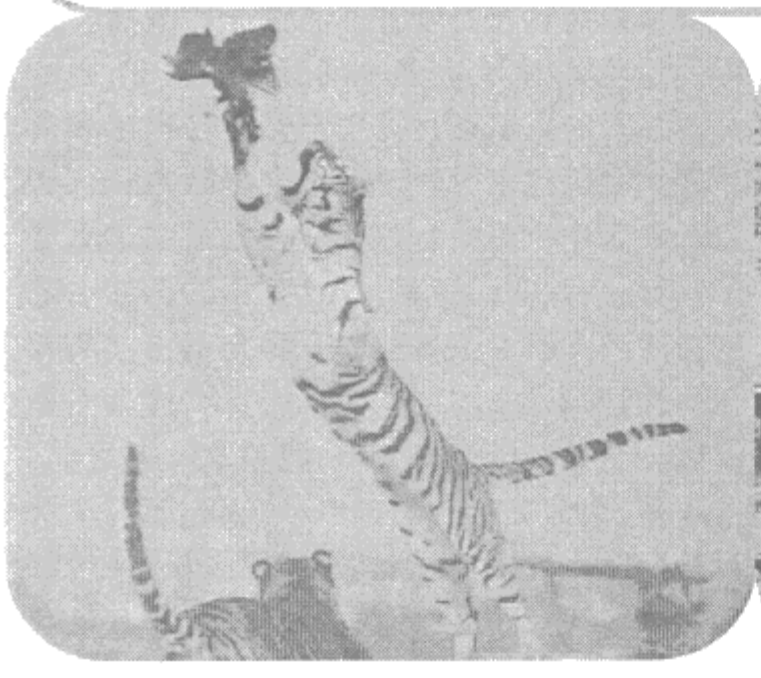
要让嘉宾打开心扉并非易事。在演播室这个陌生的环境中，在高强度的灯光照射下，同一群并不熟悉的人谈话，嘉宾自然容易拘谨和紧张，再加上摄像机时时刻刻都在提醒嘉宾还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他，嘉宾就更不敢说出心里话了。曾经到《实话实说》作过嘉宾的冯春明老人就描述过自己上节目前的紧张与不安：“两天后，我被通知参加《实话实说》的讨论，这一回是做嘉宾。当夜由于过分激动，我整宿没睡着觉，想了很多。当嘉宾可不同于热心观众。面向观众甚至是全世界的电视观众，时间那么长，现场还有 100 多名观众，既没台词又不排练，如有观众提问当即就得回答，就我这点水儿行吗？万一说砸了，我负得了这么大的责任吗？影响得多大呀

刘丹，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繁殖和野化训练基地——中国东北虎林园高级畜牧师。他可能是园里最特殊的一位饲养员，因为他在工作的同时，对于摄影还有着特别的爱好。从东北虎林园成立到现在，刘丹给园里的360多只各种状态的东北虎拍照两万多张，这在摄影史上都是很少见的。目前他已经出版了两本关于东北虎的画册。



据专家考察，现在真正的野生东北虎还不到10只。东北虎林园里的360多只东北虎无疑就是世界上最接近野生状态的虎了，把它们的各种生存状态如实地记录下来，既有珍贵的资料价值，也为进一步研究东北虎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刘丹在接受《新闻夜话》采访中，讲述了这两万多张照片背后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由于刘丹本身学的专业就是野生动物，再加上从事饲养工作长期跟老虎打交道，他对老虎已经非常了解。他说看到老虎一个动作或者老虎一个眼神，他就能知道它下一步、下一个动作要做什么。





……”到了录制节目时，老人就更紧张了，“在演播厅里，面对那么多观众，我虽然事先思想上做了些准备，但还是十分紧张，当一坐上嘉宾椅子，我的感觉是：心脏跳得快，脑袋有点儿懵，浑身热乎乎的。直到快接近话题的尾声时我才平稳下来。”（参见《〈实话实说〉的实话》第122页，时间、乔艳琳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对此不少嘉宾都有同感，如何消除嘉宾的紧张与拘谨，就成为主持人面临的一个难题。虽然在节目的前期策划中编导与策划可以设计一些有助于嘉宾放松的方法，但主要还是要靠主持人在谈话过程中通过语言、神态等来感染他们，使他们慢慢放松下来。要做到这些，主持人必须具备一定的修养和素质。

第一，主持人要有亲和力。

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需要不同气质的主持人。新闻节目的主持人要显得有权威感、要睿智，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实质；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则要活泼大方，能够活跃节目气氛；对谈话节目而言，则需要主持人有亲和力。

“亲和力”是能让别人感到亲切和放松的一种气质与魅力。主持人的亲和力首先来自于他对待嘉宾与观众的正确心态。所谓正确的心态，就是指主持人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嘉宾与观众，给予别人应有的尊重。

由于经常在电视这个大众媒介中露面，主持人很容易成为公众视线的聚焦点，随之而来的荣誉和财富有时也会使人的心态发生变化，失去平常心。有些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也常常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对嘉宾和观众不屑一顾，这样的主持人当然不可能有亲和力，只能让嘉宾和观众望而生畏或生厌。主持人对自己的工作要有清醒的认识，正确地对待名和利，要居安思危，始终有危机感，把观众的承认当作对自己的鞭策，更加勤奋和努力。

“亲和力”首先体现在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嘉宾。具体来说，就是对待普通人，不能看不起对方，不要在言谈举止中流露出轻视的态度；在对待名气大、社会地位高的嘉宾时，也不要处处奉承迎合，表现出卑躬屈膝的态度。在这方面，崔永元是一个很成功的主持人。《实话实说》是“站在平民的立场，关注平民的生存境遇，揣摩平民的所思所想”的一个谈话节目（参见《〈实话实说〉的实话》第66页，时间、乔艳琳主编，1999年版），邀请的嘉宾大多是平民百姓，带来的是平民的呼声。崔永元的主持就体现了“平民化”的特色，他朴实的语言，诚恳的行为举止及投入的情感无不透露出他对嘉宾与观众的尊重，他“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平和的方式，取得了节目在民众中的亲和力”。（参见《〈实话实说〉的实话》第66页，时间、乔艳琳主编，1999年版）

主持人的亲和力还来自很好的内在修养。谈话节目不是表演性的节目，现场的刻意修饰无法掩盖内在修养的缺乏，在即兴的谈话中，主持人的一举一动，所说的每一句话往往都是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这些细节直接向嘉宾和观众传递着信息。如果主持人的行为是粗鲁的，言语是无礼的，嘉宾和观众会立即产生不愉快的感觉，现场的气氛自然不可能轻松和谐；在许多辩论性强、嘉宾观点分歧大的节目中，如果主持人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现场的紧张气氛将难以得到有效的缓解，甚至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从而导致现场录制的失败。

主持人拥有开朗随和的性格也有助于谈话的进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不喜欢同郁郁寡欢、清高孤傲的人交谈，因为他们对别人表现得没有兴趣，更谈不上与别人分享快乐悲伤，这样的性格会让人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无法与他进行顺畅的交流。相反，开朗随和的人容易让



毛阿敏　歌手

2003年10月，国内流行歌坛有一张崭新的音乐专辑出现了，它的名字叫《美满》，演唱者是离开歌坛很久的毛阿敏。这张唱片标志着一位颇受关注、又屡被非议的女歌手开始继续她一度中断的演唱事业。在这个新的专辑里，大家将会听到什么？而离开歌坛很久的毛阿敏，现在的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在接受《新闻夜话》采访时毛阿敏为上述问题作解。在访谈中，毛阿敏披露，自己此前从未出过原创歌曲专辑，只是从前模仿邓丽君和苏芮出过盒带。而那些七拼八凑的"毛阿敏专辑"大都是盗版。当主持人质疑她唱的还像电视剧的歌曲，晚会的歌曲时，毛阿敏表示那些喜欢她的歌迷可能会买，尤其是那些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也可以说是给一部分比较成熟的人听的歌曲，而不是给年轻的听众听的。主持人旁敲侧击地问她曾经发誓再也不踏入演唱这一行时，毛阿敏承认：自己曾经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归咎于唱歌，所以曾经不愿意再干这一行时。而她笑言自己在某些方面"缺乏智商"。但是回国之后，偶然的几次演出让她发现自己最爱的地方还是舞台，舞台能够让她发现心中的喜怒哀乐。在节目中，主持人问她对时下歌坛盛行的"模仿风""包装风"的看法，毛阿敏坦率地说，这些都是暂时的，作为一个歌手还是要讲艺术水平，还是要靠内心的东西去征服观众。在这次访谈中，毛阿敏的回答非常直接和坦诚，展示出了她个性中比较真实的一面。

他人感到易于接近，喜欢同他交往，向他诉说自己的感受，同时他的活泼乐观也能感染别人，使谈话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往往一两句幽默的话、一个善解人意的眼神、一个体贴入微的动作，就能让嘉宾感受到主持人身上的亲和力，在他无形的感染下忘记自己所处的陌生环境，自然而然地投入到谈话中来。

第二，主持人要具备很强的“说”与“听”的能力。

谈话节目是以语言交流为主体的节目，要求主持人具备很强的语言能力，尤其是即兴口语表达的能力。

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一定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基础上，经过教育、培养，特别是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吸取他人的智慧并总结积累自己的经验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参见《主持人的语言艺术》第187页，吴郁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因此，虽然人人都会说话，而且每天都要与别人进行交流，但是每个人的说话水平却有高低之分。语言能力不仅反映一个人对词语的运用、语法的使用以及对表达技巧的掌握程度，还反映说话人的思维水平、知识层次及个性心理特征。

一个人的说话水平主要取决于他内部言语的组织能力、语言编码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的高低。

内部言语是人进行思维活动的工具，也是外部言语的重要基础。它存在于人的大脑中，不发出声音，以核心的关键词语来表达复杂的思想。内部言语的组织能力实际上体现的是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因此，要提高内部言语的组织能力，主持人就要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要养成经常思考问题的习惯，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要从各个角度进行全面、系统地剖析，能够准确把握事物本质。

要把内部言语外化为有声的外部言语，必须经过一个语言编码的过程，通俗地说，也就是选择恰当的话语把自己的思维表述出来的过程。古人曾说：“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意思是说，用语言准确地表述出自己的思维与情感是很困难的。最基本的语言编码能力是要做到“言通句顺”，这就要求主持人要多阅读一些文辞优美、用语规范的文学作品，培养自己的语感，使说出来的话符合语法规则，没有语法毛病。

谈话节目主持人还要培养自己的即兴口语表达能力。作为公众人物，主持人使用的“口语”与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大白话”不同，它富于个性色彩，抛弃了日常随意性口语的模糊与粗糙，吸取了书面语规范、简洁的长处，能够给观众带来审美享受。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口语带有强烈的即兴色彩，常常是脱口而出，这就要求主持人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很强的理解力，能够迅速抓住对方谈话中的要点，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在头脑中快速地组织好话语并表述出来。在口语表达的过程中，主持人不仅要反应敏捷，还要特别注意逻辑的清晰和语言的通俗易懂。

除了“能说”之外，主持人还要“会听”。有许多主持人都有着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能够滔滔不绝地说很长时间，但是这些主持人主持的谈话节目却常常受到观众的批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会听”。梁实秋先生曾写过一篇名为《谈话的艺术》的散文，很精辟地指出：“谈话不是演说，更不是训话，所以一个人不可霸占所有的时间，不可以长篇大论地絮聒不休，旁若无人。”“善谈和健谈不同，健谈者能使四座生春，但多少有点霸道，善谈者尽管舌灿莲花，但总还要给别人留些说话的机会。”（参见《梁实秋小品》梁实秋著，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梁实秋先生一语中的地说出了很多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弊病，



董铁鹰　知识产权出版社社长

即使一册图书也可以立即印刷——这种在以前不可想象的图书出版方式即将在全国获得推广。2004年4月，在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的部署下，知识产权出版社率先在我国正式启动了“按需出版”工程的试点工作。

我国每年出版十余万种图书，其中55%左右在出版后逐渐退出流通领域成为断版书，这些图书中不乏具有研究价值、参考价值、收藏价值的图书，是重要的文化资产；而短版图书中包括难以大量销售的学术著作、专业教材、信息资料、艺术作品、古籍、回忆录等类图书，这类图书更多地发挥着图书出版在文化积累、传承文明和推广知识方面的基本功能，但由于经济等原因往往难以出版。“按需出版”就是针对这些现象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出版方式，近年来在发达国家得到迅速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等知名学者纷纷表示这是缓解一些作家、特别是新作家作品“出版难”的好办法，是作者、读者梦寐以求的出版方式。

知识产权出版社社长董铁鹰在接受《新闻夜话》采访中介绍了出版社是如何满足人们的需求，按需出版能够提供哪些个性化的出版服务。用董社长的话说就是“只要有电子数据，剩下的工作就像在电脑上打印文件一样简单，要几份就打印几份。”你加上一个指令，同样的内容还可以用不同形式来出版，因此每本书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送给老人看的书，就可以把它字号放大。按需出版可以充分地满足人们个性化的需要。

社长董铁鹰表示，在“按需出版”工程启动后，知识产权出版社将在2004年内建立按需出版数据库和专业网站，三年内使5万种以上断版图书和大量短版图书实现按需出版。

即自己太能说,而不懂得掌握说话的时机。

要把握住说话的时机，主持人首先要耐心地倾听别人都说了些什么，只有明白了别人的意思,才能判断出何时该说、何时不该说,何时该多说、何时该少说,怎样说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说到底,谈话节目主持人的"说"是要以"听"为前提的,"说"与"听"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要求主持人耐心倾听嘉宾和观众的发言是由谈话节目的本质决定的。谈话节目是以大众媒介为受众提供的一个公众论坛，它为公众表达自己的意愿、倾诉自己的内心感受提供了场所。在谈话节目中,人们可以敞开心怀,自由地进行交流。与别的电视节目不同,谈话节目作为公众论坛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应当完全成为媒介所有者和制作者向受众灌输自己理念的传声筒,因此作为媒介所有者、制作者的代表,主持人在谈话节目中不能垄断话语权。主持人的主要作用在于,他要协调好场上的各种关系,让谈话在平等的氛围中进行，让各种声音能够充分表达。这就要求主持人不能有强烈的表现欲,不能把公众论坛变为自己的"一言堂"。主持人要把注意力放在嘉宾和观众身上，仔细倾听他们的观点,而不能让嘉宾、观众成为自己的听众。

谈话节目主持人的不善倾听主要表现在"听不见"、"听不进"、"听不懂"三个方面。

经验不丰富的主持人经常会犯"听不见"的错误。由于心理上的不适应以及主持经验的缺乏，年轻的主持人在面对嘉宾和观众时往往会感到紧张和不知所措，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事先准备好的问题上。常常是刚对嘉宾提出第一个问题,脑子里就在想着怎样提出下一个问题,对嘉宾的谈话听而不闻，因此根本就无法针对嘉宾的反应即兴发挥，也无法针对嘉宾言谈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问，促进谈话向更深的层次发展,因而整场谈话往往没有节奏感,体现不出即兴谈话的魅力，隐藏在嘉宾谈话中的重要观点和关键问题也无法得到更深入和更全面的揭示。

心中无观众,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自己身上,主观意识强的主持人则容易犯"听不进"的毛病。一些主持人对谈话节目的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认为自己是节目的中心,嘉宾和观众只是自己的陪衬，因此对嘉宾和观众的观点往往不屑一顾。这样的主持人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表现欲,频繁地抢过嘉宾的话头,不让别人有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即使在嘉宾说话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也集中在自己身上，听不进别人的谈话。还有的主持人主观意识过于强烈,不能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嘉宾。在节目现场,他们常常忘记自己的身份，只能听进与自己相一致的意见和观点,听不进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导致谈话一头沉,无法展开讨论和交锋。

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知识面窄的主持人则有可能"听不懂"嘉宾和观众的发言。在一些专业性强,涉及某个专业领域的谈话节目中,如果主持人不具备相关的知识，对该领域中的一些热点问题缺乏了解，就无法听懂嘉宾在说什么,也无法与嘉宾进行平等的交流,更不可能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举例来说,《对话》、《健康之路》就属于这种知识性很强的谈话节目。《对话》的选题经常涉及经济发展、企业管理领域,邀请到的嘉宾也是这些方面的专家，如果主持人对这个领域一窍不通,又不注意学习,就不可能听懂嘉宾的谈话;交流只能在低层次上进行,进而极大地影响到节目的质量。

"听不懂"的另一方面是指有些主持人的社会经验不够丰富，虽然了解了嘉宾或是现场观众所说的表层意义,却无法听懂话外之意,弦外之音。实际上,在交流过程中往往有大量的含意并不只是通过表层语言来传达的，在一定的情



危朝安　江西省副省长

本期节目采访了江西省婺源县江湾镇农信社主任和一位普通农民，以及江西省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危朝安。

农民贷款难是个普遍现象，一半以上的农民都很难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贷到款，因为农民贷款金额小，贷款的成本高、风险大、利润却不大，正规的金融机构不愿意把钱贷给农民。早在1996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2003年，又开始对全国农村信用社实施改革，这次改革在全国确定了八个试点地区，江西省就是试点之一。江西婺源率先推行给每个农户发放小额贷款，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农民能方便地贷到款，农信社还有了赢利，实现了农民和农信社双赢的局面。江西省副省长危朝安表示，这一试点要在全省推广。

境下，微妙的语气变化和不经意的表情动作都能表达丰富的内涵。要听懂这些含意，就要求主持人真正做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善于察言观色，深入发言者的内心世界中去。

总之，只有克服了“听不见”、“听不进”、“听不懂”的毛病，主持人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倾听者。值得强调的是：善于倾听并不是被动地倾听。主持人在接受嘉宾传递的信息时，脑子里同时进行着积极主动的运转，进行着快速的理解和判断，只有这样，主持人才能适时地引导对方的谈话方向；或者对对方的发言进行言简意赅的归纳，使观众明白其中心意思；或者针对对方的发言再进一步提问，使隐藏的关键问题得到更多的阐发。只有积极主动地倾听，主持人才能在适当的时机即兴发挥，实现对现场谈话的有效控制和引导。

有许多著名的谈话节目主持人都很善于倾听对方的谈话，有的主持人甚至把“善于倾听”发展成为自己的独特风格。美国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莉在主持节目时，总是“仔细地倾听嘉宾们的谈话，并且利用谈话的内容把主题步步引向深入。”“温弗莉的同情和倾听使她在观众中极有人缘，被当作‘每一位妇女的朋友’和‘一个好打听的邻居’，想要了解并且愿意理解每一个人。”（参见《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第249页，吉妮·格拉汉姆·斯克特著，苗棣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温弗莉在倾听嘉宾谈话时表现出来的耐心和兴趣，以及她根据谈话内容“把主题步步引向深入”的能力使她在调动嘉宾积极性和现场观众的热情方面表现得极为出色。

第三，主持人要机智灵活，现场反应要迅速。

即兴谈话要求主持人在短时间内迅速理解嘉宾的意思，并做出合适的回应，用相声界的术语来说，就是要有“现挂”的能力。

主持人的机智灵活有先天遗传的因素，但与后天的文化修养、经验积累、人生阅历也有很大关系。

主持人应当具备良好的文化素质和修养，能够不断汲取新的知识养分，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只有知识储备充分了，主持人的头脑才可能快速运转，如果头脑空空，一问三不知，那是不可能产生什么让人拍案叫绝的精彩话语的。崔永元在主持《演戏的孩子》这期节目时，遇到一位观众向小演员关凌提问，问她为什么会被挑上当演员，关凌回答说：“她问的问题，我肯定好多人想知道。我有机会被挑上《我爱我家》以后，这个少年宫曾一度变为热门，一下子名额爆满，大家都以为没准会有机会被选中。后来有一次我们的语文老师也谈过这个问题，说这也许是一种守株待兔的心理……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有机会的话，将来肯定能够有所成就。”关凌说完后，崔永元立刻接上：“他们用‘守株待兔’的方法找到了你，下回剧组用‘刻舟求剑’的方法选的就是他们了。”“守株待兔”和“刻舟求剑”这两个词语被崔永元运用得恰到好处，而且语含双关，十分机智，充分体现了崔永元活用巧用成语典故的能力。这种能力显然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修养基础上的。

除了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和修养外，主持人拥有丰富的阅历，对人情世故较为练达也很重要，它使主持人能够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在情况突转时也能处变不惊。而且重要的是，它使主持人具有一种对生活的敏感，能够及时察觉到现场的种种变化，并以其推进谈话，调节现场气氛。例如在《实话实说》做的一期名为《走近体育明星》的节目中，李小双和崔永元有这样一段对话：

有这么一些被称为“特型演员”的人，他们天生一副“领袖相”，在银幕上塑造出一个又一个不同时期的伟人形象，比如说开国领袖毛泽东。但是当观众已经把古月等演员和毛泽东的形象划上等号时，一个激情澎湃、热血张扬的青年毛泽东形象又出现在了银幕上。原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员王霙就是专演青年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他在《开天辟地》、《杨开慧》、《毛泽东与斯诺》、《毛泽东去安源》等30多部影片当中扮演了青年毛泽东。在饰演毛主席的演员队伍当中，王霙可以称得上是最年轻的，同时近年来也颇受专家和观众的好评。在接受《新闻夜话》采访时他说自己和毛主席最像的就是嘴，而且他还坦言扮演毛主席的所有演员都不像，包括他自己。整个采访从他自己和主席的缘分讲起，从开始的形似到后来的神似，到最后的热爱，以至于只要演毛主席，他就会推掉所有的戏，最后他告诉记者他很崇拜毛主席。



王霙 毛泽东扮演者



王霙剧照

李小双：对，事实上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赛嘛，成功和失败都会出现。当时国内对我的反映挺大的。还有一个我一直表示不满的就是有一个电视台的解说员，说李小双昨天在奥运会体操比赛中出现了一个低级错误，我对这句话一直不满，因为他是一个解说员，他不能伤害运动员的自尊心。

崔永元：他用“低级”这个词伤了你的自尊心。

李小双：对，伤我很重，我可以这么说。就拿你来讲，你现在走路，突然摔倒在地上，怎么回事，你难道低级得连走路都不会了吗？（笑声）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词义。

崔永元：我们主持人也是同时面对很多的赛场，这种即兴的解说，可能有时候也会犯低级的错误。（笑声）

在这段对话中，李小双讲述了一位电视体育解说员用词不当对他造成的伤害，不满的情绪溢于言表。崔永元没有直接发表评论，却巧妙地把电视主持人的工作同体育解说员的工作进行了类比，指出两者都有即兴发挥的地方，都有可能犯低级错误。他的这段话说得十分机智得体，和前面李小双的话相映成趣，引发了场上会意的笑声。观众一乐，现场的气氛立即变得轻松了，李小双也理解了崔永元的用意，不再表示自己的不满，转而回到谈话的主题，开始讲述自己是如何面对挫折与失败的。崔永元正是凭着自己丰富的经验以及对人情世故的洞达，成功地改变了嘉宾的情绪，调节了场上的气氛。

第四，主持人要有幽默感。

谈话节目的现场录制工作一般要持续一两个小时乃至更长。在这么长时间的谈话过程中，嘉宾和观众很容易感到疲乏，特别是在话题不那么吸引人的时候，这种疲乏感更是明显。这时就需要调节嘉宾和观众的情绪，让他们适当地轻松一下，从而使现场的气氛重新活跃起来。调节嘉宾与观众情绪的最有效方法是设法让他们笑起来。在笑声中，嘉宾和观众的疲乏自然而然地被涤荡一空，紧张的情绪也得以宣泄，谈话就能重新回到积极活泼的轨道上来。要让嘉宾和观众发出笑声，就需要主持人有幽默感。

幽默是有效的润滑剂、缓冲剂和黏合剂。笑声不仅能够缓解观众的紧张情绪，放松疲惫的身心，使人际关系重新变得和谐。作为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拥有幽默感不仅可以让自己显得平易近人，赢得别人的好感，而且在主持节目时更能举重若轻，轻松掌控现场。



王铁成　周恩来扮演者

王铁成这个名字，大家都非常地熟悉，因为他极为成功地塑造了周恩来总理。四十一岁，第一次扮演周总理，可以说是用全部的身心在塑造着总理的形象。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对总理的最好怀念。那么，这种特殊的经历，究竟给他带来了哪些影响？他会怎样描述他所扮演的周总理？生活中的王铁成又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带着诸多的好奇，在建国五十五周年的日子里，《新闻夜话》栏目把他请到了演播室。在整个节目的访谈过程中，你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他强烈的“个性”。但老先生却不这么看，在他眼里，这叫“质量不同的认真”。在谈到演戏时的辛苦时，王老告诉记者，为了演这个角色，一天需要工作 20 个小时，最后从 136 斤减到118 斤。

当记者问到饰演周总理是否有巨大光环的压力时，王老的回答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的采访：

主持人：一般的人都会这么想，顶着这么大一个光环，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有所节制。

王铁成：我没有。朱军给我做《艺术人生》时，我穿一双破鞋，衣裳也没换。

主持人：那你不怕观众会有些想法？或者指指点点？

王铁成：不怕不怕，因为我很清楚，我是我，他是他。

本期节目中像这样富有个性的对话还有很多，从中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对总理的深厚感情，同时，也能捕捉到他率真的脾气。



王铁成剧照

电视谈话节目的选题与嘉宾

拥有一个出色的主持人，谈话节目就初步具备了成功的基础。但是光靠一个主持人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互动的另一方——嘉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好的选题也是必不可少的。只要选题精彩，嘉宾出色，再加上主持人的成功表现，谈话节目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一、选题

俗话说：“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对一期具体的节目来说，选择到好的话题就意味着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对制片人来说，选题的确定则意味着以后更多的经济投入，所以无论是策划者还是节目的制作者对待选题都是很慎重的。

在选题环节的操作上，有多种渠道。有的栏目成立了“选题组”，选题组的策划负责搜集各种信息，从中挑选出适合自己节目的选题；有的栏目由编导自己寻找选题；还有的栏目充分发动观众，设立奖励，鼓励观众提供选题。由专门的选题组负责搜集选题是一种科学、经济的分工方式，它能够保证选题质量的稳定，同时也使编导把精力集中在节目的操作上。但是在这种选题方式下，如果不能加强节目编导与选题组的交流，在操作过程中，编导对选题的认识往往不如负责选题的策划深刻，因此有时会把握不好选题的重点所在。由编导自己寻找选题，可以充分调动起编导对选题的兴趣，编导对选题的认识也会相对深入，但是由于编导的水平参差不齐，对节目的认识也不一致，找到的选题往往质量、风格有较大的差异，而且寻找选题的过程也大量耗费编导的精力。发动观众提供选题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补充的渠道，但不能作为选题的主要来源，因为观众对节目的定位和操作缺乏了解，难以“有的放矢”，提供的选题往往不适用，而且这个渠道也很难长期稳定地坚持下去。

不论选题的来源怎样，栏目都要定期召开选题会，邀请有关的专家进行讨论，确定哪些选题是可行的，哪些选题无法进行操作。一般而言，确定选题要考虑如下几方面因素：

谈话节目的选题和栏目的定位紧密相关，因此节目制作者必须从栏目的定位出发，选择合适的话题或角度。

栏目定位是每个栏目在开播之前都要进行的一项工作，一般包括栏目的基本功能、受众群以及样式和风格等内容。不同的栏目有着不同的定位。举例来说，《相约夕阳红》这个谈话节目的基本功能是“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给老年人以精神关怀和慰藉，加强与老年人的思想交流和沟通”（参见《相约夕阳红》第5页，阚兆江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版），该节目时长度25分钟，受众群主要是老年人，节目在演播室里录制，带有观众；而《国际双行线》的基本功能则是“关注人类共同的话题，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与冲突，现场报道中外典型事件，实现真正意义与形式的国际交流”，节目时长为



卢奇剧照



卢奇 邓小平扮演者

在众多扮演邓小平的特型演员中，卢奇被称为是“中国扮演邓小平第一人”。他塑造的小平同志曾经让观众泪流满面，同时还得到了邓小平家人的认同，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同志曾经拉着他的手，说：“我跟老爷子生活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要说你很像”。由于多次塑造小平同志，卢奇得到了小平和其家人的认可，1991 年他们邀请卢奇到家里做客，但是由于工作缘故，遗憾地与小平同志擦肩而过。之后，小平同志女儿毛毛又亲自致电总政，要求转告他们对卢奇演技的认可和感谢。

有得到就有付出，为了塑造小平同志，卢奇学会了抽烟，而且染上了烟瘾，在《新闻夜话》演播室里，卢奇还拿出烟示范了小平同志独特的抽烟姿势。2003 年，40 多岁的卢奇出演70~90岁之间的邓小平，除了仔细揣摩研究小平的心理和思想之外，最让他痛苦的是化妆，脸上要贴人造皮肤，还要刷上胶水。正直夏天，汗捂在里面，痛苦不堪，而且一天要坚持十几个小时不能卸妆。大家平时从各种媒体上了解到的小平同志都是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外交家的小平，而卢奇则告诉我们一个生活中的小平同志，他疼爱小孩，尊重老人，而且从来没有和妻子卓琳吵过架。在卢奇眼里，小平就是一个完美的人。

50分钟,受众群主要是知识分子,现场观众由中外人士组成,所有嘉宾、现场观众以及主持人均配备有中英文同声传译系统。

不同的栏目定位决定了不同节目的选题各有特色。《相约夕阳红》的选题集中在那些老年人所关心的话题上,谈他们的情感与体验,于是就有了《孔英上学》、《卜婆婆》、《母女之间》、《为健康喝彩》等说老年人事、抒老年人情的精彩节目。《国际双行线》的选题则围绕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进行,无论是《爱情故事》、《喝酒的人》,还是《远离毒品》、《我看<卧虎藏龙>》,都力图挖掘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观念,展示不同观念的碰撞与交织。栏目定位的不同决定了《相约夕阳红》与《国际双行线》基本上不可能采用同样的选题,即使它们偶尔会谈到同样的内容,那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操作的。此外,即使是同一嘉宾,在不同的栏目,谈话的内容也依栏目的定位而有所不同。在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久,《实话实说》与《对话》都曾邀请过龙永图作为节目嘉宾,但是谈的内容却有很大差异,《实话实说》邀请龙永图探讨的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功会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而《对话》邀请龙永图谈论的却是人才问题。这种角度上的差异同样是因为栏目定位的不同造成的。

确定选题,除了要考虑栏目的定位,还要考虑选题是否具备"卖点"和可操作性。"卖点"是选题最能吸引观众、最有创意的地方。找到了具有"卖点"的选题,节目的收视率才会有保证。

明星、名人可以成为谈话节目的"卖点",但对明星和名人的选择要结合节目的定位来进行。举例来说,《对话》的定位是新闻性、开放性和前沿性,所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它的受众群主要是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高知识层人士,因此节目邀请的名人主要是一些企业界的巨子和政府官员,其中既有全球500强的企业家,如维亚康姆公司的总裁萨默·雷石东、诺基亚的首席执行官约玛·奥利拉,也有中国企业家,如联想集团的前任总裁柳传志等等。这些重量级人物的出现不仅吸引了大批观众的注意,也提升了节目的谈话层次。与《对话》不同,《艺术人生》是一个娱乐性很强的谈话节目,其受众群是普通人,受众范围广,因此邀请的嘉宾基本上是演艺圈人士。

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也可以成为谈话节目的"卖点"。时效性与轰动效应是这类选题吸引人关注的重要原因。美国的电视新闻谈话节目在这方面体现得最为充分,在新闻事件发生的当天,观众就可以在节目中看到当事者,或是有关的专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分析事态发展。这就使得电视谈话节目不仅能成为许多历史事件的见证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以自己的力量在改变着这些历史事件的进程。在中国,也有许多谈话节目以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为选题。例如凤凰卫视的新闻类谈话节目就体现出这种求新、求快的特点。以"9·11事件"来说,凤凰台不仅迅速地组织了现场直播,而且推出了专门的谈话节目;在随后几天里,《时事开讲》等新闻谈话节目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从各个角度对这个震惊全球的事件进行分析和评论。

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也能成为节目的"卖点"。例如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人们普遍关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给中国经济、企业发展、人民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此选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话题,从不同的角度切入都能吸引不少观众的注意,这样的选题就很有卖点。除了这种全民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外,特定观众群的需求也能成为"卖点",例如每年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都会牵扯到许多家庭的心,以就业问题作为话题,也能得到



傅学诚剧照

老乡拿着礼物去来看他。这些乡亲们很多当年都跟刘帅很熟，有的甚至曾经一块生活工作过。“老百姓喜欢特型演员，实际上是把对于领袖的爱戴，转移到了这个特型演员身上。”

另外，在扮演刘帅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少巧合。比如傅学诚第一次演刘帅是在《大渡河》中，那年他43岁，而刘帅长征过大渡河的时候也正好43岁，这是一个巧合。后来拍到八一厂的《大决战——淮海战役》，刘帅56岁，傅学诚那时候正好也56岁。

傅学诚，我国第一代特型演员，他一直被公认是扮演开国元帅刘伯承的“专业户”。从1979年的电影《大渡河》开始到现在，20多年来他在银幕上塑造了30多个不同时期的刘帅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6年凭借在电影《大转折》中的出色表现，傅学诚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的最佳男演员奖。

傅学诚在接受《新闻夜话》采访时坦言，“认我就是认刘伯承”，虽然作为演员，戏路基本上被定型了，扮演过的其他角色都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一种遗憾。但是扮演老一代革命家，在生活中也沾了不少光。特别是他在拍戏的时候，经常有当地的



傅学诚　刘伯承扮演者

不少观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关注。《对话》就曾经做过一系列以“人才”为话题的节目，其中几期就谈到了普遍关注的就业问题，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悬念与新奇感也能成为节目的“卖点”。美国的电视谈话节目有很多选题就是立足于满足观众的窥视欲望与好奇心理，把各种奇闻轶事作为话题，让观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样的选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节目的收视率，但负面作用也不小。中国电视谈话节目不能像美国电视谈话节目那样走极端，但也可以有所借鉴，吸收其合理因素，利用选题的新奇感及其所具有的悬念作为“卖点”。例如《相约夕阳红》的《为健康喝彩》，谈论的是一个70多岁老人为什么要坚持练健美，健美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什么。这样的选题就既有悬念，又让观众感到很新鲜。

一个选题要由设想变为现实，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既包括节目制作人员的素质、技术条件等节目自身内在因素，也包括政策限制、嘉宾意愿等外在因素，也就是选题的“可操作性”。

对于以明星、名人为主角的谈话节目而言，嘉宾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选题的可操作性，只有嘉宾愿意参加节目，并且表现出愿意与编导合作的态度，选题才能真正进入操作阶段。新闻性选题的可操作性则常常受到政策方面的影响。因此在决定一个选题是否可行时，制片人与策划者要考虑周全，多了解相关的资讯和政策，以免决定了的选题在操作过程中因为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而半途而废。

在确定节目选题的时候，节目制作者不能只靠主观臆测、仅凭“想当然”来考虑问题，除了邀请专家进行选题的“可行性”论证之外，不断总结节目制作的经验，根据观众的反馈来确定选题也是很有必要的。《相约夕阳红》的节目制作者在这方面就深有体会。在节目开办初期，《相约夕阳红》曾经做过一些节目，谈论的是“老来俏好不好”、“秧歌扰民怎么办”等“看似与老年人非常相关、也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节目播出后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随着节目制作经验的增加，《爱的奉献》与《孔英上学》等节目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共鸣，这使节目制作者意识到：“凡是与老年人生活越是贴近的，凡是老年人感受特别深切的事情，才是老年人最为关心的。”于是，在实际操作中，编导在申报选题之前，“必须经过采访，必须走到老人中间。不能想当然，更不能仅凭想象说一句‘我估计老年人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参见《相约夕阳红》第8页，阚兆江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版）。这就提醒我们，深入调查、依据事实说话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由于要考虑到栏目定位、卖点、可操作性等多方面因素，一般而言，谈话节目粗选的选题数量要十倍于精选的和落实的。

二、嘉宾

广义上说，谈话节目的嘉宾指的是被邀请到节目现场，参与录制的所有人。其中包括了现场的观众；狭义的“嘉宾”指的则是坐在主持人身边，参与现场谈话最多，也最为观众关注的某位或某几位人士。在不作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我们使用的都是狭义“嘉宾”这个概念。

嘉宾在节目中的主要功能是参与现场谈话。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嘉宾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讲述自己的故事、释放自己的情感，也可以与主持人或观众就某个问题展开讨论。

嘉宾的数量不是固定的，节目编导可以根据节目的需要决定嘉宾的数量。有的谈话节目没有区分现场观众和嘉宾，如《当代工人》。在这个节目里，主持人不与某个或某几个特定的对



郭连文剧照

对伟人的一种情结让郭连文失去了很多，同时也让他得到了很多。两次去安源拍戏，他已经成为了安源工人们最喜欢的演员，亲切的朋友。人们叫他老刘，叫他刘先生，而他也知道，那些信任和关爱不是因为他是演员，是因为他是演刘少奇的演员。他在接受《新闻夜话》采访时感慨万千：虽然在很多时候这个角色的戏份不重，但是这个角色在他心中的分量却非常重。他说："我很有幸能够通过一个演员，来洞察伟人内心世界，来分析他，研究他，还能用我的肢体，用我的音容笑貌，用我的灵魂，来扮演他，我觉得这就够荣幸的了。"

作为开国四大伟人之一的刘少奇同志，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但是在许多的革命影视作品当中，刘少奇这一角色却很少成为主角，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从不炫耀自己是少奇同志留给观众的银幕印象。

郭连文七年来，在二十多部影视作品中扮演了这位开国领袖，其中只有一部戏是真正的主角，很多角色戏份都不重。但是为了这个角色，他放弃了很多其他拍片的机会，甚至为了和少奇同志清瘦的外形保持一致，七年来他的饮食也处于一种节制状态。对于这些，郭连文归结为两个字：情结。



郭连文　刘少奇扮演者

象进行交流，而是直接面对一群人，与他们就某些问题展开谈话。不过，像《当代工人》这样的谈话节目毕竟很少，大多数谈话节目都会邀请一定数量的嘉宾。一般而言，谈话节目的嘉宾数量在1~5个之间较为合适。这是因为，嘉宾数量过多，会给主持人协调和组织现场带来很大的困难。当节目中有多个嘉宾时，主持人不仅要保证每个嘉宾的观点都得到充分的表达，还要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照顾好每个人，避免厚此薄彼。嘉宾的数量过多，主持人很难照顾周全，有可能出现有的嘉宾没有说话机会或谈话不充分的情况，有些问题因此无法得到深入的讨论。一般说来，嘉宾的人数最好不要超过五个。如果节目确实需要安排数量很多的嘉宾，那么可以采取如下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让嘉宾分组上场。主持人在前期设计时，可以根据谈话的内容、层次确定出少数的主嘉宾，这几位主嘉宾可以从始至终留在主景区。其他的嘉宾则分为几个组，根据谈话的进程在合适的时候上场。《朋友》、《艺术人生》采用的都是这样一种方式。以《艺术人生》为例，每期节目都会确定一位演艺界人士作为主嘉宾。随着谈话的展开，与这位主嘉宾有关的人，例如亲人、恋人、好友，便会被主持人根据谈话的内容先后邀上台来，参与到谈话中。这些嘉宾被邀上台后，并不会一直坐下去，当与他们有关的段落结束后，主持人就会友好地把他们送下台去，接着与主嘉宾继续展开后面的谈话，当谈话进行到某一阶段时，主持人会再邀请新的嘉宾上场。这种方式较为适合叙事型的谈话节目。

第二种方式是在主景区只保留少数几个主嘉宾，其他的嘉宾安排在台下前排座。《实话实说》、《对话》、《相约夕阳红》等许多谈话节目都采用这种方式。采用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免去了嘉宾上下场的麻烦，而且台下的嘉宾可以随时参与到谈话中来。这样的方式特别适合讨论型的谈话节目。

除了考虑嘉宾的数量之外，节目编导还要考虑嘉宾的搭配和平衡。首先，嘉宾的性别最好不是清一色的男性或女性，而是男女搭配。其次，嘉宾要有角色分工。在节目邀请的嘉宾中，既要有理性的、逻辑思维强的，也要有感性的、直觉敏锐的；既要有性格沉稳的，也要有富于激情的；既要有说话严谨的，也要有爱开玩笑的……总之，嘉宾的搭配也要讲究“和而不同”，这样才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也才可能有碰撞和交流。如果只请同一类型的人来当嘉宾，现场谈话往往会因为缺乏不同声音而变得淡而无味。

嘉宾是谈话节目的主角，嘉宾的表现直接关系到节目的成败。因此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作为嘉宾被邀请到节目现场的，谈话节目的嘉宾要经过节目制作者认真的选择。

一般而言，挑选合适的嘉宾人选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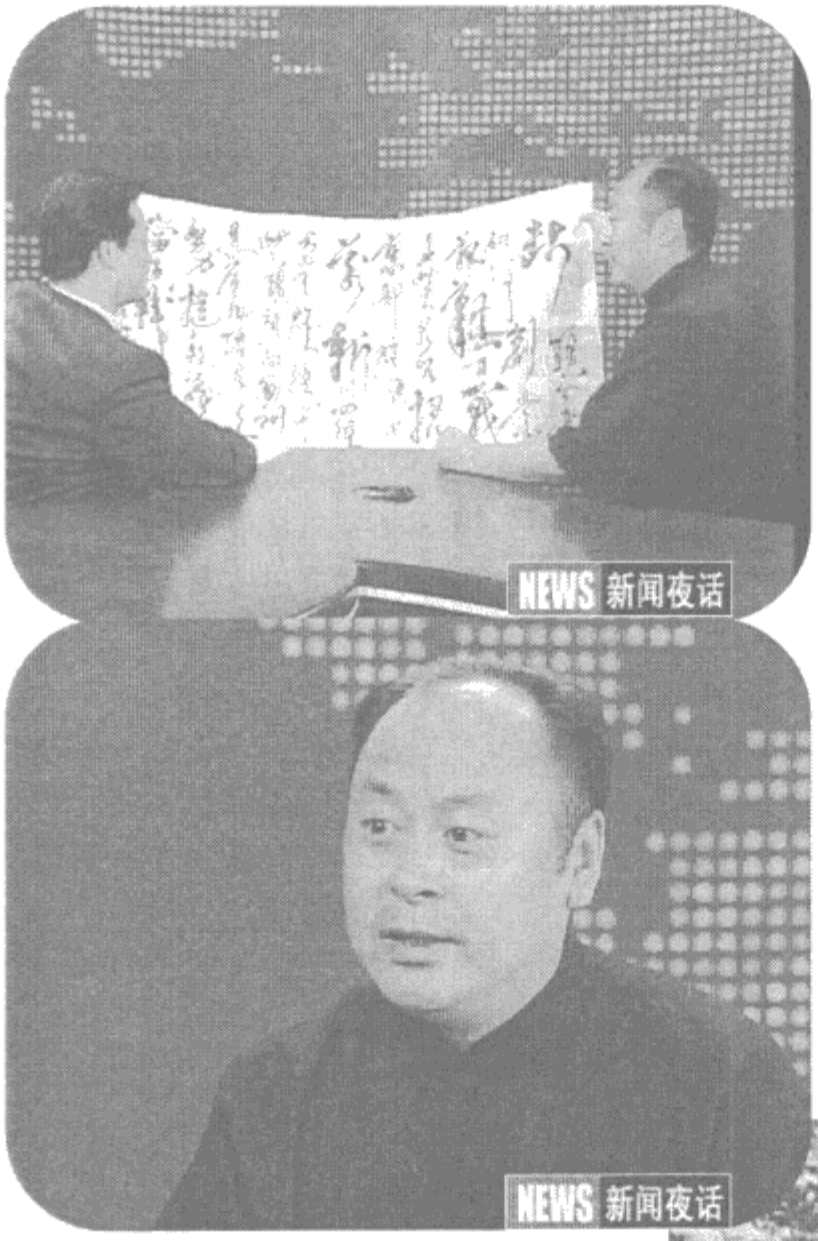
首先，嘉宾要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嘉宾与主持人一样，要能说会道，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能够清楚地叙述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不能颠三倒四，更不能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嘉宾的能说会道应该建立在真情实感的基础上，不一定要有华丽的辞藻，但一定要发自内心，是经过自己思考的有感而发。

在挑选嘉宾时，节目编导要注意避免选择这样一些看似能说的人：

在场下非常能说，机智幽默，观点也很独特，但是一到聚光灯下，面对镜头就患上“失语症”的人；

没有自己的语言，一开口就打官腔、唱高调，把别人当作教育对象的人；

喜欢高谈阔论，引经据典，说起话来惟恐自己水平不高、理论不深，但是缺乏真情实感，没



谷伟 陈毅扮演者

武汉话剧院的谷伟虽然不是第一个饰演陈毅元帅的特型演员，但他应该算是作品最多的一位。从1993年到现在他已经在45部影视剧中塑造了陈毅元帅的屏幕形象，其中《英雄孟良崮》获得了飞天奖一等奖。

或许是因为职业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十几年来潜心研究陈毅元帅的结果，谷伟对陈毅元帅充满了崇敬和热爱。在谷伟的心目中，作为一个开国元勋和共和国的副总理、外长陈毅除了广阔的眼界，博大的胸怀，雄浑的气质，坚定细腻的思想情感，最主要是还有一颗全心全意无私的为人民服务的心。而作为一个戎马一生的大元帅，陈毅更有诗人的情怀和热情、率真的性格。

谷伟觉得现在的影视作品中，更多的是展示陈毅元帅在军事斗争中的成就和作风，而像诗人陈毅、陈毅与张茜的爱情就是很好的展现陈毅人格魅力的题材。他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演绎一个从年轻到年老的全方位、感人的《陈毅传》，给广大群众一个完整的、全面的陈老总形象。这对他来说，是演艺生涯登上一个新的台阶，而对他无限热爱的陈毅元帅来说，也是一种最好的纪念。



谷伟剧照

有亲身体验的人；

喜欢充当“演讲者”，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但听不进别人意见，不愿意与别人交流的人。

其次，嘉宾要有人格魅力。嘉宾不一定要长得漂亮，也不一定要语出惊人，嘉宾可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一定要拥有某种让人喜欢的特点和气质，当他出现在镜头前时，能够焕发出迷人的光彩。在《相约夕阳红》中，就经常邀请到这样的嘉宾。例如在《为健康喝彩》中那位60岁开始练健美的老人，他的乐观、对体育运动的激情就深深打动着观众。再比如那位八十几岁高龄仍然管理着企业的卜婆婆，她幽默的言谈、爽朗的笑声、周身焕发的活力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最后，嘉宾应当是某一问题的专家或是与话题有着密切关系的人。邀请专家时，要考虑到专家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对叙事型谈话节目而言，则要尽量邀请到当事人。

此外，不同定位、不同类型的谈话节目对嘉宾的要求也不同。举例来说，辩论型谈话节目对嘉宾的内在修养就有较高的要求。它要求嘉宾要具备绅士风度，在辩论中能够待人宽厚，不会把辩论变为对人身攻击。

在确定了所需嘉宾的条件后，节目制作者就要开始寻找合适的人选了。节目制作者可以在自己认识的人中进行选择，也可以通过报纸、网络定期发布选题，在对选题有兴趣的人中进行选择。制作者有必要对嘉宾候选人进行多次的采访，或是召开多次的见面会，考察这些候选人的观点、语言表达能力，最终找到合适的人选。找到合适的嘉宾后，制作者还应当准备一份详细的嘉宾资料，让主持人能充分了解他们的性格、经历、谈话方式，以备现场谈话之用。

在做个案型节目时，常常会遇到选题非常好，但是嘉宾的表达能力却不强的情况。其实，这样的情况还是可以进行一些补救的。比如，在节目前期可以多制作一些短片，用短片来弥补嘉宾的叙述。同时，编导还可以尽量多请一些了解嘉宾事迹的人到现场，通过引入他们的叙述来丰富观众对主嘉宾的了解。《相约夕阳红》曾经做过的《走进墨脱》中，节目的中心嘉宾即那位老人对于主持人的问话，常常只用一两个字就回答完了。为了弥补嘉宾的不足，现场不仅播出了介绍墨脱情况、记录老人进山过程、希望小学建成后老人讲课的多段短片，而且还邀请到了老人的家人、单位领导、朋友来叙述这个过程。次嘉宾的出色表现，弥补了主嘉宾的不足，不仅使观众完整地了解了老人的故事，而且也感动了全场。观众不仅没有因为老人的不善言辞而着急，反而更深切地感到老人的可爱与伟大。



王伍福　朱德扮演者



王伍福，国家一级演员，战友话剧团的特型演员。

王伍福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20多年来，一共在50部影视剧中扮演朱德的角色。在接受《新闻夜话》采访中，王伍福讲述了自己在20多年的扮演生涯中的难忘经历和感人故事。由于形神兼备，他的表演还得到朱德夫人康克清同志的肯定。但是没有能和康大姐合影，又成为他今生最大的遗憾。他的表演还得到老总家乡人民的肯定，因此，还得到一张印有老总家乡地址的身份证。

虽然扮演50次朱德，却一直处在配角的位置，今后能有一部反映老总一生戎马生涯的影视精品，是他最大的愿望。作为一个演员，能够扮演其他的角色是他第二个愿望。

电视谈话节目的现场与后期制作

一、现场

经过前期的策划工作之后，谈话节目就进入了关键的现场录制过程。

现场录制是一个令编导和主持人非常紧张的过程，因为它充满了不可预知性。虽然在前期策划中节目制作者对“说什么”、“怎么说”都进行了周密的设计，但在谈话的过程中，常常还是会出现许多出人意料的情况。可以说，现场录制是在控制与失控之间进行平衡的一个过程。

现场的元素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如下几个：

一是现场观众

作为公众的论坛，参与到现场谈话中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观众越多，现场谈话的气氛就越活跃，各种观点的交锋也越激烈。现场观众不仅能够有效地营造和烘托谈话的氛围，而且作为场外观众的代表，现场观众起到了沟通场内外的积极作用。

现场观众的主要功能是参与现场谈话。

在被邀请到节目现场的观众中，有一些是编导事先沟通过并有意安排在现场发言的，这部分观众被称为“预埋观众”或“钉子观众”。安排这部分观众实际上是为活跃现场交流服务的。由于中国人一般不愿意主动表达自己的思想，许多人虽然很有想法，但是看到周围没有人发言，就变得谨慎起来。如果事先安排一些观众提问来带动场上的气氛，就可以避免“冷场”。预埋观众的第二个作用是实现编导的某些特定意图。在现场，有一些问题主持人碍于自己的身份不方便向嘉宾提问，编导可以把这些问题安排给预埋观众，让观众来询问嘉宾。此外，当节目里有一些需要观众参与的、带有表演性质的设计时，也可以事先安排好适合的人选。有了预埋观众，节目的进行就更有保障一些。当然，对谈话节目而言，最好的境界是现场观众完全投入到谈话中，愿意即兴发言、参与讨论。在安排预埋观众时，编导应该尊重对方的想法和意愿，从那些符合自己需要的人中选出合适的人进行沟通，让对方自愿参与，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

到现场参与谈话的观众应是精心挑选的。节目组一般可以通过网络来征集观众，也可以通过公关公司来寻找合适的观众。但是不论通过哪一种途径，编导都有必要在节目录制前同观众进行沟通，把那些对话题真正有兴趣的人而不是只想当看客的人请到现场。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节目有《实话实说》、《对话》以及《艺术人生》。《对话》不仅关心观众的想法，把观众的问题融入节目的设计中，而且对观众的外表和衣着也有具体的要求，这与它邀请高档次嘉宾的定位是相符合的。《艺术人生》嘉宾是演艺界人士，在它寻找到的观众中，有的对嘉宾的演艺生涯倒背如流，有的甚至收藏着连嘉宾自己也找不到的作品专辑。有了这样的观众，现场交流一定会精彩得多。在现场观众的选择上花费的精力越大，现场录制时得到的回报也越多。



韩乃寅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北大荒的精神曾经感染和震撼了几代人，知青文学也一度成为上个世纪80、90年代人们非常盛行的读物。当年的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如今变成了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从这片黑土地上也产生出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知青作家，韩乃寅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小说被认为是全景反映知青生活的第一知青文学，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和电影，其中最著名的包括知青三部曲《天荒》、《苦雪》、《泪祭》。韩乃寅是1968年到北大荒农场上山下乡的知青，在那里生活了十年，他现在是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的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韩乃寅在接受《新闻夜话》采访中表示："我就觉得梁晓声、张抗抗、叶欣他们那些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是从生活的一个侧面，或者一个片断反映当时的一种情绪，讲述一个故事。我看完之后觉得很不过瘾，我才觉得我要写。当然他们艺术形象的刻画、语言都非常好，但是他们对整个生活的感受，我觉得和我那种真实感受到的还不尽相同。结合我所接触到的人物，接触的生活，觉得他们还没有真正展示出知青十年的那种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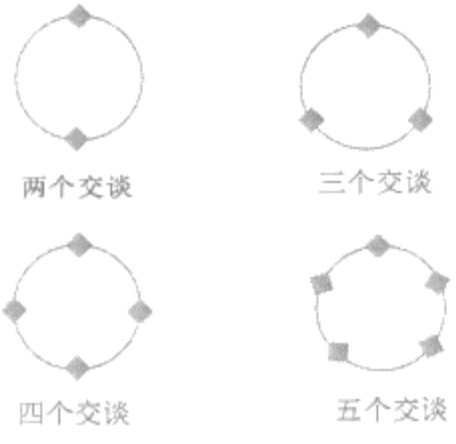
二是场地设计

大多数谈话节目都是在演播室中录制的。在中国电视谈话节目中，只有《当代工人》长期坚持外景地录制，以工厂、货场、机场、林地为场地，树立了独特的风格。一般说来，外景场地对灯光、摄像等技术要求很高，不好控制，而且在露天环境中，由于有许多外在因素的干扰，谈话的氛围很难形成，因此还是在封闭的演播室里录制谈话节目效果较好。

演播室谈话节目的场地设计一般可分为主景区和观众区。主景区是主持人与主嘉宾谈话的区域，是现场的中心；观众区是次嘉宾和现场观众所处的领域。

一般而言，现场观众的参与程度决定了主景区和观众区距离的远近。现场观众参与得越多，观众区离主景区越近。《艺术人生》为了方便观众的参与，营造一种观众与嘉宾间很亲密的氛围，观众区离主景区就非常近，观众就坐在离嘉宾和主持人四五步远的地方。而在观众参与少或不参与的节目如《朋友》和《爱心世界》中，观众区离主景区就比较远。

主景区是主持人同嘉宾谈话的主要区域，如何安排主持人与嘉宾的坐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在真实的交谈中，谈话者总是自然地形成一个圆形配置，以便于交流。如下图所示：



两个交谈者三个交谈者四个交谈者五个交谈者但作为一个节目，特别是当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中心谈话者的最佳占位方式应该是排成一条直线面对观众，这也是各类舞台表演普遍遵循的一个原则。显然，在主景区席位安排上，存在着一个既要便于主持人、嘉宾进行交谈，又要方便现场和电视观众观看的矛盾。过分重视表演效果，把主景区座位排得太直，迫使谈话者扭着脖子说话，不但画面不舒服，也会影响到谈话松弛自然的气氛；而过于注重真实谈话氛围，把主景区座位排得太圆，让现场观众看嘉宾的背影显然不妥，机位处理也增加了难度。

不同的谈话节目由于风格不同，诉求点不同，在处理这个矛盾时方法也各异。《锵锵三人行》由于没有现场观众，又特别重谈话气氛的清谈式节目，把坐席完全安排成圆形；有些节目仍然选择直线排列，更看重的是直面观众的表演形态；而目前大多数谈话节目则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就是把圆形和直线两者结合起来，把主景区的席位排列成弧线形，或是略微变体成直角形、雁阵形。如下图：



与主景区相对的观众区的布置应该与主景区的配置思路一致。简单地说就是以直线对直线，以圆形对圆形，以弧线对弧线。以两排直线相对是典型的剧场方式，突出的当然还是“脱口秀”中的“秀”字。用观众的大圆形围绕谈话者的小圆形最有利于再现最有日常谈话意味的谈话，欧洲有一些谈话节目运用这种方式，气氛很好，但它对于现场机位调度的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种以两个马蹄相对的方式，实际是把两个圆形各留一个开口，在考虑到现场观众的同时把



陈旭　上海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社区服刑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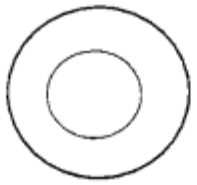
2003年8月，一种崭新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制度进入人们的视野。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应的一种行刑方式，是在社区里完成的。有五种罪犯适用于社区矫正，他们是被判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力的罪犯、获得假释和监外执行的罪犯。这些在社区里服刑的犯人，他们除了每个月要上交一次思想汇报，每周要有三个小时的公益劳动之外，他们可以自由地出入这个社区，他们可以上街、逛商场，他们还可以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每天去上班，甚至还可以出外旅游，几乎和普通居民没有两样。当时全国共有六个省市正在积极地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

上海市从2001年就开始了试点工作，也是最早建立社区矫正试点的省市，而且从2003年8月开始，社区矫正制度将在上海全面推行，对于越来越多的罪犯将回到社区里服刑，普通的社区居民心理上会存在很多担心，《新闻夜话》栏目赶赴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街道社区采访了一位在社区里服刑的犯人，和主抓社区矫正工作的上海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陈旭。在节目最后，记者从司法部获悉：中国在监狱外服刑罪犯人数的比例将肯定会逐渐增加，而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正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营造谈话氛围的可能性提高到最大的程度。重庆台的《龙门阵》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使用最多的还是两个相对的弧线的安排方式，弧度的大小则根据编导者对自己节目的不同理解而相差甚远，有的弧度很小接近于直线，有的弧度很大差不多是两个半圆。几种情况如下图所示：



直线相对



两个同心圆



两个马蹄形



两条弧线

不论采用哪种设计，都要从节目定位出发，并且考虑演播室的具体情况。好的现场位置设计能够很好地展示节目的风格与个性，让观众产生深刻印象，也有利于谈话流畅地进行。

三是场外介入

扩大谈话的范围，实现场内外的互动一直是电视谈话节目制作者追求的一个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热线电话和网络被引入谈话节目现场中，成为场内外联系的有效工具。热线电话一般只适合于在现场直播的谈话节目中运用，美国著名的新闻谈话节目《拉里·金节目》就把热线电话接入作为一个重要元素，极大地扩展了谈话场的范围，把小小的演播室同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在我国，过去上海东方台的《东方直播室》和现在山东济南台的《泉城夜话》都充分利用了热线电话来实现节目同广大电视观众的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在谈话节目中的运用。近年来计算机网络迅速普及，网络社区、网络聊天室造就了一个大众论坛，网络论坛与作为另一种类的大众论坛的电视谈话节目所具有的这种同质性使得它很容易溶入到谈话节目中来，能够很自然地把论坛空间开拓到远距离的用户端。网络介入的另一个好处在于它的可控性较强，网络接入内容可以通过编辑进行筛选后再出现在节目中，可以避免发生政治或技术事故。此外，一些录播节目可以在录制过程中进行网络直播，并把直播时网民的介入适当编入最后的节目中。这种半直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录播节目无法实现场外互动的难题。《东方时空 7 周年特别节目》在这方面做过一次很好的尝试，但到目前为止，把半直播式的网络介入还没有作为常规方式出现。

除了电话和网络之外，利用卫星技术联结不同地域的人，让更多的人参与谈话也是当今电视谈话节目发展的一个趋势。例如《对话》就曾经利用卫星技术连接台湾与大陆，制作了一期名为《两岸髓缘》的精彩节目。

谈话节目正式录制之前，常常要有一个“热场”的过程。所谓“热场”，就是主持人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给观众讲一些笑话、幽默小故事，或是带领观众做一些小游戏，让观众在笑声中松弛下来，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正式的谈话。这个过程可以有效缓解观众进入演播室的紧张情绪，使谈话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同时，摄像也可以在热场的过程中抓拍一些观众表情很好的画面，为后期剪辑做准备。

二、后期制作

电视谈话节目的后期制作没有复杂的特技处理，相对而言要简单一点。如果谈话节目采用的是现场直播的方式，就不需要进行后期制作了。但是在中国，由于绝大多数的谈话节目还是采取录制播出的方式，后期制作就变得十分重

2003年5月，防控非典，全民动员，事关全人类健康和生存质量。

但是在特殊时期对公共服务人员数量的要求激增，现有数量严重短缺，而这样的岗位在这种时候是最危险的岗位之一，他们要直接面对传染源，随时可能感染到病毒，直接威胁到生命。

李海成是一个普通的旅行车司机，公司征召志愿者的时候他第一个报名，写了请愿书，裱了大红纸，带着同行的人们到北京市交通局去请愿，请求到一线参与公共服务。他得到的任务是运送疑似病人。

谁都知道这个岗位离病毒有多近，广东第一位病例造成的第一批感染者中就有救护车司机。李海成不怕吗？是什么力量推动他冲到前线？与家人隔绝一个多月的生活怎么坚持？

李海成，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接受《新闻夜话》采访时告诉记者，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他的选择只是听从了党的召唤，他只是在实践20年前入党时立下的誓言："跟着党走，为人民服务。"



李海成　司机



要。

在后期制作中，编导对谈话节目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剪辑完后的节目的面貌。

有的节目制作者认为谈话节目是现实生活中人际交流的延伸，谈话节目应该真实地反映日常谈话的状态，后期剪辑要忠实于现场谈话的真实性，因此在剪辑时不能做太大的变动，保留现场的原汁原味最重要。这样的节目制作者可以称为“纪实派”，他们剪辑出来的节目同现场录制的情况大致相同。

有的节目制作者则认为可以在后期剪辑中对现场谈话进行很大的调整，本来是后面谈的内容可以放到前面，本来没有掌声的地方可以加上掌声。总而言之，现场谈话的真实性可以部分地加以改变，只要节目好看就行。这样的节目制作者可以称为“剪辑派”，经过他们剪辑的节目同现场谈话的情况往往有很大的不同，节奏和结构都发生了改变。

“纪实派”和“剪辑派”的差异可以通过片比看出来。比如，现场录制在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之间，剪辑后节目播出时间在一个小时左右的谈话节目一般没有经过很大加工，基本反映出了现场谈话的真实状况；而录制时间不变，剪辑后播出时间却不到半小时的节目通常经过了很大的调整，现场同播出的节目有很大不同。

事实上，由于存在主持人没有经验、嘉宾说话很啰嗦、出现技术故障等特殊情况，现场谈话有时会出现节奏缓慢、跑题严重甚至暂时中断的问题，所以，后期剪辑是提高节目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关键问题在于怎样剪辑才能体现出谈话节目的特性和魅力。

电视谈话节目的魅力在于把大量的受众带到现场的即兴谈话中，进行一种当下的讨论。对电视谈话节目的受众而言，现场感是最吸引人的一个因素。现场直播是产生现场感的最佳方式，在直播中，无论是观众还是嘉宾，对下一刻将会发生什么全都一无所知；而对于非现场直播的谈话节目而言，制造“现场感”，让观众感觉如同在看直播节目是非常重要的。

要让节目有“现场感”，后期剪辑时就要重视和保持“谈话场”的完整。谈话的过程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逻辑、有层次的，现场的氛围和情绪变化也是随着谈话的内容上下起伏的，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谈话场。如果在后期剪辑时编导没有“场”的意识，对谈话的内容断章取义，随意调整结构，就会出现现场的氛围和情绪前后不连接、谈话“气脉”不顺畅的毛病。有的节目甚至出现上一个画面主持人坐在嘉宾对面谈话，下一个画面主持人在观众中提问，再下一个画面又跳回嘉宾对面谈话的情况，这样的剪辑割裂了现场，让观众难以理解。

要让节目有“现场感”。导演在剪辑时还要注意保留一些能够体现现场特色的细节，如嘉宾的口误、用语的重复、谈话中出现的停顿、主持人在观众中穿梭的过程等等。我们在一些谈话节目中常常会看到，由于后期编辑“下刀”太狠，把这些细节全都剪掉了，导致主持人刚刚在主景区说完“下面我们听一听现场观众的看法”，下一个镜头就已经出现在观众席当中了。这种表面看来干净利索的剪接方式，实际上却等于在告诉电视观众：这个节目是经过后期精心编排删改过的，并非真正的现场再现。现代观众也就由此有理由进一步怀疑，谈话的内容是不是也已经按照编导的意图被篡改了呢？

总之，不论是“剪辑派”还是“纪实派”，在后期制作中都应该特别注意保持节目本身的“现场感”，要努力让观众感到谈话就是在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段中自然进行的，节目只是对这场谈话的传真和再现。



王丽妍　国航内蒙古分公司百灵乘务组乘务长

王丽妍在非典肆虐的那段非常时期，人们害怕出门害怕到空气不流通的密闭空间，飞机成了危险的交通工具，很多人不敢乘坐飞机，而王丽妍带着她的百灵乘务组，始终在万米高空微笑着对每一位乘客去工作去服务，在这期间，王丽妍和其他空姐们都被隔离在办公大楼，休息时间也不能回家，她有一个刚几岁大的女儿，而她这个党员妈妈只能在万米高空抽空看看女儿的照片。



电视谈话节目的可持续发展

一、对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1. 关于发展现状与追求目标

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是电视节目发展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观众成熟的标志。

随着我国社会文化从偏重教化发展到注重交流和信息共享,谈话节目也逐步兴起。目前,我国电视谈话节目已经开始出现数量上的繁荣,但远未达到品质的成熟、完美,主要表现在智力投入相对不足、选题范围较窄、高素质的主持人难觅、缺乏品牌节目等方面。认清当前我国电视谈话节目存在的问题,对确立谈话节目的追求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电视谈话节目来说,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追求目标:

一是从节目的角度。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作品"的意义上来认识节目,这种固有的观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谈话节目的提升。相对于报社印发报纸,电视台播出的是节目,可以说,节目是电视媒体的主导"产品"。因此,在现今的工业社会里,对"节目"的理解有必要在原有"作品"的层面上进一步拓展,提升到"产品"的层面上,形成品牌效应,以"生产某种精神文化产品"作为指导思想之一来指导节目制作。至于如何在工业生产的机制下组织节目生产,节目生产过程中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将在下文有选择地具体探讨。

二是从谈话节目的角度。

提及电视谈话的追求目标,不少人认为,当电视谈话能够真正实现直播,就说明电视谈话节目无论是从策划的深入程度来看,还是从主持人的现场把握、嘉宾乃至观众的现场表现来看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目前国内已经有少数电视谈话节目实现了直播,如济南台的《泉城夜话》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实现了直播的节目就是发展比较成熟、完善的电视谈话。我们说,如果从谈话节目的角度来理解的话,直播不仅仅是一种播出方式,更是一种对节目效果的要求。

与纸介媒体相对隐藏思维过程、侧重展示完美结果不同,电视谈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要体现过程的完美。在一个谈话空间里,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形成活跃流畅的话语交流,在轻松中思想受到启迪。这样一种未经排练、后期剪辑掉的东西非常少的类似直播状态的电视谈话,才是电视谈话节目追求的目标。

近年来,有不少电视人借用物理学的"场"的概念来形容电视谈话应该形成的一种谈话气氛。但是,总观业界和学者对"场"的理解的表述,似乎尚停留在引用新的概念的层面,对"场"究竟为何物,"场"内有什么特点,究竟与其他的空间有何不同等关键问题并没有明晰的认识。在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看来,"场"是指"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其构成要素是具有不平等关系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这里指的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阶级关系),它们总是为改变或保存自己的势力而进行着斗争。(参见



郭丽军　河南省委机关幼儿园老师

2003年5月，正是SARS最严重的时候，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在抗击非典疫情。《新闻夜话》栏目在策划反映各行各业抗击非典的系列片《五月的中国》的时候，记者想到了儿童的世界。成人世界的恐惧是否会影响到儿童？天真的幼儿园里孩子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为此我们采访了河南省委机关幼儿园的老师——共产党郭丽军，在非典疫情最严重的5月，为了做到不让一个孩子受到传染，她和她的同事们想尽了办法，从严格消毒措施到耐心做工作，消除家长的种种顾虑；从克服大人的恐惧心理到保证每个孩子的健康快乐，最终她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这个不平凡的5月，快乐地迎来了孩子们自己的节日——“六·一”儿童节！

《关于电视》,布尔迪厄,辽宁出版社,2000 年 9 月)布尔迪厄认为,在电视谈话节目中,不仅谈话者和话题是精心选择过的,而且主持人对场面也处处施以控制和影响,分配着发言时间、主导着话题走向。从民主的角度看,对话者的地位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不具有任何自由表达的可能性。布尔迪厄的观点听起来有些绝对,因为电视谈话节目毕竟是一个节目。依照美国出版的《电视百科全书》中"谈话节目"词条中的定义,"电视谈话节目(TV talk show)是一种主要围绕着谈话而组织起来的表演。谈话节目必须在严格的时间限制之内开始和结束,并且要保持话题的敏感性,以便在面对上百万观众时能够提起大众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电视谈话节目是一种表演。本文用大量篇幅讨论了谈话节目创作的诸多环节及其技巧,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事实上,电视谈话几乎总是以一个主持人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尽管会有较大程度的自发性,但同样有着很强的结构性。在一种仪式化的碰撞中,受众通过电波听到和看到的内容已经被制片人、策划人、编导、导播和技术人员规定了形式,并且进行了裁剪。事实上,即兴谈话与表演模式(尤其是其中策划的成分)的对立正是电视谈话节目的根本性矛盾。谈话节目的制作者可能会发现,从选题、选嘉宾、现场设计、实拍调度,直到后期编辑,几乎所有环节都会不断被这对矛盾困扰。2001 年底,在北京电视台《国际双行线》一期节目的录制过程中,发生了"谭盾退场"事件,引起了业内外的广泛关注。由于节目组事先没有告知音乐人谭盾在节目中会出现与其在音乐理念上截然对立的卞祖善,谭盾在两人"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情况下中途离去。这说明,节目的制作者实际上拥有特殊权力,他们设计好节目的走向,而参与节目的个体则处于被动的下风。这次意外失控,其实是谭盾、卞祖善这样的个体对谈话节目制作者"优势"地位的一次挑战。虽然这次"意外失控"的节目最终成功播出了,但却留给人们很多思考。电视谈话节目如何在这种先天"不平等"的条件下,运用各种技巧来平衡即兴谈话与节目表演这对矛盾,使谈话双方的观点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并形成一定的交锋,将真实、自然的谈话过程完整而又集中、流畅、富于戏剧性地再现出来,这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真正的"场效应"。

2. 关于学习借鉴与创新

目前,对国内的谈话节目制作者来说,学习借鉴(指同一节目形态间的,而不是广义上的向其他节目形态乃至其他学科的学习借鉴) 大概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国外及港台谈话节目的学习借鉴;二是国内地方媒体与中央媒体间的学习借鉴,尤其是地方媒体向中央媒体的学习借鉴。学习借鉴本是自身提高的有效途径,但是国内谈话节目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两种不良趋向:

一是"改版热"。过分热衷形式上的变化,忽视节目内涵的挖掘。不少节目一年改一次版(而且每次宣传广告都说是"全新改版、隆重登场"),改版前也没有做充分的调研,只是觉得不改版就老化了,是一种为了改版而改版的浮躁心态,体现出认识上的不理智、不成熟。这也正是为什么很多节目的改版都以失败而告终的原因。

改版是目的还是手段?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改版是一个"不是不变,而是如何变"的问题。改版过程至少应该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不能过分迎合,二是要注意形象的持续性和品牌效应。

受众的需求固然应该得到满足,但受众也

梁秉堃先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他的作品很多，我们熟悉的有《冰糖葫芦》《默默的人》等。2003年5月23日，由八位作家组成的非典一线采访团开始了他们长达半月的深入采访，他们的足迹遍布与非典有关的各个部门。

在这一行人中，梁秉堃先生是年龄最长的，已经67岁的老人深入到北京市东城区的几处隔离区采访。梁先生有着非典时期最被人顾忌的基础病——高血压，但他对自己的体力、精力却很乐观，他被自己的戏剧构思所激动着，要写一部反映北京城内隔离区生活的戏剧。



梁秉堃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在节目中，梁秉堃先生的一席话至今言犹在耳："中国作家在我们国家任何一次危难当中，都没有缺席过，共产党成立以后，多少个作家都深入到前线中去，咱们随便举个例子，田汉、关卫然、王愚坚、巴金、杨朔都去过，当然时期不同，有抗日的、有解放战争的、有抗美援朝的，都属于有硝烟的战争，去了以后，也都写出不朽的作品。"



是需要引导的，过分的迁就和迎合无助于谈话节目的发展。电视媒体是大众文化的传播者，但仍要比大众站得更高、看得更深远。媒体应该而且必须承担这个责任。目前一些谈话节目，尤其是一些大众话题类、情感类的谈话节目，在改版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超出了满足受众正常需求的迎合趋向，应该得到及时而有效地控制。

同时，改版还要注意形象的持续性和品牌效应。在电视产业发展相对成熟的美国，特别强调电视要坚持栏目化原则，重视品牌的营造。在美国，谈话节目很少更换主持人，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失去了原来的主持人，许多谈话节目宁可就此收场。老牌谈话节目《今夜》在 40 多年的历史上先后有 4 位主持人，但每一任至少有数年之久。至于一个栏目的样式和风格，包括各板块的组成方式，也不应该轻易改变。固定的主持人、固定的式样、固定的风格，成为谈话节目的品牌标志和外部质量标准，也为观众提供了信誉保证。此外，一个谈话节目如果获得了一定的声誉和较稳定的观众群，若非收视率下降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或是受到巨大的社会压力，是不会随意取消或是大幅度改版的。《今夜》已经持续了 45 年，《唐纳休访谈》持续了 38 年，足见，美国电视业非常重视名牌栏目无形资产的价值，少有轻易改变的不明智之举。相比之下，国内有些谈话节目改版频繁（某上星的省台竟然采取所有节目全面改版的“休克疗法”），忽略了节目的延续性，改来改去不但没有吸引新的观众，连原有的核心观众也丧失了，原有节目形象的持续性和节目品牌的社会影响随之丧失殆尽，实在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轻率之举。

总之，对于改版要认清一点，即改版只是节目提高的手段之一，节目提升的根本在于内容的充实、思想内涵的深入和内在品质的提升。

二是学习借鉴表现在克隆、模仿，而不是锐意创新。

中国的电视媒介在节目形态上有过几次明显的“跟风”。中央台的《综艺大观》、《生活》，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台湾的《非常男女》等节目都引来了模仿者无数，导致一个时期打开电视在某一时段都是同一类节目的千“台”一面的不正常现象。《实话实说》诞生后，各地方台也纷纷创办电视谈话节目，而在创办节目的过程中发现最缺的就是一个“崔永元”式的主持人。其实，办好一档电视谈话节目决不单单是主持人的问题，很多地方台忽略了对话题角度的精加工，忽略了嘉宾配置，忽略了整个谈话机制、流程的建立，以为靠一个出色的主持人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具有崔永元这样的素质，同时能担任主持人和制片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崔永元只是一个个案，绝不是一个职业范式。

齐白石老先生在谈到艺术的生命力时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对于电视谈话节目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认清某个个人不是可以简单“克隆”的职业范式的同时，还要意识到中央媒体也不具备提供一种职业范式的作用。地方台要从过去“跟风”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意识到自己与中央台在智力支持、嘉宾选择面乃至观众的视野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距离，从理性的角度认真思考自己的出路，以学习借鉴为基础，因地制宜，走一条充满本土化与地方特色的创新之路。重庆台的《龙门阵》应该算得上是一档把借鉴与创新处理得较好的谈话节目。

3. 关于收视率

收视率是衡量节目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但绝不是唯一的标准；收视率能说明一些问题，但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这是在探讨有关收视率的问题时首先要明确的。

他是一名普通的环保工人，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掏粪工。他又是一名在普通岗位干出不凡业绩的人，被老百姓誉为“天津的时传祥”。他，就是共产党员顾月海。顾月海出生在环保世家，1991 年，当他光荣入党的时候，顾月海就下定决心：要在环保工作的岗位上干出成绩。

在 2003 年的 5 月，顾月海和他的同伴们一共加班将近五千个小时，相当于一个月干了两个月的活儿，他们用自己的辛苦，换来了六十多万居民的清洁与健康。回忆起那个忙碌的月份，顾月海说自己最担心的并不是会传染上非典。

顾月海可以说做的是最危险的工作，因为他不仅要坚持岗位，清扫街道和公共厕所，而且还要兼顾天津几个医院医疗废物的处理。这些工作场所都很有可能传染上非典，但他却说，自己最担心的是万一自己和同事们感染了非典，被隔离，就不能去干活，不能为公众清洁环境了，这是多么朴实的语言呀！



顾月海　环保工人

在节目的最后，顾月海谈起自己入党摁红手印时的心情：“当时自己就想，以前你是一个群众，摁上红手印以后，你是一名党员了，跟原先不一样了，有些事你必须得走在前面，是在各方面吧，你就要多干，还得要干好了，总归党员跟群众不一样了。”



当前，我国电视节目在看待和利用收视率上普遍存在着问题，就电视谈话节目来说，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把收视率作为一个绝对和唯一的衡量标准。

事实上，不同的谈话节目在评估尺度上各不相同。每一个谈话节目都像是某一个品牌的产品，对于产品来说，除了要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还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美誉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某些电视台尤其是地方台只凭着一个百分比就决定是否还保留该节目的简单做法实在是不可取的。以中央电视台的《对话》为例，它的收视率始终都在1%以下，但作为中央电视台十大品牌栏目之一，《对话》代表的是谈话节目的一种品质，是谈话节目的高端，具有提高人的学养和提升媒体品质的作用；同时，《对话》的嘉宾除了知识文化界精英外，更多的是经济界、产业界风云人物，这些人是都市生活的主导阶层，而现场观众更是有着成长为未来精英的潜力，通过与产业精英的对话，这些未来的精英看到了一个方向、一个阶梯，从而可以更准确地为自己定位，节目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以某一谈话节目受众的绝对数量来简单衡量，还要考虑到这个节目的稳定受众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的作用。有了这样一个“加权值”，《对话》在二套这个有着巨大生长空间的频道里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

另外，收视率是一个量化的标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特别强调不是一切都可以完全量化的，要把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对话》除了定期了解自己节目的收视率以外，每期节目结束后还会自己花钱做受众调查，征求观众的意见。由节目组确定一些有代表性的观众，让他们就节目当中涉及的问题发表看法，通过email的方式传送给节目组。这些意见往往非常生动、到位，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以往节目存在的问题，不少改进意见成为节目制作的重要参考。

二是对专业调查机构提供的收视率缺乏深度利用。

收视率调查是一项非常严密的、需要规范化的科学性的工作，因此一定要选用专业调查机构来完成。专业调查机构提供的详尽的收视率情况，还有很多文章可做。如，很多谈话节目的制作者在看节目“受众流动情况的曲线图”时都会发现，前五分钟受众流动比较大。针对这一情况，节目制作者就有必要在策划时给予特别的注意，思索和分析受众流失的原因。如果前五分钟受众是在选择话题、决定是否继续收看，那么策划时就要特别注意怎样选择吸引人的话题切入角度，再结合“成人注意力的极限只有20分钟”等传播学规律，把节目的内在节奏策划得起伏有序，始终保持对受众的吸引。在这一方面，好莱坞的商业大片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虽然谈话节目不是商业电影，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借鉴其合理成分，在节目策划时，强化考虑受众收视状态波动状况的意识。又如，收视率可能会为节目制作者提供核心观众的情况，要培养忠诚度，就有必要就他们的文化背景、生活情趣与爱好、心理需求等方面做进一步的调查，了解他们对即将制作播出的话题有什么看法等，这实际上是节目制作流程中重要的“前馈”环节。可以说，目前节目制作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强化“反馈”环节，但对“前馈”的自觉意识还远远不够。

二、建立工业化节目生产机制

之所以提出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要建立起一种工业化生产机制，是因为工业化生产模式是一种可操作、可管理的系统化流程，能够保证节目数量的产出和质量的恒定。完整的工业化



金媛媛 石家庄客运公司的一位列车长

金媛媛，石家庄客运公司的一位列车长。她所在的这趟列车正是往返于石家庄与非典首发地广州之间的专线列车，而列车也正是当时阻止非典蔓延、传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

非典期间，金媛媛不仅带病上车完成运营任务，还曾经三次直面非典疑似病人，当时只有将整个车厢的100多名乘客全部隔离。“你只能是把大家的那种激动的情绪先稳定下来，让他们别慌，因为你的列车运行时速120公里，如果一旦你控制不住局面的话，旅客一乱，一慌张，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金媛媛说。采访中，这位年轻女列车长曾不止一次地说，那时最羡慕的就是别人能够哭出来，“当我看到电视上一些医护工作者抱头痛哭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总有一个能够宣泄的机会。但是，作为一个列车长，你不可以哭，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可以，因为整个列车的乘客都在看着你。”

生产机制是一个涉及多方因素的流程，这里只想从两个方面就某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做些简单的论述，以期制作者和管理者能够从各自的角度重新思索如何使蓬勃兴起的电视谈话保持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谈话节目的真正提升。

1. 制作者与节目制作层面

从节目制作的角度看，以下几方面是制作者需要加以考虑的：

一是可以适当微调节目定位。

一个电视谈话节目做得越久，制作者“无米下炊”的感觉通常也就越强烈，于是就有了一次次的“改版”。但改版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时也许可以换一个思路，将节目的定位进行微调。

从工业生产的角度来讲，一个产品诞生后过了生存期，还要经历成长期、品牌期，直至最后步入衰退期，在每一个时期都要采取不同的市场策略。谈话节目其实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中央台的《艺术人生》就是一个典型的感到“题荒”的节目。对于已经过了生存期、进入成长期的《艺术人生》来说，决不能自做牢笼，要在体制所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扩展自己的视野、放开自己的思路，可以考虑微调节目的定位，否则难逃快速进入衰退期的命运。原来的定位中，只限于选择老艺术家作为嘉宾，调整定位后，可以考虑同时请几位年轻嘉宾就生活中某一方面的感悟做横截面式的谈话，而不是像做老艺术家那样纵向谈其人生；再比如，把思路进一步放宽，是否可以考虑把演艺界外的普通人请来，谈谈生活中无所不在的艺术对他们的人生、尤其是精神世界的影响？在节目定位的调整上，湖南卫视的《新青年》操作得比较成功，节目原本的思路是邀请专家学者在演播室里答疑解惑、传播知识、启蒙大众，随着节目的成长发展，遇到了和《艺术人生》类似的困境，所以该栏目也在保持已有“启蒙”理念的基础上开始关注“资本”理念，也开始请“资本”家做嘉宾。在“知本”和“资本”之间寻找平衡的同时，节目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得到了解决。

应该说，作为一个电视节目，它最终也许难逃改头换面、甚至销声匿迹的命运；但如果把它视为正常的社会谈话空间，则生命力永远不会停止，关键是不能被自我限制。

二是要始终坚持“谈话”的本质。

谈话节目顾名思义一定要有真正的谈话、交流的过程，但有些谈话节目却不是真正的谈话。

有的谈话节目邀请的嘉宾多为名人或明星，且均标明身份。节目中嘉宾们在一起说说笑笑，观众也充当欢乐气氛的配角，随着工作人员的手势鼓掌、叫好。观众出于对名人的崇拜，提问多以“我非常喜欢您的……”、“我是您忠实的……”开场；嘉宾们更是绕着圈的朋友，坐在一起挑些无关痛痒，惹人发笑的事件讲讲，充满了吹捧与自我吹捧；主持人也是嘉宾的呵护者，既不引导谈话的思路，也不给人启发、思考。谈话节目变成看人谈话的节目。这样的以“谈话”为名、实则背离谈话本质的节目，中央台和地方台都有。

有的谈话节目的制作者过分看重节目的技巧和手段这一“偏门”，譬如刻意追求戏剧性，营造“失控”。在西方谈话节目中有一类“垃圾脱口秀”，专事禁忌话题、制造混乱和挑逗观众的营生。这样的节目也背离了“谈话”的本质，是低俗的游戏和作秀。对于谈话节目中已经出现的这样的苗头，要坚决遏止。

还有的谈话节目规划过细，掌控过严，形同表演。谈话节目的魅力在于能够近乎原貌地再现一个不可重复的真实对话过程，满足观众实现社会交流(尽管只是一种虚拟的交流)的强烈

春光三社区居委会主任
杨金霞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



非典时期，有很多人在冒着危险坚守岗位，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就是一位普通的居委会主任，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春光三社区居委会主任杨金霞。在五月份那个非常时期，杨金霞所在的小区几次出现疑似病人，三户家庭被隔离，小区两千多名居民为此恐慌，是她使小区重新安定下来。那时她每天都背着消毒水给小区每栋楼消毒，一次次往被隔离的居民家里送食品，她说她也害怕，但一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就义无反顾地去做这些工作。在节目中，杨金霞自豪地说，最让她记忆犹新的一句话，就是朱镕基同志在大连市社区居委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你们是大街小巷的总理，你们的工作联系着千家万户，做到了严密细致，周到体贴，我应该向你们学习。我代表国务院向你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每当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一想到了这段话，她就觉得，既然是小巷总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应该给居民有个满意的答复。



愿望。观众希望通过节目看到谈话者真实的心理脉络,感受到他们真实的情感变化,也期待出现某些无法预测的戏剧性场面。但现在有些谈话节目总是企图刻意安排嘉宾和现场观众说什么和在什么时间说,看起来是有利于节目的"顺利"进行,实际上却破坏了谈话的气氛,显得虚假、做作,因而也就失去了观众。

谈话节目的本质除了要"谈",还要"谈起来",让双方或多方形成交流。没有掌控好的谈话节目往往表现为一种观点压制了另一种观点,这实际上是一个"话语分配权"的问题。某个节目请了两位嘉宾。A 对 B 说:"听说有人批评你的书了?"B 答:"不知道。都是朋友告诉我的。我没工夫看批评文章。"A 说:"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去写作品,专门给别人挑错儿呢?是想借批评名人出名吧!"B 道:"我不计较。"此时主持人则在一旁打着哈哈。三人在谈笑间把那些批评者全"灭"了。批评者没有受到邀请,无法为自己辩护,只好老老实实在荧屏前听人家奚落。缺失了重要角色的谈话,又怎么能实现真正的沟通交流,将争论引到该问题的方方面面,并推向更深入的层次呢?

三是要加强完善策划环节。

策划与即兴是谈话节目面临的一对无法摆脱的矛盾,策划为即兴创造条件,即兴实现并深化策划意图。策划作为矛盾的一个方面,具有主动性、可控性,因而也就需要给予更多的重视。

当前,各类谈话节目的策划工作一般体现为对话题的选取。其实,一期节目谈什么、不谈什么非常像工业生产中的立项。工业立项要论证它的可行性,更要分析项目上马有什么困难,上马后会带来什么结果。策划选定话题亦然。可以说,一些节目失败的原因就是对选题的可行性论证不够。做节目时间长了容易主观、容易自以为是,很难跳出来审视,这是可以理解的。如何跳出来?工业生产的某些经验也许可以借鉴。在国内著名企业"希望"集团里,所有要想上马的项目都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式"论证,集团成立一个由各类人才组成的专门小组与项目立项组对立,任务就是驳倒立项申请。如果项目被驳倒,专门小组将获得巨额经济奖励。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可行性差的项目被砍掉,最终能够上马的项目原来计划中的一些漏洞在"争吵"中得到了弥补,人们对其上马后可能遇到的困难也设想得更充分。相比之下,我们在确定选题的时候就普遍缺乏这样的一种机制作为保障。当前绝大多数谈话节目的栏目组人员的组织结构大致与《五环夜话》相似,由 3~5 人的选题策划组、2~3 人的信息资料组、3~4 人的责任编辑组、3~4 人的编辑组、2 人的观众联络组的和节目制片 1 人构成。这样的构架在策划选题的时候可能要更多地依赖于节目组的自觉程度,随意性强,直接导致了当前不同谈话节目选题的质量相差较大,同一谈话节目选题质量波动较大的状况。

除了话题的选定缺乏批判精神以外,策划的深入和角度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实话实说》的策划力量在众多的谈话节目里算是比较强的,曾经做过《再见罗大佑》,旨在探讨"艺术与商业性的关系"。由于对观众的选取过于随意,现场都是罗的崇拜者,导致了"一面倒"的状况。本期节目的总结"干一行要爱一行"、"行行出状元"也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前谈话节目普遍存在的前期策划在深入程度和全面性上的不足。再比如不少节目抱怨"热点"就那么多,在选题上容易与其他节目"撞车"。这实际上反映了策划工作只是确定了选题,而对谈话时选题的切入角度缺乏考虑。对于选题资源的开发不能是消耗性的,要考虑再生利用,这就提醒策划者要结合自己栏目的

中国人民银行文件

银发〔2003〕121号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



黄慕东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信贷政策处调研员

200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121号文件，控制房地产贷款。这一收缩房贷的新政策一出台，社会反响强烈，波及到整个房地产业和各个商业银行，老百姓最关注的房价问题也成了争议的焦点。《新闻夜话》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信贷处调研员黄慕东，他也是这个121号文件：《央行房贷新政策通知》的起草人之一。黄慕东解答了这一房贷新政策出台背景、具体采取的措施，另外他还分析了该政策，对房地产业和购房人的影响。

定位从小角度进入,不能走大而化之的路。比如同样是选择米卢作嘉宾,《实话实说》、《五环夜话》乃至《对话》应该是各有各的做法。这种"选题趋同,立意互异"不但能有效地缓解"题荒",也会使谈话节目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勃勃生机。

好在一些谈话节目的制作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开始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努力。我们说,有接受批评的勇气和意识,如果能够有制度作为保障,那么节目的辉煌就指日可待了。

四是不能忽视"产品"的社会效益。

我们提倡以一种"节目生产观"来制作电视谈话节目,并不是说以赚取经济利益为最大和唯一目标。谈话节目是一种精神产品,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在制作谈话节目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其社会效益。

在西方,谈话节目的确有一部分属于"垃圾脱口秀",但它不能成为主流节目。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电视史上创下最高收视率纪录的谈话节目不是什么刺激感官或满足偷窥欲的"垃圾脱口秀",恰恰是比较讲求谈话品质的《奥普拉·温弗莉节目》式的定位在社会、家庭生活领域,话题非常宽泛,从家庭厨艺交流、失业人员的理财建议到父母对摇头丸的了解、妇女遭遇的暴力侵扰等等的节目。即便请来好莱坞明星,谈论的也是他们的家庭生活。在"9·11"美国遇袭事件之后若干围绕此事件的众多谈话节目中,《奥普拉·温弗莉节目》的一期节目以主题"怎样向你的孩子解释 9·11"显示它对题材的敏锐触觉和社会责任。与此同时,美国的电视谈话节目又是以最不严肃的方式来处理这些话题的,用一些嬉笑怒骂的方式把主题中的严肃与沉重消解。这种极具后现代意味的话语方式作为沉重现实生活的一种润滑剂,对生活紧张单调又总是要面对太多严肃问题的普通大众来说,确实能够起到抚慰和放松的作用。这是许多美国观众对电视谈话节目情有独钟的原因之一。

当然,国外谈话节目也有一些做法是令人担忧的,比如很多节目在制作方预知或预设了尴尬的局面的时候会事先告知嘉宾,而且通常以某种形式的报酬来与之形成契约关系。1992年美国花样滑冰选手堂尼亚哈丁的一个密友打伤了全国冠军宝座热门的竞争对手南茜·开丽根的腿,引得国人大嚼舌根。某著名电视台主持人采访哈丁,付酬五万美元。但是哈丁实在受不了采访中的提问,当场退出,结果要赔偿。

虽然我们并没有完全照抄照搬国外的做法,但随着诸如"谭盾退场"之类事件在谈话节目中的发生,我们还是感到了一种隐隐的担忧,国内的谈话节目经过了十年的发展,现在确实到了要对嘉宾对节目的知情权、独立话语权、接受与拒绝权等问题进行一番理性思索的时候了。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社会问题,大到紧张的国际局势、经济危机和环境污染,小到个人的情感纠纷、心理障碍和生活困境,还有社会发展带来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的剧烈变化等,这些问题关系到了每一个人的生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世界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我们更需要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出发,建立一套自成体系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电视谈话节目理论,并用健康、繁荣、多样化的电视谈话节目实践来满足社会的精神需求,提升观众的兴趣和审美水平。

2. 管理者与总体规划层面

对于管理者,有三个方面要加以注意:

一是要能够超越对主持人、嘉宾等表面元素的关注,强化谈话节目制作和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工业化评估体系的建立。

节目制作机制最重要的是要有宏观调控。比如,谈话节目的整合,应该是一个自上而下的



龙翼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2003年6月9日出现了全国第一例有关性骚扰的胜诉案件。这起案件发生在武汉：一位女教师状告上司对她进行了性骚扰，武汉市江汉区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侵扰原告事实成立，侵犯了原告的人格权利，判决被告向原告女教师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元。

“性骚扰”是指有关性的不受欢迎的强迫的言语或举动。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已经就此立法，明确了性骚扰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在中国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近几年，各个地方法院已经开始受理有关性骚扰的案件，有人认为这起案件的胜诉，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将推动反性骚扰的立法进程。但是节目的嘉宾本案的主审法官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张绿水法官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龙翼飞教授却表示事情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简单。。

过程，由各个频道立项并且论证。无论是中央台、省台、城市台还是公司发行的节目，一定要论证各档栏目在本频道中所处的位置。现在的频道基本上都是专业频道，本专业频道有什么资源，哪一部分资源必须以谈话节目来承载，在播出时段上有多少被其他频道分流；对象化受众是什么，可以发展为指向观众的有哪些，流动观众中可以被吸引发展成忠实观众的又有哪些；重点扶持哪个节目作为招牌节目，对其他节目采取什么样的规定原则，等等。这样的详细论证协调了谈话节目与其他节目的资源占有和生存空间，给谈话节目的后期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各档谈话节目之间也要有配置，既不能出现盲点(如现在新闻性谈话节目就十分薄弱)，也不应该出现各节目间交集过多的情况，要让不同的节目各自的走向更鲜明一点。在美国，电视谈话节目对公共空间的划分已经非常清晰。仅以专门针对女性受众的谈话节目为例，可能是这个频道里一群家庭主妇正在聊各种家庭问题，另一档节目中几个职业女性正在谈未来的发展前景，再一台节目《男人来自火星》专门谈男女婚恋，观众可以各取所需，选择自己想看的频道。而在我国，谈话节目还处在泛话题时代，很多谈话栏目还没有形成各自独立的谈话群，也没有形成稳定的受众群，因此，走分众化路线应该是谈话节目实现繁荣发展的有效途径。

工业化评估体系要根据具体情况科学制定并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这里不再详述。

二是日常管理要能够推动谈话节目的稳步发展，而不是起相反的作用。

以保持“周期性”为例。电视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建立起了成熟的栏目机制，成熟的栏目机制都特别强调“周期性”，即除非有特殊情况或明显的改动需要，电视节目总是在每周的固定日期的某个固定时段中播出。日期和时段的固定有利于培养稳定的观众群，以星期为周期也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规律。而国内目前经常会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打乱这种周期性。如《实话实说》2001 年应当播出 52 期，实际播出 48 期，人为停播 4 次。已播出的节目中，被延迟 18 次，占 38%；其中，严重延迟 14 次(推迟 90 分钟以上)，占 29%，停播、迟播共 22 次，影响比例为 42.3%。虽然不能说《实话实说》2001 年节目收视率的降低与不稳定播出构成绝对的因果关系，但至少是也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而且相关系数不会很低。这类问题很多谈话节目和地方媒体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因此，必须考虑制定出有效的补救措施。毕竟，打造一个品牌难，丢掉一个品牌则轻而易举。

三是要认清媒体角色。

虽然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国家明文规定新闻媒体不准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这就提醒媒介管理者，必须切记媒体在中国社会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而谈话节目是一个以观点见长的节目，怎么处理观点是所有谈话节目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对于谈话节目来说，没有观点是不行的。谈话节目主持人这个职业在美国被叫做“Comics(喜剧演员)”，足以看出此类节目的诉求。中国的电视谈话从一开始并没有特别倾向于“谈话表演”(当然，目前部分叙述型谈话也有这种倾向)，而是把诉求点放在观点的交流上，但是对一番交流后究竟要怎样，人们理解上却产生了分歧。

有人认为谈话节目就是创造一个谈话空间，追求的是谈话过程的真实和生动，不主张给人结论，强调把判断的权利还给老百姓。但是，尊重观众的思考和判断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制作节目的时候一味地不置可否。在“我看《实话实说》”有奖征文活动中，有观众撰文指出：“《实话实说》作为《东方时空》的一个特别栏目，应更多



诺丹加拉、保罗 《猫》剧的主角

英国作曲家韦伯的《猫》是世界上公演时间最长的音乐剧，在它的家乡英国伦敦演出超过了21年，在美国纽约、奥地利维也纳等等也都超过了12年。优美的音乐、新奇的编舞，加上丰富逼真的造型使音乐剧《猫》受到各国观众的喜爱，它在150个城市巡回演出过，全世界已经有6500万观众看过《猫》的现场演出，它的忠实观众自称为“猫迷”，最多的看了700多场，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小群落文化。所以，当音乐剧《猫》在2004年五一期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演的时候，便成为最受关注的文化娱乐新闻。《新闻夜话》栏目专访了北京版《猫》的导演和两位主角。

北京版导演丘·安妮·罗宾斯在韦伯创作《猫》的时候担任编舞，所以谈起这部音乐剧非常有感情，她说，音乐剧《猫》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原创性、好音乐、好故事和剧场演出。她相信即使有一天音乐剧《猫》不再上演了，其中脍炙人口的歌曲还会继续传唱下去。

两位《猫》剧的主角诺丹加拉和保罗，讲述了扮演猫所必需的动作训练和表演上的独特之处；面对中国观众的批评，他们一边指出这是一种文化的误读，同时对自己的表演充满信心。

这两期节目在音乐剧《猫》在人民大会堂上演之前播出，达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保持电视新闻杂志的特色，话题更具有严肃性、深刻性及广泛性。没有什么触动的话题会使节目沦为快餐文化。有些节目让观众感觉在众目睽睽之下说了一阵子实话，没有收场，成了'实话散说'，难辨真伪。"还有的观众认为："厚重的话题绝不是一两句调侃的话就可以一笔带过的，这样做只能让人感到肤浅和自以为是。"

在这里，观众的理解和节目制作者的初衷有了一定的误差。《实话实说》曾经做过一期《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制作者的本意是想告诉人们不要回报是高尚的，要回报也是合理的。现代经济学和现代社会学的观念认为，给一定的回报也许是使拾金不昧风气形成或者张扬的一种机制。节目把两种观点呈现在观众面前，希望观众自己去分析，结果却因为没有明确制作者的观点而遭到谴责。

这引发我们两方面的思考：

一方面，电视谈话节目固然应当给予观众一定的独立思考的空间，实际上观众群体独立思考和评判的能力也在日益增强，但是上述事例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中国观众的接受习惯有一定的惯性，这也是节目制作中应该考虑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节目制作者的观点、倾向并不妨碍老百姓形成自己的观点。观众也希望在看完了故事、听完了讨论之后，再听听主持人的高见。这二者并不矛盾，反而能给节目增加一种思想上的张力。只要节目制作者(包括主持人)尊重观众的观点，而不是想将自己的观点、有时甚至是不属于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那么，制作者的观点也是会受到观众的尊重的，碰撞与交锋也可以在这个层面上展开。

中国的电视媒体，尤其是中央电视台，所担当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制作节目的时候不可能没有倾向性，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背景下，节目制作者是需要一定的策略的。《焦点访谈》的做法是运用"硬焦点软着陆，软焦点硬道理"的手法，把自身作为媒体倾向的观点高明而艺术地体现在节目里——这一点是很值得谈话节目借鉴的。



李正孝　北大博雅科技实验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水可以变成油，在1995年这就被很多的专家公认为是伪科学。但是七年过去了，2002年，一种新的燃料添加剂成了公众的焦点，它的名字叫纳米添加剂。据说把这种添加剂放到汽车的油箱里，"它能够大大降低尾气的污染程度，达到40%~80%。更重要的是，还能够节油，节油的程度达到了10%~20%。"有很多的媒体和专家对这种神奇的"纳米水"进行过质疑，为此《新闻夜话》专访了"纳米水"的发明人——北大博雅科技实验有限公司的首席科学家、留美博士李正孝。

李博士解答了关于"纳米水"的所有疑惑，介绍了这种科技新产品的特点和优势，以及对节省国家能源的贡献。但是似乎还是有些问题没能给观众以满意和易于理解的回答，比如说，这种产品到底是不是"纳米水"？它是不是应该被冠以"纳米"的名号？因为打着"纳米"的旗号而非"纳米"产品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是不管怎样，任何为人类造福的人都是令人尊敬的，希望"纳米水"也能有一个好的前途。



电视谈话节目操作实务

《新闻夜话》栏目是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一档新闻深度访谈节目，以主持人与新闻当事人或有关专家一对一的演播室访谈为主要形式。其中旨是“给新闻更多的背景，给背景更多的解释”;其定位为“社会新闻的热点事件,热点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关键人物的心灵对白,心灵对白中的事实真相。”

它也是西部频道所有栏目中，播出内容被平面媒体和网站引用转载次数最多的栏目。

《新闻夜话》在谈话形式上做的是减法,它既没有现场观众,也没有外拍短片做补充,甚至连最初的电话连线也取消了。它把谈话节目的电视化表现手段减少到最低，在演播室里完全依靠谈话的力量,尤其是依靠提问的力量推动节目的前进。减法的成功是《新闻夜话》区别于其他谈话节目之所在。

《新闻夜话》栏目是一个年轻的创作团队,下面收录的是大家从事一线工作的心得体会,所思所感,主要从选题、采访、主持人、嘉宾、道具、合成等方面加以阐述。



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新闻夜话》栏目创作团队

《新闻夜话》“三好论”

□ 陈永庆

一个以演播室访谈为主的新闻类谈话节目，其成功的核心离不开三好：好的主持人，好的嘉宾，好的话题。

说起来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具体到节目制作时，还是有许多值得思考和推敲的东西。

第一好：好的主持人

主持人是整个访谈节目的灵魂，他是谈话的引发者，是谈话的倾听者，是谈话语境的营造者，还是节目节奏的调剂师。

CCTV《新闻夜话》的主持人是记者型的主持人，其风格总体表述为犀利的、敏锐的、明快的、独特的。它强调访谈中的故事化和交锋感，强调访谈的纵深结构，要求层层揭开谜底，不能完全都是摊大饼式的结构，也不能全是散点式提问。

在访谈中，主持人经常会出现对嘉宾的步步追问，但如果分寸把握不好，追问就变成了质问、拷问。本来，主持人追求犀利的风格无可厚非，但并不是说板着脸像审犯人式地追问、质问嘉宾，或生硬地刺激嘉宾，有时候嘉宾感觉到主持人像拿着刀一样逼迫着自己，内心十分反感。即便是宰人，中国不还是有“温柔的一刀”之说吗？犀利的背后应该是以智慧作支撑，以友善、坦诚和平等为前提。一句话，主持人也要与人为善。提问的方式不能过于简单，态度过于粗暴，语言过于生硬，表情过于严厉。

由此想到主持人的人性化问题。

人性化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他所提的问题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二是他应该有同情心，即使他面对的是一个死刑犯，他也应该给对方足够的尊重。

曾经有一个飞越黄河摩托车手的粗编节目，在这期节目中，多次出现了另一个车手在飞越长城时被摔死的镜头，血淋淋的，重复使用这样的镜头，然后发问，这不是太残忍了吗？如果你是摔死者的家属和亲人，你看到这样的镜头会怎么想？

2004 年，两个南非的飞行员想完成环球飞行计划来到了中国，不料其中一人在湖南失事死亡，另一名幸存者来到北京接受专访，粗编节目中出现了说他们想环球飞行是否”痴人说梦”，此语不妥，太不友好了。你想，现在两手空空，徒步环游世界的人都有了，人家一个是建筑商，一个是 IT 经理，环球飞行怎么就不可能呢？何况他们已经飞完了许多国家。最关键的是，他的同伴刚摔死在中国，此时他最需要的是鼓励和帮助，是安慰而不是再次受到伤害。

提问是一个电视谈话栏目的核心竞争力，编导和主持人下工夫最多的地方就应该是对提问的设计，把提问变成收视率是一个电视谈话节目追求的境界。

《新闻夜话》反对抽象提问，反对大量宽泛的提问。

提倡从最新的时间提问；



艾伦(左)、里奇(右)
南非飞行爱好者



里奇 南非飞行爱好者

2004年5月18日,一名叫艾伦的南非飞行爱好者驾驶一架自己组装的小飞机,在中国湖南省境内不幸失事遇难。半个月后,他的同伴里奇走进了《新闻夜话》演播室,讲述了他们87,000公里的环球飞行梦想和那次不幸事故。

2003年12月17日,里奇和艾伦分别驾驶一架自己组装的小飞机,开始了飞行历史上距离最长的环球飞行,他们计划飞行87,000公里,途经6个洲的55个国家。当宣布这个计划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他们是认真的,因为他们不是专业的飞行员,飞行只是业余爱好。但是两个人坚信,自己并不疯狂,只要每天飞上500公里,一直不停飞,总有一天在绕地球一圈后,他们可以回到祖国南非。他们希望向世界展示一个崭新的南非,勇敢的南非人。在变卖所有家产,告别家人后,他们出发了。一路上困难重重,语言障碍,文化差异,饮食差异,都被他们的乐观精神化解了。

他们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因为飞行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媒体报道的世界,旅行给他们带来很多快乐。

但是,不幸还是发生了,在飞行了4000公里,完成一半旅程,来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中国后,一个错误的飞行决策夺去了艾伦的生命。失去了朝夕相处的同伴,里奇悲痛不已,一度要放弃飞行。但是痛定思过,他决定继续艾伦还未实现的梦想,继续飞行下去,即使一路上还有很多未知数,即使面临孤独……因为飞行的快乐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

提倡从身边的人或事开始提问；

提倡从细节开始提问；

提倡从故事中提问；

提倡从道具开始提问；

提倡从对比中提问；

《新闻夜话》的提问口号是：细些、细些、再细些；人性、人性、再人性。

多数情况下，采访是按事先安排好的设计提问，但这样会产生一个问题：主持人只管一路问去，但嘉宾的回答却未必是编导想要的，而且感觉嘉宾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由于主持人的部分提问还经常带有叙事的色彩，带有交代背景的功能，所以提问有时可能会显得很长，而嘉宾的回答却很短，这样的结果是主持人在节目中占据了相当多的表述时间，主持人显得太强势了。

这里涉及到一个主持人与嘉宾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这是栏目风格的一个重要标志。

《实话实说》的主持人与嘉宾的关系是邻里关系，是大家在一个社区会议室里谈谈自己关心的人和事，但并非由官方组织，而是一种民间聚会。

《新闻会客厅》的主持人与嘉宾是主客关系，是请到家里做客的感觉，因为是在客厅里进行，所以还是带有一种礼节性，一般不谈卧室里的东西。

《面对面》的主持人与嘉宾的关系对立成分比较重，虽然不能用敌我关系来形容，但主持人强烈的质疑风格还是会让嘉宾感到一种时刻准备战斗的警惕。

《讲述》的主持人与嘉宾的关系是朋友关系，但他们不是在家里而更像是在一个深夜的酒吧或茶室，一个人听一个人诉说，倾泻情感。

《对话》的主持人与嘉宾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师生关系。当然，师者是那些顶尖级的精英人物，主持人带着许多观众想知的问题和崇拜心情，像学生一样挖掘老师成功的经验或者讨教做人做事的高招。

《艺术人生》的主持人与嘉宾的关系很像老同事，老战友的关系，他们在一起主要是回忆过去的岁月，捡拾那些艰难、痛苦、辉煌、亲情、友情、爱情的碎片。

《新闻夜话》的主持人与嘉宾的关系则像比赛选手的关系。主持人提问像是乒乓球的发球手，嘉宾则是接球手，从采访一开始，就是不停地发球，不停地接球，当然也有嘉宾给主持人发球的时候。这是一个赛智商，赛速度，赛敏捷的过程。

《新闻夜话》现在的问题是，主持人发球太多了，太快了，有时对手还没来得及接球，下一个球已经到了。体现在节目上，就是主持人问得多，嘉宾回答得少。有人会说，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可以不接球，但我还是要不停地发过去，让他猝不及防，让他接受一次考验，看到他手忙脚乱的样子，观众会开心。其实不然，《新闻夜话》虽然叫 TALK SHOW，但它的首要目的不是娱乐观众，它的总体风格是严肃的，用问题难倒嘉宾不应该是它的目的，它的核心还是要告知观众更多新闻背后的东西。既然像打乒乓球，那么只有发球而没有接球，比赛是无法进行，也无法欣赏的。

这样看来，好的主持人不仅仅是一个好的提问者，也应该是一个好的倾听者。

其实，倾听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主持人不仅要听清，更要听懂，不仅要听懂，还要作出相应的回应，因为与嘉宾的交流感是谈话节目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志，有时恰恰是一些即兴的答话观众爱看，而且能够营造好的谈话气氛。

这里涉及到主持人能否敢于放大自己在

濮存昕，著名演员，2001 年成为中国第一个“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从那时起，濮存昕的形象就出现在各种预防艾滋病的公益广告上，他的漫画形象甚至出现在安全套的包装袋上，他在各种活动各种场合给认识、不认识的人发放安全套。他还把十几位艾滋孤儿请到自己家里做客，并亲自和家人一起，为他们做饭。濮存昕对预防艾滋病宣传工作的热心也影响了他的演艺工作，他在电视连续剧《失乐园》中，扮演了一位艾滋病患者，还准备在下一部中，扮演一位艾滋病患者的父亲。濮存昕毫不隐晦他的这些行为方式带有营造新闻事件的目的。他说：他就是要让社会更多地了解艾滋病的现状，提醒人们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性。

在节目里，濮存昕在《新闻夜话》演播室里深情地哼唱了他最喜爱的歌曲：电视剧《光荣之旅》的主题歌——“感谢生活、感谢生命”，他说：“生命是美的，他的心跳、他的呼吸、他的眸子里面晶体闪着光，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艾滋孤儿在濮存昕家做客



濮存昕　演员、中国“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

谈话过程中的感觉问题。一般来讲,主持人在专访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形成了采访的大纲,甚至提前预知了嘉宾回答内容的60%~70%,所以在访谈开始前可以让被访者知道你已经为此做了很认真很充分的工作,让他信任你,让他尊重你,也让他无处可逃!

当主持人在采访中放大了自己的某种感觉,会表现出不自觉的自信,而这种自信也会激励嘉宾的谈话信心,这也是调试嘉宾情绪的一种有效手段。

调试嘉宾的另外一种有效手段是想法从接近他的职业,接近他的典型经历,接近他的典型人物入手,消除他的陌生感。绝大多数人到聚光灯下和摄像机前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紧张,即使是演员和经常出镜的官员也不例外。有一次,一位犯罪心理学家接受专访前十分紧张,主持人与他握手时感到了他内心的距离,便笑着说,我大学学的是新闻,但我一直想学心理学,你现在还带研究生吗?如果我想读心理学研究生,需要什么条件?嘉宾的情绪一下就放松了,主持人接着说,前不久我刚采访完公安部的某某领导,在谈到国内犯罪心理学研究时,他提到了你的名字,对你大加赞赏。嘉宾听到这里时,忍不住笑了,采访也就顺利开始。

第二好:好的嘉宾

根据实际经验来看,好的嘉宾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良好的外表气质和风度

电视首先是视觉艺术,嘉宾的长相和气质及风度对观众来讲非常重要,显然,漂亮的、帅气的、气质好的嘉宾,观众是容易接受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外形起决定作用,但一个外貌过于丑陋,形象十分猥琐的人作嘉宾肯定会吓跑一些观众。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凤凰卫视的有些谈话节目,一定要请个美女,坐在嘉宾旁边,她并不是谈话的主角,只是时不时插一两个天真的问题,其实,这都是研究收视心理后的有意安排。

曾经有一期节目,谈的是一个关于恐婚症的话题,这是一个非常有社会热点和争论价值的选题,原本判断它应该会有不错的收视率,但播出结果出人意料得低,正在百思不得其解时,一位网友在网上发了这样一个帖子:我本来没有恐婚症,看了你们的节目,被吓出恐婚症了。还有一期节目,是专访一部芭蕾舞剧的男女主角,采访就设在他们排练的地方,由于天气太热,二人穿着很随便,尤其是男主角,穿着大短裤衩,与芭蕾舞剧高雅的气氛不协调,他们的长相和气质以及语言都无可挑剔,但着装和谈话现场的选择与主题出现了背离。因为芭蕾舞毕竟是高雅的艺术,所以采访的环境、光线、构图、气氛都应该有一定的艺术性。

一般来说,当嘉宾来到演播室接受采访时,我们都要求他们尽量穿正装,濮存昕作为中国第一个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来栏目接受采访时,不愿意穿西装,但当听说着装也是栏目风格的一部分之后,他还是穿上了西装。同样,栏目也一直是要求主持人穿正装,体现一种职业的气质和素养,有一次一个主持人在戒毒所采访,穿的是一件圆领汗衫,而且汗衫有品牌的明显标志,结果整期节目作废。

当中国大量的谈话栏目在追求"家"的感觉时,《新闻夜话》追求的仍是白领"上班"的感觉,松弛,懈怠,散漫与这个栏目无关。这也算是一种风格吧。

二、良好的语言表述能力

电视是视觉和听觉艺术的综合,谈话节目突出的是一个谈字,嘉宾能不能谈,善不善谈,他的音质好坏,音量大小,语调高低,语速快



李婷(左)、孙甜甜(右)在雅典奥运会领奖台上



李婷(左)、孙甜甜(右)
雅典奥运会女网双打冠军

中国女子网球双打在雅典奥运会夺冠之后，国内外对这块金牌的评价各一，她们的获胜被称为是最神奇的中国“神话”。谁也没有想到这两名年轻的中国选手会获得奥运冠军，包括她们自己和教练。甚至国际网联的调查将它评为“最意外的”金牌，这块金牌的背后是什么？得到它之后对国内网球业发展能起多大的促进作用？《新闻夜话》在对冠军得主李婷、孙甜甜及其教练余丽桥和张琪的采访中，李婷、孙甜甜就实力和排名问题澄清了一些其他媒体报道中的不实之处；两位教练也提出本次夺金有可能是昙花一现，因为发展网球运动需要大量的商业赞助，靠现有的国家队带队员是不可能实现振兴中国网球业的，金牌和胜利能给中国网球带来什么还是个未知数。

慢，普通话程度，都是影响谈话节目品质的因素。

总的来讲，《新闻夜话》的嘉宾绝大多数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语言表达能力不错。在选择嘉宾时，也要求编辑必须考虑他们的口才和表达能力。《新闻夜话》不能像有的地方电视台，直接用方言进行访谈，因为它的观众是面向全国的。在普通话问题上，一般不作让步，有时甚至因此放弃选题，确保栏目的品质。

嘉宾在语言表述上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是过于紧张而引起的说话卡壳、结巴、琐碎，二是由于顾虑太多而不敢放开说话，处处小心谨慎，生怕说错了什么。

这两点主要是由于心理作用所致，表现在屏幕上就是声音偏小，底气不足，语速迟缓，语态低沉，语句短促，语言干巴，辞不达义，目光游移，甚至额头出汗，这样的谈话往往不是他们的真心话，从而使整个节目的节奏拖沓，主题分散，失去吸引力。

还有一种现象是嘉宾谈话过于兴奋，滔滔不绝，不管主持人怎么引导，也拉不回来，一味按照自己的思路说。由于《新闻夜话》采访的多为名流，其中有不少一流的科学家，各种领域的专家教授，他们习惯按照自己的逻辑来谈，时常出现这种局面。

三、新闻事件中的核心人物

好的嘉宾一定意味着他或她是最适合所选题目的谈话人选。有时候新闻事件的主角可能不止一个，但谁会带来最精彩的故事？谁的讲述能力最强？需要认真选择。

对于《新闻夜话》来讲，主要形式是演播室一对一的访谈，这样选择起嘉宾来就更需要经验。曾经有人把三个嘉宾请来同时接受采访，然后编出三期节目，这样做成本是降低了，但是我们看到，当一个嘉宾在那儿侃侃而谈时，另两位无事可做，无话可说，显得比较尴尬。而且由于机位少，经常出现构图上的问题，旁边的嘉宾只能露个肩膀，或一只胳臂。

可以说由于一对一的形式也是《新闻夜话》风格的一部分，因此，当非要采访一个人以上的时候，我们提倡分上下半场的方式，减轻主持人的压力，也避免嘉宾在那儿坐冷板凳！

雅典奥运会女子网球双打中国选手意外获得冠军，《新闻夜话》要采访四个当事人，只好把选手李婷和孙甜甜成一组作上半场采访，把两位教练成一组作下半场采访，这也算是《新闻夜话》开播以来节目采访人数最多的一期吧。

如果我们作一个冷静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当一个主持人对两个嘉宾进行采访时，总会有一个嘉宾说得多，另一个说得少，说得少的并不是不能说，也不是不想说，而是没有机会说，中国人讲究谦让，他们决不会在演播室这个特殊的场合抢起话头来。

从主持人的角度来说，多位嘉宾坐在眼前，就必须要求提问更具有针对性，而且要经常在嘉宾之间来回转换，有时候免不了顾此失彼。

从摄像角度来讲，多位嘉宾的谈话拍摄起来难度更大，因为有时要推近景和特写，镜头要紧跟谈话者，主持人抛出一个问题之后，谁会第一个回答，谁会回答得最好，这都是未知的，只能临时做出判断。

从后期编辑来讲，有时为了平衡关系，只得通过后期剪辑时来调整或重新分配不同嘉宾的出镜谈话比例。而众所周知，比例分配本身就是有倾向性的。因此总的来说，我们不赞成在一期节目里同时采访两个以上的人。

当然，编辑的天职就应该选出最核心的新闻当事人。不能为了平衡嘉宾的关系而经常出



警犬太尼



商士波　警犬训练员(左)

李振东　警犬中队中队长(右)

在中国有一支专门由警犬组成的反恐部队，随时准备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从11年前成立到现在，武警北京总队最大的成建制的警犬中队担负着首都地区重大的安检任务，并且每一条警犬都和枪支弹药一样，是武警部队自己的武器装备，和战士一样，它们还都有自己的档案，被称为是不说话的战士，到底这些警犬在反恐作战当中发挥了怎样特殊的作用，哪些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警犬训练基地，《新闻夜话》专访了警犬驯导员和他的警犬。特别让记者感到触动的是，警犬太尼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始终静静地坐着，面对镜头它的驯服和可爱是那么的真实。

现妥协。

第三好:好的话题。

这里主要指好的选题。什么是好的选题?

我感觉这个“好”字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它的内涵已经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好、中、坏”那样简单的三分法中的“好”了,而是一个具有无限张力的字眼,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标准的总称。我们想寻找它的规律,却又经常被它的变化多端所捉弄,我们想制定它的标准,却又经常被实践所嘲笑,但在捉弄和嘲笑中我们的思维能力却获得了空前的磨炼。我们至少会越来越接近于观众,接近于市场,也越来越接近于真理。

在好选题的标准历史演变中,我认为走过了这么几个阶段:

一是以领导满意为主的价值标准。领导说好就是好,领导把新闻当作推动工作的一种工具,把个人的意图强加在新闻身上。这些通常都是以布置任务,强令执行的形式出现,只要你做成了,就是好的,就连获奖也顺理成章。

二是以创作者自我为中心的价值标准。自己感觉好就是好,把自己的感觉当作别人的感觉,主观性强,有些编辑容易把个人的偏好尽情体现在节目当中,使自己在节目的制作过程和传播过程中得到一种满足和愉悦。

三是以观众满意为核心的价值标准。比如节目播出后收到多少来信,接到多少热线电话,手机短信有多少,电子邮件有多少,最核心的,是收视率的数据有没有变化。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电视界眼下越来越看中第三种标准,这种标准的变化反映了对传播学一种规律性认识的加深,充分体现了以受众为核心的大众传播理念。因此,收视率高的节目,无疑成为“好”的重要标准,在广告市场,收视率和广告投放成正相关关系。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评估体系中,每周每个频道的栏目都会有一个收视率高低的排名。

可以这么说,现在收视率是一个栏目的生命,也是反映该栏目的节目被观众消费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正因为如此,它像魔棒一样指挥着我们,像巨石一样压迫着我们,也像海洛因一样令人兴奋。但在考虑选题时我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实,首先要考虑栏目的生存问题,在舆论导向上,往往是“生存还是毁灭”,而在收视率的指挥下,往往是要求更多的刺激和犀利,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新闻夜话》的原则是,在确保导向正确、确保栏目品质、品味的前提下,要努力提高收视率。

这就不得不使人花大量时间来思考:什么样的题目可能会有高的收视率,同时又没有政治上的风险?

为了先解决栏目生存的危机,考虑到西部频道在整个 CCTV 中的位置和角色分配,结合《新闻夜话》所处的环境和实力,特在选题上提出以下要求:

一、特别敏感的政治问题,暂不去碰,如国内的行政、司法腐败、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藏独、疆独等。

二、大量的由于管理缺陷和体制缺失造成的“人祸”也要谨慎,如矿难、空难、海难、爆炸、毒品(毒物)泄漏、食品集体中毒、车祸、抢劫、杀人等。

三、国际特别敏感问题,如中东问题,日本问题暂不介入。

明眼人都知道,上面的这些问题大多数都是热点,也是世界所有重要传媒都重点报道的范围,但相对于新闻频道和中央一套及四套来说,《新闻夜话》所处的西部频道是比较边缘的,当你非要往漩涡的中心跳时,矛盾自然就



中国海军女子陆战队荒岛生存训练



孟秋贞　中国海军女子陆战队副队长

中国海军女子陆战队，是中国海陆空三军部队当中，唯一一支担任作战任务的女兵分队。女队员们被称为是陆地猛虎，海中蛟龙，有海陆两栖霸王花的美称。女子陆战队到底是干什么的，她们身上有什么绝技？孟秋贞，海军女子陆战队的副队长，就是带着这样一身神秘色彩走进《新闻夜话》演播室的。

孟秋贞告诉我们，海军女子陆战队作为应急作战部队，在发生战争的时候，要求不进行任何集训，就能在最短时间冲到战线最前沿，深入敌后方进行侦察，获取情报，探明路线，扫除地雷等障碍，以保证大部队顺利通过。特殊的任务要求特殊的技能，她们不仅能够掌握各种先进武器的使用方法，而且还擅长武装泅渡，擒拿格斗，悬崖攀登等技能。现在，陆战队的每个女兵对应两三个普通男性根本不成问题。

这身绝技是怎么练就的呢？女子陆战队最有特色的训练就是荒岛生存训练。就是给每个女兵发上二两大米，一两猪油，一盒火柴，一把匕首，然后把她们空投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在那里生存七天七夜。七天七夜走出荒岛时，女队员们已经是个个皮包骨头、瘦骨嶙峋，连熟人都认不出来了。这样的魔鬼训练，让女兵们个个皮肤黝黑，身体健壮。她们羡慕军队外女孩们白皙的皮肤，苗条的身材，但是她们相信，自己身上的迷彩服却不是每个女孩子都有机会穿的。这群女孩是大海波涛中闯荡出来的，是在炙热的沙滩上煎熬出来的，是在严格的训练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她们为自己别样青春而自豪！

会出现。如何在边缘频道和边缘选题中获得更高的收视率,其难度可想而知。

通过观察和总结,我以为《新闻夜话》的选题应该是多元化的,而非局限在某一个领域。多元化、多样化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多地关注社会新闻,比如文化领域、科技领域、考古领域等等。选题在原则上要适当放低视角,多从老百姓衣、食、住、行切入。

具体说来,以下几个方面是好题材的一些共同原则,值得关注:

一、具有揭秘性

探索未知的东西是人类的天性,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说,新闻就是一种可以减少人们对事物未知状态的信息,因此,具有揭秘性的题材总是会引发观众的好奇心,如"揭秘警犬反恐部队","探访中国女子海军陆战队"等节目都取得了高收视率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揭秘不能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刑侦手段等。有一期揭露手机短信诈骗的节目,来自公安部的嘉宾讲述了诈骗分子是如何利用群发器来工作的,甚至说出了群发器的产地,这样的细节一旦传播出去,显然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二、具有允许范围内的矛盾冲突

冲突是构成谈话节目高收视率的重要手段,也是一个谈话节目精彩程度的关键因素,《新闻夜话》所表现的矛盾冲突虽然是有限定的,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冲突论"。冲突不光是构成节目卖点的元素,更重要的是推动谈话前进的动力。

在冲突构成中,要把握好主持人与嘉宾之间的平衡,把握好嘉宾与嘉宾之间的平衡。以"人造美女的难题"这期节目为例,人造美女能不能参加选美大赛?节目中先请人造美女讲述自己的理由和感受,然后请选美大赛组委会的负责人陈述反对理由,靠双方的冲突推进故事的发展,也推动节目的进程。

三、具有较快节奏的故事性叙述。

《新闻夜话》是谈话节目,但首先是新闻类型的谈话节目,这个特点要求它是快节奏的。故事化的叙述方式有助于提高观众兴趣,纯思辨的谈话所占比例毕竟很少。而故事性和事件性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在考虑选题时要多选事件性的,少选现象性的题目,多选有情节,有细节的题目,少选抽象性的题目。

四、具有震撼力量的内心独白

争取让当事人讲自己的故事,让知情者讲当时的故事,真情的内心独白具有煽情的效果,容易赚取观众的眼泪。

五、具有明显的竞争因素

选题中的竞争性色彩是与人天性中的"好斗"联系在一起的,纵观近年来收视率高的栏目,大都是具有"竞争"色彩的,例如《幸运52》和《开心辞典》,它们主要表现竞争智力;美国的《生存者》,更是面对面进行生存的残酷竞争。收视率屡创新高的奥运会、世界杯以及其他各种比赛,无一不是"竞争"的最大战场。这类选题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就是"九种吉祥物竞争奥运形象代表","国家大剧院方案竞争激烈"等。

六、具有名人效应

名人类节目收视率之所以偏高,是因为观众在收视心理上与名人的某种熟知性,正如一个人在路上见了自己的熟人与见到一个陌生人,反应是绝对不同的,停留时间也会有长有短,关注的程度也会有高有低,专访彭丽媛,张艺谋等明星的节目收视率明显偏高也是一个佐证。



杨媛整形前照片



杨媛 2004 年国际选美大赛洲际小姐大赛参赛选手

2004 年 4 月初，国际选美大赛洲际小姐大赛开始，北京赛区有 30 名选手入围决赛，河南姑娘杨媛就在其中。但就在决赛临近时，杨媛突然接到大赛组委会通知，她的决赛资格被取消，原因是她是人造美女。杨媛为此起诉组委会。《新闻夜话》栏目采访了杨媛和 2004 年环球洲际小姐大赛北京组委会主任卢俊聊，双方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杨媛为了参赛脸部整形 11 处，她认为自己追求美没错，在节目中她的情绪很激动。而组委会则认为为了选美整容此风不可长，为此决定还要举办一次人造美女大赛。最后杨媛败诉，人造美女大赛则在紧密筹备。

《新闻夜话》“三度论”

□ 陈永庆

1992年,我买了一本关于打网球的书,书名到现在已经忘记了,但整本书我只记住了三句话,它说,打网球取胜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三点:第一,球的速度要快,要让对方猝不及防,现在有的男子网球选手发球的球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多公里;第二,球的落点角度要大,充分利用球场的宽度,要让对手够不着;第三点,球要尽量打到对方底线附近,即要打出深度,如果打浅了,容易被对手在网前截杀。

我姑且把它称为“网球三度论”,十几年过去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三度论”也完全适用于做新闻节目,尤其是像CCTV《新闻夜话》这样的谈话栏目,下面分而论之。

一、速度论

速度与速胜是关联的,没有速度就没有速胜。

在新闻竞争以秒计算时效性的时代,速度的重要性开始统帅新闻竞争的各个方面,除了新闻的真实性外,还没有其他属性能像时效性这样引人注目。

客观地说,《新闻夜话》对新闻的反应速度现在是比较差的,第一,它不是日播栏目;第二,它不是直播栏目;第三,它被人为限定在主流新闻的边沿;第四,它的财力不支持快速反应所需要的开销。如此多的先天不足,是否就意味着《新闻夜话》不需要速度了呢?《新闻夜话》如何理解速度论并走出自己的路?

实践证明,《新闻夜话》走的是跟大速度,抢软速度的道路。

所谓跟大速度,是指跟一个阶段内的热点,而不是一个具像事件的小热点;所谓软速度,是指一个事件或人物不同阶段的状况,并非一定是巅峰状态的情况。

比如,雅典奥运会是一个阶段的热点,而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就是一个具象的热点,《新闻夜话》如果也做开幕式,那是无法与现场直播竞争的,它也无法在第一时间采访到冠军。当奥运会刚结束,人们还沉浸在喜悦欢乐之中时,《新闻夜话》采访了刚刚回国的女子网球双打冠军,虽然在此之前,人们都已经了解了中国体育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许多谈话栏目也已经对两位选手进行了采访。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这一话题还有它的新闻性,还有它可以再次挖掘的地方,虽然播出可能比别人晚几天,但依然有观众,有市场。

今年北京的夏天雨水偏多,原来是与人工降雨有关,于是《新闻夜话》采访了中国航天集团专门制作增雨火箭的总经理。采访完没两天,北京就又下了一场雨,编导急得直拍腿,心想,要是下雨这天晚上能播出这期节目该多好。但《新闻夜话》不是日播节目,只有等两天,两天后就在节目播出的那晚,不知是老天有眼呢,还是总经理又在北京多打了几发增雨弹,总之,那天夜里北京再次下了一场大雨,许多北京人就是在雨声中看《新闻夜话》的。这种时



陈光学 “增雨火箭弹”发明人

张纪淮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人工影响天气所研究员

2004年入夏以来，全国各地不断传来“人工增雨”的消息，尤其是“增雨火箭弹”热销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新闻。据国外“人工增雨”的一项统计结果显示：每下6滴雨水就有1滴是人工增雨造成的。在中国，仅北京市近5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平均下来每年的“人工增雨量”相当于每年增出53个昆明湖。据了解在中国，目前人工增雨的原因已经不是只为了抗旱，那么“人工增雨”在社会其他领域还发挥着什么作用？大面积普遍性地进行“人工增雨”使得人工干预天气过多，是否会产生负面效应？

针对上述问题《新闻夜话》请到了发明“增雨火箭弹”陈光学教授和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人工影响天气所的研究员张纪淮，就人工影响天气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正在发展的趋势做出了详细解答。

嘉宾张纪淮曾与中央电视台有过多次愉快的合作，他在节目录完后表示，“我深深感到《新闻夜话》栏目对较新鲜的事物、对普及科学知识的执着追求。作为一名从事人工影响天气的老工作者，感谢你们用活跃的形式支持和宣传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效的契合，让人觉得妙不可言，真有“天助我也”的感觉。后来这期节目的收视率数据一出来，果然比平时的许多节目要高。

类似这样跟阶段性热点，做软时效的例子很多。当学校快进行期末考试时，就播一期关于呼吁取消三好学生评选的节目；当学校放假时，就播一期中国科学家正在重新复原张衡地动仪的节目；当高考分数线出来时，就播一期对高考状元的分析节目；当学生毕业找工作时，就播一期假文凭展览的节目，谁又能说这不是时效呢？

软时效的节目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好处，就是正因为你比别人稍滞后，你才有站在别人肩膀上的机会，才可能有更好的角度，更丰富的素材，更从容的时间和空间。

软时效的节目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好处，就是正因为你比别人稍滞后，别人替你做了预热，做了铺垫，当它们通过种种努力把社会注意力集中起来时，你的节目恰好出现在热点之中，只要你显得与众不同，回报显然会超过自己单打独斗！

有时节目已经做出来了，但并不急于播出，甚至故意把时间往后延，为什么呢？就是希望别的媒体把一个人物或一件事炒得炙手可热再进入，炒作的火候不到，暂可作壁上观，当观众的注意力都被集中起来时，《新闻夜话》再出手，就可网罗到更多的观众。当然，这时的节目必须提供更深入的信息和更独特的角度。

二、角度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是对新闻角度最好的写照。搞新闻的人都说现在几乎没有什么独家新闻的可能，但独特视角是完全可能的，《新闻夜话》的视角有什么特点？

以这次奥运会报道为例，《新闻夜话》没有去雅典的名额，但可以选择与奥运会有关的主题制作节目。当别人在追逐着金牌报道时，《新闻夜话》可以采访中国奥委会的官员谈北京场馆节省投资的事；当别人在报道典雅奥运会的吉祥物是如何畅销，如何受欢迎时，《新闻夜话》可以采访中国的九种申报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竞争是如何的激烈。同样，刘翔的跨栏金牌是中国和亚洲的历史性突破，当别人在疯狂围追刘翔采访时，《新闻夜话》专访的是国家田径队总教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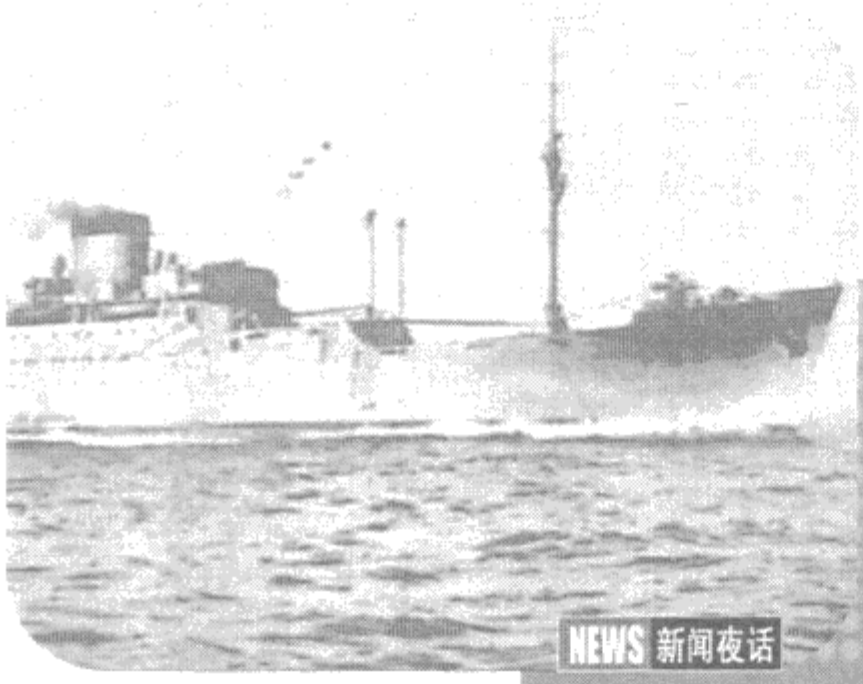
侧面进攻有时会取得更独特的效果，而且会大大降低操作的难度，节省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当北京周口店发布准备扩大保护范围时，《新闻夜话》播的是一期关于北京猿人头骨化石是否就在被击沉的日本名舰“阿波丸号”上的节目。当《十面埋伏》被炒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新闻夜话》播出的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眼中的张艺谋。当世界荒漠化日来临的时候，《新闻夜话》播的是立志构筑中国生态长城的留美博士访谈。为了配合党的生日，《新闻夜话》播出的是对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主创人员的专访，这些其实都涉及到一个角度问题，都不是“正面进攻”，而是“包抄迂回”。

三、深度论

(一) 深度来自于高度，有时首先要有高度，才会有深度

高度有两种，一种是人物的高度，一种是节目视角的高度。

所谓人物高度，是指嘉宾是这一领域的领头人，或者是这一问题的权威研究者。比如，谈取消三好学生评比的是中国教育学会的会长，谈恐婚症的是中国研究婚姻问题一流的专家，又比如纳米产品的真假问题，采访厂家是一种



“阿波丸”号邮轮



李树喜 《阿波丸》作者、历史学者

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神秘遗失之后，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至今仍下落不明。对于中国来说，它是巨大的痛！然而，一艘被美国海军击沉、在大海中沉寂了59年的日本邮轮“阿波丸”号却点燃了中国人的希望。那么，“阿波丸”邮轮到底是一艘什么样的船？它为什么会和“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联系在一起？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彻底打捞“阿波丸”沉船，揭开“二战”期间最大、最后的谜团？

带着这么多疑问，《新离夜话》专访了著名学者李树喜，他向记者透露了二十多年来的最新发现。他说，根据掌握的资料显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极有可能在“阿波丸”沉船上。在二十分钟的专访中，从头盖骨遗失时的背景到“阿波丸”被击沉时的情景再到对打捞工作的期待，问题环环相扣，情节险象环生。不仅向观众全面描述了事件的全过程，也打开了一扇了解“阿波丸”沉船和“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下落之谜的窗口。

节目一经播出，就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平面媒体和几大门户网站也纷纷转载相关内容，使人们再次开始关注“阿波丸”沉船和“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命运。

说法，商家是一种说法，但采访中国纳米领域的首席科学家呢，显然又是一种说法，先有了首席科学家这个高度，才会有深度的可能。再如关于中国开始使用第二代身份证的节目，酝酿时间很久，只是因为有关部门的分歧而拖延至今，最后采访的是中国公安部管身份证最直接的相关负责人，在此之前，他从未接受电视记者的采访，而这次，他的所有解释无疑是最全面，最有深度的。

所谓节目视角的高度，是节目的出发点与众不同，具有更宽的视角，更高的落点。《神鹿的女儿》通过对一个人的专访表现了一个少数民族命运的变迁；《马燕有了钱之后》说明了一个人的命运在金钱面前的表现，也暗示了金钱对人物命运的影响；《特殊的快递员》表明了残疾人也能做正常人所做的事，这些节目的共同之处，就是以小见大，以个例来说现象，以普通人物来说明不寻常的事情，节目主题的高度远远超过了节目人物本身。

(二) 深度来自于对专业的了解

主持人和编导都不是神，不可能万事通，但他们面对的却是不停变换的人，而且是具有专业特长和取得很高成就的人，要与这些人实现一种平等的融洽的对话，只有两个字：学习。平时的积累是一个方面，主要是方法论的掌握，大量时候，还是临时抱佛脚，现学现卖。

眼下最为关键最困难的问题是：主持人和编导都面临着如何把专业的东西通俗化和电视化？

《新闻夜话》做过很多专业性很强的采访。比如关于重新复原张衡地动仪的节目，就涉及到地动仪的工作原理，这是如何也避不开的问题，比如戒毒用品美沙酮的节目，涉及到药理药效问题，捐赠干细胞的节目，涉及到人体医学，编导如果一点都不懂，节目的设计肯定会出现问题。

那么如何使专业的问题通俗化？

在设计问题时，一定要从平民的视角出发，从观众的角度来提问，做到真正的人性化、平民化，《新闻夜话》有一句口号：主持人永远应是代表观众提问。

当做艾滋病用药的国产化节目时，多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做国家颁发建筑施工条例节目时，重点把拖欠民工工资问题讲透，从民工角度设计问题，而非枯燥的法律条文解读；做民办教育实施条例节目时，核心讲了民办教育的学历认可问题和城市打工者子女上学问题；火星探测节目，则从人类的好奇心设问。

总而言之，我们的节目是做给绝大多数人看的，并不是专门做给吸毒者、戒毒者看的，既不是专门做给干细胞医务工作者看的，也不是做给专门研究张衡地动仪工作原理的科学家看的，必须通俗化、平民化、故事化、形象化。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编导在专业与通俗的转换之间，还缺乏经验。他们在做科技选题时，容易掉进专业领域的海洋里，掉进它的细节里，因为这些对编导都是新奇的，过去从未接触的，而且编导还会受专家的影响。

北京五棵松在建奥运会场馆时出土了清代花瓶，专家认为此物从考古学角度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编导用空镜时没有编上。而此物的外形恰恰光鲜照人，制作也十分精美，我们的节目不只是只做给专家看的，更是做给大众看的，虽然它不像重点文物那么值钱，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把它编辑出来，不也是一件非常养眼的事情吗？

所以我们倡导要“心中时刻有大众”。如果访谈一味地沉醉在琐碎的专业细节里，太专业化，太技术层面了，让普通人难以接受和听明白，(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弄明白)，绝大多数观

2003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新闻夜话》的嘉宾马燕成为年龄最小的入选人,她不仅感动了中国,还感动了欧洲。

13岁的马燕出生在宁夏一个偏远山村,窘迫的家境使她两次辍学。她采取各种手段,向妈妈表达强烈的读书渴望。法国解放报记者彼埃尔·阿斯基(中文名韩石),于2001年在马燕的家乡采访,离开时,马燕的妈妈把女儿的几本日记塞到了他的手里。《马燕日记》2002年在巴黎首版,很快登上法国年度畅销书排行榜,并且迅速在欧洲引起轰动。

《马燕日记》的出版,改变了马燕的命运,她每月可以从版税中得到500元的资助,这些钱不仅足够支付她的学费,也能改善全家人的生活。

韩石则用寄自欧洲的捐款成立了一个协会,名称是“宁夏的孩子”。“宁夏的孩子”帮助了数十个和马燕同乡的孩子,其中只有两个男孩,其余都是女孩子。

《新闻夜话》是最早报道马燕故事的电视媒体。

在节目中,马燕告诉大家,“知识能改变命运。”



马燕 宁夏同心县予旺张家树村



马燕妈妈白菊花与法国《解放报》驻京记者韩石

众就会很快产生视觉和听觉疲劳，从而转换频道。

这样看来，在做专业性很强的节目时，编导不光要钻进专业领域去，这只是第一步，钻进去主要是自己学习相关知识，不能太外行。第二步还要爬出来，这才是关键。爬出来后还要站在普通观众的角度重新审视题目，重新设计提问和结构，做到了这两步，就可以既有专业的知识作支撑，又有平民百姓的视野和角度，做到专业与大众的统一。

在专业问题通俗化之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使专业的问题电视化？

多用道具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果把道具与谈话内容有机结合，就能够丰富表现手段，解决谈话节目冗长的毛病。

道具的应用可与嘉宾商量，他们甚至会帮助你找道具，带来道具，在采访前编导可作为一项必须的要求向嘉宾提出。

应该说抽象的说教是电视最大的敌人。电视的长处，就是要展现细节与现场，如果新闻夜话的提问可以完全复制到平面媒体上，那它的电视化特征就没有充分展示。换言之，平面的问题是永远无法回归电视本质的。

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谈到民办学校的学生是否能买半价火车票问题时，主持人应该在演播室手持卡票引出问题；在谈到观察流星雨节目时，主持人如果拿个普通望远镜问嘉宾：我拿这个可以看到流星雨吗？我的朋友说他准备那天登上香山去看流星雨，你认为有必要吗？在自己家的阳台上看行不行？……显然拿着道具提问会拉近观众与问题的距离。

(三) 深度来自于精彩的细节

在新闻夜话节目录制过程中，有时嘉宾面对追问时，其细微的面部表情变化都被捕捉到了，而且，把他的停顿，犹豫也表现出来，非常真实。过去，我们常把嘉宾的一种反应性停顿在剪辑时删去，其实符合人物真实心理的停顿也有它宝贵的价值，因为这种停顿符合观众的收视心理，而且会产生一种彼此的心理默契和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在制作涉案方面节目时，切记不要泄露破案机密，不要泄露破案手段，不要详细报道破案、作案过程，以防客观上起到教唆的效果，或被人利用，产生误导。

当然深度还来自于归纳与综合，来自于现场的敏锐判断，若在访谈过程中发现新的或更有价值的问题，主持人可以立即抓住深挖。同时对嘉宾所谈的内容进行快速地归纳综合，再次提出问题，这无疑也可把谈话引向深入。



靳北彪　北京时空通用董事长

我国沙尘暴和土地荒漠化形势严峻，一些有识之士正在为治理沙化奋斗，本期节目嘉宾是留美博士、北京时空通用董事长靳北彪，他率领团队发明沙漠种树的射流植树机，计划在长城以北的沙漠腹地植树万亩，把这些沙漠都绿化，形成一道绿色万里长城。对于这一庞大计划能否实现，靳北彪博士充满信心，他表示一定要做成这件最难也是最有意义的事。

《新闻夜话》“三段论”

□ 陈永庆

电视谈话节目要不要分段落？如何分段落？是明分还是暗分？这些问题在实践中都有不同的意见和观点。

最初CCTV《新闻夜话》是不分段落的，至少是不明显地分段落，二十分钟的访谈不间断地下来，观众看得很累，如果话题精彩，也许好些。但一般来说，纯二十分钟的谈话，要一直吸引人很困难。后来进行了改版，明确规定要分段落，而且不是暗分，是明目张胆地分，大大方方地分，特别显眼地分。

《新闻夜话》从总体结构上讲，一般分为三大段，但其实质并不是分几段的问题，而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让观众知道下面要讲什么，尽量吸引住观众

看节目的观众流入和流出是一个动态的不停变化的过程，在节目播出的二十分钟内，随时都会有观众流入，对于刚流入的观众，分段对他们是一个预告和提醒，便于他们是否决定继续看下去。

二是培养编导宏观思维的能力

有些编导在编节目时容易沉醉在精彩的细节里，当他把一些美丽的细节串在一起时，却发现，最后要表达的主题不知是什么。因此，分段就是要求编导在准备文案和后期编辑过程中始终有一根主线，始终有一个基本的框架，通过分段来勾勒节目的骨骼。骨骼定了，节目的长相也基本定了。

三是调整谈话节目节奏的需要

节奏对于谈话节目来讲，是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好的谈话节目应该是一种节奏的合理流动。有的谈话节目，引进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就是要把节奏弄得明快一些，丰富一些。常见的形式有外拍短片穿插，电话连线进入，双视窗运用，观众席的鼓掌或各种反应镜头，以及观众对节目的讨论，各种道具的运用等。

这些做法应该说都是在做加法，但《新闻夜话》却在谈话形式上做减法。它既没有观众席，也没有外拍短片做补充，既没有眼花缭乱的互动，也没有专门的道具设计，连刚开始仅有一点电话连线，后来也不要了，它把谈话节目的表现手段降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稀少位置，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主持人对一个嘉宾，你问我答。如果编导的问题设计不好，如果主持人的提问不好，这样的节目生存是极为困难的。但是，《新闻夜话》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它在演播室里几乎是完全靠谈话的力量，尤其是靠提问的力量推动节目的前进。如果说这个栏目还能在中国电视的晚间谈话节目中占有一席之地，那就是它做减法的成功，这一点恰恰构成了它的特征所在。

《新闻夜话》的节目结构形式由以下几个主要部分构成：

A：总导视：对整期节目高度凝练的预告

B：主持人导语

C：介绍嘉宾





王军霞　运动员

王军霞，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 5000 米项目金牌，女子 1 万米项目银牌获得者。为中国体育田径项目的突破作出巨大贡献。

2004 年 7 月 30 日，王军霞代表中国运动员赴希腊参与第 28 届奥运会火炬在希腊本土的传递。这届奥运会在希腊举办是奥运发展百年之后回到故乡，所以这次奥运火炬在希腊本土传递也受到全球瞩目，王军霞能参与和见证这一时刻也同样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

栏目在王军霞临行前对她进行了专访。在这期节目里，王军霞透露了自己的比赛经验；分析了这届奥运会我国田径选手的特点并预测了成绩；同时也提出了对中国田径运动培养新人机制的意见，坦言新老运动员经验传承很困难。这些看法和意见对中国体育田径运动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期节目也是 28 届奥运会之前，王军霞再次成为新闻焦点之后接受的唯一一个专访，节目内容被数十家媒体转载。

D:第一个问题(然后进入第一单元)

E:分导视(1):介绍第二节内容

F:第二单元

G:分导视(2):介绍第三节内容

H:第三单元

I: 结尾:根据节目的需要取舍

J: 片尾字幕

把一个二十分钟的谈话节目强行分成三部分,并不完全科学。当然,在这三大部分中,仍然会有许多小的段落,小的主题,这些完全由编导自己来控制。其实,分几段并不是问题的实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该这样来理解:分段只是谈话栏目调整节奏的一种手段。而且在实践中,它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收视效果。

下面是对具体段落中的一些关键部位的要求:

● 关于导视

导视是一个栏目的眼睛,具有独特功能:

它是对即将播出节目的高度提炼;

它是设置悬念,引人入胜的手段;

它是预告下面内容的号角;

它是调整全片节奏的鸡汤;

它是整期节目中最鲜活的灵魂;

它的重要性决定了它的形态和在片中位置的相对固定性。导视如果太平淡,就会缺乏冲击力、吸引力,为此要做到四提炼:

提炼最精彩的提问;

提炼最精彩的回答;

提炼最核心、最精彩的画面;

提炼最精彩的导视词句,要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反复锤炼和推敲。

总之,导视是整个节目钓住观众的鱼竿。

● 关于导语

要求简明扼要地说明新闻专访理由和介绍一些重要的背景。其语言不能四平八稳地打官腔,而是或长驱直入,直指要害,或故意设问,埋下伏笔,留下悬念。

● 关于切入点

切入点是谈话节目正文的开始部分,它的精彩与否,直接关系到观众是否会接续把节目看下去。对切入点的总要求是小,细,新,情。

小是指切入点的角度有充分的平民化特色,感觉是从身边讲起,它也是一种节奏的启动方式;细是指切入点的具象程度,可以是衣着,表情,道具,故事;新是指切入点的新鲜元素,可以是时间上的新,也可以是事件发展阶段上的新;情是指一种谈话气氛的营造。可以是亲切,和谐,平等。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后,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接受专访,主持人看到他系了一条非常鲜红领带,就从这条领带谈起,龙永图说,这是他特意新买的一条领带,就是为了庆祝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访谈也就此打开话匣。

● 关于兴奋点设计

谈话节目最大的敌人是节目的平淡和拖泥带水。因此编导在设计文案时,每隔几分就要设计一个谈话或观众的兴奋点。按照收视心理的规律研究,一般三分钟左右就应该有一个兴奋点出现,新闻夜话要求在每隔六分仲左右时有一个大的或明显的兴奋点出现。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对的理想状态。许多时候,兴奋点是随着谈话的进行而不断迸发的,这对主持人的随机应变能力是一个考验,他必须敏锐地抓住这些新的或者说是设计之外的兴奋点进行开掘。

● 关于道具的使用

道具出现的时机和出现方法都是有讲究的,由谁拿出来,是主持人拿出来还是嘉宾自

赵成文，被称为是中国的警界神探——中国刑警学院法医系教授、一级警监，他也被认为是中国刑事相貌学的奠基人。他曾经利用相貌复原技术破获上百起离奇命案，他能让长眠地下500年的明王妃恢复容颜，他还曾经成功复原了马王堆女尸、已经沉睡2200年的西汉长沙国丞相夫人辛追的相貌。《新闻夜话》之所以做这么一期节目，是因为这一次他又让人们看到了3800年前的新疆楼兰美女的风韵。

其实做古人相貌的复原是赵成文教授的副业，他主要还是从事通过痕迹分析协助刑事侦破的工作。他画出的犯罪嫌疑人的画像，仿真度大约在90%左右，人们通过画像基本上能把所描绘的真人认出来。

赵成文还先后八次考察秦陵兵马俑，并从兵俑衣袖上不易被人发现的“辛卯”二字推断出秦陵兵马俑烧制于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驾崩之年。这一结论解决了兵马俑考古的一大难题。在考察半坡遗址时，他发现了7000年前的人手印，这一世界首次发现引起了全世界考古界的轰动。

在节目的最后，赵成文向记者透露，他现在特别想复原的，一个是秦始皇，再一个是武则天，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想做埃及法老的还原。





赵成文　中国刑警学院法医系教授

己拿出来，在什么时候或者什么火候拿出来，拿出来后如何表现它的细节，摄像师如何密切配合，都有其严格要求。现在许多谈话节目所犯的一个共同错误是，主持人经常拿出了本不应该是由他拿出的道具。

● 关于标题

办报纸的人有一句座右铭：看报看题。起谈话节目的标题比消息类新闻标题难度更大。它往往难在要用一句很短的话概括一个全局性的东西，多数时候标题只包括了节目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段落，要把所有的段落概括进去很难。编导们常常有顾此失彼，难以取舍之感。

新闻夜话要求以观众为核心来起题目，并且致力于把标题变成提高收视率的手段。

多用第一第二第三人称，“我”，“你”，“他”等字眼经常出现在标题中。如采访王军霞节目，标题是“我将在希腊高举奥运会火炬”；采访冯小刚面对社会巨大压力时，标题是“我在崩溃的边缘”；“你可以控告上市公司”则是独家专访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时用的标题；“如果你在水上遇险”是专访水上救助队的标题。为配合预防非典而推出的系列节目总标题叫“为什么不能吃它们？”类似这样的标题，既可以拉近观众的距离，也可以拉近被访者的距离，对节目起到了很好的推销作用。但有时用滥了也会影响节目，如“我的业余爱好是义务性教育”，这样的题目还会让观众产生误解。

疑问型标题也是《新闻夜话》大量使用的，如“你有手机依赖症吗？”“下一个被复原的是谁？”“纳米离我们有多远？”“外交部为什么会向公众开放？”“飞檐走壁到底是什么？”“我国真会出现娶妻难吗？”这样的标题容易激发观众的收视欲望。

理智解析型标题虽然略显沉重和正统，但它是一个最好的万能包裹，什么内容都可以装下，常见的有“解读第二代身份证”，“直播分娩的背后”，“高考状元分析”，“破解停车难”等。

谐音型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如“濮存昕的防‘艾’历程”，“常香玉，香长留”，“大佛大修”等。

煽情型标题把握得好，也可以为节目增色，如“中国政府第一参”，“天上地上六十年”，“你怎样才能不吃危险的药？”等。但是煽情型标题把握不好分寸，就容易走上极端化的道路，变成危言耸听，如“三分之一儿童受铅污染威胁”，“中国有近一半的人感染过结核病菌。”首先，这些危言耸听的数据来源其真实性值得注意。其次，退一步说，即使这些数据是真实的，突出这些数据只会造成公众恐慌。

《新闻夜话》挂标题的时间也要求很长，节目全程是标题、字幕与嘉宾身份字幕的交替使用，但从挂在屏幕上的时间长短分配来看，标题所占的时长要达到三分之二，且标题字号要醒目。之所以要求长时间把标题挂在屏幕上，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考虑到不断流入的观众收视需要，二是强化了新闻节目的主题色彩。

● 关于人物称谓

人名字幕与标题是交叉出现的。在节目的实际操作中，经常会碰到一个人物身份的多样性。那么到底打哪一个身份最合适呢？

例如，濮存昕最少有三个身份：著名演员，北京人艺副院长，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如果是采访有关表演艺术的话题，应该打著名演员；如果是谈中国话剧改革，应该是北京人艺副院长；如果是谈对艾滋病人的救助，应该是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但不能把三个身份都打在一期节目上。顾明远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也是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是他向传统的三



金燕志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产科主任医师



张敏　《中国人口》栏目负责人

目前在中国，每年有将近4成的新生儿是通过剖腹产来到这个世界的，而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剖腹产分娩率应控制在15%，剖腹产率在中国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新闻夜话》邀请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金燕志，通过对央视一套首次将自然分娩的全过程进行电视直播这一事件的报道，更加深入地分析了剖腹产率在我国持续上升的原因。金主任在节目中告诉我们，现在在中国剖腹产率之所以那么高，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对自然分娩的宣传力度不够，很多产妇对科学分娩的认识存在误区。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医患纠纷增多，导致医生的心理压力加大，有些大夫害怕出问题承担责任，干脆一剖了事。对此，有过二十多年产科经验的金燕志主任一再强调，其实，剖腹产手术对产妇和婴儿的健康都有一定的影响。对产妇来说要承担麻醉的风险，产后并发征的可能性是自然分娩的10~30倍。特别是对婴儿，由于没有经过产道的挤压，容易诱发新生儿肺炎，降低免疫力。在国外有很多这种倡导分娩的电视节目，产妇们能够从各种媒体上了解有关分娩的知识，而我们国家这方面的宣传相对来说不是很多。

节目播出后，金主任告诉栏目，以前是她一个人不停地向那些准妈妈们讲自然分娩的好处。现在，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和她一起向更多的人宣传自然分娩的科学性，这种变化让她很欣慰。

好学生评比发出了挑战，呼吁全国取消三好学生评比。在这样的节目中，其身份如果打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就肯定不如打中国教育学会会长这个身份更有分量。显然，一个大学教授的呼吁与一个全国性学会会长的呼吁在业界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李树喜是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是《阿波丸号》一书的作者，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一个历史学者。在就沉船阿波丸号专访李树喜时，其身份打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就不如打《阿波丸号》作者和历史学者好。刘翔获得奥运会跨栏金牌后，《新闻夜话》采访的是国家田径队总教练，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中心副主任，也就是说他有两个身份，其实打一个前面的就行了，但节目标题打的是：专访国家田径队总教练，人物同期身份打的是国家田径运动中心副主任。这样反而容易引起混乱，其实打总教练比打副主任更合适。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征询被访者本人的意见，他最熟悉自己的各种身份是怎么一回事，会给你一个最合适的答复。

● 关于构图

《新闻夜话》的人物景别要求很特殊，一般都是卡在嘉宾的第三颗纽扣附近。大特写也经常使用，主要是充分表现谈话者的神情，捕捉谈话者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当你把特写镜头变成一种栏目风格时，观众觉得谈话者的确离他很近。细心的观众也许注意到了，当《新闻夜话》的主持人在介绍访谈理由或新闻背景时，会切进一个嘉宾正在聆听的镜头，他们此时的表情基本奠定了他对这些介绍的评价和认同，也许是会心的微笑，也许是频频的点头，也许还有一点惊奇，一份欣喜，一脸意外。

● 关于灯光

由于是新闻类栏目，光线饱满，亮度适中即可，其光线区别于纪录片式的装饰性很强的风格。

● 关于声音

声音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可重复性，它可以重复历史，可以再现历史，所以，访谈过程的本质是一个用声音记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对过去历史片断的声音重现，更多的是现实心声的忠实记录。具体到《新闻夜话》，由于节目大量采用特写镜头，所以声音必须相应配套，虽然是夜话，但不是絮语，必须有一定的音量，像特写镜头一样讲究冲击力和渗透力。

● 关于片尾设计

片尾设计包括画面和音响两部分。画面是挑选本期节目中最有代表性的进行重放，起一个回顾的作用。片尾音乐通常情况下是固定的，但当节目中有好的音响元素出现的时候，编导就可以把这些音响元素运用到片尾中来，比如，采访邓小平的扮演者卢奇这期节目，片尾用的是两句深情的画外音："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采访中国第一支海上救援队负责人，片尾音响用的是救生直升机巨大的轰鸣。采访中国第一次直播分娩的负责人，片尾音响用的是孩子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这些音响的运用，不仅增强了节目的新闻现场感，当它们在片尾出现的时候，还会造成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国务院参事建议

（9）

国务院参事室　　2000年3月22日

关于解决债转股中"固定回报率"问题的建议

"债转股"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解困和



郎志正　北京理工大学

在国务院各个部门里，有一个地方一直非常神秘，就是国务院的参事室，虽然它已经成立了55年，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里究竟是做什么的。实际上参事室是一个智囊、参谋机构，而且被称为是"中国政府第一参"。直到2004年的4月份，它才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公开主动地亮相。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们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能够以直通车的形式，把各种意见和建议直接报送给国务院领导，包括总理、副总理还有国务委员。那么这些能直接送到领导办公桌上的参事建议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反映的情况能保证真实吗？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国务院参事？这些都是我们节目要解决的问题。本期节目嘉宾是的北京理工大学的郎志正教授，这是他第一次以国务院参事的身份接受电视采访。

新闻访谈的魅力

——突破平面追求纵深

□ 魏鸿

我以为新闻谈话节目的魅力在于它是在突破平面追求纵深的同时,拓展了声音的可视性。举一个不十分恰当的例子,有点像尚未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小说,没有更多的画面冲击视觉,却可以给不同的读者带来不同的感受。因为谈话的过程很多时候是没有恰当的画面相配的,但是嘉宾在叙述过程中的表达和表情,却可以让我们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副副与之相符的画面。

很久以来,国内对电视人的评价一如对电视节目的评价:肤浅。从国内电视观众的构成看,高中以下的学历占了大多数,"有文化的人不看电视"成为广为传诵的一句戏言;从权威机构的收视率分析看,电视剧和娱乐节目名列前茅是不争的事实;而新闻类节目,除了《新闻联播》的影响力暂时无人能撼,央视一些不错的品牌栏目《新闻调查》、《东方时空》、《经济半小时》、《面对面》也仅仅是被圈内人认可,从收视率的表现上看不出绝对明显的优势。

但是深度新闻评论节目在国外历时已久,美国《60 分钟》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是全美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近年来代表阿拉伯世界声音的半岛电视台的崛起,也是发端于它对新闻的独家披露;中央电视台对美伊战争的直播奠定了中央电视台 4 套、9 套在国内外不可替代的影响力。而今天,"靠真正有影响力的新闻报道树立品牌"正在成为各家电视台摆脱电视"肤浅"之说的一张牌,因为访谈可以突破平面化,追求深度与纵深感。

钟情于谈话节目,缘于对电视的热爱,缘于被凤凰卫视一干新闻评论性节目的吸引和对新闻深度访谈的追寻。

一、"新闻"是什么

从凤凰卫视低成本运作成功的几档新闻评论性节目看,"新闻"的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印象中的"新近发生的事"的概念。因为新近发生的事太多了,互联网每时每刻为我们提供着海量的信息源,观众爱不爱看决定于电视人选择什么样的角度和观点去做这道菜。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几位评论员的成功在于长期的时评工作中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风格:曹景行讲信息、阮次山访政要、何亮亮谈资料、杨锦麟读报,他们对新闻独到的分析、判断、讲评,使我们看到,"新闻"除了是新近发生事件的真相,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对于本地化报道的价值与当地观众的关联度。正如 CNN《60 分钟》在选择每一个新闻故事时,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报道它?观众为什么要知道它?"所以他们把新闻定义为:人们不知道却又必须知道的事。

二、选题和收视率

选题意味着一个新闻栏目对新闻的价值判断,意味着该栏目的风格和定位,也意味着收视率。做新闻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不断选择



彭丽媛 歌唱家

她是深受广大歌迷喜爱的歌唱家，她是中国民族声乐的代表人物，她还是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将军——彭丽媛，这位屹立歌坛的常青树，在2004年出版了自己最新的歌曲专辑，并宣称：自己演唱的不仅仅是民歌，而是世界音乐了。

接受《新闻夜话》们的专访时，彭丽媛爽快地说，十多年前自己就想改变这种唱法，想探索用“中国的最古老的民歌和世界上最先进的音乐元素结合起来”，但那时自己怕被“扼杀”而不敢尝试。现在的她则勇于尝试，不惧怕专业人士批评她“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也不怕改变自己一贯在听众中的印象，她爽快地承认：彭丽媛变了。而当主持人追问她的改变是否意味着中国民族声乐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她则谦虚地否认，并说自己不过想起一点表率的作用。面对大众对中国民族声乐千人一面、丧失民族韵味的批评，她则礼貌地回避，拒绝评价。

在本期节目中，彭丽媛爽朗坦诚，还现场清唱了两首歌曲，体现出了这位民族歌唱家朴实可爱的一面。

的过程，从选择角度、选择嘉宾、到选择嘉宾说的每一句话、选择相符的有冲击力的新闻画面。在这一点上，CNN 的台训更露骨：哪里有 CNN 的记者哪里就有新闻。你说它主观也好，偏颇也好，世界上真正做到客观、公正的报道似乎并不多见，即使在西方被认为是新闻自由的环境中，看过 CBS 知情人所著的畅销书《偏见》的读者应该有所认同，“偏见”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新闻是人做的，有人自然会有不同的观点，只不过媒体的良心是否代表主流、代表大众而已。

记得 CNN《60 分钟》的制片人唐·休伊特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我们开办《60 分钟》，我们拥有很好的编辑。就像一本好杂志的编辑，我不认为杂志编辑只是负责找写手如那些给《纽约人》……甚至《时代周刊》《美国新闻》写文章的写手。我们不是像杂志编辑那样简单地把好的故事收集起来，我说：你们要去找好的故事，你们知道什么样的故事才可以让我满意，让观众满意。

《新闻夜话》的选题标准经过探索性的试验，根据频道本身的资源和定位，目前确定为以社会新闻为主，侧重从“三度”入手：即讲时效的“速度”，要求深刻性的“深度”，和独特视角的“角度”。从《新闻夜话》近期收视率比较高的几期选题分析，其实也是应了讲好看故事的逻辑：

《揭秘警犬反恐部队》无疑是软新闻中趣味性较强的，而且警犬和训导员一同坐在主持人面前接受采访，画面的冲击力放大了电视对观众视觉的吸引，加上一些展示性、互动性的提问，吸引收视是可以理解的。这期节目选题的角度是获取收视率成功的主要因素。

《彭丽媛变了》是软新闻中附加明星效应的选题，流畅、好看是该节目给人最深的印象，节目中穿插的音乐和歌声再次把电视的音画功能放大，让观众在聆听访谈的过程中多了视听感官的享受，加之明星效应，赢得收视率是意料之中的。

《人造美女的困惑》应该是典型的社会新闻，它的收视率来自于大众对于社会热点人物中普通人的天然关注度，以及整形美容与受众之间有着较高的关联性，因为它对应的收视人群本身就是不可忽视的主流电视收视人群，加之话题的敏感、嘉宾的可视，都是收视率的保证。

还有更多的是《我们打捞南海一号》、《中国政府第一参》、《外交部为什么对公众开放》、《女网双打“意外”夺冠之后》、《北京奥组委雅典取经归来》等等一批时效性强的新闻，也取得了较好的收视，因为它们注重新闻性，力图挖掘深度和新鲜的角度。

所以一定意义上说，谈话的魅力首先是选题的魅力；收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选题的成功。

三、主持人的号召力

历数成功的，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的个人魅力是不容忽视的，且不必说 CNN、BBC，单单是央视，从早期《实话实说》的崔永元、到现在《中国周刊》的白岩松、《面对面》的王志，事实说明，一个有个人魅力的主持人对于栏目观众的号召力是不可替代的。这种魅力来自于主持人本人深厚的新闻阅历、丰富的知识结构、洗练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对新闻独到的判断和梳理功力。

曹景行有个心得：“评论员和主持人更多的时候就是记者，只不过是把各方的信息，以及重要的观点梳理出来，找出自己认可的答案，告诉观众。”



“南海一号”打捞现场



张威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

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是一艘宋元时代沉没在南海海域的古沉船，里面有大量中国古瓷器珍品，从20世纪70年代被偶然打捞上来的个别瓷器看，是业内老专家见都没见过的，所以考古学家们认为，“南海一号”最终出水，其价值和影响力将不亚于西安秦始皇兵马俑。所以，本期节目就由“南海一号”的最新新闻入手，经过对它的艰难探寻、打捞过程，引出了中国唯一一支水下考古队、全国25个水下考古工作者的新闻事实，在展示水下考古工作意义的同时，也揭示了它面临的困境。

《新闻夜话》能从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脱颖而出，一年多的时间很快在业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与它创办之初就将主持人的定位确立为“记者型的主持人”有关。在夜话，每一个主持人既是编导又是出镜记者，既在台前也在幕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科班出身，所以没有主持人惯有的播音腔和表演的感觉；他们熟悉资料的程度不亚于编导，所以他们可以在演播室有许许多多的追问，直逼新闻的核心；他们的普通人形象和直截了当的提问方式，带给电视屏幕的是一种主持风格的清新和质朴；但是由于他们的阅历有限、经验有限，使得作为一名优秀主持人必需的对重大新闻的判断稍有力不从心；于是在业界的评论中，对夜话提问“尖锐”的赞扬，同时也伴随的是“对嘉宾不友善”态度的质疑；对夜话选题“时效性强”的称道，伴随的是“方向把握不行，剑走偏锋”的批评。但是不管怎样，记者型的主持人在新闻访谈节目中的作用，是任何一个有经验的编导都心知肚明而无法控制的。如果把选题、主持人和编导放在一个综合评价体系中测评，应该是3:4:3。因为实践证明，演播室的即兴采访正在使演播室成为新闻现场，它直接能考验出主持人的素质和功力。《新闻夜话》的嘉宾一般都是新闻当事人，在对他们的访谈过程中，主持人追求的是深度报道，是新闻背后的新发现，一定意义上说，那个发现过程本身就是新闻事件的延续和发展。

四、编导的作用

谈话节目的编导不同于专题或调查节目的编导，后者的技术性要求更多，比如拍摄什么样的画面，用什么样的解说词，对采访对象的选择尽量全面周到，所以对编导逻辑梳理功力的要求更高一些。相对来说，谈话节目的编导似乎好做一些，但是《新闻夜话》的编导似乎比其他节目的编导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因为从选题、选择嘉宾，到选择角度、后期编辑，编导几乎是流水线中的每一个螺丝钉，哪个环节松懈了就会影响到整个节目。

电视仿佛是一个愈来愈可怕的东西。电视提供了世界各地庞杂的海量信息，给予你眼花缭乱的视觉刺激，也削减着我们日渐微弱的思考能力。在电视面前，我们往往无需动脑筋动心思，甚至来不及分析判断。于是当你做的节目不能满足电视机前观众的知情度时，当你不能提供给观众更多新鲜的信息时，无情的遥控器理所当然地就会蔑视你的收视期待！

为了证明“电视时代并非肤浅时代”，越来越多的谈话节目出现了，凭借编导对选题的把握，凭借嘉宾的上好表现，凭借主持人睿智的现场追问，电视新闻访谈节目正在力图突破平面化，追求深度与纵深感。当电视屏幕上只有主持人和嘉宾两个人的画面时，吸引观众的唯一理由只有谈话内容和双方交流的感觉。那么，编导的作用就不言自明了：选择好看的选题和独特的角度、选择最合适、能出彩的嘉宾、选择优秀的主持人，然后是后期编辑时对每一句话、每个面部表情、每个合适画面的选择。

所以说谈话节目编导的作用，窃以为除了选择、选择、还是选择！



郝荣　东莞市中心人才市场策划部的高级经理

2004年8月，广东省东莞市在全国开先例举办了"全国假文凭展览"，现场展出了几百个假文凭，涉及到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让参观者感到造假者无处不在。这次假文凭展览，引发了中国南方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竞相报道。究竟是哪些人在使用这些假文凭？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在使用假文凭？假文凭泛滥的背后又暗示着怎样的诚信危机？

《新闻夜话》在展览结束的第二天请到了策划并举办这次假文凭展览的东莞市中心人才市场策划部的高级经理郝荣，他同时也是当地学历鉴定中心的负责人。

最新消息，国家人事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正在研究新的人才统计标准，初步方案已经提交审议，有望于2005年实行。根据新的人才标准，不再将学历、职称作为划分人才的唯一标准。届时，伪造假学历的人群可能就没有市场了。


流动人员及大中专毕业生学历
和学位确认证明书

经验证确认_____同志学历为_____，

学位为_____。

东莞市人事局

年　月　日

注：本学历学位验证是东莞市人才服务中心受权深圳市人事局
基下一家专业验证机构，采用先进的网络数据库和专业技
术人员进行验证鉴定，对验证的结果负担相关法律责任。

我们要什么样的新闻类谈话节目

□ 杨红叶

前几天，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一版讨论文章:《谈话类节目的八年之痒》，中心内容是说八年前《实话实说》大获成功,国内谈话类节目风生水起,各地电视台都在“谈话”,自崔永元退出实话实说,谈话节目风光难续,成了“鸡肋”。文章中热心地请了专家支招,我个人总结了一下,认为这是在批评谈话类节目没有了风格,失去有风格的谈话,失去有风格的主持人,谈话节目就比北京街头上的“侃爷”高明不了多少,可能还没侃爷吸引人。后面还跟着来了一篇评论“凭什么听你侃”,看的我这个谈话节目编导队伍里得一员有些汗颜。

谈话类节目主要是两大阵营,情感类的和新闻类的,国外还有一些“真人秀”、“垃圾秀”之类的,在我国还尚未引进或未成主流。我是做新闻类谈话节目的编导，也就只有资格就CCTV《新闻夜话》来谈谈对新闻类谈话节目的一些粗浅见解。

从《新闻夜话》的发展来看,我认为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采访阶段。在《新闻夜话》开播的一年多来,严格来说称不上是谈话,只能叫采访,把以前的调查类节目形态中记者对新闻当事人的一段采访放大，拿到演播室,成为一期独立的访谈节目,因此《新闻夜话》开始根本没有主持人,只有出镜记者和编导。做一期节目时编导和记者都要查阅大量资料,掌握新闻事件和被采访对象的详尽背景,列出一系列层层推进、有逻辑关系的问题,编导在头脑中即可完成对嘉宾的采访,演播室的提问事先都已设计好。既然是采访,就是对新闻事件的客观报道,不能有聊天、有主观的成分在里面,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得是新闻,是观众以前没听过的,《新闻夜话》的初期就是在这样客观得有些“冷冰冰”的一问一答中度过的。那时很多编导会沉浸在一些采访技巧里，比如,在网上查阅到被采访对象曾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在采访中问:你曾经某年某月说……”,对方一听立刻精神一振，采访就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完成后很多嘉宾会说:你们这个采访和别人不一样。编导尤其是出镜记者都比较年轻,却采访了很多重量级嘉宾,就是因为给了嘉宾很大的舞台。是采访而不是聊天也不是讲述,这是《新闻夜话》和其他谈话类节目最大的区别,也由此引起了业界关注和议论。在这个发展的初期,也有一些弊病为栏目招致了很多风险,引来诸多非议。这可能是新闻谈话节目的致命伤,因此我做了一些总结:

首先,质疑式提问的风格在初期发展到了极致,好像不质疑就不成节目,就不是采访。发现嘉宾说话中一些细节上的疏漏就以为抓到了事件的真相,一路穷追猛打。认为是拨开了采访对象的层层伪装,实际上自己已经远离了新闻,这是最可怕的错误,已经有失新闻工作者的公正客观,这样的节目能走多远？嘉宾感觉不舒服时,观众也会觉得不舒服。我个人认为《央视论坛》在提问上有一点很值得推崇,有



廖佳 职业旅行者

对大多数人来说，旅行只是一种调剂，而有人把它当成了职业。《新闻夜话》采访的就是这样一个职业旅行者北京姑娘廖佳。她曾自己驾车走了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之后出版一本自驾车指南书《玩路者》，在这之前，廖佳还曾一个人驾车穿越欧亚大陆，经过了32个国家和地区，历时142天，行程6万多公里。著书《欧亚远征》，是中国第一个穿越欧亚大陆的女性，在节目中廖佳回答了为什么会选择生活在路上，在路上的一些感受等，让人们了解了像她一样行走在路上的旅行者的精神世界。在录完节目后不久，廖佳再次上路，开始了她为期八个月的环球之旅。

一次看董倩提问，她是很诚恳平和地发问，听完后一想，才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尖锐。嘉宾也坦然接受了，这就是好问题。

其次，《新闻夜话》在初期时是看不到出镜记者的主观反应，面对什么样的人都是一样的无表情，一样的客观，跟采访对象没有情感共鸣和交流，这种“冷冰冰”很长时间是栏目的一种风格，这让《夜话》和同类节目相比时，似乎更职业化。但却忽略了一点，我们是给人看的节目，恰恰没有了人的情感展示，很多人在看惯了聊天漫谈式的节目及主持人大发肤浅感想后，再看到这样的节目会认同节目的独特性，却没有感情上的共鸣，很难从心里喜欢它，不大众，这是我听到的观众的评价。让人说好却又不爱，做到这份上还真算有风格。

有了上述的两大软肋，《新闻夜话》的成长就颇多波折，到现在开始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发展期：谈话时期。谈话强调的是对话、交流交锋的感觉，这才是真正谈话类节目应该表现出来的东西，这对节目制作者就有了更高的要求。谈话节目主持人是核心，早期编导在场外就可按自己的意图完成一期节目，而灵动的节目更强调的是主持人现场的把握。栏目的风格在这一时期有了改进，还是采访，但多了交流。单从收视表现上来看，这种交流感更受欢迎，收视率有了很大幅度提高。说明精品谈话节目还是很有市场。就在这几天，我看到了一期张越访谈，讲述了一个女子千里追凶的故事，节目制作的很精美，还加了遮幅，像一个故事影片，扣人心弦。好的谈话加上精美包装可以出现大片的效果，新闻类谈话节目能不能做到？《新闻夜话》能不能做到？我想它应该是栏目发展的第三阶段。

现在《新闻夜话》正处在第二个发展阶段上，对团队的要求更高。我引述我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凭什么听你侃》中的观点：“你和别人聊天我为什么要听？除非我能从你们的聊天里得到生活的知识、处世的智慧、幽默的快感。我不会真的需要故作深沉的嘉宾来说教，我不会真的一直关注你对名人隐私的挖掘，你要提高自身素质使自己比一般人更睿智更博学更幽默，但同时你也要摆正位置，真正把你和我们放在平等地位上聊天，只有猎奇的策划人和字正腔圆的播音员，永远不可能做出成功的谈话节目。要猎奇我去看电视剧，要听播音我不如看新闻，凭什么听你侃？”听听，永远不要低估观众的智慧。

在目前发展阶段上，《新闻夜话》栏目向精品节目更近了一步，我觉得还应注意下列问题：

首先是编导和主持人如何形成合力。编导和主持人要有充分交流，否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主持人完全照编导提纲，那可能会错失现场能抓的精彩回合；另一种情况就是主持人临场发挥，按自己的思路走，这一点很可贵，但可能因为对新闻事件介入程度没有编导深，问了自己想问的问题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却只看到了新闻事件的一个方面，使报道有失片面。这两种情况都需要编导和主持人前期更多交流才能避免。

还有一点：谈话是在采访风格上的谈话，是更深层次的采访，跳开了采访就成了聊天，聊天也会有收视率，但会失去栏目风格。很多节目都在聊天，一聊天就没有什么独特性了，别的节目完全可以取代你。我前面提到的那期张越访谈，讲的是千里追凶的故事，我揣摩了张越问出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是层层递进，每一步都向事件真相和嘉宾内心深了一层。一个故事性的选题提问完全是在采访，完全不同于讲述，做到这一点很可贵。



33年前，在内蒙古的赤峰市发现了一件玉制的龙，这只龙被考古学家称为是“中华第一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华民族最原始的龙形，2004年，就在这只龙的故乡又发现了一只距今7000多年前的陶杯，这只陶杯是一只凤的造型。有专家认定这只凤是“中华第一凤”。节目采访了中国北方民族古代文化研究专家、赤峰市文化局局长于建设。于建设把这只珍贵的凤杯带到了演播室，展示给了观众。对凤杯的发现、认定及其在考古和史学上的重大价值作了阐述。



于建设　中国北方民族古代文化研究专家
赤峰市文化局局长

我们将走向何方?

——对《新闻夜话》选题定位的一点思考

□ 胡彩阳

选题定位一直是CCTV《新闻夜话》栏目讨论的焦点,也是很多编导的困惑所在。

现在《新闻夜话》栏目里普遍存在一种唯收视率论。由于收视率和收入紧紧挂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评判编导业务能力的一个标准,在这种压力下,一些编导开始剑走偏锋,选择选题唯一的标准就是,它能否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快轻好省的拥有更高的收视率?这种心理自有它来源之处。

有时候操作一个新闻选题,比如时政或者经济选题,联系部委嘉宾难度很大,并且在采访文案的立意和角度上很难推陈出新,令人煞费苦心。另外,由于关注这类选题的受众一般受教育程度较高,属于少数群体,最后出来的收视率自然不如对一个娱乐明星的专访高,既影响了收入,也不能得到领导的鼓励,简直就是"事倍功半"。而那些选择了轻松的带有娱乐性质的社会选题的编导,没有费多大心思,回报却很高。久而久之,在投机心理的驱使下,编导们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新闻价值判断,寻找通向高收视率的捷径。部分编导甚至在选题会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为了片面地追求高收视率,我以后就专门报名人明星选题。

该编导的话固然有些偏激,但并不是独家之言。其实自2004年4月份以来,在收视率压力下,《新闻夜话》在选题方向上已经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多做社会选题,倾向于将选题定位在故事性强、带有揭秘性质、具备矛盾和冲突、竞技竞争等具有戏剧因素的新闻。

这种收视率至上的观点,是否能成为《新闻夜话》的选题指导思想?《新闻夜话》的选题是否应该固定在上述方向?《新闻夜话》的核心价值观究竟是什么?

众所周知,对采用演播室访谈这种形式比较单一的栏目来说,选题是它的命脉。传播实践证明,很多时候,一个选题的成败几乎决定了节目本身的成败(从收视率角度来看)。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收视率为基础,也就是以市场原则、利益原则为基础,以此来定位新闻选题方向,并没有什么错。但是,新闻行业本身的特性和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允许我们完全市场化、利益化,完全以收视率为指挥工作的魔棒。

我们曾经经历过以政治逻辑主宰新闻编排的年代,在意识形态的指令下实施新闻资源的组合配置,而很少考虑受众的实际状况和需要。同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电视台缺少的不是资金和资源,而是竞争对手,皇帝的女儿从来不愁嫁,观众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电视媒体运营方式的变革,电视媒体有了经营意识,收视率作为传播效果的一种客观标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同时,人文精神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逐渐渗透,也让新闻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发生了改变。现在的很多新闻工作者承认,新闻需要以人为本,关注人本身,尊重人本身,明白受众最



郑毅　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

很多人知道，过于频繁使用手机，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殊不知，手机如果使用不当，还会影响心理健康。这种心理问题有个名字，叫手机依赖综合征，它已经引起了心理学家们的关注。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的郑毅主任告诉记者，手机依赖综合征的具体表现形式是：

1. 总是把手机放在身上，如果没有带，您就感到心烦意乱，无法做其他的事情；

2. 总有“我的手机铃声响了”的错觉或者幻觉；

3. 经常下意识地找手机，不时地拿出手机来看看，有时候甚至要把手机攥在手里头才踏实；

4. 允许不开机的时候，关机会觉得很不踏实；

5. 严重者手脚发麻、心悸、头昏、出汗、胃肠道功能不好。

引起手机依赖综合征的原因很多，工作压力大，导致心理焦虑是重要原因之一。轻者需要及时调整心理状态，重者需要咨询心理医生，服用药物。手机给我们带来了通讯的方便，但是正是由于随时可以找到你，压力也就随时存在。而且手机还隐藏了个人很多隐私，成为很多不安定因素的潜伏物，这种不可确定性搅乱了很多人的生活，包括情感生活，给使用者带来不安。青少年也要谨防手机依赖综合征，手机的网络游戏功能容易让这些没有自制力的青少年沉迷，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就会导致学习下降。

需要什么，然后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内容。“受众本位”思想体现着媒体对受众本能需要的重新认识和回归，是媒体改革的必然结果和良好趋势。新闻的“后院篱笆原则”就是在这种背景和共识下产生的。

丹·拉瑟告诉他的手下，当不能确定英阿福克兰群岛之战、中东战争和伦敦戴安娜王妃的新生儿子等新闻事件的重要程度时，就设想一天结束后，两位家庭主妇靠在后院篱笆上聊天，她们讨论今天的“重要新闻”的时候，首先会谈到什么？多半是王妃的新生婴儿！“后院篱笆原则”已经对现在的新闻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力，提醒媒体要更多地着眼于对公众共同欲望的满足。

应该说，“后院篱笆原则”具有积极意义，它强化了媒体和受众的亲和力，体现了新闻对世俗人生和现实生活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夜话》追求多做社会选题，倾向于将选题定位在故事性强、带有揭秘性质、具备矛盾和冲突、竞技竞争等具有戏剧因素的新闻，是一个符合市场原则、收视率原则的决定。新闻本身就起源于人类天生的好奇心，那么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们的兴趣、观点以及利益要求各异，如何最大限度满足最大范围的受众呢？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什么？换句话也就是说，如何最大限度提升收视率？答案是娱乐，是感官刺激得到最大限度满足后的快乐，受众借此可以宣泄心中所潜伏的各种无意识的欲望和冲动，从而获得愉悦感，得到自我慰藉的快乐。满足了受众的这些需求，收视率也就上来了。

但是，在这种选题定位思路下，试想以《新闻夜话》为观察的唯一标本，它所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影像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是一个热闹的、喧哗的世界，充满了轻松、流畅的故事，同时具备感官刺激，里面有能飞檐走壁的武艺高手，有激情满怀、能言善辩的婚庆主持人，有与老虎亲密接触的饲养员兼摄影师，还有对莫须有的手机恐惧症夸大其词的心理学家……然而，在这个热闹的影像世界中，是不是还缺失了些什么？我认为，缺少了对事件、人物历史价值的深厚思考，缺少了对人类自身根本内涵和终极价值的追求，缺少了对受众的积极启迪作用，缺少了对新闻本质的深度逼近。我们已经有些过于津津乐道于新闻事件中的离奇和冲突，矛盾和刺激，还有能赚取眼泪的煽情内心独白。《新闻夜话》已经有了娱乐化、浅薄化的倾向！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认为，《新闻夜话》并不适合走这条路子，理由有二：

第一，不管是在哪种社会制度下，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永远不可否认。即使是在十分功利的西方社会中，仍然有一种精神力量在始终不渝地批判着现实社会，连提出“后院篱笆原则”的丹·拉瑟都感叹：我们已经变成好莱坞了，我们已经屈从于新闻的好莱坞化了！正是这种自我超越的冲动和否定现实的力量，成为社会前进的动力。新闻不仅仅见证和记载着社会变迁的轨迹，而且还有参与和推动社会变迁的进程的作用。《新闻夜话》作为一个有社会公众意识，有良知的栏目，同样不能沦为收视率的奴隶。收视率是不是我们新闻媒体追求的终极目标，能不能取代传统的新闻价值观？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回答：不是。的确，现代媒体需要有经营意识、市场意识，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让受众的消费需求主宰了新闻的采集和制作。在这个受众缺乏清醒审视的浮躁社会环境中，媒体尤其要提供思考的营养和动力。新闻媒体不是“快乐大本营”，不能无休止地进行全社会的“欢乐总动员”。

第二，《新闻夜话》在社会选题上，并没有



陈宝山　国务院反假币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

你收到过假币吗？假币流通新趋势是什么？谁最容易收到假币？

假币真的令人防不胜防！国务院反假币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陈宝山在接受《新闻夜话》采访时第一次向媒体透露了目前中国的假币数量——假币和真币的比重大体在万分之一到二的样子。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家对假币的防范意识提高后，假币制造分子也想出了很多新招。比如减少大额人民币的制假，加大5元、10元的制假。想办法在小商品市场、集贸市场、菜市场，早晚黄昏视线不好的时候，把假币和真币混在一起花出去。

陈主任认为，假币之所以打不掉，一个是因为制假分子狡猾，另一个主要是一些地方官员对打击假币认识不正确，担心假币制造窝点端的太多，影响自己的政绩和升迁。他还指出，随着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坚挺，信誉越来越高，制假分子也会越来越猖狂。要想真正解决假币问题，需要大众的亲自参与！

自己的优势。社会选题往往故事性较强，具备戏剧冲突因素，感性成分较多，思辨因素较少。在此情况下，丰富的电视手段和气氛轻松的采访环境几乎是充分展示社会选题各种戏剧要素的必备条件，大量外拍画面细节和自由灵活的叙事方式不可缺少。以社会选题见长的《讲述》和《社会纪录》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点。而《新闻夜话》最为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些条件。我们的演播室严肃高雅，我们的表现方式不允许运用小片，我们的节目节奏快捷，这些都成为我们制作优秀社会选题的硬伤。我认为，《新闻夜话》的风格更适合强调思辨力量，更适合于展现比较严肃的选题。这才是《新闻夜话》存在的价值，是它区别于其他栏目所具有的异质性。

那么《新闻夜话》关注影响社会进程的重大时政、经济、文化新闻，记录对社会、生活有积极干预的人和事，是不是肯定会影响收视率？并非如此！相反，我认为，能够真正影响大众，打动大众的，恰恰是那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严肃的新闻。举例来说，中国人事制度的改革，和某位港台明星的花边新闻，老百姓更关注哪个？从表面上看起来，前者枯燥严肃，后者轻松刺激，而且能满足大众窥探他人隐私的心理，后者似乎应该拥有更大的收视群体。但是中国人事制度改革和中国几亿百姓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对这条新闻的解读，可以让他们更清楚地判断自身命运，更清醒地做出对前途的选择，而后者只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讨论话题，一个明星的一张新专辑的出版与否，既不会影响大众的命运，也不会给社会带来重大损失。说到底，老百姓最关注的是与他们的利益切身相关的人和事，而不是能刺激感官心理的故事。

也许有人会拿出《新闻夜话》的每周收视报告，证明处在收视率排名前几位的都是故事性强，具备矛盾和冲突，带有揭秘性质的社会类新闻选题，而那些有关社会变迁，引导受众对社会、对人类自己命运进行思考的新闻选题，往往收视率低下。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是编导和主持人对重大选题的操作能力和业务水平限制了重大选题的收视率，而非选题本身有问题。《新闻夜话》作为一个以西部频道为依托的演播室访谈节目，它的生长环境决定了它相对于其他新闻访谈节目的异质性。也就是说，相对于很多新闻栏目追求新闻的第一时效性，《新闻夜话》的特长应该是定位在新闻的第二落点甚至第三落点，也就是揭示新闻的背景、深度和独特角度上。但是很多编导和主持人由于年龄原因、阅历原因以及努力程度，在设计采访结构和采访内容时，没有做到准确、深刻地揭示新闻背景，积极探索事情的深远意义，选取令人耳目一新的角度，充分运用传播技巧。而在同等水平下，那些具备了矛盾和冲突、竞技竞争等因素、带有揭秘性质的新闻，由于天生带有讨巧性，即使不用花费很大的精力，具备很高的业务水平，也较容易出彩。

《新闻夜话》应该是一个有长远眼光的栏目，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栏目，是一个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栏目。事实上，也只有将自己定位于真正为百姓服务的新闻栏目，才能成为一个在受众中有深远影响力的名牌栏目。我们不能把注意力仅仅放在短期利益上，我们需要做的是：树立正确的新闻观，养精蓄锐，锐意进取，尽最大努力提高业务能力。《新闻夜话》拥有一支朝气蓬勃的年轻队伍，相信明确了前进方向后，一定会在不断地磨砺中前行！



郑延钦　中国驻刚果(金)
维和部队工兵连指挥



徐凤　医疗分队护士长

到2004年8月29日为止，中国第二批赴刚果(金)的维和部队成员已经全部回国。一般来说，驻扎有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国家，往往是经常发生战乱和冲突的国家，刚果(金)也不例外，在这个局势极不稳定的非洲国家，维和任务不但艰苦，而且非常危险。中国驻刚果(金)维和部队工兵连的指挥郑延钦和医疗分队的护士长徐凤告诉我们，他们外出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全副武装，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背心，携带武器。刚果(金)各派武装分子在中国工兵联营地附近曾经三次交火，最近距离离营区只有30米，子弹就落在营区房顶，而双方的炮就架在营区对面。刚果(金)炎热的气候则让医疗队的所有队员都感染上了疟疾。2004年6月，刚果(金)爆发了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大规模骚乱，中国维和部队也处在风暴中心。面对百姓的误解，中国维和部队保持克制态度，没有和当地百姓起任何冲突。医疗队在恶劣环境中不但要坚持工作，还要安慰惊恐的病人。当时很多人给远在中国的亲人写下了遗书，所幸骚乱最后化解，中国军人没有伤亡。因为任务完成得出色，中国维和官兵218人全部被授予了联合国的维和勋章。

论电视新闻访谈的原生态

□ 董雯娲

现在有些新闻节目做得越来越精美了，精美的包装、精美的环节设计、精美的剪辑还有流畅和谐的对话和访谈、完美无瑕的现场报道，就像超市里包装好的半成品菜肴，靓丽、光鲜。播音员、主持人、记者、嘉宾，甚至连田里的农民伯伯都可以用最精练的语言，最合适的辞藻来表达观点。不过超市里切好的蔬菜销路总赶不上菜市里的新鲜货，看早市上刚刚上架的黄瓜和萝卜，粘着泥带着土、有的叶子还能甩出露水。人们喜欢这些菜，水灵灵、还有生命，再说怎么切那是自己的事，重要的是货真价实。所以，交易额很大。

做电视节目其实等同于卖菜，你准备在地头卖，拉到菜市场卖还是放在超市里卖？

有人说，买菜各取所需，哪一种菜都有市场，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嘛！

说得对！

但是——就新闻节目的属性而言，它恰恰是应该离田地越近越好。我们再来看看在电视这个大卖场中，各种商品的特点：精品柜台里有文艺节目、文化历史、科教专题、影视剧；专业柜台里有体育节目，财经分析；地摊儿货架上还有生活服务、量身定做（比如，中央电视台的农业军事频道、英语频道、戏曲频道、各付费频道）。一个眼花缭乱的市场，新闻搁哪呢？人们对新闻报道的要求首先是“新鲜”，这决定了它的时效性，新闻的提供必须“快”，第一时间满足人们知情权；其次是“真实”，这是新闻的生命，一条假新闻或不客观的报道无异于信息垃圾，只能给社会人群带来误导和危害；然后，人们才会要求报道深刻、深入进而完整地溯源、延续。

从新闻的特点看，无论哪一条都要求它送达买主时是最原生态的，是真正来自田间地头的刚刚出土的萝卜白菜。所以新闻的销量就像这些新鲜蔬菜一样，是其他销售形式其他节目类型单体不可比拟的。当然新闻始终是内容为王，受欢迎的内容一定具有重大性、社会性、有关联度、不同寻常、揭秘性和冲突性的特点，优质萝卜总会是抢手货，其实显赫的名人新闻不论是不是质优也一定是抢手货，只是在国内是配额出售形不成规模。而我们现在只讨论这些普通蔬菜的销售方式。

“新鲜”的要求其实指明了电视新闻的传输方式，“直播”是必然趋势。美国媒体对“辛普森事件”的直播报道创下收视率历史记录充分展现了直播的魅力；CNN 对海湾战争的直播奠定了这个国际新闻频道霸主的地位。中央电视台“97 香港回归大型直播报道”是它第一次尝试新闻直播，创造了很好的收视率，可惜仍不够新鲜，记者完全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说话，生硬、刻板，而且不敢在现场捕捉鲜活的新闻点，没有创作。就像是到了田里却拣了些挑剩的萝卜，不过，直播已经令人兴奋，开始散发出迷人的魅力。此后，中央电视台开始逐渐增加新闻直播数量，但几乎都是人为组织好或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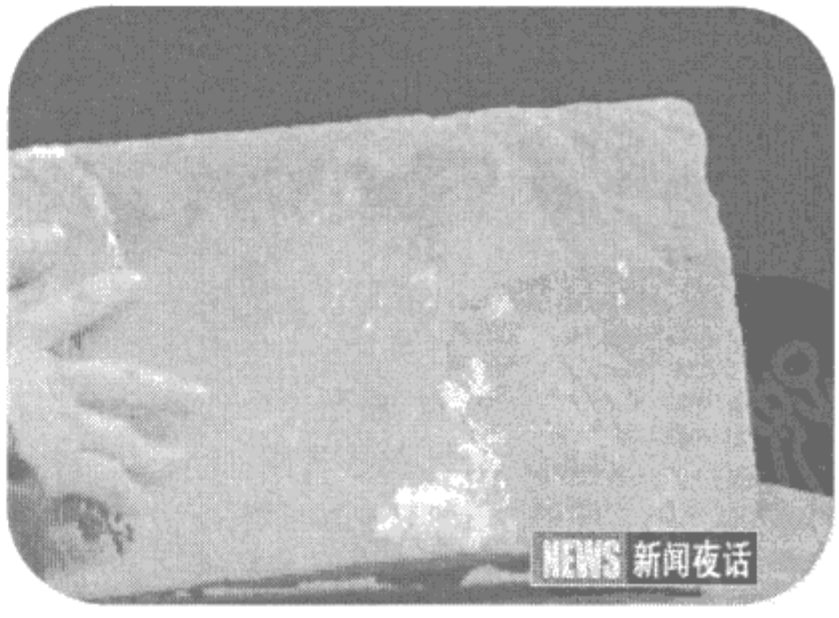
董耀会，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因为爱长城，他完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单人徒步考察长城的壮举，发表了几十万字关于长城的著述，他曾为两位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布什讲解长城。他说："对长城，以前是一种喜欢，现在是一种责任。"

2002年8、9月间，董耀会组织16位专家对长城进行了历史上最严格的一次考察，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涉及学科最多的一次考察。考察结果令人震惊：目前长城主墙体基本完好的只有2000余公里，约占长城全长的三分之一，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长城主墙体已经不同程度地坍塌，余下的三分之一长城已经不复存在了。

长城的保护工作陷入失控状态，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之淡漠与中华文明古国的深厚文化积淀太不协调。董耀会认为"若干年以后，长城也许就只剩下被旅游开发的几个景点了。然而长城之所以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一定地位，就在于它是'万里'，如果我们不及时保护，就会失去'万里长城'的价值。"



董耀会　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



长城砖

备好的活动，设计的痕迹显而易见，观众的兴致并没有充分调动，可直播仍然贡献了收视率，美伊战争，中央电视台一套和四套对战争现场和专家分析点评实现直播是一个巨大飞跃，观众也如预期般买账，收视率创造了巅峰。对于新闻栏目而言，《直播中国》最先尝试了在中国各地现场报道新闻，但报道内容缺少新闻价值，记者引导又不到位，失去根本而追逐表面手段，自然没有讨好，而消息类新闻虽然有直播报道但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大多时候，出镜记者只是循规蹈矩地说一段开头，话接画面再加后配上去的解说。在这方面中央电视台12套西部频道《西部新闻》策划推出的“秦岭探访”大型节目应该被看作国内电视新闻界探索直播模式的样板，如果它实现真正的现场直播，这种记者带领观众实地考察新闻现场、即兴发表评论、共同经历发现之旅的样式一定是电视新闻改革的未来走向。

“真实”如何实现？不同的人以不同角度看待事物，不同的报道者选取事物的不同方面加以展现，哪一个选择更接近事实真相呢？有一个答案是：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和随之产生的好奇心，这个角度将更接近公认的事实真相，也将产生最有价值的新闻。那么，谁能保证自己一定是合格的代表？答案是，谁能为观众展现更多的现场谁就拥有更多“真实”，因为新闻现场就是最好的角度。现场包括自然环境和人的活动，镜头相当于观众的另一双眼睛，记者的调查采访赋予这双眼睛生命，这是获取新闻最常用最有效的方式，这就是采访记者的使命——担当观众的感官。

那么，不能出现在事发现场是否意味着失去了原生态？那些演播室里的新闻访谈不就没有意义了吗？事实是，只要遵循新闻的规律，演播室新闻访谈一样可以具有原生态，而且应该具有原生态，除此以外的其他形式就真的失去价值，没有意义了。

一个新闻事件发生以后，当时当地成为第一现场，有关当事人的经历记录、所见所闻就成为第一落点，这是新闻的根本。但新闻本身与很多其他事件和现象有联系，人们在了解发生了什么的同时，也想知道这件事的起因、性质、影响、与自己及大多数人的关系，而且新闻也是有延续性的，这件事发生后引发的其他事件或同步发生的其他反应是新闻的第二甚至第三落点，演播室新闻访谈更多的时候是完成这个任务。采访相关当事人了解事情的真相；采访知情人追寻事件起因；采访管理部门得到负责人的态度；采访专家解读这件事的性质；当事件的发生衍生了其他副产品——一些连带事件时，对新的事件做报道和采访一样可以有价值。这些，在演播室同样能做到，前提是——也得“新鲜”和“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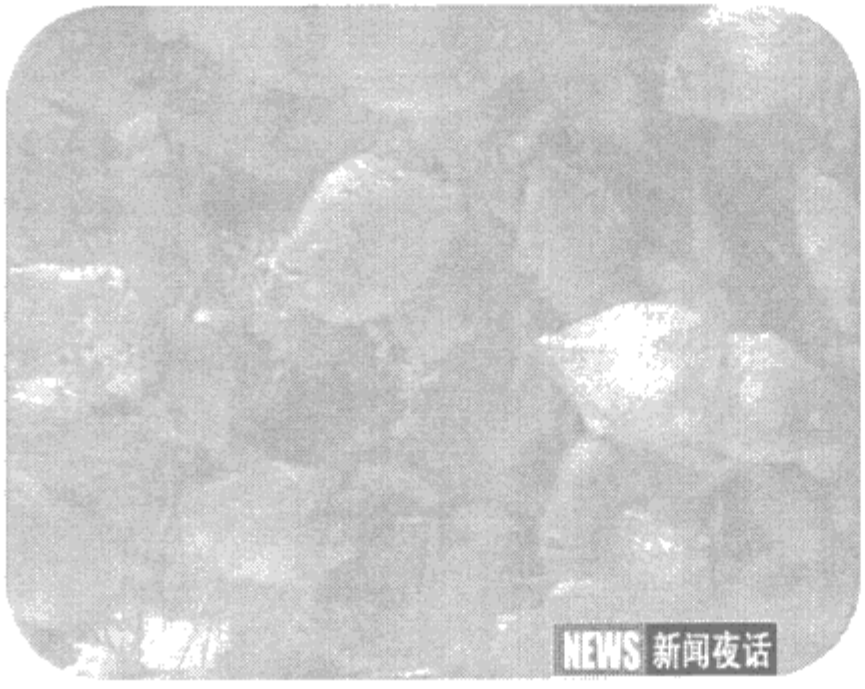
演播室新闻访谈实现“新鲜”和“真实”的唯一可能是——创造第二个新闻现场。这相当于，把蔬菜批发点直接设在田间地头，而且交通还不成问题。演播室就是原生态新闻发生的地点，如果能在第一时间（直播始终是人们呼唤的最佳方式）展示给观众，我们会看到一个惊人的结果，这样的节目能创造极高的收视率，甚至高于普通娱乐节目和影视剧。

目前在国内，由于评价体系不同，标准不同，所以访谈节目中这样的实践目前不能完全实现而且也只能缓慢地探索。随着收视率这个紧箍咒渐渐收紧，这样的谈话采访原生态也会逐渐增多，因为原生态一定是访谈节目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录播节目，保留谈话的原生状态（减少编辑点）会增强现场气氛、交流气氛，增强观众的现场感，参与感，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向新闻真实再现迈了一大步，所以不能

食人鲳，也叫食人鱼，在原产地南美活动猖獗，经常攻击靠近河水的人类。但是有人在国内南宁观赏鱼市场发现这种鱼在大肆出售，人们把它买回去当宠物养，很快，北京、沈阳、成都、杭州市场上也出现了食人鲳。专家担心，这种没有天敌的物种一旦进入我们的生态系统将酿成灾难，它会吃掉其他鱼类、水生动物、甚至威胁人类，而且在适宜的水温下会急剧繁殖。《新闻夜话》请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鱼类学副研究员张世义先生现场讲解食人鲳的习性、特点；又详细分析了中国与南美气候异同及留有祸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对于人们的猎奇心理，张世义再次警示这将带来惨重代价，并呼吁管理部门有所作为、大力打击。



张世义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鱼类学副研究员



食人鲳

节目还采访了农业部渔业养殖处负责人，他在采访中透露要展开调查，纠正一些地方对这件事不够重视的做法，甚至修改地方规章；并分析了食人鲳的市场流通渠道，提出追本溯源的思路；也公开了管理工作遇到的困难；最后明确表态，一定会把食人鲳问题控制好、解决好。这是相关管理部门第一次就此事接受采访，也是第一次正式表态。

节目播出之后，农业部渔业局关于食人鲳的管理办法很快制定，总理也对此事作了批示，一个月之内，食人鲳——这种外来强盗物种，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直播的遗憾只能靠最大限度的真实再现来弥补。而在规定时间内创造一个新的新闻现场，需要大量新的新闻事实来填充，这里强调的是事实而非观点，否则就不能称为真正的新闻现场。

这还要求当事人的讲述决不能仅仅是简单的情景再现，这样的再现是前线记者的优势也正是演播室采访的劣势。凡是有价值的新闻，在当事人进演播室之前，一定已经有大量前线记者进行了第一落点的报道，外景访谈记者也往往会先于演播室记者拿到第一手资料。当你费尽周折把嘉宾请进演播室之后，仅仅让他按照自己的逻辑讲一个故事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你要在有效录制时间内得到真相，有效挖掘真相的过程本身就是新闻的延续，这是创造第二新闻现场的基础。包括嘉宾对事件的真实反应和描述，嘉宾对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所持的态度，嘉宾对可能产生的影响深入的思考，甚至嘉宾在表达的同时展示出来的语气、表情、动作和思考问题的时间甚至拒绝回答都构成新闻的原生态。

很多时候，嘉宾因为种种障碍不能说实话或者并没有意识到身边发生的事情与社会、民众有多少联系，但如果节目制作者也停留在这个层面，只能说他是不合格的，这样的新闻报道没有价值。在一些情况下，记者很容易犯这种错误：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原则；懒惰，根据已有的别人的报道匆忙下结论，或者只了解一些基本事实，表面文章就作出判断；缺乏逻辑性等等。后果是观众也不会买账，一个栏目如果停留在这样的水准，它的生命力将是有限的。

作为演播室新闻访谈节目的制作者在进行报道之前，一定要进行大量的调查、核实、思考，要了解大量事实和资料。包括事件亲历者的介绍、各媒体的报道、同类事件的情况、背景资料、历史渊源、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各个时期人们对此类事件的看法、国内外的异同、专家评论。一个优秀的记者一定是一个好的调查者和思想者，并且善于把不同的现象联系起来找到规律和问题的症结；也一定是一个有自己原则的人，不会被表面现象蒙蔽、被权威言论吓倒，始终能抱着怀疑的态度提出问题，这样，你的采访过程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新闻现场，你的提问和得到的答案才能形成新的新闻事实，你才能走到新闻的更深处。

访谈的方式也直接影响新闻现场的有效形成，在这里强调的是真正的采访而不是聊天、不是漫谈、不是话题，是特定时间内为观众提供的干货。在目前的屏幕上，有大量的谈话节目，《讲述》就是一个优秀的谈话节目，主持人以提问的方式和嘉宾聊天，嘉宾可以按自己的逻辑意愿讲述自己的故事，但不会有人把它定位成新闻栏目；《新闻会客厅》是一个轻松的新闻访谈，新闻当事人是来做客的，所以可以多说说感性的话题，但感性显然缺少硬通货；《央视论坛》就是典型的话题类采访，一个话题谈下去，产生很多启迪和感悟，只是纯粹的观点像空中楼阁，它不构成货真价实的新闻。这些栏目制造的产品都是超市里精美的包装蔬菜。如果被定义为新闻，则渐渐远离了它的本质。

保持新闻现场原生态对出镜记者的要求极高，甚至最终主要由出镜记者（在演播室是主持人）来实现。

人们喜欢看真正的对话，包括交谈中的情绪、口误、修正及尴尬，甚至拒绝的态度，喜欢不可预知的戏剧性，尤其当嘉宾是名人或焦点人物时，这一切都将成为人们的判断标准、兴趣所在并且会引起观众的收视追逐。这就如同



曾芝强　厦门铁路派出所民警

谁都害怕出门在外的时候，碰到犯罪分子，但是很少有人能在人群当中认出他们，这期节目的嘉宾好像很容易就能做到这一点。他在十年的时间里，先后认出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5000多人，而且最近五年内，发现了公安部网上通缉的在逃人员60多人，协助公安机关破获了380多起刑事案件，查获各类枪支54支，走私黄金33千克，还有海洛因等各种毒品近2000克，这个人不是警察，但是公安部门为了奖励他，特聘他成为一名真正的公安干警，他同时得到的还有一个绰号，叫“鹭岛神眼”，而他的真名叫曾芝强，在成为干警以前，他在厦门火车站做了十年保安。

在节目中，曾芝强告诉观众，他靠规律、经验和直觉来识别犯罪分子的伪装，普通人也能学会。在节目的最后，“鹭岛神眼”曾芝强真情流露，第一次对着镜头讲出自己的困惑和压力，让我们看到模范背后、光环之下朴实但却闪光的心灵。

我们买菜时新鲜萝卜带着的一点露水一样招人喜欢。创造丰富的、戏剧性的现场谈话效果是由主持人实现的，可如果你不是嘉宾的谈话对手，结果可能是你的节目成了讲坛或像个街头闲谈，而你的任务却是拿到新闻。作为出镜记者，能否在规定时间内挖掘到真相、获得最大量的有效信息，对自身功力的一个直接考验。拉里·金和温芙瑞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收入是个佐证也是个标尺，这将是一个主持人应该追求的最终境界。而主持人功力不够或对嘉宾及事件不够了解都会大大损毁展现出来的效果，嘉宾可以说长篇的假话、可以编造虚构的故事、可以圆滑地和你兜圈子、可以用理论代替问题实质，最终的结果就是浪费时间，轻易毁掉你的节目。

在录播节目中，主持人采用长时间的采访依靠后期剪辑编辑的办法是不可取的。首先，它失掉了现场感，不同语境下的谈话内容编辑在一起是不可能连贯的；其次，这种做法失掉了真实性，编辑点越多，你拿出来的东西离事实就越远；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节目损失的是谈话魅力所在——原生态，可能节目表现形式完美了，主持人显得无暇了，语气、措辞、态度稳妥了，但节目变成了塑料花，现在塑料花没有市场，这是追逐“真人秀”的时代。当然，你不能因此说我们的缺点、失误、甚至所有的欠妥就有了存在的理由，没有，没有任何理由，市场就是这么苛刻，要原生态的同时仍然要求完美。你唯一能做的是职业化，一个主持人必须在最短时间甚至同步时间里完成一次成功的采访，找到新闻事件的真相、抓住事情的本质、挖到事件发生的根源。

电视新闻访谈就是这样一份工作，找到品种优良、栽培成功的新闻蔬菜，把它们嫁接到采访现场来(条件允许我们是一定要到原产地去的)，现摘现卖，销路一定是有的——只要你摘得到。



杨晓楠　中国第一条个人戒酒热线创办者

“近几年来，酒依赖的病人越来越多了；酒依赖、喝酒导致疾病的人年龄越来越低了；饮酒导致精神疾病的重症病人增多了。酒具有和毒品一样的特点，可以导致人成瘾，一旦成瘾，戒除是非常困难的，困难在于现在没有一种药可以解除或者消除他的心理渴求，总是在想，总是要喝，总是想喝。”——中国药物依赖治疗中心主任郭松

离2004年春节只剩几天，每年的这个时候酗酒的人数会大量的增加，《新闻夜话》再次把目光投向那些急需帮助的人。那么，我们怎么帮助那些身陷酒精深渊的人们呢？

河南出现了一位严重酗酒又成功戒酒的典范，他叫杨晓楠。有一些媒体称他是中国第一酒鬼，他曾经一天喝掉6斤多高度白酒，而且持续17年，每天要喝3斤以上，他先后7次住进精神病院，一度被看成一个废人，不过现在杨晓楠成了上万名酗酒患者的救星，他开通了中国第一条个人戒酒热线。半年多就接到求助电话37000多个，据他自己说，用他的方法来戒酒，成功率在90%以上。这个方法的核心就是先理解和接受酗酒者，才可能帮助他。《新闻夜话》专访了杨晓楠，他在节目中详细分析了酗酒者心理、特点，现身说法鼓励酗酒者重新找回生活信心。节目播出后，栏目接到大量热线电话，杨晓楠开通的热线更是被打爆。

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让更多人感到一个文明社会能展现出的温暖，是《新闻夜话》的宗旨之一。

论访谈节目的气场

□ 刘昊天

近几年来,访谈节目成为电视业中最具成长性的栏目样态之一,一方面它具有时间周期短、资金投入少、人力成本小的优势,另一方面国内从业者也逐渐发现了“谈话”的魅力,虽然这种认识比西方同行晚了四十余年,但从访谈节目遍地开花、方兴未艾的趋势来看,这种栏目样态不仅是有生命力的,而且操作得当,是有可能成为像美国的《60分钟》《拉里·金访谈》那样的荧屏常青树。

在本篇文章开始论述之前,先理清下述几个概念:

谈话节目 这是国内一些媒体、研究者和观众对访谈节目和脱口秀节目的统称,其实这二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虽然从样态上来讲,二者都是主持人提问,嘉宾回答,现场也都可以设置观众,但表面的相似并不能掩盖二者的相异,就像拳击与交际舞不能混为一谈。

访谈节目 美国的电视访谈节目脱胎于广播访谈,并在起初就和新闻采访有不解之缘。在我国,电视访谈真正成为一种栏目样态,应该自《东方时空》中的《东方之子》始。这个推出不久便成为名牌的栏目,造就了中国电视业最优秀的一批访谈节目记者、编导和主持人,而它规整的形式、日益讲究的构图、用光等技术指标也成为此后人物访谈节目的标杆。我认为访谈节目最基本的形式是一个记者对一个新闻人物或者新闻当事人的采访,它的运作核心是记者,它的目的是发掘新闻本质或者新闻人物的个性,它必备的要素是:新闻性、交锋感,其中新闻性是访谈节目和脱口秀节目最大的区别,而访谈节目讲究提问的质量,讲究采访技巧也和脱口秀节目大相径庭。

脱口秀节目 美国的脱口秀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广播中的诙谐剧、夜总会的谐星表演,所以脱口秀节目从一开始就和娱乐有不解之缘,这种栏目样态在美国深受欢迎,移植到中国之后亦可以说是一炮打响,也就是现在国人皆知的《实话实说》。此前地方台虽然已经开始实验电视脱口秀节目,有的也获得地方性知名度与影响力,但当然没有一个能和《实话实说》对中国电视业界的影响相比。脱口秀节目的基本形式是主持人以幽默轻松的语言和嘉宾调侃,它的运作核心是主持人,它的目的是以轻松的聊天娱乐观众,它必备的要素是:娱乐性、表演性,它给观众提供有趣的信息而不是新闻,当然,如果它的内容和时事新闻跟得比较紧的话,会有助于它的收视率和影响力,但新闻性,尤其是新闻必须具备的中立与准确,是它所不具备的。

当然,实践总是会突破理论和概念的局圄,而观众的首肯比教科书的概念更受电视人的看重,当前电视屏幕上的谈话节目,并不是全都能够清晰地划分成访谈节目和脱口秀节目,这两种节目样态是有融合交叠的地方,比如《对话》当然是访谈节目,但它也具有一些脱口秀的特点;《艺术人生》是文艺类的脱口秀,



孙恒 “打工青年艺术团”创始人、团长

这期节目的开头是一段质朴的歌曲：孙恒演唱《天下打工是一家》片段：“你来自四川，我来自河南，你来自东北，他来自安徽，无论我们来自何方啊，都一样的要靠打工为生。天下打工兄弟姐妹们是一家！”孙恒，“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创始人和团长。2002年的‘五一’劳动节，他和一群在北京打工的朋友们成立了“打工青年艺术团”，艺术团里都是有文艺特长的年轻人，他们唱歌、弹琴、说相声、演小品，唱的演的都是打工者自己的生活，而且不收分文地专门为打工者义务表演，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走遍北京的各个区县，一共演出了100多场，观众有两万多人，不但受到了打工者的热烈欢迎，也被很多媒体关注和报道。2004年9月份，有唱片公司慧眼识珠，为他们出版了歌曲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这也是全中国第一张打工者自己的专辑。《新闻夜话》为此采访了这个可敬的小伙子。当主持人问起他为什么不写那些风花雪月，就要写打工者自己的歌的时候，孙恒朴实地回答：因为我身边都是这样的打工者，他们没有自己的歌曲。而“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歌曲后面，几乎每首都有一个故事。在节目中，孙恒还流露了内心深处的期待：不要再用“农民工”“打工妹”来称呼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同胞，因为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劳动者，是“新型工人”。

但它又吸收了大量访谈节目的优点，而且它的节目只要一贴近新闻就能更加生色，比如它做的关于“电影《无间道》剧组特别节目”“缅怀常香玉特别节目”等。还有，CCTV-10 的《大家》主要专访科学界、文化界的杰出人物，是一个很规整的访谈节目；而《讲述》虽然具有谈话节目的躯壳，但它既不是访谈也不是脱口秀，它是一个自述体的纪录片，它的主持人是一个虚置悬空的角色，可有可无，拿掉了也无关宏旨，现在它又加大了外拍的量，在访谈中插入大量画面，使得节目自成一格，完全打破了谈话的气场，难怪能够拿到国内的纪录片大奖。又如新闻频道的《新闻会客厅》，当然应该是新闻性的访谈节目，但它借鉴了脱口秀的一些做法，比如主持人事先不会设计严密的采访提纲，这样的好处是节目即兴自然，但也往往流于粗疏。目前最值得重视的、最纯粹的新闻访谈节目是《面对面》，这个脱胎于《新闻调查》的长篇人物专访节目由于去年的“非典”和今年的“专访成龙”使它两度声名鹊起，主持人王志厚重而不乏尖锐的提问使用得长篇访谈的形式做深度新闻报道成为可能，但它的困境在于：一，适合它的素材有限，《面对面》最适合报道有大容量新闻内涵的人物，可这样的人物一年能有十几个就不错了，但它周播两期，每年的吞吐量是 108 人，所以它日常的某些节目会让人觉得有些拖沓、乏味、平淡；二，主持人只有王志一个，这虽然在节目创立初期有助于建立节目品牌，但长此以往的消耗会很快把主持人耗空，最近的节目中已经很少看到王志有精彩的提问与对应，而是有些套路化了，他的疲惫不是表现在脸上，而是体现在采访质量的下滑。

理清了上述概念之后，我将论述一番本文的重点：访谈节目的气场。

访谈节目的气场也可以理解为访谈节目的氛围、气氛、状态等，但都不如说成气场更为准确，因为这个“场”一旦确立，节目的风格、包装、音乐等外化的物质外壳才得以确立；而且，电视节目往往面临改版、更换班底甚至主持人的情况，但只要维持这个“场”不变，节目就不致大为走形。

由于气场的概念很难用术语描述明白，我试着对一些知名的访谈节目的气场做一个描述，以理清这个概念：《面对面》是严肃冷静的，于厚重温和中藏着尖锐的质疑，即使是国际知名的影星、被过度娱乐消费的成龙，在《面对面》的场里也被挖掘出了社会性与新闻性，即作为慈善家的成龙；《新闻会客厅》则是明快轻松的，新闻当事人到了他们的演播室往往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就是负面新闻的主角也不例外，这才会有重庆石蜡火锅的肇事者到《新闻会客厅》里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东方之子》是高雅大方的，这和它只能做正面人物有很大关系，也因为它和新闻有一定的疏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收视率；而《新闻夜话》，由于从业者的经验和素质，使它呈现出一种年轻人的质疑态度，足够锐气，但不够从容。

同样的嘉宾放到不同的访谈节目中会呈现不同的个性侧面，新闻也会被开掘出不同的角度，这都是不同的节目的新闻理念、制作手法不同所造成的，但也是它们自觉或者不自觉营造出来的气场传递给了嘉宾以及观众不同的信息。比如，同样接受《新闻会客厅》和《新闻夜话》采访的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在前一个节目就表现得轻松，而在后一个节目中则有适度的紧张，这两种被采访状态无优劣之分，而是两个节目的特色所在，非如此不能将二者区别开来，他们也无法相互取代。

既然访谈节目的气场对其风格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我想从实践的角度出发，谈谈如





王骥 环保志愿者

圣洁的珠穆朗玛峰，它的名字在藏语当中其实是“第三女神”的意思，它给人们的印象也的确像女神那样圣洁美丽。但是自从1921年，人类开始在珠峰活动，探险家和登山者们不仅在世界最高峰上留下人类的足迹，也陆续留下了很多垃圾，有人估计这个数字甚至高达600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珠穆朗玛峰的北坡，也就是中国境内。2004年9月，“2004珠峰环保大行动”是中国清珠峰规模最大的一次，参加这次清理的有28名环保志愿者和西藏登山队的队员，还有当地的藏族群众。《新闻夜话》为此专访了刚刚从珠峰归来的志愿者王骥和这次活动的主办者之一——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的主席高登义。王骥面对镜头向公众呼吁：“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除了照片什么都不要带走”。高登义则分析了这些垃圾的成因，除了过去登山者缺乏环保意识之外，国内的登山管理也需要细化，才能更好地保护珠峰。



何营造和维护这个气场，其原则和技巧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可以说，访谈节目的所有制作环节都指向气场的营造，每个工种也都在或多或少地参与营造这种气场。例如：

1. 从前期来讲，编导的预采访和准备工作十分重要，不仅能使自己对这个嘉宾、这条新闻胸有成竹，而且在正式采访时能赢得嘉宾的足够尊重，并使嘉宾保持一种良好的情绪和心态来回答问题。

2. 在正式采访之前，必须要求主持人或者出镜记者有充分的案头工作，但最好不要让他和嘉宾见面，甚至电话也不要打，或者见面了也不要让主持人直接向嘉宾提问，以保证录制节目时双方都保持一种适度的紧张和兴奋——试想某人向同一个人讲述同一件事情，第一遍必定会鲜活、真实、原生态得多，也珍贵得多，因为假如主持人和嘉宾事前有比较充分的沟通，则采访不过是重复沟通时的那些话，或者成了嘉宾揣摩主持人想要什么样的回答，这样就使采访的质量大打折扣。

3. 前期准备的采访提纲依照不同栏目的工作流程，由谁准备、提纲的详细程度都有不同，但有一点应该是共识，就是主持人和编导应该有充分的沟通，双方在对新闻的理解、对这一个新闻事件的报道方式和角度应该没有重大分歧，只有这样才能在合作中碰撞出火花来，而不是南辕北辙，使编导感觉节目没法编，主持人感觉编导歪曲了自己的现场采访。

4. 尊重现场采访。现场采访是访谈节目的重要一环，是各工种的“会战”，也是营造气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可以说成败决定于此。但在电视栏目化生存、流水线化生产的今天，有的电视人会轻慢了现场采访的气场，主要表现有二：一个是各工种之间缺乏沟通，对拍摄各有想法，以致合作中产生矛盾而影响了气场的营造，甚至有的当着嘉宾争执，这当然是现场采访、也是所有电视节目的大忌。另一个是新编导常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是现场教嘉宾如何去说，或者因为预采访中嘉宾表达得格外精彩，便在设计问题的时候希望嘉宾把原话在现场录制的时候再说一遍，这当然也是很忌讳的，不仅有违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更有越俎代庖之嫌——编导将现场的主持人置于何地？而且这样的工作方式永远出不来鲜活精彩的问答。

5. 后期剪辑中继续营造访谈的气场。很多新编导往往喜欢在剪辑时选择主持人最字正腔圆的提问，再用嘉宾一个最完整无缺的回答作为对应，这样也没什么大错，但放弃的恰恰是访谈节目最基本的要素：交锋感。只有在后期剪辑中保留主持人对嘉宾大量的追问、适当而有意味的不完整的半句话甚至是沉默，这样剪辑出来的节目才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现场采访的原汁原味，也就是带着原生态的粗糙质感，才更真实可信，因为，最好的访谈节目是把访谈现场变成了新闻发生地，也就是访谈的场和新闻的场合二为一了。

6. 在最后的合成阶段，要警惕不要让过度的技术包装损害了访谈的气场。现在的电视包装手段五花八门，电视的娱乐化倾向使得一些电视人比观众还浮躁，生怕哪个地方花活儿不够，让上帝手中的遥控器换了台。不过我倒觉得，能看电视访谈节目的观众，更关心的是内容，而不是它的包装手段。



张本兴　北京智化寺音乐第29代传人

中国是一个文化遗产丰富的国家，拥有悠久历史的我们，往往会忽视了身边的文化遗存，北京智化寺音乐就面临这种失落。这种从明朝流传至今，融合了宫廷音乐、佛教音乐和民间音乐所形成的独特音乐品种，在流传的五百年间基本保持了它在明朝的原貌，所以被称为“音乐化石”，并对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音乐和民间音乐有很大影响。由于现在北京智化寺音乐只有一位传人，就是已经81岁的张本兴老人，不禁使人担心，这个文化遗产是不是到了存亡断续的关头？《新闻夜话》为此专访了张本兴老人。

在节目中，这位音乐活化石的唯一传人用明朝的九云锣展示了同样古老的智化寺音乐。张本兴老人还回顾了20世纪30年代至今，北京智化寺音乐从繁盛到衰零的命运沉浮：1953年，他曾和师兄弟一起为老舍、梅兰芳等文化名人表演；上世纪80年代他们还曾作为中国佛教音乐的代表访问欧洲，并受到热烈欢迎。然而1992年的时候，由于老一代传人相继去世，使依靠口传心授的智化寺音乐面临传承危机。早在11年前，张本兴老人就开始独自授徒，但遗憾的是，十几个徒弟中只有两个人留在他身边。

这种古老音乐的命运到底会怎样呢？在我们做完这期节目的时候传来这样的消息：文物单位将为张老再次招收学徒，好重振智化寺音乐。

新闻采访中“霍桑效应”的发生与应对

□ 庄庆飚

在新闻采访中，相信每个记者都遇到过这样一种可怕的情况：刚才还谈笑风生，口若悬河的嘉宾，一进演播室马上变得正襟危坐，要么满头是汗，口吃语塞；要么滔滔不绝，言不由衷，不知所云。

这种现象被称为新闻采访中的“霍桑效应”。

“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是20世纪三十年代一些在美国芝加哥的西方电器公司的霍桑工厂，从事一项研究的人员发现的一种现象。研究人员最初注意到，当答应给一群装配电话机的女工经期假、提前下班以及在工作期间供应一餐热食时，她们的生产效率随之提高。但是，后来经期假被取消并把下班时间推迟，她们的工作效率仍然不断增长。研究者们起初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后来才认识到，这是由于女工们正在受到研究者的注意造成的。正是研究者们自己的关注，改变了他们所希望考察的工人们的生产行为。

“霍桑效应”虽然是在科学研究中产生的一种现象，但它几乎存在于一切社会领域。只要是由“受到注意”引起的异常反应，都属于这一效应。在一次采访活动中，采访对象由于受到记者的“注意”，“霍桑效应”就或多或少地产生了。

也就是说，进行新闻采访时，当采访对象意识到记者在场(或摄像机、话筒等)，可能会“夸大或隐瞒些什么”。

过去，记者在采访中往往抱怨：被采访者刚才还好好的，该说什么、甚至怎么说都预演过了，可摄像机一架、灯光一开，被采访者立刻像换了一个人，眼睛也不知道往哪看了，话也说不成句了。赵本山曾经演过一个小品叫《我想有个家》，说的就是两个征婚者上电视，一看镜头就进紧张，导演问“你叫什么？”回答“我叫不紧张”。

这种现象最为常见，在我制作的一期关于“农民工”问题的节目中，两位被采访者都是最普通的农民。我事先已经预计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所以在前期采访中尽量与他们拉近距离——在工地上和他们一起吃饭，一边聊天一边帮他们干活，他们对我也做到了“知无不言”，而且表达十分顺利，朴实，真诚。

第二天，我十分自信地进入演播室，满以为昨天的“辛劳”一定会在今天“结出硕果”，可一切都出乎意料。首先，当他们发现与他们对话的并不是我，而是一位女主持人(我只是这期节目的编导)时，立刻表现出高度紧张，甚至有一种受骗的感觉，我只好详细地为他们解释了我们工作的流程和分工，告诉他们主持人已经和我进行了认真的沟通，对于他们的情况和想法主持人和我一样了解。解决了初步的怀疑，肯定我并不是在骗他们后，他们又提出还是希望我来问他们问题(由我作主持人)，我只得再次向他们说明：就像在工地上一样，电视台也有规定，“瓦工”只能干“瓦工”的活，不能

2004年7月1日，大型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经历了整整40年的风雨历程后，再次与广大观众见面。这部舞剧以震撼人心的悲壮情节，恢弘绚丽的场面，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海南岛的地域风情，从它诞生起，就赢得多方好评。它在芭蕾舞台上破天荒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形象，将芭蕾的精华与中国的气派融为一体，为世界芭蕾舞坛增添了一朵奇葩。

《新闻夜话》采访了《红色娘子军》当年的创作者之一——原中央芭蕾舞团团长、编导李承祥和剧中女主角吴琼花的第五代扮演者。他们分别讲述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时期的种种经历和这部舞剧在各历史时期的命运，以及作为一个生长在改革开放时期，从未经历过战争的青年人是如何看待这部革命题材芭蕾舞剧的。





李承祥　原中央芭蕾舞团团长、编导

当“木匠”。

采访正式开始了,两位“农民工”要么不说话,要么满嘴都是从报纸电视上学来的官话、套话:

主持人问:“你们的工钱都拿到了么?”

回答:“感谢党中央和人民的关怀,都拿到了。”

主持人问:“你们的孩子在北京上学,有没有感到和北京的孩子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是前期采访中对方主动提出来的)

回答:“没有没有,都挺好的。”更可怕的是其中一个农民工连婚还没结,竟也跟着说“挺好的”。

这就是典型的“霍桑效应”——采访对象明显在隐瞒些什么,彻底的言不由衷。

尽管主持人和我一再告诉他们:采访的时候,只要看着主持人就行了。可一遇到不好回答或只能实话实说的问题,他们马上就会情不自禁地转过脸看我的反应,甚至在采访进行中还一再提出让我作主持人。我只能庆幸身边没有台领导了,不然一定以为他们俩是我找来为自己争取主持人职位的“托儿”呢。

这也许是我遇到的最吃力的一次采访,一个小时下来,主持人、两个嘉宾、再加上我都是一身汗,看看带子,整个一个“民政部官员谈当前农民工大好形势”。这与节目策划时的初衷简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甚至是南辕北辙啦!

如果反思一下,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们知道,新闻采访是采访主体(记者)对采访客体(客观事物)的认识活动。大多数情况下,采访是记者对另一个人的访问,因此,采访也可被视为一种人际传播(记者和被采访者)。人际传播的直接目的是自我认识和认识他人,显然,采访是记者认识他人的活动。”

而在我这次认知或认识活动中,很显然,与对方根本无法在采访中建立有效的沟通,其结果很简单,就是本应在电视上出现的农民工形象,因为上了电视突然变成了一个既非农民,又非农民工,更非官员,但又三者都像的“怪物”!他们说出的每一句话必然不会有人相信,成为了无效传播。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搞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伊兹拉·帕克所说:“每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无论多少总是在有意扮演一个角色……”但不论他们的原始角色是什么,一旦采访活动发生了,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身份就会临时定格为特定角色。采访者就是记者,被采访者就是采访对象。

作为被采访对象的两位“农民工”本来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自己的知识和思维方式看待发生在自己身上和身边的事情。他们的想法,有的尽管片面,甚至可笑,但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大多数农民工的想法。这正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初衷和目的,也是最希望展示给观众的东西。但当他们离开工地,走进陌生的演播室,面对摄像机,他们似乎突然意识到:自己上电视了!无数的人会在电视里看见自己!

他们本能地认为,电视上的人应当这样说话或应当说这些,不应当说那些。他们臆想中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标准,另外出于自尊心,不愿意被人们瞧不起也会有意隐瞒甚至编造一些根本不符合实际的事情,以证明前面的谎言(尽管这样的谎言绝非恶意,但它却使我们的采访距离新闻事实本身愈来愈远)。

他们在扮演一个他们臆想中的角色,一个他们认为的电视里的被采访者的形象。

如何将他们从角色中脱出来,成为他们自己,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工”,是这



陈胜利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教司巡视员

2004年7月11日,是第十五个世界人口日。当天许多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发布了一则来自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数字: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19.92，也就是说每当出生100个女婴的同时，就将会有近120名男婴出生,因此,许多媒体纷纷指出如果不有效控制男女婴儿出生比例,男多女少现象必将成为不久以后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主要任务是稳定低生育水平,要努力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

《新闻夜话》通过对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教司巡视员陈胜利的采访,向人们详细解释了人口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的原因,以及世界各国的情况。对于社会上流传的我国将会出现"娶妻难"的传言,陈胜利予以了否定,但同时他警告人们,对女婴非正常死亡的状况应当引起注意。

期节目成功与否的关键。

看过演播室录像带后，我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毙”掉，要么重录。

如果重录，如何避免已经发生的一幕呢？

根据勒温的“心理场论”理论，处于“心理场”中的人的行为的发生有共同的规律可循，用公式表示为：

B(人的行为)=F(常数)×P(个体因素)×E(环境因素)

其中，F(常数)作为一个定值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剩下的就只有 P(个体因素)和 E(环境因素)了。

针对 P(个体因素)我们一般采取的方法有：比如节目录制之前先不开机，聊天，使对方放松然后悄悄开机，提一些采访对象很熟悉的事情，让他讲故事，开玩笑等等。

但这些在第一次演播室录制时，已经全试过了，收效甚微。

那么能不能依靠改变 E(环境因素)来消除被采访者的“霍桑效应”呢？我决定，放弃演播室，将采访改到工地上，重新录制。

采访当天，我有意和主持人提前两个小时来到工地，衣着尽量朴实，并戴上了和工人一样的安全帽，采访地点选在一处光线较好的建筑物地基上，主持人和被采访者没有像演播室那样刻意安排，而是坐在随手垒起的一排水泥砖上，不远处的搅拌机和脚手架成为画面背景。

由于已经进行过一次采访，我们的大部分问题对方已经知道并有了相对的思想准备，所以这次采访我们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一开始就直奔主题，而是从现场，他们的工作环境入手的。随着采访的进行，两位农民工明显变得比在演播室里自然多了，偶尔路过的其他工人使被采访者产生了某种优越感和满足感，他们越来越活跃，甚至出现了对主持人的提问产生争议的局面，许多以前不愿回答的问题现在他们也对答如流了，采访出奇得顺利。

美联社记者休·马利根曾经说：“假如让你选择访问的场所，要设法做到在后台约见演员，在车站约见侦探，在会议室约见法官，在室外竞选讲台约见政治家，在栏圈里约见野牛骑士。这样如果没有恰当的话可供引用，你至少也可以从他所在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主题。首要的是，要避免在旅馆的房间里约见被访问人。”这实际上就是遵循前面勒温的“人的行为公式”。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采访场所，让双方都静下心来，形成融洽的谈话气氛，减小“霍桑效应”的强度，保证采访的顺利进行，以便记者达到采访的目的。千万不要动辄摆出记者做派，拿出采访机、采访本、照相机、摄像机等长枪短炮，刻意制造一种我们现在是在进行采访的气氛。

我两次采访结果充分证明了休·马利根的理论，“霍桑效应”的产生虽然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但采访环境对于被采访者的影响来说往往是最直观和最明显的。当把被采访者放到一个它所熟悉的环境中时，它会因为感到对周围据有“可控性”而显得自然，自信，相对于采访的干扰度被降低，采访进行的就会顺利一些，反之则效果也相反。

当然，我绝不是反对演播室采访方式，众多现实情况也已经充分证实，演播室采访有其自身不可替代的优势。在此只是结合我的一次采访经历浅谈采访环境对于我们获得新闻事实的重要性。



2004年5月，第五十三届世界小姐总决赛在中国三亚举行。来自中国吉林的关琦获得世界小姐第三名。但是，社会上广泛流传一种说法，即关琦的季军是由于本届比赛设在中国，按照惯例必然会有一位东道国小姐获奖，也就是说这个季军是内定的。

《新闻夜话》通过对关琦的专访，充分展示了关琦作为一名合格的世界小姐所具备的个人魅力和感召力。一切传言在关琦机智、巧妙地回答下不攻自破。如何看待“世界小姐”、“选美”和“歧视女性”也是这期节目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关琦在节目中告诉我们：“选美”曾经被女权主义者诟病“轻视女性”，现在已不能如此轻易断言。本届世界小姐中国总决赛就提出“用美丽升华美丽”，“鼓励的是新一代才貌双全、积极向上的女性。”



关琦 世界小姐

论质疑式采访风格

□ 荆慕瑶

这个题目，其实已经酝酿很久了，只是一直在我头脑里以各种细枝末节的状态存在，并且不时冒出一点“智慧”的小火花，星星点点地冲击着我。今天终于有时间有心情把它整理出来，也算了一个心愿，是对自己对观众的一个交待吧。

好了，闲话少说，进入正题。

正规的新闻学教材里提到过很多种采访，因为分类方式不一样，所以给人的感觉，采访本身也是五花八门的。但是我认真浏览了一下，对于质疑式采访，倒真是很少有人提到。虽然有前卫的学者也在研究并小有所成，但这种采访风格在新闻教学的主流观念里，并没有形成气候。它实际上是伴随着对国外采访经验的学习和一些新闻工作者的实践发展起来的，现在正处于逐步形成之中，且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所以，笔者这篇小文也不揣冒昧，贻笑方家了。

在这里，我主要想谈的是电视采访当中的质疑式采访。一方面，因为我是多年的电视人，日积月累了不少电视采访的心得体会、经验教训。另一方面，质疑式采访也只有在镜头前才能更清楚地表现出来。试想，一个文字记者上门采访，非要跟采访对象来质疑式，在人家的地盘上，你又手无寸铁（没有摄像机保驾护航），人家不把你扫地出门才怪呢。在这里，我不是说电视记者可以靠着架在身后的摄像机仗势欺人，而是采访对象在你的镜头前，面对你的质疑式采访，可以呈现出最真实的反应。面对你的质疑，无论他是尴尬、紧张、愤怒还是从容应对，都是新闻事实的一部分，都是观众能得到的超出文字记录的真实现场。

说了这么多，还没有讲到底什么样的采访才叫质疑式采访，因为现成的新闻教材里也并没有给它下一个完整明确的定义。所以，笔者只能依靠这几年的采访实践和对国际先进采访节目的认识，来给它做一个解释。

质疑式采访，就是在进行采访的时候，对采访对象抱着怀疑的态度，不是他说什么就相信什么，而是仔细分析他的回答，找出薄弱或不合情理之处进行合理有效地追问，以达到探究新闻事实、获取真相的目的。

质疑式采访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记者和采访对象话语的交锋甚至争论，从收视效果来说这自然比那种四平八稳、你问我答的采访要好看，但这种采访并不是不给采访对象话语权，更不能把它变成一个辩论会——无论何时，采访对象都是节目中最重要的部分，记者质疑的目的不是显示自己的表达能力，而只是出于避免被嘉宾欺骗，力求获得事实真相的目的。至于质疑式采访风格，只是因为经常使用这种采访方式，时间长了，自然会有一个个人风格的养成。

国际上出色的硬新闻节目中，基本上都会用到质疑式采访，尤其是当采访对象是政要官员、商人等社会上的强势人物时。因为公众天



养花种草会得上癌症，这是真的吗？2002年5月，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向社会公布了52种植物含有诱发癌症的成分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对此也有很大的争议。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在广东、广西两地鼻咽癌高发地区进行的相关研究已经持续了十年。那么这些花木真的是诱发癌症的隐形杀手吗？通过对中国科学院曾毅院士的专访，《新闻夜话》栏目澄清了事实：某些媒体公布的“花木致癌”，这个提法就是错的。实际上是在52种中草药里面，包括一些植物里面，含着有促癌物质，不是致癌物质。促癌物它本身不致癌，但是它能够促进致癌物或者致癌病毒更容易诱发癌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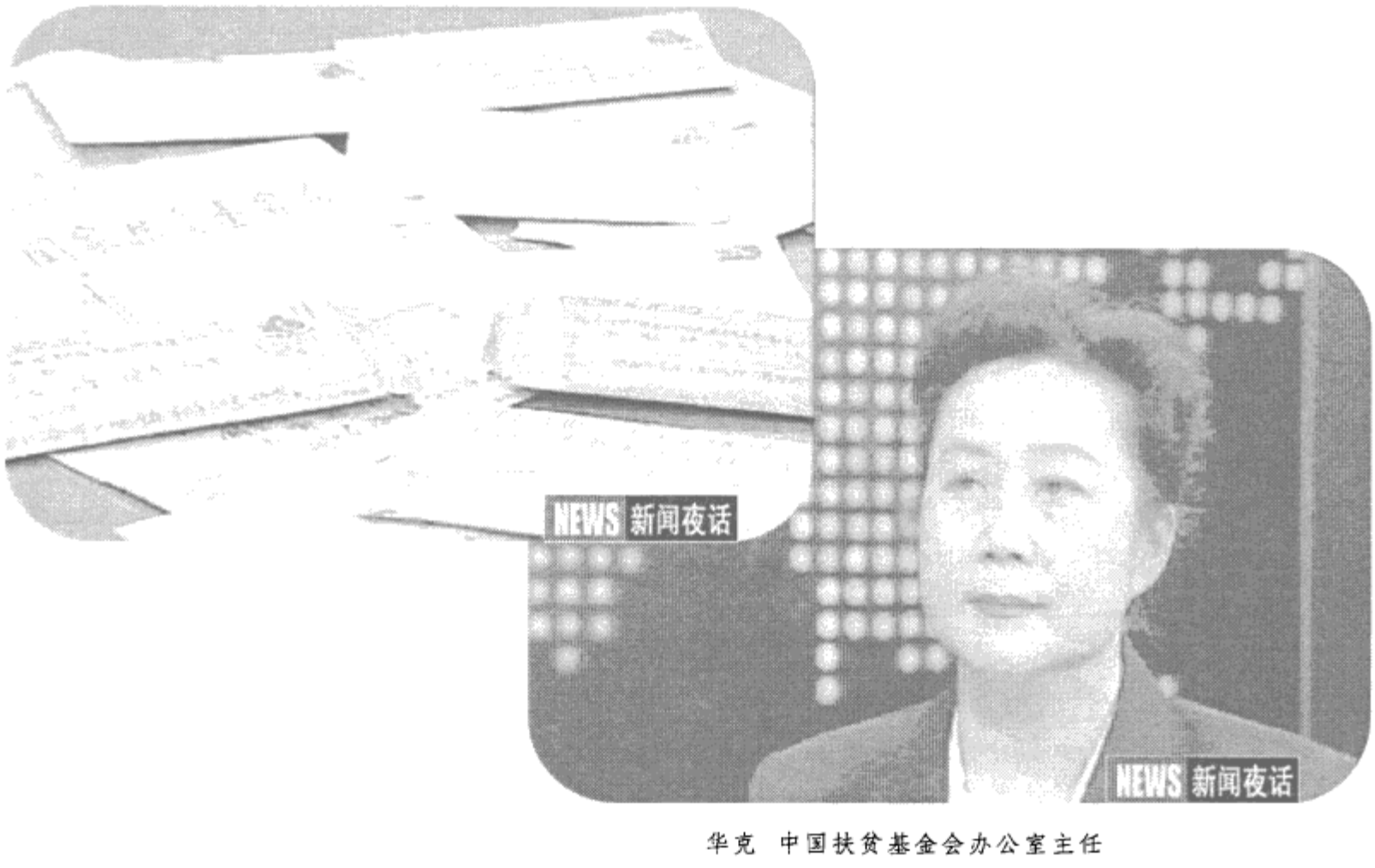
曾毅　中国科学院院士

然地对他们说的话抱有怀疑，认为他们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隐瞒真相，所以记者通过质疑式采访刨根问底、挖出真相，正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比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名牌节目《60分钟》——一个已经被权威新闻学院奉为教材的栏目，它的几位资深记者(年龄都在60岁以上，像迈克·华莱士已经年过八旬)，就把质疑式采访风格发挥到了极致。无论采访对象是美国政要还是他国总统，乃至美国国内数一数二的商界大亨，这些记者通通是用怀疑的眼神针锋相对，他们从来不会频频点头附和采访对象，更不会说什么就信什么，而是永远有充分的证据在握，并且不时抛出以反驳对方刚才的回答，把采访引向深入。而且在采访中，记者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一旦采访对象少许疏忽，出现逻辑错误或者前后矛盾的说法时，就马上进行质疑，结果自然能掌握主动，得到自己想要的新闻事实。

现在国内的新闻采访节目也都开始借鉴质疑式采访风格，比较典型的就是《面对面》和《新闻夜话》。《面对面》的主持人王志很好地实践了采访中的怀疑眼神，在他的大部分节目中，都已经用眼神明白地告诉了嘉宾：“来吧，我不相信”，对方自然不敢掉以轻心，知道用应付性语言是过不了关的。如果仔细分析一期节目中他所提的问题，就会发现，除了对新闻本身的核实性问题，比如5个W以外，剩下的大部分都是质疑性的，比如“真的吗”，“你怎么去实现它”，“有人说你这是作秀”等等。但是他在运用质疑式采访风格中也有一些遗憾，比如有时会出现为了质疑而质疑的问题，就是没有质量没有意义的问题。比如在采访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时，当对方说到要对中小股民的利益负责时，主持人追问，中小股民的利益和你没关系，你可以不对他们负责——这就是为了质疑而质疑，因为证监会的重要职责就是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这是证监会官员无法推卸的义务，绝不能说没有关系。的确，采用质疑式采访在挖出真相的同时，也是为了让采访过程更好看，但它绝不能成为一场采访“秀”，就是无论何时都不能为了质疑而质疑，每一次质疑都要事出有据，而不是对嘉宾的每一个回答都要不假思索地反驳。只有在你掌握了充分证据，而且确信这个质疑能把采访引向深入的时候，才能提出自己的质疑。

除了要有据、有度地使用以外，质疑式采访当中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关键的是，这种采访风格容易引起观众的不满，认为记者咄咄逼人，不给采访对象充分的话语权。因为在采访中，记者有备而来，准备了大量的材料，而采访对象往往很难适应这种连续追问的质疑，从而在两个人的博弈中败下阵来——这就表现为现场的尴尬、紧张乃至于愤然离席。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就要做到“得理也要饶人”，要给采访对象准备好台阶，使其保存颜面，也使采访得以继续。否则，就会赢得采访却输掉了观众。因为人天生都是同情弱者的，当看到一个体面的成年人在镜头前手足无措甚至面红耳赤时，会自然地激起同仇敌忾之心，形成对采访记者的反感。

采访听起来简单，其实是一本永远也写不完的教科书。因为新闻事实五光十色，采访对象千变万化，采访作为一种人际交流的艺术则永无止境。笔者认为，质疑式采访风格代表了一种新的采访理念，它使采访在获取新闻的同时还成为了一种可以直接展示给观众的好看的节目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质疑式采访风格应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期待同仁们携手，把它发扬光大。



华克　中国扶贫基金会办公室主任

本期节目报道的是当时一个惊人的骗局，而且这个骗局正在进行当中。从2001年下半年起，中国扶贫基金会陆续收到各地来信和电话，咨询一个听起来非常诱人的扶贫项目，内容是你寄出去100块钱，就有可能收到100万。这个项目已经被认定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个骗局已经蔓延到了全国几乎所有的省份。但遗憾的是，因为没人查处，所以每天依然还有许多老百姓上当受骗。《新闻夜话》通过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办公室主任华克的专访，独家披露了很多打着扶贫旗号的骗局内幕。

论“道具”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的运用

□ 陈永庆 蒋乐进

访谈节目以语言符号为主要传播工具，它传达的是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当人们认识到“面对面交流思想是电视最大的长处”后，也就越来越重视运用访谈这一形式来传播信息。《新闻夜话》、《面对面》、《新闻会客厅》、《央视论坛》等一大批节目出现在观众眼前。由于电视访谈节目运用的电视手段少，很容易给人单调、枯燥的感觉。节目在形式上往往是几个人在演播室里“干侃”+“人头接人头”的画面，再就是插上相关的画面加上访谈的同期声。如何在选题和采访思路确定好的基础上，突破这一固有形式，使节目更吸引观众的眼球。笔者认为在节目中恰当、适时的运用到与选题和嘉宾相关的“道具”是提高访谈节目质量、取得好的收视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研讨美国三大电视网的诸多访谈节目中，我们看到，出镜记者往往是体验式的在节目中把“道具”展示在受众眼前。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要充分运用到“道具”，调动各种电视传播元素，才能更好做到现场的信息交流互动性，才能充分发挥电视的优势，生动、形象、准确、真实的传播信息，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道具”的概念及其在传播学理论上的分析

“道具”在舞台影视艺术中被称为“与表演者直接发生关系的器物”（吴永庭《道具在影视艺术空间的作用》刊于《文化时空》2002 年 04 期 73 页）或者说“在戏剧等演出中一切用具统称为道具”。在访谈节目操作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道具是与新闻事件、人物相关的各种真实的事物、元素，并能在节目中充分运用，增强传播效果。舞台剧中道具虚拟性能强，在访谈节目中，道具应该是真实、具体的而且是可以在镜头前充分运用的。从传播学理论上来讲，电视访谈节目中道具运用的必然性。

传播学中，“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是社会生活中最直观、最丰富的传播现象”“双向性强，反馈及时，互动频度高”“是一种高质量传播活动”（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81 页、84 页）可同时用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手段。大众传播“指特定的社会集团通过文字，电波，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体，以图像、符号等形式，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过程”（T.O’ Sullivan,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Methuen&Co.,New York,1985,130）。可见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重要的差异在于人际传播中存在反馈和交互。访谈节目中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信息交流是人际传播，而通过电视这一大众传媒传递给电视观众是大众传播。可以说，电视访谈节目是一个将人际传播进行大众传播的过程，即人际传播的大众化过程。必须肯定的是，访谈节目对人际传播的大众化，不是简单的再现，而应该

纳米即一米的十亿分之一，对纳米材料的基础研究和生产运用是近十年才兴起的一个崭新的前沿科学领域。要是几年前对您提到“纳米”这个词，可能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甚至有人会开玩笑地猜测是不是一种新的“大米”。可是现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时就会有“纳米”这个词蹦到我们耳朵里，像“纳米燃油”、“纳米冰箱”、“纳米衣服”等等。

《新闻夜话》请来了中国最权威的纳米专家之一、国家纳米科技指导协调委员会首席科学家白春礼院士为大家解答了一些疑惑，同时向我们描述了纳米科技的诱人前景。

白春礼院士介绍，我国纳米科技的研究虽说起步较晚，但在基础研究方面目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在产品开发、技术运用方面还比较落后，现在市场上有些声称的“纳米”产品，实际上只是在某个部件上采用了纳米材料，有误导消费者的嫌疑。因此，国家正在制定一项纳米技术的检测和认证制度，以引导纳米科技的研究、运用沿着规范化的轨道发展。

再过二、三十年，纳米技术将广泛地运用在电子、机械、生物、能源等各个领域，当人们真正进入纳米时代的时候，生活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个最形象的例子，目前的一张 DVD 光盘运用了纳米技术之后，可以存储 1000 部电影。





白春礼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国家纳米科技指导协调委员会首席科学家

是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精细的发挥人际传播模式的优势。在访谈节目中，大众传播是人际传播的目的，为人际传播指定方向；人际传播是大众传播的前提和基础，人际传播的效果直接影响并决定大众传播的效果。电视访谈节目要利用人际传播手段改善大众传播效果，就要充分运用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种手段，演绎好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中的双重角色。而“道具”是个非常重要的非语言符号，它可以直观、形象地传递给受众有用的信息；它是对新闻现场的一种再现；它是出镜记者和嘉宾更好交流的一个重要因素。“道具”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的运用，是电视访谈节目更好发挥电视优势的要求，也是电视恢复人际化传播的要求。电视工作者会有这样的感慨“道具在电视节目的制作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离开了道具节目是无法进行的”；“根据节目的需要就要配备必须要的道具，缺少了这些道具会使画面枯燥无味，节目内容无法体现”“各类电视类节目”“道具是不可缺少的元素”。（佟全东《谈电视节目中的道具》刊于《现代电视技术》2003年04期102页）

“道具”的作用

“无论是综艺节目、专题节目，还是曲艺小品、戏剧、谈话类的节目，尽管有场景、灯光和服装的烘托，然而离开了道具，节目是无法进行的。道具对承接剧情、交待环境、辅助演员完成表演、增强节目的表现力方面往往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佟全东《谈电视节目中的道具》刊于《现代电视技术》2003年04期102页）访谈节目由于其独特性，“道具”的运用有着重要的作用。下文试从几个方面分析“道具”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的作用。

有利于营造一个愉快的访谈氛围，使嘉宾和出镜记者更好交流。“道具”是与嘉宾有直接联系的，在制作节目过程中运用到“道具”，很容易拉近嘉宾和出镜记者的距离，让嘉宾减少陌生感，真正进入到访谈内容中去，和出镜记者更好了解、沟通。这样才能够在访谈中做到更深层次的交流。在制作节目时，很多嘉宾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好”，其实是很多有见地的观点没能说出来。自然的人际交流是在人际空间发生的，演播室大量灯光、摄像机等往往会对嘉宾心理产生重大影响。要让嘉宾去除这种影响，彻底的摘掉带在自己头上的“嘉宾”、“专家”这样的帽子，和出镜记者做到真正的、自然的人与人的交流；在制作节目的前期运用到和嘉宾有直接关系的“道具”是很重要的。《艺术人生》作为一个成功的访谈节目，每每在嘉宾出场时候，朱军总是会不失时机地拿出与嘉宾关系很紧密的“道具”来拉近访谈者的距离，造成很好的现场访谈的氛围和效果。比如“刘欢专辑”中，开场是朱军拿出一瓶“玉泉山”牌啤酒，与刘欢对饮。这个“道具”不仅营造一个愉快的访谈氛围，而且让刘欢“回”到了他的大学时代，开始生动、真实的与朱军交流。

更加生动、形象、准确的传播信息。电视与其他媒体相比，它的优势在于它集画面、声音、文字等传播元素于一体。电视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人们首先是看电视，其次才是听电视，但是，很少有人在看电视时用严密的思维逻辑去“思考”电视。访谈节目要使得节目变得感性，要用通俗的、形象的、易懂的，非语言符号去吸引观众的注意力。“道具”运用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做到生动、形象、准确的传播信息。当我们千方百计试图通过嘉宾的生动的语言来描述表达某个过程、事物的时候，往往不如通过结合“道具”来表示。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新闻夜话》栏目在制作一期矿工遇难逃生的节目



顾明远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每到期末,各个中小学校都要评比本学期的三好学生,三好学生作为学校授予优秀学生的一个荣誉称号,是学生都希望得到的。而"三好学生"评比,俨然成为一项制度,在全国的中小学校沿袭了50年。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在上海教育论坛上呼吁,应该取消"三好学生"评选,对学生采取个性化的评比。他的这一观点一经抛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顾明远教授走进《新闻夜话》演播室,再次通过媒体,向公众阐述他的观点。顾教授认为,"德、智、体"三好学生标准本身已经违背了现在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综合发展的基本要求,更何况现在大多数学校的三好学生评比已经演变成对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的奖励,成为应试教育的一个工具。顾教授提倡对所有学生都要推行鼓励式的教育,要开展多样化的个性化评比,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使大多数学生自觉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顾教授也坦言取消"三好学生"评比并非那么容易,关键是观念的转变需要比较长的过程。他本人还会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希望能把这个提法说得更透一些。

时,在演播室里,被采访的矿工说到他们在黑暗的地底下靠吃木头等东西坚持渡过了数日,(如果接着让嘉宾描述是怎样的木头,是如何的难吃,留给观众的只是抽象、枯燥)这时,主持人指着桌上的一截烂树干说,这就是你们吃了好几天的东西。摄像在同一时间给了"道具"一个特写,矿工回答说这就是我们吃的,镜头立刻给矿工的面部一个特写,并留足了他的反应镜头。一个"道具"的运用胜过千言万语,极大的增强了节目的真实性和可看性。用生动、形象的非符号准确的传播了信息,可以说充分运用了人际传播手段来改变大众传播效果。《新闻夜话》栏目的编导在制作节目时,总是会让嘉宾尽量带上与新闻事件或是与选题有直接关系的"道具",恰当的在节目中展示出来。

笔者认为,"道具"在访谈节目中的这种作用,要从受众的角度把握和分析的。如何能让电视更好的做到"延伸受众眼睛"的功能?如何能让自己见到、了解到的信息生动、形象的变为受众需要的信息?"道具"的作用一目了然。

揭露本质,在访谈的"矛盾"中展现事件真实性和嘉宾性格。在访谈节目中,"道具"的运用是对新闻真实性的一种再现。因为事件发生的现场不能直接表现出来,在访谈过程,把相关的"道具"适时、恰当的展现出来,是对真实性的强化。访谈节目中的出镜记者应该是思辨型的主持人,能够与嘉宾有智慧的交锋。恰当的运用好"道具"往往不仅能够再现事件的真实性,而且在"矛盾"的交锋中,突出嘉宾的性格特色。《新闻夜话》在制作一期专访环球小姐的节目时,出镜记者在与嘉宾交流了比赛的信息后指出,有的媒体说你在参赛之前填写表格时候写的学历有造假的嫌疑。嘉宾在迟疑中,出镜记者迅速拿出填写的表格这样一个真实的"道具",指出具体的细节。通过"道具"带来了访谈中的"矛盾",节目在制作过程中给了"道具"和嘉宾反应镜头的特写,嘉宾的沉默和"我还是拒绝回答"都充分再现了事件的真实性;突出了嘉宾的性格特色。在制作"专访金庸"的节目时候,出镜记者在和金庸交流时候适时的拿出《金庸茶馆》等"道具",让金庸语出惊人说"金庸很俗气,很俗气,越俗越好,我俗,我有三亿读者,你不俗,那你只有三百万读者,差一点嘛"(详见 http://www.cctv.com/west/special/C10630/20030728/101328.shtml)充分显示了嘉宾的性格特色,让节目充满兴奋点。在美国 CBS 著名的新闻杂志节目《60 分钟》里,出镜记者往往能自如的运用到"道具",特别是在访谈的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迈克·华莱士在采访名人时候,往往能通过一些"道具"来展现出人物复杂的性格特色。

引发肢体信息的作用。编导都希望自己的被采访嘉宾能有出色的表现,希望他们能够全心真实地投入到访谈的过程中来,而不是"挤牙膏"式的一问一答。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嘉宾积极地参与到节目中,在谈话的过程中,不管是面部表情还是手势动作都能够真实表现出来,即嘉宾能传播真实的肢体信息。编导通过运用预先设计好的真实的、恰当的"道具",能够引导嘉宾积极地参与节目,从而达到引发肢体信息、参与结构的作用。《新闻夜话》获得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骏马奖"一等奖的一期节目《神鹿的女儿》在制作时,让嘉宾带上特有的民族服饰,结果嘉宾不仅在访谈表现出色,还衣着特色的民族服饰在演播室里跳起了特有的民族舞蹈,嘉宾的肢体信息,很好的表达了主题,使节目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运用"道具"的前提是编导、记者对选题和被采访对象的充分了解,



甘露　纪录片导演

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自编自导的大片《十面埋伏》2004 年 7 月在全国公映。自《英雄》之后，这是张艺谋导演的又一部武侠巨片。这部电影同样招致广泛的关注和各种评论。在张艺谋拍摄这两部电影的过程中，有一个纪录片创作组一直在跟踪拍摄，真实地记录了影片拍摄的大量内幕，并随电影上市，出版发行了两部纪录片《缘起》和《如花》。这两部独特视角的纪录片摆脱了一般性的电影花絮的拍摄方式，导演甘露带着女性特有的感性和忠实纪录的观察角度，向人们展现了电影背后的张艺谋和其他主创人员在一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经历的种种酸甜苦辣以及他们的思想和追求。

走进银幕背后去了解一部电影的诞生，也许从中会对电影有更深的了解。在这期节目中，纪录片导演甘露做客《新闻夜话》演播室，披露了《十面埋伏》这部电影在拍摄过程中经历的种种困难和挫折，讲述了张艺谋和他的电影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靠的是电视工作者从受众的角度分析如何制作表现能更精彩。“道具”的运用要真实、合情合理。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 “道具”的运用要注意和特写镜头的配合。“道具”本来就是电视新闻细节化的一个方面，如果“道具”的运用只是形式上的走过场，那就达不到传播效果。一般来说，“道具”应该给足特写镜头，让观众看清楚。在访谈中“道具”的特写镜头一般要配合说话内容，声画一致，及时跟上。

2. 善于挖掘间接“道具”。特别是在采访前，能够自己准备与节目相关的“道具”，做到从“道具”提问。比如，在制作关于流星雨的访谈节目时，要采访一位天文学专家，记者拿出自己准备的一个普通望远镜说，有人告诉我他们准备用这个观测这次的流星雨，这一下就激起了专家的兴趣，结果节目很精彩。这类“道具”的运用更应该从受众的角度分析考虑，运用时要合理合时。

3. 记者要把自己当成最大的“道具”，“体验型”的进入到情景中。用形象的话说，出镜记者必须和被采访对象“亲密接触”，特别在外采的节目中，通过记者在现场的活动，可以最大限度的加大新闻的信息量，增加节目的现场感。当然，通过画面加访谈同期声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做专访冰雕大师的节目时，就可以和大师一起雕刻冰。要做个风筝节的选题，记者要亲自摸摸风筝。

4. 需要指出的是“道具”在访谈节目中使用必须恰当，不可泛滥。否则容易产生作假、作秀的嫌疑。很多嘉宾带来的“道具”就应该由嘉宾展示，主持人就不能反客为主；不同的栏目有不同的特色，对“道具”要求不一样，同一个选题《新闻夜话》就不能和《艺术人生》一样的运用“道具”。

近几年，医生们被请到其他医院给病人看病的现象非常普遍，这种现象被称为是院外行医，有人说它是好事，可以合理高效地利用医疗资源；有人说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院外行医实际上就是走穴、拿红包，而实际上也确实因此而引发过一些医疗纠纷。这个现象应该怎么看？现存的哪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本期节目请了一位行业代表人物——卫生部北京医院的王建业副院长。他非常坦诚地在节目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王建业副院长的观点很明确：医生院外行医在现在的大背景下是可行的，重点是如何规范的问题。尽管现行的医疗管理制度，理论上说是不允许医生到外面行医的，但是无论对患者、医生还是医院来说，院外行医都是对医疗资源，尤其是专家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医疗市场的必然要求。需要做的是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对医生院外行医的有关问题制定规范、树立规则，以避免乱收费、逃避税收、无照行医、医疗纠纷等方面的问题。一个可行的思路是首先要改变医生只能在工作的医院注册行医，而应该允许医生到其他地方的医管部门注册，以加强对医生院外行医的合法管理。



王建业　北京医院副院长

我看《新闻夜话》

□ 崔亚卿

从事电视新闻工作不短,但是来《新闻夜话》的时是不长,提笔论《新闻夜话》内心深感不安,在这里将加入《新闻夜话》工作以来做节目的一些体会与各位交流,权当作自己反思、学习的一次机会。

一、《新闻夜话》的定位

新闻当事人和记者一对一的演播室访谈及所创造出来的新闻多元素的谈话空间,谈话的节奏明快、视角独特、话题感较强。

二、《新闻夜话》话题的选择

谈话节目的话题选择和具体操作基本上是有一定规律的,很多新闻谈话节目是相通的。那么,什么样的新闻话题是记者着重选择的呢?

1. 具有张力的新闻话题

确定一个话题,首先考虑的是话题的关注度,要站在观众的角度思考谈话的内容,不是信手拈来一个新闻事件就可以做谈话节目,因为,有的新闻事件适合现场拍摄表述,有的适合话语表述。什么样的话题更适合用来交谈?交谈哪些内容?是记者思考的关键。如:《七年追踪张艺谋》、《世界最大的骨雕展亮相北京》两个选题,经过和采访对象多次交流,记者最终放弃了第二个选题,为什么?因为骨雕艺术中欣赏的东西要远远大于谈话本身,交谈的面较窄,一个话题的张力不够。

2. 社会热点中的新闻事件和新闻当事人

毫无疑问一个大家关注的新闻事件和新闻当事人,是谈话节目优选的内容,它所产生的共鸣,在收视率那里可以得到印证。如:《人造美女的难题》,一场选美风波,把河南姑娘杨媛推到了前台,人造美女能不能参加选美比赛,组委会和当事人无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3. 时效性较强的新闻话题

《新闻夜话》以新闻为背景,加大节目时效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时效是在保证节目风格,抓住节目重点,确保节目质量为前提的情况下来完成的。如《常香玉 香常留》这期节目的记者反应迅速、及时,常香玉去世后对其家人的访谈很快的通过我们的节目呈现给观众,加大了《新闻夜话》的时效性,如果技术指标更好些,这期节目就少了些许遗憾。

三、《新闻夜话》谈话角度的把握

《新闻夜话》从敲定选题到选题的具体实施,记者考虑最多的是一个新选题的谈话角度,角度的把握是一个新闻谈话节目的灵魂。

1. 同一个新闻事件的不同落点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有的是记者第一时间的发现;而更多时候,记者要在众多的新闻事件中,去寻找适合自己节目特质、适合电视语言来传达的新闻话题,这就需要记者去挖掘同一个新闻事件的不同落点。如:著名导演张艺



冯树勇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中心副主任
国家田径总教练

在雅典奥运会上，刘翔夺得男子 110 米栏冠军，举国欢庆，同时也让世界震惊，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亚洲人能进入这一项目的前三名。田径一直被认为是白种人的运动。21 岁的刘翔改写了历史。本节目专访了带田径队出征雅典的国家体育总局田径中心副主任、国家田径总教练冯树勇，冯树勇介绍了刘翔为什么能在短短的时间取得这样大的成绩，针对运动员的科学训练方法，回答了人种的差异究竟有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也让人们对刘翔和中国田径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坦言就在喜悦的同时，奥运会的那份压力也已经来了。

谋自编自导的大片《十面埋伏》近日在全国公映，大家对张艺谋的过分关注，招致了各种各样的评论。在张艺谋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有一个纪录片组一直在跟踪拍摄张艺谋和他的电影，真实地记录了影片拍摄的大量内幕，《七年追踪张艺谋》邀请跟踪拍摄张艺谋达七年之久的纪录片导演甘露做客演播室，听她讲述张艺谋和他的电影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节目采用的这种视角比较独特，一个大家共知的新闻就有了一个较新的解读方式，在众多的新闻报道中，这个节目有了独家发言权。

2. 发掘新闻事件的未知话题

找到一个适合谈话的新闻是比较艰难的，在交谈中如果没有新的发现，做出来的节目就如同烫剩饭让人失去兴趣，挖掘未知新闻是记者重点采访的内容。如：《重新复原“张衡地动仪”》，它给记者最大的兴奋点在于新闻的再发现，原来只是知道复制的地动仪存在问题，并在国外引起争议，专家开始重新复制工作；记者和当事人接触以后，发现地动仪是国家博物馆和国家地震局联合在搞的科研课题，在前期工作中，先前的复原者王振铎先生（已去世）的女婿兼学生也介入其中，这样不但可以通过现在的人了解50年前的复制情况，还可以使人们对科研工作者的工作精神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3. 引导一种新闻观点，是记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个新闻事件的发生，到最后通过节目呈现出来，都会隐含出一个节目所要表达的观点，观点的传达有的很直接、有的比较中立、有的比较开放，无论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表达方式结束谈话，多少都会让观众从节目中感受到记者的立场。如：《取消三好学生评比行吗？》记者在传达社会对此问题不同看法的同时，还是暗合出这样一个提示性的思想：无论怎样讨论，不能引起现行教育改革的混乱，记者在本期节目中采用的是一种比较开放的观点。如《医生“走穴”如何规范》，这个话题在讨论的同时，通过谈话让观众了解市场的需求、存在的问题、政策的改变，其实最后表达出医生可以“走穴”，只是如何规范的问题，这期节目记者的观点就比较直接。如《七年追踪张艺谋》面对社会对张艺谋和他的电影的各种议论，新闻夜话的态度比较中立，用独特的视角，比较客观的来审视这件事情，从新浪网友众多的帖子中，可以看出大家对我们的观点还是接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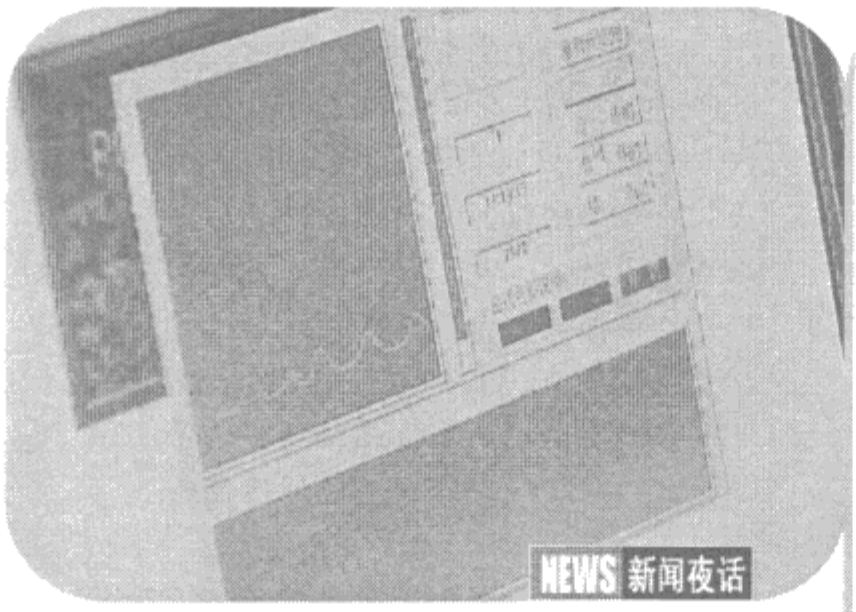
四、《新闻夜话》节目的表现形式

不同的新闻话题应该有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一切为内容服务。

1. 道具在《新闻夜话》节目中的运用

新闻谈话节目可以使用道具吗？惯常的新闻谈话节目，是不运用道具的，纵观许多谈话节目，在节目中比较淡化或不使用道具，但从众多新闻谈话节目的多样并存中，可以想见只要符合节目内容，道具的使用是可以被大家接受的，道具在谈话节目的恰当运用，会成为一些谈话节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新闻谈话节目中使用道具产生的效果如何呢？一个谈话节目的魅力，给人更多的是从谈话的交锋中得到思考，也许人们对谈话节目使用道具曾经产生过质疑，新闻谈话节目运用道具是否放慢新闻谈话节目的节奏呢？如《纳米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当谈到纳米产品和我们的生活相关时，一件纳米衬衣和纳米小汽车的出现，会加强观众对纳米功能的认识和了解，在视觉上有一定的冲击力，反而强化了节目内容。



一提起测谎仪，很多人都会想到谎言，但是“测谎高手”武伯欣却告诉记者，测谎的说法并不合适，测谎仪实际上是在测真，就是测试一个人真实的心理痕迹是什么。凡是做过一些特殊事件的人在他的心里都会留下一生都抹不掉的心理痕迹，当遇到外界的刺激时，就会从人的皮肤，呼吸和血压三个方面反应出来，这些是人不可抗拒的。

在节目中，武教授一再强调，测试准确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在人而不是在仪器，如果只仰仗仪器而不注重人的培养，造成失误就无法避免。武教授透露，利用心理测试技术他们已测试了一万多人次，区分涉案与无辜的准确率已达到98%，2%的失误也只出现在将涉案错当无辜给排除了，并不会出现将无辜错认为有罪的失误。他更坦言这种测试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有利于涉案人的。

现在心理测试技术还只是办案的一种辅助手段，它的结论可以“帮助审查，判断证据”，但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节目播出时，正值武教授新书出版，书的名字叫《心证》，武教授说，之所以取名叫《心证》，就是希望有一天，心理测试结果能够成为判案的证据，而对使用它的人也有严格地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它的科学性。



武伯欣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2. 短片在《新闻夜话》节目中的运用

新闻谈话节目运用短片是比较常见的，有的作为新闻背景的介绍，有的作为谈话节目的补充说明，有的是在强调谈话内容再现另一种场景等等。如《七年追踪张艺谋》在20分钟的谈话节目中，先后6次运用了短片，使节目的视角一下开阔起来，嘉宾的谈话更真实、更有说服力，增加了节目的可视性。

3. 音乐在《新闻夜话》节目中的运用

每个栏目都有自己的定位和节目制作要求，经常变换的是节目内容，但是，不同的节目内容，需要记者有一个灵活的编辑思路，在保持节目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尽量达到视听感觉不同的效果，这样使节目有一个伸缩发展的空间。如《彭丽媛变了》，这期节目确切地讲是音乐加短片的合理运用，光鲜、优美的画面和动听的音乐，使这期访谈节目多了一份轻松，节目的节奏看起来比较明快。

五、关于《新闻夜话》嘉宾和主持人

关于嘉宾和主持人的关系，一直以来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一个环节，主持人能否摆正自己的位置，是一个谈话节目成败的基石。

1. 嘉宾是我们的客人

新闻谈话节目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并不长，早期生硬、近似模式化的采访已经过时了，现如今《面对面》、《新闻会客厅》、《今日关注》给人们展示出一种崭新的、被大众所接受的新闻谈话节目的类型，从诸多新闻谈话节目中可以看出其节目的种种魅力，它包括：新闻与人性之间的魅力，新闻时事与新闻直播的魅力等。在一个谈话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要把嘉宾的身份摆正，《新闻会客厅》的定位从节目名称中就可以清晰的看出，嘉宾是我们的客人，《新闻夜话》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对待嘉宾就像我们的客人一样，态度是热情、真诚、平等、尊重。如《取消三好学生评比 行吗？》嘉宾是中国教育学会的会长，今年70多岁，一个从事50多年教育工作的专家不会轻易发表一个在社会上有很多争议的观点的，对他的尊重是多层次的：有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尊重，有对一个长者的尊重，有对一个为教育改革高呼呐喊的学者的尊重，在这样的基础上，节目访谈起来就比较流畅，包括我们这期访谈节目的标题都传达出我们这样的一种想法。

2. 嘉宾会成为我们的朋友

一个谈话节目是建立在嘉宾是我们的客人基础上开始的，如果嘉宾不认可谈话的内容，不认可提出的问题，情况就会适得其反；较为成功的谈话节目是在互相接纳、吸收的氛围中完成的，在碰撞中相互尊重，在谈话的交锋中比拼智慧，节目访谈结束后，嘉宾会成为我们的朋友。如《七年追踪张艺谋》嘉宾甘露是记者出身，对新闻这个行业很了解，她很直接地告诉记者："很不喜欢记者用生硬的态度来质疑的提问题，有人认为这样可以激起嘉宾讲话的欲望或者冲动，不是的；不生硬也是可以质疑的，我可能更愿意讲"。节目整个创作过程，大家合作得很愉快，嘉宾明确表示：期待着下次合作；如《纳米到底离我们有多远》节目完成后，中科院在给节目组的反馈意见中提出，希望共同策划一些有影响的选题，由此看出嘉宾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

3. 一个主持人，给人最重要的印象是专业

说起专业，主持人首先要学会倾听，倾听的过程中要有发现，这些发现是观众最想知道的内容，如果主持人的发现不及时，所提的问题就会走偏；如果主持人不专注倾听嘉宾的思想和观点，背景资料又不详实，提出的问题就很机械，与嘉宾的问题不衔接，就感到主持人





王自新 “环保狂人”

如果一项事业已经让你倾家荡产的话，你还会继续去做吗？你也许不会，但是废电池狂人王自新却一直坚持到了现在。1999 年，王自新为了建立自己的废电池回收处理厂，押上了多年的积蓄，然而厂子还没运转起来便被宣告停产，原因是废电池处理技术有可能导致污染。这一停产让他直接损失近百万元。从那以后，王自新便彻底地与废电池打起了交道。他开设了废电池回收热线，自己投资七万元印制电池宣传挂图向学校、单位免费发送。近期，又启动了绿色直通车活动，直接到老百姓家中回收废电池。

在节目中，王自新告诉我们，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志愿者，而是把处理废电池当成一项事业来做，他的目的是有一天，能够建立废电池回收、加工、处理产业化链条，既解决废电池的问题，又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从国际上来看，废旧电池的回收处理都是不赚钱的，为了鼓励私营企业回收废旧电池，各国政府采取了补贴政策。但目前国内还没有这样的补贴政策出台，这意味着王自新的处理厂做的是“赔本买卖”。这一切王自新比谁都清楚，但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目标，决定了的事就要一干到底，不管结局如何。

不专业;在平和、真诚中,用详实的谈话背景做支撑,学会发现、学会倾听,一切就大不相同。如在做《重新复制"张衡地动仪"》节目时,初次和嘉宾见面,大家就节目涉及到的内容谈了2个多小时,前期采访的记者从中了解到很多相关的知识,掌握了许多难得的背景资料;而嘉宾告诉记者:"一个记者给人最起码的印象,要具有专业素养,使我们愿意和记者交流,前不久两三家地方台的记者联系到我们,在不了解情况的同时,满口的质疑,这样的记者我们是不欢迎的"。同样一个演播室的主持人更有必要做到这一点,毕竟,主持人是一个节目的最终体现者,他(她)代表了一个节目的形象、品牌、品味、品质。

六、《新闻夜话》节目的剪辑技巧

这是一种观点的两种看法,是如何把握和使用的问题。

1. 盒子里和盒子外的关系

一个电视人要经历从躯体到灵魂的磨炼和洗礼,要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健康的身体及正常的心理卫生,在这样的先决条件下,才可以把电视作为自己的一个梦想来追逐。很多记者都有一种痛苦的经历,我的片子为什么剪不好?一个节目要想被更多人接受,首先,就要学会看待盒子里和盒子外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轻松处理的。因为,做节目都会带有个人色彩,在文人圈中,有一种说法叫做"文如其人",一个电视作品也同样有这些痕迹,特别是谈话节目,从话题的设计到提问方式,都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价值观、对事物的认知水平等等,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记者存在的某种缺陷;所以,在别人和你论证节目存在的问题时,先要问一下自己,是否改变一种思考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另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能否从自己的盒子里跳出来,到盒子外重新审视自己。

2. 拼图可以很多种,哪一种看起来更美

写到这,我忽然想起一句话"你自恋吗?"。每个人多少都会有自恋情结,因为,适当的自恋可以保持一个人的自信与尊严,记者会下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看成一个孩子,孩子当然是自己的好,这样记者对自己的节目很容易失去判断力;就跟拼图一样,它可以拼出很多种,但是,总有一种更科学、更省时、更好看的拼接方法,如果打破自己惯常的一种思维剪辑方法,接受更有效的意见,回头再看整个工作过程,你会有一种顿悟和超脱,感觉自己从没有过的轻盈和放松。

通过工作实践,我感觉:《新闻夜话》是一个学习、发现、倾听的过程。



葛强 “飞檐走壁”者

葛强，被媒体称为中国“飞檐走壁”第一人。他自幼喜好攀爬，多年来摸索出了一整套“飞檐走壁”练习方法。在2004年9月宁夏银川召开的第13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葛强进行了“飞檐走壁”的功夫表演，这也是葛强练习“飞檐走壁”20多年来首次公开表演。

表演前夕，葛强接受了《新闻夜话》的采访，他表示这回把“飞檐走壁”的功夫通过电影节这个平台展示给世人，主要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功夫特有的魅力。另外也要还“飞檐走壁”一个真实的面目，其实它并不是我们在影视片和武打小说中看到的那种被神化了“飞檐走壁”。

经过多年的实践葛强还发现，“飞檐走壁”的功夫在军警反恐、消防救护等特种行业中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葛强经常到部队进行实地讲解，根据部队特殊的楼房和墙体，有针对性地设计出了很多攀爬跨越的动作，把自己的功夫跟部队的越障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

在节目当中，葛强还特别提醒青少年，“飞檐走壁”这种功夫具有很大的危险性，还是多读一些科学知识方面的书籍，如果要是爱好体育活动的话，可以选择登山、攀岩等有安全保护措施的户外运动。

节目播出后，很多观众打来热线，表现出对“飞檐走壁”的极大兴趣。同时中央台其它栏目，以及北京、山东、湖南等地方电视台也相继制作了相关专题片，掀起了各地媒体报道葛强的一个小高潮。



葛强训练中

事件类访谈节目中嘉宾角色的多元化选择

□ 宋楠

新闻事件类访谈节目通常是让当事人成为主角，通过新闻当事人来解构新闻事件。在制作这类访谈节目时，关于嘉宾人选，在通常情况下，策划和编导最先考虑的是新闻事件中的第一当事人，这种选择符合新闻报道的特点。但是，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时，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能够在第一时间采访到第一当事人，而新闻当事人此时面对各家媒体的轮番轰炸，有时也很难愿意再而三地接受采访。在这种情况下，访谈类节目如何对受关注的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并做到出奇制胜，嘉宾的多元化选择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不仅同样可以保障节目及时播出，适时地发出自己媒体的声音，同时还可以成为对这起新闻事件一个不同的报道角度，拓展新闻视野，满足受众的知情需要。

一、从新闻事件的制造者中选择嘉宾

新闻当事人通常是新闻事件的制造者，但是并不是唯一的制造者，一切和新闻事件相关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不错的嘉宾。在这次的奥运会上，刘翔获得110跨栏金牌，完成了亚洲田径史上零的突破，他是这一事件的当事人，但是，他的教练，他的家人也是这一事件相关的制造者，在无法请到刘翔本人的情况下，编导们能否考虑把他们作为嘉宾的人选，他们的讲述有助于观众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待这个新闻事件，了解来自更多新闻背后的故事。《新闻夜话》就曾在此期间，不失时机地制作了一期《刘翔的时代》，专访了把刘翔送进雅典的中国田径队总教练，国家体育总局田径中心的副主任冯树勇，这期节目在收视表现上还是很让人满意的。

二、从新闻事件的目击者中选择嘉宾

这类节目的嘉宾通常是发生突发性的重大事件时被最先考虑的。由于有些新闻事件突发性强，新闻当事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接受新闻采访，而事件本身又具有极大的关注度，在这时节目的策划人员就可以考虑把事件的目击者作为一个信息源。记者一定要设法找到比较了解内情的目击者，详细了解当时他处的位置和观察到的细节，倾听他们回忆当时的感受，从中披露有价值的新闻事实。北大第一医院幼儿园的15名孩子和3名老师被砍伤，其中一名幼童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这起发生在幼儿园的恶性暴力事件顿时引起相当大的关注，人们非常渴望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就在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会客厅》对此事件制作并播出了一期节目《北京15儿童幼儿园遭砍》，其中两位采访的嘉宾就是事件发生时的目击者，同时还有另外一位事件发生后的目击者——现场记者。目击者向观众讲述了这起恶性事件发生时现场的情况，许多



葛修润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川平　重庆市文物局副局长

整个三峡大坝正式蓄水后，有一半以上的文物都被淹没在水面以下。为了保证库区众多地上地下的文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已经变成了最大的文物抢救的发掘现场。

三峡地区被列入国家规划的文物就有一千多处，其中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的白鹤梁题刻，不仅是国家级文物，还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然而七年以后，三峡水库建成时，它会完全被淹没在库底的泥沙里。但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葛修润的建议，却让它绝处逢生，因为在白鹤梁修建水下博物馆的方案，已经获得了有关部门的批准。

另外，我们还采访了重庆市文物局的副局长王川平，他也是三峡文物保护领导小组的组长，他在节目中介绍了关于三峡文物保护的一些最新进展情况。

信息可以说也是第一手的。

虽然这几位嘉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当事人,但却是事发现场的一双眼睛,通过他们的讲述有助于满足观众对事件的了解。[①] 西方记者报道事件性新闻时有一种惯用的模式,即便记者在场也会引用目击者或是当事人的话,以求公正,而且他们在选择目击者时也比较注意身份,喜欢从长驻居民、商店服务员和外地游客这几类人当中选择。比如路透社曾经报道过英国老百姓反对人头税引发伦敦街头骚乱的消息,记者不仅把目睹的事实告诉读者,而且采访了骚乱地区居民、商店经理、裁缝店老板和美国游客,把他们眼中的骚乱场面和感受也写进消息里,而且还借助一个游客的话说,骚乱没有减少她对伦敦的热情,把记者的观点巧妙地隐藏起来。这些思路很值得在选择事件类访谈节目嘉宾时借鉴。

三、从新闻事件的关注者中选择嘉宾

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时,关注的人各有不同,哪些人能够成为不错的嘉宾人选呢?我觉得,首先他对这个新闻事件有足够的了解,同时他有独到且权威的见解,一方面这种人往往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或学者。另一方面,他也可以是普普通通的关注者。2003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中央电视台以最快的方式报道了这一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中国军事科学院相关军事专家轮番做客央视,结合新闻事件最新发展态势,做出相关分析和解读,使观众对伊拉克战争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和了解。而事实也证明,选择这些专家作嘉宾非常成功。

普普通通的关注者看上去似乎与一个新闻事件没有任何关联,但是做好了也能不落俗套,出奇制胜。WFAA 电视台 8 频道脱口秀女皇奥普拉·温弗莉的脱口秀节目《奥普拉·温弗莉访谈》在美国有 2200 多万观众,并向全世界 107 个国家进行转播,"9·11 事件" 发生后,美国许多电视台纷纷对此加以报道,很多电视媒体把"9·11 事件"中的消防员或者幸存者邀请到演播室。然而奥普拉·温弗莉则是另辟蹊径,以"你如何对后代谈'9·11 事件'"为题采访一些普通的美国民众,通过对普通民众的采访,来向受众展示在"9·11 事件"发生后,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一事件的。观点和想法深藏其中。节目播出后,立刻引起很大反响,在业界也被津津乐道。

当然嘉宾的多元化选择并不是仅仅拘泥于上述三方面,它需要节目策划人凭借自己独特的新闻敏锐性去发现和寻找。总之,新闻事件发生时,策划者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在目前的这种媒体环境下,新闻人物对媒体也是有所选择的,而同一张脸频繁出现在不同的频道、不同的栏目也难免会让观众产生视觉疲劳。对于嘉宾,这种多元化的选择并非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而是战略调整的需要。这就比如一场攻城的战斗,不管是从正面进攻,还是侧面进攻,还是多面进攻,只要能把城池攻下就是胜利。作为媒体,我想无论是采访第一当事人,或是采访事件的其他关联人物,只要能及时准确地为受众提供多角度的信息,满足受众的知情需要,就不会有负媒体的责任。

①刘刚《新闻价值的判断与表现》新华网 2003 年 8 月 5 日



白明生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主任设计师



肖业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飞行器系教授

2002年12月30日，由中国自己研制的“神舟”四号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并成功地进入了预定轨道，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四次飞行试验。第二天晚上，《新闻夜话》播出了有关“神舟”四号飞船顺利升空的一期专访，采访的是曾经参与过“神舟”系列飞船有关课题研究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飞行器系的肖业伦教授，并电话采访了亲眼目睹飞船升空一幕的新华社派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记者曹智。4天后，2003年1月4日23:30分，在“神舟”四号飞船顺利回收刚刚4个小时后，我们在最短时间内又播出了一期有关“宇宙飞船是如何回收的”深度报道，专访的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主任设计师白明生，他本人就是“神舟”系列飞船的主任设计师，曾参加过“神舟”三号飞船的回收。

肖业伦教授专门带了一个“神舟”系列飞船的模型来到演播室，拿着这个模型，肖业伦教授介绍了由中国自己研制的“神舟”系列飞船的各部分的功能和特点，怎么才能达到载人飞行的要求，以及此次飞行的任务。

白明生设计师在采访中介绍了“神舟”飞船回收的过程以及预防意外发生的方方面面保障措施的细节，可谓百密不疏，他还提到：“这个飞船进入到大气层，会引起飞船表层的剧烈地摩擦和燃烧，表面温度可能会达到上千度。但是因为它有防热层，这样可以保证航天员在里面，有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最高的时候，也就是30度左右。”

寻找“接近点”

□ 杨燕怡

《新闻夜话》是以访谈形式客观深入地报道新闻，它将电视化的手段减到最少，在20分钟的节目中，主要的形式是主持人与嘉宾一对一的交流。节目涉及的采访对象从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到普通农民、学生等等，形形色色，只要他是新闻的当事人，就可能走进《新闻夜话》的演播室。因此我们每天都要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要采访必然要接触人，首先面对的困难就是：如何接近采访对象，使他们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记者对于不同身份、地位、职业的采访对象都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能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过于盛气凌人，也不需要对官员名人卑微恭谦，显得低三下四。前期采访态度分寸的把握对于演播室正式采访的结果至关重要，这也是记者“接近”采访对象的一个基本修养。特别是第一次与采访对象接触时，要让人感到亲近、平等，这样对方才愿意向你介绍情况，甚至把心里话说给你听。如果一见面就让人感到不好接近，或者目的不友善，采访对象自然就会产生心理障碍，处处防范，这样很难向你说出心里话，甚至会用官话、套话、假话应付采访。因此前期采访时的第一印象十分关键，也是“接近”采访对象的基础。

然而很多情况下，被采访者也会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配合记者采访，以致双方很难沟通，甚至妨碍采访的顺利进行，影响下一步节目的录制。要解决这个问题，记者还要掌握一些“接近”的技巧，尽快地找到与采访对象的契合点，快速有效地拆除两个陌生人之间的心理“屏障”。

一、寻找心理上的接近点

从表面上看，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是有求与被求的关系，即记者有求于被采访者提供新闻素材，讲述新闻现场。实际上，这种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应该是相互的，有的被采访者也希望通过在电视亮相表明自己的观点，或者澄清一些新闻事实，需要一定的话语权。所以说，后者也是有求于前者。这就容易形成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在心理上的接近点。

2002年8月北大山鹰社登山遇难事件震动全国，这是我来《新闻夜话》后参与制作的第一个选题。当时准备采访北大登山队的队员，但由于队员们刚刚经历了山难，痛失队友，心理负担很大。再加上各种媒体都在争相报道此事，众说纷纭，争议、质疑的声音铺天盖地，全社会的焦点一时间都集中在北大登山队身上。而北大队员们则始终回避一切采访活动，这使我们的采访计划很难进行，我最初的联系工作也屡次被婉言拒绝。但是面对这么一个很难得的选题，就轻易地放弃很不甘心。

大学生登山活动今后肯定还要继续，如何最大化的规避风险，积极地解决问题，认真地反思教训，避免悲剧重演，这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一个有良知的媒体的责任。于



2004 年 2 月，《新闻夜话》在辽宁省抚顺市的雷锋纪念馆走访了雷锋生前最亲密的战友乔安山。雷锋纪念馆从建立到现在刚好整整 40 个年头，雷锋生前所在部队的驻地，距离这个纪念馆大概只有 15 公里。

乔安山的家里有一张照片，是他和雷锋的合影，乔安山一直把它挂在自己的屋子里，四十多年了，乔安山每天都要看上几遍，“看到他就有一种亲切感，就像他总是活在我的身边，我要把这张照片当成我的一面镜子，就是我怎么去做人，做好人。”乔安山说，“你比如说，我受到委屈什么的，我要看到这张照片，我就能化解，我接下来还要怎么去做。像我有的战友说，您这个照片，别挂在显眼的地方，看着你心里不难受吗？虽然我难受我还得挂，他（雷锋）一刻离不开我，他（雷锋）与我的生活相连。”

乔安山在采访中介绍了他这几十年学雷锋的经历，有快乐，也有被别人不理解的苦涩，曾经几次被人冤枉，甚至是讹诈，有一次还差点被逼上绝路。但是，“应该说我是在为人民服务，做了一些好事，但是还不够，还得继续去做。我这六十年没有遗憾！”乔安山说。



乔安山　雷锋的战友

是我继续寻找新的突破口——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王登峰，王书记当时一直在前线负责登山队山难事故的指挥救援工作，他对登山队情况非常熟悉。经过几次交流，记者了解到其实北大校方和登山队员们此时也很需要一个说话的机会——澄清社会上一些不实的报道和传闻，同时也给所有关心北大登山队的人们一个交代。由于记者制作节目的初衷和采访对象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也就是找到了与采访对象心理上的接近点，所以接下来的采访工作就得以顺利地进行。在王书记的帮助下，队员们终于同意接受采访，这是北大登山队山难归来首次接受电视专访。节目录制很成功，播出之时正值事发一个月，取名《北大登山队山难月祭》，影响非常大。

其实，要想准确地把握住这种心理上的“接近”，有时需要记者采取换位思考的方式。你不妨站在采访对象的立场上多想一下，面对媒体和公众，他都会产生哪些顾虑，或者是为难之处。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逐一打消，使采访对象尽快消除心理障碍，配合节目的制作。

1. 激将法：可以把社会上的舆论婉转告诉被采访者，适当给予其压力，使其产生“拨乱反正”的念头，觉得站出来表明观点极为必要。

2. 回避法：将本期节目制作的目的直接明确地告诉被采访者，尊重其隐私，双方可以共同把握其谈话尺度，一定要让被采访者知道你的报道动机是善意的。

二、寻找地理上的接近点

由于题材广泛，我们的采访对象也是来自全国各地。这时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地域上的优势，也是能够缩短记者和采访对象在沟通上的距离。这种作用对人们心理上影响是很微妙的，毕竟同乡故里乡音往往都会使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很快亲近起来。

三、寻找兴趣上的接近点

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或者兴趣，这些通常都是擅长、体会、心得最多的地方。采访者如果能准确地捕捉到这些信息，用自己相同的兴趣话题引起采访对象的共鸣，就容易形成一个志同道合的轻松氛围。采访对象也会很自然地消除本能的防备心理，最大限度地向记者敞开心扉。这在前期采访时，对于记者掌握更多新闻细节，了解采访对象内心世界非常重要。

例如在制作2004年国庆特别节目，采访扮演刘伯承的特型演员傅学诚时，真正的交流就是由傅老收藏爱好开始的，接着又谈到了他老北京满族人的家庭背景。而这些爱好和背景又恰好与记者的父亲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双方聊得十分尽兴，甚至傅老还破例带记者参观了他的收藏室。

“现在最想演的就是老北京的戏！”傅老进而向记者袒露了自己的心声，“其实一生大部分时间只扮演一个角色，作为演员确实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可以说也是一种奉献。”这时一个真实的特型演员形象就活脱脱地出现在眼前了，他们除了荣誉以外，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也有遗憾，这些可能是常人所不能想象的。

这种对内心世界的真实展现，突破口就在于记者捕捉到了采访对象爱好上的兴趣点，从而带出了他的“心声”，而这些是需要在采访前对资料的充分掌握，筛选出有用的信息。

四、寻找经历上的接近点

记者如果能从采访对象身上寻找到与自己相同的经历，特别是对采访对象来说比较有



冯锐　中国地震局地震信息中心研究员



李强　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

张衡作为我国东汉时期杰出的科学家，他所制作的地动仪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地震的发生及其方向，比欧洲最早的地震仪要早一千七百多年。这是我们中国人引以自豪的一项古代科学成就。但是历史并没有留下张衡地动仪的原貌，大家现在熟知的张衡地动仪的模型是我国考古学家王振铎先生五十年以前复原的，而现在，有一些地震学家对这个模型的内部结构提出了质疑，并且正在做着重新复原的工作。《新闻夜话》请来了两位从事和关注这项工作的专家：一位是中国地震局地震信息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冯锐先生，另外一位是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李强先生。

出于民族的责任感和科学探索的精神，冯先生开始进行重新复原张衡地动仪的工作。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推翻了原来的直立杆的结构，而代之以更加符合科学实际的悬垂摆。王振铎先生的学生，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李强也热情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50 年后重新复原张衡地动仪，他们有了更加丰富的资料和更加科学的技术手段。

本片拍摄后不久，国家地震局将重新复制地动仪的科研工作正式立项。

意义的经历，双方就很容易产生相互间的情感交融和心灵撞击产生的共鸣。有时我们的阅历还比较浅，很难与采访对象有相同的处境，于是寻找身边与其有相似背景的人也会起到同样的效果。

在制作《“神舟”四号飞船返回》节目时，我们请的嘉宾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专家。由于是赶制的一期节目，当天录制当晚播出，嘉宾也是上午才确定下来的，录制前嘉宾一直很紧张。于是在化妆的半个多小时的交流看似漫不经心，实则非常有助于稳定采访对象的情绪，而且这个交流的过程对于下面的访谈也很必要。

由于记者家里有航天系统的亲友，所以聊天的话题也很自然地从这里开始。专家从这位亲友所在的单位，谈到航天各所不同的工作任务，再到前几次“神舟”系列飞船的研究，越说越兴奋。“您看您还担心什么？这不都是您熟悉的领域吗？我们的采访话题也都是围绕着您日常工作经常接触的这些展开的？”听这么一说，嘉宾也笑了。

这时演播室一切准备就绪，嘉宾很快就进入状态，非常配合主持人的提问，给大家讲述了许多“神舟”四号飞船不为人知的故事。这期节目在当晚“神舟”四号飞船返回四小时后播出，创下了时效性最强、反应速度最快的记录。第二天许多平面媒体和重要的门户网站都转载了该期节目的文案。

五、寻找见解上的接近点

俗话说“英雄所见略同”，在交往中，人们往往会因为对某一问题看法和见解相同，而一见如故。在采访中，如果记者能和采访对象找到共同的话题，就等于找到了一条通向被采访者心灵深处的捷径。

当然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的“接近点”在很多方面还可以找到。这就需要我们在前期采访时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很多“接近点”都来自于大量的背景材料中，一定要认真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捕捉到一些生动的细节。

采访归根到底是与人打交道，即必须研究采访对象的心理，营造出一个有利于采访的氛围，这是决定记者采访成败，效率高低的重要环节。因此要尽量“接近”我们的采访对象，使自己成为“期望的目标”，而不是“应回避的目标”。

沙漠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根据中国近20年来土地荒漠化的速度来看，在30年之后，我们国家40%的土地都将会变成一片沙漠。目前世界荒漠化的土地面积几乎是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加上中国所有的国土面积的总和，土地荒漠化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法国水利专家爱迪博士几乎用了一生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他成功地在沙漠当中种出了小麦，同时也因为他在防治土地沙漠化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了联合国水利开发署的奖章，以及法国政府的最高荣誉骑士奖章，在2003年9月23日他来到了北京，在短短四天的行程当中，接受了《新闻夜话》栏目的独家专访。谈了他对治理荒漠化的一些研究成果，呼吁高度重视对水资源的保护和科学利用问题。



爱迪　法国水利专家

电子智能水资源利用技术成果图



构筑《新闻夜话》的谈话语境

□ 崔亚卿

作为一档新闻谈话类节目，挖掘和传递观众感兴趣的新闻背景固然是《新闻夜话》栏目立足的根本，但同样不能忽视构筑节目内在的谈话语境，使节目所传播的内容，更容易让观众理解和记忆。节目的记者和主持人，不但要以敏锐的新闻眼光去挖掘谈话的要害和深度，同时还要在采访预约、前期采访、演播室访谈的各个阶段，完成与被采访对象的短时间的磨合，共同营造与节目内容对应的合适的节目“气场”，也就是谈话语境。

谈话节目是各类媒体都常用的新闻报道方式，从受众的接受心态来说，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受众的关注点是采访者的提问角度和被采访对象提供的新闻背景、本人的观点。广播媒体增加了谈话过程中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双方的语气，使听众能够通过声音所传递的语气、情感等“额外”的信息，进行经验性地判断，从而提高对谈话内容的准确把握，增强了信息传递的真实性。而电视媒体更是把谈话的过程真实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观众不仅在聆听，同样也在注视谈话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所以，谈话双方的环境、语气、语速、神态、表情等元素共同构成的谈话语境，就是谈话节目电视特征的最重要的体现方式。离开对谈话语境的正确构筑，不但会使观众感到不舒服或者单调、乏味，甚至有可能向观众传递错误的信息。

谈话语境的构筑既为节目的定位和风格服务，同时也是构成节目定位和风格的重要元素。包括演播室布置、主持人提问的风格、谈话的节奏、节目包装等构成语境的各个方面都应该建立在节目标志性的定位和风格基础之上，使节目从内容到形式上，形成风格化的统一，这样才能与目标观众群形成一种长期的约会关系，保证节目的收视率。

谈话语境的形成最重要的阶段当然是被采访者走进演播室，接受主持人访问的过程。但事实上，谈话语境的构筑是在四个阶段共同完成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求节目记者具备良好的新闻采访素养和节目的整体意识，尤其是怎样完成与被采访者的短时期的磨合，更需要节目记者与主持人之间的默契和统一。因为被采访者是构成整个节目谈话语境的要素中最不确定也是最难于掌控的一环。

第一阶段　赢得采访机会——与被采访者的第一次接触

在确定了一个节目选题之后，作为节目的前期采访记者，要完成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新闻当事人或者是最适合对选题内容发表言论的人，取得他的同意，接受主持人的采访。在使用所有可能的赢得采访机会的技巧过程中，记者不能忘记，这个阶段是让被采访人了解和接受节目访谈方式的最重要的阶段。记者应该如实地向被采访者描述节目的关注点和风格，这样的描述还应该与事后被采访者走进演播室，接受主持人的采访保持基本一致。虽然后



欧阳予　中国科学院院士

未来中国那些缺电的地方都有可能会用上一种新的能源就是核电，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规划，要在未来16年里新建30多座核电站，这是过去的20多年当中已经建成核电站总数的4倍。去年国内许多城市都爆发了电荒，主要是在夏天和冬天，老百姓的生活和工业生产都是受到了严重影响，两次电荒以后许多地方开始要求发展核电（建设核电站用核能来发电），但是与此同时，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却都在放慢自己的核电发展速度。有预测说，未来20年全球的核发电能力将会下降一半，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选择大力地发展核电？核电究竟是不是安全的？

这期节目取得了相当高的收视率，除了采访比较成功以外，主要还是题材取胜——观众对核技术有着天然的好奇，但是以前能清楚说明相关内容的节目又比较少，所以本期节目的嘉宾是否有足够的分量，也是能出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请到了中国科学院的欧阳予院士，他是我国著名的核能专家，曾经担任过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总设计师，他的权威性也为节目增色不少。

来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并非完全不能接受，但最重要的是，让被采访者在这个阶段起，就有在节目构筑的语境中，真实而坦率地说出自己掌握的信息和观点的心理准备。

不要认为，只有最后播出的节目，才是节目风格和理念的体现。节目记者与被采访者的第一次接触，实际上就是彰显节目风格和理念的开始。被采访者往往会根据与节目记者的第一次接触，来决定自己是否接受访谈要求以及以什么样的态度来接受即将到来的与新闻媒体的对话，而这一态度会直接影响到谈话语境的形成。如：《新闻夜话》的一期节目《医生"走穴"如何规范》，这个选题显然是一个针对性很强又比较敏感的话题，新闻背景本身已经是中国四家大医院的院长在谈各自的观点，节目的关注度较高。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四家大医院的院长之一，卫生部北京医院的副院长王建业。电话预约嘉宾能否接受我们的前期采访的期间，就要用合适的语言来描述节目的形态和录制节目的目的，嘉宾是在认同我们的观点并且很乐意的情况下，实施下一步工作的。

第二阶段　前期采访——谈话语境的初步形成

为了向主持人提供必要的访谈资料，大多数情况下，节目记者需要对被采访者进行前期采访。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对演播室访谈的一次演练，也是谈话语境初步形成的过程。这个阶段记者除了要完成深入调查主题、细化访谈提纲之外，还应调动被采访者接受采访的积极性，帮助他确立正确的心理预期，去接受主持人的采访。需要注意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不要将所有问题的细节对被采访者和盘推出，因为这会使被采访者在演播室接受采访时，感觉是在重复自己说过的话，削弱他向新闻媒体表述的冲动和热情。让他明白问题可能涉及的层次和深度就可以了。作为一个技巧，记者甚至可以刻意为被采访者设计一些悬念，提示他我们的主持人可能会怎样，增强他与主持人交流的冲动。第二，记者要对被采访者的性格、谈话特点、心理特征、对话题的敏感程度有一个准确的评估，这是为主持人准备的。在进入第三个阶段之前，记者除了要交给主持人背景资料和采访提纲之外，一定要将这些评估的结论与主持人充分沟通，帮助主持人合理地运用不同的访谈技巧，来构筑良好的谈话语境。

此外，在这个阶段，记者还应该考虑是否应该为谈话语境的完善而做一些其他准备，比如是否需要为谈话节目拍摄一些必要的新闻背景资料，是否应该让被采访者或者主持人准备一些辅助说明的道具等等。如：《新闻夜话》"十一特别节目"《闪闪的红星——我扮演了陈毅》，嘉宾是武汉话剧院的演员谷伟。记者首先利用采访对象在上海拍戏的空隙，前后有3次长时间的谈话，从年龄、经历、谈话语气来分析判断他对问题的理解能力和语言特点、脾气性格，基本上把节目所涉及的问题了解的比较清楚，同时调动嘉宾的积极性，让嘉宾主动回忆自己在创作这一人物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有意思的故事，在故事的里面又有哪些有趣的事发生。由于前期沟通得比较好，主持人的问题甩出去之后，基本上达到预期的效果；由于前期准备的比较充分，这样就出现了演员在讲述将军本色是诗人、陈毅是书法家的时候，告诉观众他为了扮演好这个角色专门练起了书法并拿出了自己习练的作品现场朗诵起来，整个谈话气氛很鲜活又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观众看起来真实、可信。所以，前期采访为第三阶段主持人的访谈打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地方戏曲组团进京演出，一向被看成是地方戏走向全国的开始。2004年春节前，吉林省二人转剧团进京拜年演出，成了那段时间北京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因为这是二人转这种地方戏诞生300年来，第一次组团进京。近年来，东北二人转火爆的速度让人惊叹，在东北，看二人转的人数超过了电影，甚至有的电影院干脆改装成了戏院。在全国，已经有超过20个省市向二人转剧团发出邀请。这和整个戏曲界的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年以前，中国有文字记载和演出活动的剧种还有394种，但现在还在舞台上演出的，只有100多种了。二人转的兴旺发展，在戏曲界可以称得上是一枝独秀了，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其它的地方戏可不可以借鉴呢？我们通过专访二人转剧团的两位主力演员得到了答案。他们一位是国家一级演员韩子平；另一位是民间艺术家翟波，今年已经50岁了，但是唱二人转已经38年。



翟　波　二人转民间艺人(左)
韩子平　国家一级演员(右)



韩子平表演现场

第三阶段　主持人访谈———谈话语境的形成

当被采访者走进演播室接受主持人访谈的时候，就是电视台、电视记者、电视节目主持人与被采访者一起，共同在一个谈话语境之下，完成电视节目摄录的过程。主动权交给了主持人，一个让被采访者熟悉环境，摆脱陌生感的过程是必须的。因此在这个环境里，所有的人都应该注意细节，要让被采访者有一种平等对话的感受。在这里，主持人先向被采访者提出一些极易回答的“暖身”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尽管在最后播出的节目中，不一定需要这些内容，它的主要作用是将被采访者带入谈话的语境，让他顺利地进入谈话的状态。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主持人在观众面前显露的“态度”，即他关注的角度、提问的用语以及他的神态、表情。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主持人是代表观众对事实真相的追问者。对不同特征的被采访者，主持人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但绝不能让观众产生“不对等”谈话的感觉，尤其是将被采访者请到电视台的演播室，主持人更应该有“主人”的一种宽厚的心态，并让观众认同和接受你的态度。如：新闻夜话《七年追踪张艺谋》，嘉宾是一位年轻的纪录片女导演甘露，此节目的新闻背景是在电影《十面埋伏》热映之前，除了制片方对外统一搞的大型宣传活动以外，对任何媒体不发布与之相关的消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联系到甘露，让她从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角度去解读张艺谋和《十面埋伏》以及背后发生的故事。七年的跟踪拍摄是一个不短的时间，在这七年中，张艺谋经历了哪些事情，有哪些变化遇到哪些问题，一个女导演从中得到了什么等等，无一不是观众想要了解的。主持人并没有就怎样评价《十面埋伏》，怎样评价张艺谋与嘉宾进行辩论，而是在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下，引领嘉宾客观、真实地讲述她所了解的、她所感悟的东西。主持人的态度是记者态度的一个延续，主持人的话题是记者和嘉宾前期交流的一个延续，在互相碰撞、语态衔接得很好的前提下，在一个有节目特征的谈话环境（演播室）中构筑出一个话题的较为完整的语境。

第四阶段　节目剪辑和包装——谈话语境的完善和强化

《新闻夜话》作为一档非直播的新闻谈话节目，有条件利用节目的后期剪辑和包装，来进一步完善谈话给观众呈现的语境，并通过强化语境的效果，来提高观众收视的兴趣和心理享受。如：《医生走穴如何规范》用大量的质疑、存在的医疗问题来和嘉宾交流；《闪闪的红星——我扮演了陈毅》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嘉宾充满激情的谈话来强化节目特色；《七年追踪张艺谋》用鲜为人知的《十面埋伏》背后的故事呈现给观众一个更加立体的电影故事和电影导演。对不同内容的节目应该有不同的剪辑节奏，而节目的分段导视和适当的新闻图像素材的运用也是强化传播效果的有效手段，其他如现场道具、音乐等手段也可能在某些节目中得以运用。总之，通过最后阶段的努力，“谁在问”、“谁在说”、“问什么”、“说什么”、“怎样问”、“怎样说”，这些被观众注视的新闻谈话节目的传播要素，在节目的定位和风格的统领之下，在节目记者、主持人和嘉宾共同参与的谈话语境构筑的过程中，形成独具电视特色的节目。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将整个节目的运作作为一个系统来加以完善，才能够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新闻谈话节目中吸引观众的注意，满足观众的收视需求，提高节目的收视率。



汪俊英　北京朝阳医院医生



姜垣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

2004年世界无烟日前，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和北京朝阳医院共同开设了中国内地第一条戒烟热线。而中国无论是烟草生产还是吸烟量，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分别占到全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根据统计，中国现在有3.5亿烟民，其中想戒烟的有20%，但是最后能够成功戒掉的寥寥无几。那么这条戒烟热线能给他们多大的帮助，我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控烟条约以后，吸烟者会有哪些变化呢？本期节目专访了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的副主任姜垣和北京朝阳医院的汪俊英医生，后者是戒烟热线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我国仅有的几个专业戒烟医生之一，并在演播室现场举例，进行了尼古丁依赖程度的测试。

山重水复中的柳暗花明

——新闻角度浅析

□ 刘 进

角度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出发点,出发点不同,人们思维的指向就不同,注意到的侧重点也就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就是由于观察者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同一事物呈现出的景象也就截然不同。自然现象如此,社会现象也包含着类似的道理。人与人思想交流的核心就是看问题角度的交换,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到现代的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许多人一直在研究说服学。新闻角度是记者报道新闻事物的出发点,以及由此看到的新闻事物的侧重点。

有这样一个故事,两个鞋厂的推销员同时被派往一个孤岛上进行市场调查,两个人到达小岛后发现当地人都不穿鞋。甲很沮丧,给工厂发回电报说:“这里的人都不穿鞋,没有市场。”乙却兴奋地在电报中写到:“这里的人都不穿鞋,有很大的市场。”同样的情况,同样的目的,由于认知的角度不同,两个人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甲用孤立的眼光就事论事,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乙却用辨证的眼光分析事物,从“无”当中看到了“有”,得出了乐观的结论。生活中类似的例子很多,反映在新闻报道中,由于角度的不同,经常会导致报道出现很大差异。

到底是什么在影响新闻报道的角度呢?选择什么样的新闻角度,看起来像是记者完全掌握主动的行为,仔细分析却不尽然。面对具体新闻事件,记者报道时从哪个角度入手,反映哪些问题,实际上时时处处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记者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它们的影响。首先是客观因素:

1. 受众需要

客观因素方面最明显的莫过于受众需求。选择新闻角度是为了更好地开掘事物的新闻价值,新闻价值的核心是满足受众需求,所以新闻角度的实质是为受众服务地。某一角度能否吸引广泛地受众,应该成为鉴别新闻角度优劣的重要标准。

2. 政策取向

政策取向是制约新闻角度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新闻选题阶段,政策因素规定了必须报道哪些内容和不能涉及哪些内容;在新闻角度阶段,政策因素主要规定了一些特殊题材的角度取向。

3. 媒介和栏目定位

分析制约新闻角度的客观因素会发现一篇报道的角度取向与刊载该报道的媒介或栏目特点密不可分,新闻报道的角度要体现媒介特点,服从栏目定位。

主观因素:

除了外在客观因素外,影响新闻角度的还有来自记者主观方面的因素。面对同一新闻事物,不同的记者选择的报道角度可能会明显不同,这种情况在新闻报道中司空见惯。分析影响记者选择报道角度的主观因素,会发现其中的因素比较复杂,记者的思维习惯、心理状态、

一年一度评选出来的环球小姐，被公认是世界上最美的女性；这样的人只有具备了三个条件才能成为女性美的典范：品德高尚，聪明、才智，当然还有美貌。在2002年年的9月23日，环球小姐的冠军，俄罗斯的一位女大学生，因为种种的原因被宣布剥夺了桂冠，但是现在第三名的桂冠也出现了危机，她的获得者是中国的上海姑娘卓灵。

在2002年的5月31日，波多黎各举行的2002年环球小姐的大赛上，这个只有19岁的上海姑娘，夺得了第三名，这个结果马上就让卓灵成为中国女性美的代表，这个环球小姐的季军出席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公益活动，同时主要还是商业活动。当然她也成为了很多女性争相效仿和学习的代表。但是后来，关于这位美的使者的各种质疑和不信任越来越多，而且还有一家跟她签约的公司，准备起诉她。

《新闻夜话》拿到了第一手资料，从那家签约公司得到了卓灵报名时亲手填的报名表等一系列文件，大大增强了节目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卓灵 2002年环球小姐



生活阅历、知识经验，价值取向，以及气质性格等都可能对选择报道角度产生影响。用一个心理学词汇来概括，就是这些诸多因素形成了每个人特有的认识结构，记者选择新闻角度的过程，实际上是把新闻信息纳入自己个性化认知结构进行再加工的过程。

新闻角度是报道的出发点，是记者对客观事实新闻价值定向思考的结果。对受众来说，新闻角度的意义在于，通过新闻作品中的角度可以引导受众认识事物的新闻价值所在。我们知道了影响新闻角度的各种因素，那么我们应该选择角度呢？

再来听一个真实的例子：某记者接到一位消费者投诉，说他花2500元买了一台日本“松下”录像机，刚过保修期就发生了故障，到北京唯一的指定维修点去修理，维修人员告诉他修好这台录像机至少要花1600元钱，消费者觉得收费太高，怀疑维修点有欺诈行为，于是记者和消费者一起来到维修点，面对消费者的不满，维修部门负责人义正辞严地说：“现在讨论的问题不应该是我们有没有欺骗你，而是我们的收费价格是否有依据。”说完就拿出各种零配件的进货价目清单，以及维修收费标准，并对消费者的指责进行了针锋相对地反驳，最终说得消费者哑口无言。事已至此，观众和消费者都有山穷水尽之感，不知记者该如何收场，但记者此后的补充采访和评论却令人拍案称奇。离开维修点，记者只向消费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对维修部的解释怎么看？”消费者除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外还说：“今后他们的什么产品我都不会买了，而且我还要建议我的亲朋好友都别买，免得像我这样自讨苦吃。”接下来主持人评说：“树上有十只麻雀，开枪打掉一只，树上还剩几只？正确的回答是一只也不剩。商家和消费者的关系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而是鱼和水的关系，松下维修部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是胜利了，但他们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失败者。”

这篇报道在对新闻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过程、结果的交待并无特殊之处，但在价值分析层面并没有把自己等同于当事者或普通观众，而是跳出了可能被具体事件“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以独特的角度，更大气、更具全局性的目光分析事件，给人以茅塞顿开之感。足以说明角度在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性。

突出、快速、趣味是受众对选择新闻报道角度提出的基本要求，选择新闻角度应该在充分体现新闻价值的原则指导下，突出最有价值的信息，减少冗余信息，提高受众接受兴趣。最后说说几种独特的角度：

1. 以小见大

一个重大的选题，或者很有价值的重大事件，记者直接报道可能不容易把握其内涵，如果选择一些有说服力的具体事实，通过细小的、却又很典型的事实反映大事件或问题，就会变得生动、深刻而且具有说服力。

2. 以大观小

以大观小角度与以小见大角度是逆向的，现实中的一些具体事件，如果孤立来看，它的新闻价值可能不容易被发现，如果把它放到宏观背景中去考察，其新闻价值可能就容易显露出来。

3. 对比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即使一个鉴别能力很差的人，如果把两件有可比性的东西放在一起，他也能很容易分出优劣来。新闻报道也包含着同样的道理，一件事物的新闻价值不明显，把它和相关或相似的事物比较一下，其差别就会显现出来，而这差别点往往



柳芭　鄂温克画家

这是《新闻夜话》栏目开播的第一期节目，与第二期节目——它的姊妹篇《最后的狩猎部落》同时获第九届全国电影电视骏马奖一等奖和二等奖。

这两期节目关注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生态移民后的生活与命运。这是一支神奇的部落，从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现在，生产方式也将在短时间内彻底地改变——这个部落从丛林里搬出来之后，要在政府为他们建设的市镇中生活。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柳芭，鄂温克第一个女大学生，她走出山林，走进城市，又走回山林，回到家乡，她的经历最能说明社会巨变给山林的子民造成的冲击。

在这里一定要提的是：在这期节目播出后不久，我们的嘉宾，“神鹿的女儿”柳芭不幸在家乡丛林的溪水中溺水，永远离开了我们。《神鹿的女儿》是柳芭在电视上留下的最后身影，成为她的“绝唱”。

后来栏目赴山东济南领奖前特地把柳芭的女儿和丈夫接到北京，再共赴济南，一起见证栏目和柳芭共同的荣誉。

栏目还决定，赞助柳芭的女儿完成基础教育，栏目全体人员更是纷纷解囊捐款。

我们只是在实现我们的承诺——做有责任感的电视人。



纪录片《神鹿啊神鹿》剧照

最能体现事物的新闻价值。

4. 对立

对立角度是对同一事物中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进行平行挖掘的角度。对立角度和对比角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比是对两个不同事物的相互比较，它以揭示两个事物的区别为目的，只要有可比性，即使两个事物没有实际上的联系，也可以进行比较。对立角度则不然，它是对同一事物内部两个对立面的比较，这两个对立面存在着实质性的联系，两者之间应该有矛盾，有对立，甚至有冲突。

5. 突出特色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性，最能体现事物特殊性的地方，也往往是人们感兴趣的、最有价值的信息。突出特色角度要求记者报道新闻时，不要面面俱到地什么都说，而是要善于捕捉事物的个性特点，并突出予以报道，让人对该特点留下深刻持久的印象。

6. 逆向思维

某个事物有没有新闻价值，有时候打破思维惯性，从相反的角度去思考，可能会有更大的收获。逆行思维是根据惯性思维进行反向思维，它是角度创新的重要途径。当从习惯思维出发，发现不了事物的独特新闻价值时，不妨从相反方向想想，也许会有更大收获。



朱进 北京天文馆馆长

2004 年 4 月份我国最早记录的流星雨——天琴座流星雨爆发,《新闻夜话》栏目专访了国家天文台小行星项目组组长,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博士。朱进馆长全面介绍了流星雨是怎样形成的,描述了流星雨出现的各种绚丽景观,如流星暴雨等,以及如何去观测流星雨等。节目中展示了朱进自己拍摄的狮子座流星雨爆发时景观,还介绍了一些天文奇观,既有知识性又有可视性。

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外观形象与自我表达

□ 黄 刚

随着电视事业的飞速发展，以主持人形式出现的各类节目如雨后春笋般方兴未艾，得到广大受众的认可和接受。究其原因，就是主持人形态的节目符合大众传播的规律，顺应了受众要求双向互动的收视心理。那么，作为电视节目主持人如何达到更有效的传播效果，外观形象与自我表达就显得尤为重要。

主持人是节目的灵魂，是节目信息传播的终端载体。信息能否有效、准确地传递到受众，主持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由节目的表现形式决定的。按照传播学理论，电视节目的播出过程属于大众传播的人际传播，人际传播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相互认知。相互认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希望对方能够充分地了解、理解自己。作为电视节目信息传播的最后承担者，受众，也就是观众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持人的外观形象是否到位，自我表达是否充分。

首先，我们来谈一下主持人的外观形象。这里所说的外观形象不是狭义的长相，而是一个人的整体形象。它既包括身高、体形、脸型、发型等体貌特征，也包括通过服装、饰物及随身携带品的使用等形成的氛围特征。它是构成一个人气质的重要方面，是自我表达的重要手段，是信息是否能有效传播的首要条件，是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印象。

服装不仅具有遮体御寒的实用功能，也是一个人的性别、年龄、职业、地位、文化、品位的象征。主持人的服装是否得体、协调、到位直接影响着受众的收视心理，也直接关系着传播效果。主持人的着装有无规律可循？回答是肯定的。总的原则应该遵循大方、得体和协调的原则。不同的采访内容，不同的采访对象，不同的采访环境，着装应进行适当的调整。比如说，在田间地头采访农民，就不能再西装革履地面对镜头了。但是，在办公室采访政府官员，就得穿西服、打领带。正式的场合就得着正装。不同类型的节目，对主持人的服装也是有不同要求的。新闻类节目，主持人应该着职业装，以西服为主，以凸显主持人的庄重、大方和权威；文艺类节目，主持人应该以晚礼服为主，突出节目欢快、祥和的气氛；服务类、旅游类节目，主持人就可以穿得休闲一些，和周围的环境协调就行了，但有一点需要注意，休闲并不意味着随意。

发型也是这样。应该说选择什么样的发型完全属于个人的权利。但是，作为公众人物的主持人，发型的取舍就不能凭个人喜好来决定，而是要根据节目的类型、节目的风格进行定位，以达到人和节目的和谐统一。因为发型的象征意义已丰富到可以显示一个人的风度、个性、教养、素质、品味、价值取向等等更宽的范畴，简而言之，发型也是表达内心世界的一种手段。它必须和整个社会的审美价值取向相一致。

不仅服装和发型，各种各样的随身携带



朱宪琪 中国第一代冰雕大师

在中国冰灯艺术的发源地——哈尔滨的兆麟公园举行的冰灯游园会，到2004年已经有整整40年的历史了。40年前的冰灯是什么样的？这么多迷人的冰灯作品都是怎么雕刻出来的？带着这些问题，《新闻夜话》专访了中国第一代冰雕大师朱宪琪，他已经有65岁了，从事冰雕艺术26年时间。

在采访中，朱老先生告诉记者，40年前，也就是哈尔滨首届冰灯节的时候，人们看冰灯，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万人空巷，全跑到兆麟公园里来了，从春节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人还不断。朱老先生谈到："有时候冰雕到了紧张的时候，手套也拿掉，做到高潮就忘记(寒冷)了。做到了痴迷的程度，有时候得快速，赶紧出效果，那时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都顾不上了，等你感觉到了手冷，这个(雕刻)也快完了。"他说做冰雕赶上最冷的时候有零下二十七八度，而冰雕师们在户外一干就是3、4个小时，基本上一气呵成就把一个作品刻完。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期节目的录制也是在户外——中国冰灯艺术的发源地哈尔滨兆麟公园的冰雕园中，时逢初春，还未出正月，室外温度零下18度。而朱老爷子和主持人，还有两位哈尔滨台的摄像师在外面一坐就是3个小时，镜头中冻红的脸和嘴中呼出的白气，以及采访背景中的大型冰雕，让节目看起来非常有冰雕世界的现场感。

品、小饰物等，也都可以起到自我表达的作用。象美国总统小布什总喜欢佩带一个国旗的小饰物，不仅是风格和个性的表达，也是政治观念的表现，你会感觉到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它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但同时也要明白，使用不当反而会画蛇添足，适得其反。

其次，自我表达是否充分也是每一个节目主持人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能否以一个自然、稳定、积极的状态和观众进行交流，是传播能否有效的重要保证。自我表达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人能够充分认识和理解自己。但是，自我表达是以他人为对象和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里进行的，如果不顾及他人和社会的价值与规范，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这种表达就会让人反感，也就谈不上传播效果。

在一个讲文明、讲礼貌的社会里，任何粗鲁的语言、低俗的动作都不会得到社会和大众的认可；在一个讲礼让、以谦虚为美德的社会里，任何傲慢的态度和无视他人的行为都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在一个以诚信为做人原则的社会里，任何不着边际的大话、空话和套话都不会得到好的传播效果。因此，主持人的自我表达应该符合全社会认可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规范。不是单纯通过刻意修饰，而是通过展示真实的自我而使自我表达得以充分发挥，才能真正为广大受众所接受，树立起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良好形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无限！



2004年5月中旬，全国的多家媒体和众多网站上有一条相同的新闻格外地引人注目，说是有20吨太空蔬菜开始在北京上市了，到2004年8月份产量可达400吨，这些被称为是"太空种子"种出来的蔬菜成熟之后，体积普遍较大，平均每只茄子有4斤左右，每只番茄一般也都在半斤以上。据了解，不仅是蔬菜，许多农作物的种子，包括水稻、小麦的种子，经过航天育种之后，品质和产量都会有明显的提高。有专家说，航天育种是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公众和媒体对于"太空蔬菜"的认识还存在较大的偏差，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种子上天转一圈就可以被称作"太空种子"的，也不是所有的用太空种子种出来的蔬菜都可以变得体积超大。节目中国家航天育种工程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刘录祥，就太空种子的形成、增产的奥秘，以及吃了它们会不会有不安全的因素等问题做了权威解读。

刘录祥告诉记者，"在参与此次节目制作前，对《新闻夜话》栏目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本次节目播出后，发现周围人群收视率很高，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相对来说，作为12频道，收看人群在客观上是受到限制的，但此栏目是无疑做得十分成功的，其播出产生的效果不比主流频道1套2套逊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本栏目选题很能贴近群众，从制作到播出的时效也快。这也是我在中央台做过的近10余次节目中最有影响的。希望《新闻夜话》再接再励，成为中央台的名牌栏目。"



刘录祥　国家航天育种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

随笔:由一次聊天想到的

□ 李品华

2004 年 7 月。

这个月正是我做《新闻夜话》值班主编的一个月,由此也就有了更多机会与栏目里的各位同仁做业务交流与沟通。

7 月 5 日下午,适逢董雯嫣《海上救助》那期节目的演播室录制。下午 6 点,我在办公室遇见了刚从台里演播室回来的董雯嫣,问及节目的录制情况,便聊了起来,于是便有了这篇关于两期节目、两个问题的探讨与思考。

《海上救助》这期节目中,有一段谈到了海上特警队是如何营救海难遇险人员的。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大部分的海上营救都发生在海上船只倾覆以后,营救对象大多为被船倒扣在船舱里面的遇险人员,他们最多可以依靠倒扣的船舱中仅有的空气维持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的生命。

聊天中,董雯嫣提到了节目录制过程中有个遗憾,她觉得有一个问题没有问好,节目录制过程中也未及修改重问。节目中是这样提问海上特警队员的 (提问 A):“你们通常是怎么营救的? 营救过程中你们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你们面临的危险主要来自哪些方面?”没有认真研究过采访和提问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的问题就是好问题,没有什么毛病。可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让董雯嫣觉得给这期节目留下了莫大的遗憾:因为问题太宽泛,指向不具体;因为作为新闻采访, 这样的问题没有唯一性;因为嘉宾的回答可长可短、主持人很容易失去对采访的控制;另外,观众对这一类泛泛的提问不会有太高的期待值与关注度……如果这种说法还不能让您信服的话,请试着把提问的方式改变一下,同样是提问海上特警(提问 B):“你们会有几分钟的时间去营救? 超过这个时间的话……? 营救出活的幸存者的机会有多大? 你们怎么把他们弄出来? 你本人有没有成功救出过幸存的人? ……”所有的问题都是非常具体的,没有哪一个问题嘉宾是可以胡乱回答的,是可以避而不答的,没有哪一个问题不是由主持人在牢牢控制着的,也没有哪一个问题是观众所不关心的。

第一种提问方式(A)显然是不需要了解太多背景材料的, 提问也是不具有唯一性的,提问的效果也不是扣人心弦的,而嘉宾的回应也往往是平静的、平铺直叙的、中规中矩的,甚至是考量用词的完整答案。即使有的嘉宾在回忆起难忘的往事时可能会略带激动,但提问的方式已经决定了嘉宾不可能非常兴奋地来回答你的问题。退一万步说,即使嘉宾的回答非常理想、非常感人,但这并不能掩盖主持人提问方式的愚蠢。如果足够幸运,你或许会碰上几个好嘉宾,但不可能永远有那么好的运气。

如果按第二种方式(B)来提问,那么前一种提问方式(A)中的 3 个问题其实可以分解为相当多的 (实际上现在的提问 B 只是问了提问 A 中的一个问题)指向性更强的、更扣人心弦或引人入胜的好问题、更细节的问题,而



段里仁 “国家畅通工程”专家组成员

对于中国人来说，拥有一辆私家车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当很多人还在憧憬着“轿车梦”的时候，一个看似非常小的事情——停车问题，似乎一夜之间就横在了我们的面前。据不完全统计，仅2003年一年我国的机动车数量便增加了900万辆左右。而与此相对应的城市停车状况却显得颇为尴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中国城市频闪停车红灯，停车问题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生活中的一大难题。对于这样的选题，表面上看新闻的时效性并不凸显，但是，结合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来看，新闻的时效性却比较突出。为此，栏目专门请来了中国最具权威的交通管理专家之一，“国家畅通工程”专家组成员段里仁教授破解停车难问题。段教授结合自己丰富的管理经验，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内到国外，列举了大量的实证，特别是国外的成功经验，深入浅出地详细阐明了解决停车难问题的办法——加快停车的产业化步伐。

好故事需要精彩的细节！

由此我也想到了我自己作编导的一期节目《用双脚走出“死亡之海”》，是对徒步穿越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探险者宗同昌的采访，其中也有相当多的遗憾。比如，我们来看这样两个提问：

提问 A：在沙漠中行走，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提问 B：整个行程中只有 4 次补给。在两次补给中间，向前向后走都需要 10 天的时间才可以得到补给和救助，这个时候是绝不可以生病的，(对)，即使是最普通的感冒也是致命的？

提问 A：你在走到 1/3 的时候，腿被毒虫咬伤了，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

提问 B：你在走到 1/3 的时候，腿被毒虫咬伤了，只能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走。还有 2/3 的路程，可能还要走近 2 个月，即使那样你都没有想过放弃徒步穿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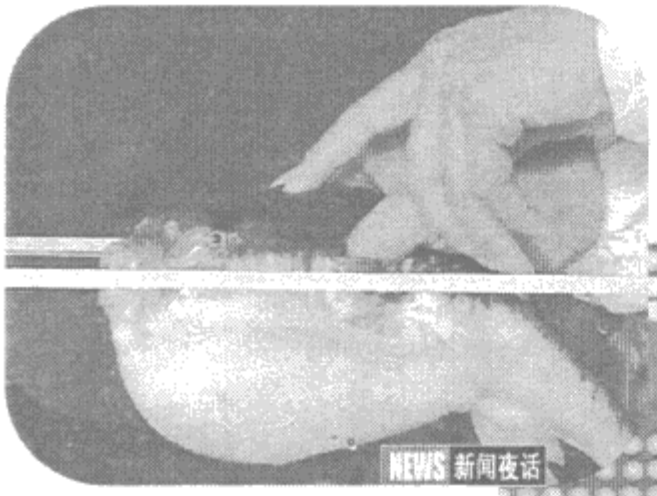
以上的两个问题，提问方式 A 和 B 的区别显而易见，不再赘述。

本文中所提到的这两期节目中的提问，其实都是在报道中对新闻基本事实进行展示时的提问与采访，主要作用是在所谓深度报道之前充分展示新闻基本事实。那么，如何做好演播室访谈节目中的基本事实展示？

首先，这种展示是需要有细节的，是由一个一个的细节组成的。这里的细节同样不是指嘉宾回答有细节，而是特别要求我们的提问应当是非常具体、细节的提问。有人认为，有关新闻基本事实的展示，是没有深度的，是完成不了演播室深度访谈的任务的，访谈的深度要靠基本事实展示之后的深度问题来实现。展示的任务只需要做到展示清楚和好看。然而，《新闻夜话》大量的新闻访谈实践证明，新闻基本事实的展示同样可以是有深度的，并且，是靠一个一个的细节的充分展示来完成的，这些细节本身就构成了新闻的深度(有关新闻事实的展示与深度报道的问题恐需另撰文探讨)。

其次，这些有关事实展示的问题也决不应该是平凡的、普通的、陈述式的，而一定是精彩的、针锋相对的、直指核心的提问(例如上文中关于海上救助的两种提问方式的对比)。记得曾听到过这样一段话，颇有说服力：什么才是展示？大花蝴蝶漂亮吧、美丽吧？当场撕碎！这就是展示。一如将谎言戳穿、将漂亮花瓶打碎，展示同样要有震撼力，而且一定要求得震撼力，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展示？

当然，还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所有有关细节的提问就是高级的，宏观的提问、问得比较虚的问题就是愚蠢的。有时候一个宏观的提问可能是跳出来的提问，是更具有高度的提问，是更高级和更有深度的提问。同样，也并不是所有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提问就是好的采访，有的时候这样的提问还会适得其反、令人生厌。因此，判断一个提问高级与否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合理，并且恰如其分。它一定是符合当时、当地做这样一件新闻的背景，符合当时的语境、氛围、情绪，是考虑到嘉宾和主持人的身份和关系的。现在在电视上充斥着采访记者大量不尽合情理的提问、追问和质问、质疑，有的甚至会引人发笑，可见，把问题问得合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一切提问皆要合理、恰当的追求，可能是对采访过程最高境界的要求，一如做人做事，要恰当、合理一样。问题的关键是，只要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去问出好问题，就一定能找到一种合适的问话方式，从而杜绝愚蠢的提问。



河豚



食品化妆品监督管理处副处长
张玲萍　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



孙正文　河豚厨师(左)
宫庆礼　中国海洋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部教授(右)

河豚是一种有剧毒的鱼，但是因为肉味鲜美，在中国古代就有“拼死吃河豚”的说法。在全国每年都会有相当数量的人因为食用河豚中毒甚至死亡。每年的清明前后都是吃河豚中毒事件的多发期。到现在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药来解河豚鱼的毒。那么一旦发生中毒，人们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急救呢？河豚鱼真的有那么好吃，值得那些食客甘愿去冒生命危险吗？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新闻夜话》专访了中国海洋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部的教授宫庆礼，他从事有关河豚鱼方面的研究有十年的时间，他也是卫生部全国河豚鱼安全食用协作组的专家委员。还有一位是河豚厨师孙正文，他从事河豚的加工去毒处理与河豚的料理制作六年，是一位有着丰富料理河豚经验的厨师。在节目中，我们还专访了河豚食用安全的主管部门——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食品化妆品监督管理处的副处长张玲萍。

我和电话

□ 宋楠

“我和电话”?

搞错了没有!

当然没有!我今天要说的就是电话。到底是谁发明了电话,有人说是美国发明家亚历山大·贝尔,也有人说它真正的主人应该是默默无闻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梅乌奇,不管是谁,他一定会很高兴,因为今天的我们正无时无刻地不在享受着他给我们制造的种种神奇,这当然也包括在工作中。

几乎每一位《新闻夜话》的同仁初来乍到时都是从打电话开始的,找嘉宾,做前期采访,与各种各样的人周旋,差不多都是通过电话,以至于有时候办公室会热闹的让人以为误入了台总机室。我自己也深有体会,进入《新闻夜话》快两年了,有一大半的时间是用在了打电话上,也难怪,对于谈话类节目来说,嘉宾找到了,节目就完成了一半,所以怎么利用电话把嘉宾约到演播室接受采访,便成了《新闻夜话》的编导必经的第一道关,没有毅力、耐心和诚意是不行的。

我们的嘉宾来自全国四面八方,要想把他们邀到北京,《新闻夜话》的演播室进行采访,也绝非易事。首先得找到他们。刚刚做记者时总会为搞不到对方的电话号码而发愁,后来慢慢知道,要获得采访对象的电话,除了通过114查号台外,方式还有很多种,假如对方是位学者,可以在网上查查他的学术论坛,看看他是否有个人主页,根据他的个人简介找到他的单位或者出版过他的作品的出版社,通过相关编辑来要到他的联系电话。如果对方是一位名人,可以从网上查到他的经纪公司,唱片发行公司、演出公司的名称,再通过公司和他本人联系。《新闻夜话》就曾经利用名人的官方网站,通过给对方发邮件约采访的方式,约到了皇家马德里队队长劳尔的全国独家专访,这个经验曾经一度不予外传的。如果你要采访的是媒体已经报道过的人物,那就更简单了,根据媒体上所出现的信息作为线索进行查询,或者是找媒体采访过他的记者要来电话,天下媒体是一家,再说又是对方报道过的事情,大多数人还是很乐意告诉你的。如果这一招不灵,那么就只有通过一些更加间接的信息来找啦。当然这会有些周折,不过当你已经写下两页纸的电话的时候,那个关键的电话号码就会渐渐地浮出水面,如同做新闻一步步接近事实一样。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否则会削弱你的意志,降低你的职业能力。

当你将对方的电话号码如获至宝般捧在手心时,千万别高兴得太早,因为这仅仅是刚刚开始,没有人能保证那个电话就能找到你要找的人,也没有人保证,他就会接受你的采访。所以你要开始第二步,电话采访。要想赢得对方的采访,先要赢得对方的认可,在电话采访中给他们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非常重要,而礼貌、周到、值得信任就是好印象的第一步。电话采访虽是最快捷又简便,但是由于记者不是与



徐荣祥 烧伤治疗专家
民营企业美宝环球集团董事局主席

2002年的9月，烧伤治疗专家、青岛医学院客座教授徐荣祥因提出5年内复制206个人体器官而声名大噪。这一"人体配件工厂"计划一经提出，就遭到国内外众多生命科学专家的质疑。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陈大元表达了他的看法："他(徐荣祥)提出了五年之内要克隆出人体所有的器官。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五年之内要克隆出人体的全部器官，包括脑、心脏、肾脏、肝脏、脾脏等，根据现在掌握的技术，能不能完成，我有一点儿怀疑。"

《新闻夜话》专访了这位颇有争议的学者徐荣祥本人，他为自己的"五年之内可以复制全部的人体器官"的说法做了辩解，在节目中首次澄清了他所指的人体器官是指生物学中的概念，而非人们理解的"脏器器官"，包括脑、心脏、肾脏、肝脏、脾脏等等很多"组织器官"这些是他们目前无法克隆的。但是他也坚持认为："攻克某些癌症比克隆全部的人体组织器官更容易。五年之内，我一定会实现预定目标。"

受访者面对面的采访，打电话时的态度就变得特别重要，对人的称呼、说话的语气、适当地说些客套话等等，看似简单，把握并不容易。比如在跟官方机构打交道，一定要注意对方的官职，否则对方有可能误会你对他不够尊重。而在约请一些业务繁忙的采访对象时，你过多客套的话，只会让听者觉得啰嗦，此时他更希望你能够言简意赅地说明目的。电话采访的目的是为了让对方答应接受采访，所以语气平和，用词简短，才是礼貌打电话的要领。同时，选择打电话的时间也是不能忽视的，在一个别人不方便时打电话你很难不遭到别人的拒绝。我曾经就听过这样的抱怨。一位我曾经采访过的嘉宾对我说，某位记者为了采访到他，不停地打手机，当时他正在开车本想接听后告知对方稍候再打，谁知对方始终不放电话，说了半个多小时。这位嘉宾告诉我，后来凡是那个人的电话他都不接。虽然那位记者的执着劲头让人佩服，但很显然，最终他并没有达到采访目的，在这种情景下，锲而不舍并不值得学习，假如他要是能够耐心地等上一会儿，结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差不多人手一个手机，方便是方便了，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用手机和别人长时间地打电话，除非他时间和金钱都很富有。所以在做电话采访的时候也应该多为对方考虑，记者尽量不要扮演一个令人厌烦的角色。我现在还记得我曾经采访过的西部志愿者莫峰在节目录制结束后对我说的一段话，他说在所有要采访他的记者中，只有我是给他发短信，而不是打他的手机。当时他是从志愿服务地内蒙古回到北京参加团中央的活动，手机是内蒙的，对于一个志愿者来说，异地漫游的手机费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确实不希望因为我的采访而增加他的负担，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没想到的是，我的这份用心却被他深深地记住了。所以，我以为只有对受访者充分地尊重和理解才能够得到受访者的尊重和认同。

我一直认为，访谈节目追求的应该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采访的过程其实也是记者对受访者了解的一个过程。在有了一个好的态度的前提下，电话采访前也应对采访对象的背景信息有初步地掌握，比如说受访者基本的个人信息，他对于事件的基本态度，如果受访者是一位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那你就应该对他所做过的事情和从事的领域有所了解。有了这些准备，受访者会认为你非常重视这次采访，对他是有备而来，他也会更负责任地接受你的采访。假如你要采访一位著名作家，但在前期采访中问的问题都是“你都发表了哪些作品？您最近写了哪部小说？你的作品是否被搬上屏幕”等等，我相信，虽然你的态度非常诚恳，但你听到的肯定是“砰”的挂断电话的声音。其实，了解受访者的途径有很多，假如对方是一位名人，你可以上他的个人网站，了解他近期的活动。如果对方是一位专家，你也可以上网去查找他的相关观点，阅读他的文章，通过大量的资料先来了解他。总之，在你给他打电话之前，他应该是你的一位“熟人”了。所以，通常我在与嘉宾进行前期采访时，一定要先熟悉材料，断不敢拿着一份 100 来字的新闻消息就贸然进行采访。

我现在也不记得到底通过电话把多少人“骗”到演播室来，不过我却记得大多数嘉宾跟我见面时说的第一句话，“哦，宋楠就是你呀”。哈，电话真的好神奇。



陈宁　北京陶然幼儿园园长



施建农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2004年，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在北京建立了它的超常儿童教育研究基地，并首次面向全国招收学龄前儿童，再根据这些超常儿童的特点，对他们进行有别于常规的教育。这个基地的建立，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超常儿童的浓厚兴趣和比以往更为热烈的讨论。为此，《新闻夜话》专访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博士生导师施建农研究员和北京陶然幼儿园的园长陈宁。施建农教授是中国超常儿童研究中心的主任和世界天才协会亚太理事会的主席，他进行超常儿童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将近20年时间了，而中科院的超常儿童教育研究基地就建立在陈宁园长所在的这个幼儿园。

陈宁园长介绍了幼儿园中超常儿童班的情况和幼儿园专为这些孩子们设计的课程。施建农教授认为，对超常儿童的教育方式可以采取多种模式，“如果当一个老师，或者一个教育的体系里边，能够认识到这个个体差异的客观存在，以及能够真的在实施教育的过程里边，照顾到个体差异的时候，其实这是最理想的。但是现实的很多时候，老师往往要照顾到大多数的孩子，所以采用的教育方式可能会不太适合超常儿童，包括学习比较缓慢的孩子。有些孩子确实需要给他们抽离出来，组成特殊的班级，进行特殊的教育。”

节目中施教授提醒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一方面要认识到自己孩子可能存在一些潜能，不要埋没了孩子，另一方面，也不要苛求孩子。超常儿童可能某些方面表现得很出色，但是在另一些方面，他就是要弱一些，甚至很弱，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帮助。如果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凭空地增加很多的压力，其实对孩子的发展，甚至身心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难舍《新闻夜话》

□ 魏鸿

曾经两次辞职都没能离开的《新闻夜话》，似乎与我格外地有缘分。回想起来，跌跌撞撞地一路走来，如同开着新买的车一路踩着刹车，小心翼翼地期望早点磨合，好上路行驶，却无奈怎么也磨合不到位，终于下决心想要放弃了，却又在刹那间，见到了曙光……

刚刚过去的7月19日是《新闻夜话》开播两周年纪念日。那天，分管《夜话》的频道新闻总监陈永庆特意请栏目组全体人员吃饭，席间大家唱起了老歌“365里路”和“掌声响起来”，当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的脑海中闪过的，是刚刚过去的那两个不平静的365里路。一个人的一生中会经历许多个两年，一晃即逝甚至不会留下太多的记忆，但是在《新闻夜话》的两年给我留下的却是一个深深的烙印，因为这两年来亲身经历了太多的变化，从对人的重新认识，到对自己的重新审视，以及面对事业选择的犹豫和坚定。

为了纪念2002年7月19日那个栏目诞生的日子，陈主任提议开播时的元老共庆一杯酒，没想到站起来的竟然只有寥寥6个人（原栏目机构设置中的3个编导和3个助编），在他们共同干杯的一刹那，我相信许多人都会感慨万千……

通讯录里的回忆

那天许多人谈起了我们人手一份的“《新闻夜话》通讯录”。那个通讯录更换的频率是《新闻夜话》自己不断制造的新闻，曾经它所创造的最快更新速度仅仅间隔几个小时，也就是上午刚发了新版通讯录，下午就有了更新版。许多离开夜话的人至今都会想起它，想起那些通讯录上熟悉和还尚未来得及熟悉的名字。

那天聚餐后回到家，我找到作为“收藏品”保存完好的一叠通讯录，翻看这几十张不同时间的通讯录，那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名，记录着所有来过《新闻夜话》的热爱新闻事业的青年。

看着一张张通讯录上的日期，从2002年7月1日到2003年4月30日，在10个月的时间里《新闻夜话》竟然有将近300人的过往人次，数一数和自己一样在“非典”之后留下并且坚持到今天的战友，还有15人。再回想聚餐时这15人如今彼此轻松的一张张笑脸，是谁说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接近新闻 感受震撼

我上学时的专业是经济，从事新闻工作源于父亲的影响。从平面媒体转行到做电视，我对新闻的了解是循序渐进的。

真正接近新闻，感受新闻的震撼力是从2000年5月，当时作为地方台一个小栏目的负责人，我到北京参加“国际电视周”的新千年论坛，在那次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传媒精英分几个主题研讨了新千年传媒的特点和未来走势：人大新闻传播学院的喻国鸣教授称



莫锋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卫生防疫站站长助理

2003年，SARS肆虐的春天，北京大学预防医学部应届毕业生莫锋，放弃沿海城市高薪的聘请，毅然报名参加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卫生防疫站。一年后，莫锋自愿留在了西部，并荣获第五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称号。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眼中的西部和他想像的一样吗？在西部他能得到他所要的吗？我们采访了莫锋。

莫锋坦言，当年去西部并不仅仅是出于志愿者的目的，而是觉得西部更能够施展他的才华，那个舞台更需要他这样的人。他所服务的是巴林右旗卫生防疫站，担任站长助理。巴林右区农牧区卫生状况十分落后，而很多基层防疫人员的素质并不是很高，对此，莫锋结合自己所学的知识，给基层卫生防疫人员进行非典知识培训。并利用休息时间，每个月精心编写一期《巴林右旗卫生防疫通讯》，送给所有的基层卫生防疫人员。那里的同事很喜欢这位北大的毕业生，但同时，同事们对莫锋又透露出一丝担忧，因为在他们看来，莫锋很多的建议和想法并不是非常成熟，他一个志愿者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改变当地卫生条件落后的状况。对此莫锋并不在意，他坚信，通过他和其他志愿者不懈地努力，西部落后的面貌肯定会有所改善。

莫锋在去西部之前曾经给温总理写过一封信，表明自己愿意去西部的决心。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莫锋说，如果现在再给温总理写信，他一定会告诉温总理，6000名志愿者太少了，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来。

"传媒是21世纪的最后一个暴利产业"一语惊人,它让我欣喜于身处传媒行业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实力媒体和尼尔森公司对中国媒体和客户市场的数据分析,让我清醒地意识到,面对网络媒体的崛起电视从业者必须认识的现状;民营媒体的代表光线影视王长田的发言,给我传递了更多新的信息,那就是制播分离的趋势将使更多有志、有能力致力于经营媒体的人有更多的机会。还有对首次设立的对纪录片的讨论、《开心辞典》制片人郑蔚对引进国外节目如何实现本土化的发言等等,都让我对传媒的经营有了更多的了解。

但是那次论坛上更吸引我的是,关于新闻谈话节目的价值分析,CNN《亚洲论坛》的主持人韩玉花有一种很明确的信息提醒我:未来做新闻的最高境界就是访谈。为什么?因为访谈节目除了采访对象是新闻当事人以外,更重要的在于它是正在发生的新闻,是新闻的延续和更接近新闻的核心和本质。

从那时起,我开始留意各家电视台,那时候国内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新闻谈话节目,比较醒目的要数刚开播不久的凤凰卫视的评论节目《时事开讲》,它既不同于央视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也有别于普通的新闻报道。新闻性极强的"紧贴时事"概念和资深评论员透彻的背景分析,使得《时事开讲》特别容易拉近新闻事件本身与观众的关系,当时央视似乎还没有类似的节目。

2001年"9·11事件"之后,凤凰的影响力达到了空前,凤凰台对"9·11事件"的直播在全世界产生强大效应的同时,也使得从此以后的我成了凤凰的忠实观众。至今我还清醒地记得当天睡梦中的我(北京时间已过了午夜),突然接到香港的妹妹打来电话说:美国被袭击了,凤凰正在直播,并且语气紧张地说可能世界大战要爆发了。我赶紧打开电视机,听到直播主持人语速极快地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绝对不是电影中的灾难镜头,世贸双子大楼刚刚被两架飞机袭击,大楼还在倒塌,我们的直播将持续进行……那天我一夜没睡,等着看事态的进展,同时给一些朋友打电话交流资讯,无奈当时很多地方看不到凤凰台。而央视直到第二天傍晚的新闻联播才有一条简单的消息。那个事件让我对新闻事件的震撼力有了更多的感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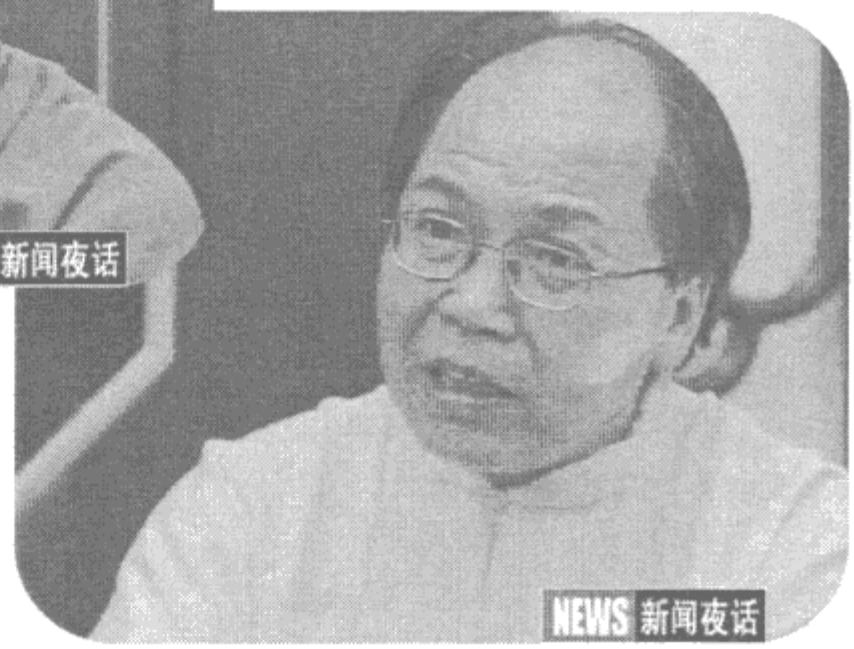
发现《新闻夜话》

2002年7月底我再次出差北京,无意中看到CCTV12刚开播的《新闻夜话》,那期节目采访的7岁儿童窦蔻,是一个在教育方式上有争议的儿童,当他面对央视知名主持人咄咄逼人的发问时能够应对自如并且不断反问,在不想回答问题时一句"我要撒尿"显露的童真,让我第一次在看电视的时候始终为主持人捏了把汗,"清新"、访谈"有挑战性"、演播室庄重大气是我对新闻夜话的第一感觉,接连看了几期不同的节目,它有别于其他谈话节目的风格,没有评论只有事实的报道方式,着实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当时它应该算是央视唯一的新闻人物专访栏目吧。20分钟的时长,景别给的是少见的人物面部大特写,使得嘉宾在回答提问时的每一种面部表情都是对答案真实性的一种有效印证;还有主持人的提问方式也是与众不同。总之它的整体节目样式和风格,在当时的电视屏幕上几乎是没有可比性的,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也许这就是我向往已久的新闻访谈?

《新闻夜话》是我30岁时的选择,应该说是冷静思考后的决定,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却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挫败感,自信心遭受前所未有



李刚　四川大学教授



李远国　四川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2004年6月5日"中国首届道教文化节"在成都举行。主会场就设在四川省成都市的青城山，它也是中国道教的发祥地。那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道教文化，会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样的文化节给成都怎样的影响，又会给来这里的游客带来什么呢？四川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李远国副所长和四川大学的李刚教授在本期节目中谈到了道教文化的起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其之间的关系：儒家的文化更注重于对社会伦理方面的关注；道家文化是注重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佛家的文化，则重视的是自我精神方面的修为。



道教文化的茶道表演

的打击。看到北京街头穿梭如织的人流，曾经多少次怀疑自己的选择，怀疑自己的承受力。

梦回新《新闻夜话》

2004 年 3 月底，开始了《新闻夜话》新的发展阶段。命运让我又重新回到这里，用佛家的话说也许是“缘分未尽”，但是我知道主要原因是这里有太多让我留恋的地方，除了难舍的兄弟姐妹、曾经付出的艰辛努力，最重要的是工作环境的改变，有可能让那个潜藏的梦想得以实现。

重新投入工作带给我的是从未有过的轻松，平静中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认识周围的一切，一如经历了 SARS 之后对人生的反思。

白岩松带来的团队理念

请台里名牌谈话栏目的制片人来《新闻夜话》介绍经验，被公认是频道新闻总监陈永庆送给《新闻夜话》编导们最好的一份礼物。白岩松的到来着实给大家带来了一丝兴奋，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在边听边议中，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台里同质类新闻栏目《新闻会客厅》、《时空连线》以及《中国周刊》的运作方式和其逐步建立起来的核心价值观。

看得出白岩松对《新闻夜话》还是比较了解也比较关注的，他提到“夜话”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现在需要明确的是栏目的核心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决定了一个栏目的风格和定位在观众的心目中是统一而明确的。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会即时收看台里同类节目以资借鉴，但是在此之前多是以批评的眼光、审视的态度，拿自己得意的作品与之相比，除了无奈于竞争对手的资源优势，很少去看对手的长处，甚至是从没想过当做朋友坐在一起交流经验。但是当真的有人创造机会坐下来探讨共同的新闻理念、新闻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在感受着明显差距的同时，更多的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任何一个热爱电视的人都会有良好的团队意识，都会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栏目发展结合起来。以前《新闻夜话》秉承的是精英策略，即以重点选题重点人为主，以期集中兵力产生轰动效应，事实证明这在栏目初创时期是需要的而且有效的，但是作为栏目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并不可取，容易形成发展的瓶颈。把节目质量的宝押在几个人的身上也是极具风险的。白岩松提出管理中的“短板理论”(一个桶能盛多少水取决于那块最短的板)，正是带着团队共同成长的理念，他们的管理模式，从选题智囊组的设立到编委会审片制的独创，都为团队整体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点是我们从前未曾想到的，也是新“夜话”正在积极探索的发展之路，我们也欣喜地看到现在的“夜话”已经调动了大多数成员的积极性，收视率在稳步攀升，大家学习业务的积极性也在从被动转向自觉主动。

《新闻夜话》在进步，随着《新闻夜话》的变化，《新闻夜话》的许多人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包括我自己。但是对于我来说，唯一不变的还是那个在新千年的红五月种下的梦想。四年的时间，经历了追梦、磨砺、放弃和返回，“难舍”的情怀是支撑一切的元素，即便是放弃的时候我也不后悔曾经选择了“夜话”，因为它使我有幸感同身受地经历了被业界称为“新闻年”的 2003 年：这一年有 SARS 肆虐、有美伊战争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动荡，还有中国新闻频道的诞生。

新闻天天有，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突发性事件却不是每个人都能碰到的，我庆幸那一刻，我是一个新闻人！

据2004年中华骨髓库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大约有400万各类疾病的患者，急切地等待着骨髓移植，仅白血病患者每年就新增4万人，其中50%是儿童。如果一个人的骨髓出现问题，失去了造血功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除了可能会得白血病(也就是我们大家所俗称的“血癌”)，还有可能不幸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重症免疫缺陷病、急性放射病、淋巴瘤等这疾病，这些患者要想继续生存，就只有通过骨髓移植来恢复自身的造血功能。但是大多数人听到“骨髓捐献”就会感到一丝恐惧。本期节目通过独家拍摄到的一个志愿者捐献骨髓的全过程和他的亲身感受，向观众介绍了相关的知识。本期嘉宾是武警北京总队十七支队的卫生员王锦鹏，他在2004年年初捐献了自己的骨髓造血干细胞，成功地挽救了北京市一位急性白血病患者的生命，并且受到了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佩云的接见。



王锦鹏　武警北京总队十七支队卫生员



王锦鹏在捐献造血干细胞



彭佩云到医院看望王锦鹏

我的《新闻夜话》之路

□ 李东明

人的一生就像一条长长的路，回忆过去，就是看自己走过的路。为什么要看自己走过的路，那是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走偏，甚至走错。现在还不到穷途末路要写回忆录的时候，只是觉得在某一个阶段应该进行一下必要的反思和总结，仅此而已。

世界因为必然性才有规律，又因为偶然性变得希望无穷。我的《新闻夜话》之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的。我想每一个大学学新闻的人，将来都希望自己干的是真正的新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进入顶级媒体。就在疑惑自己是否准备好的时候，我居然进入中央电视台了，这都要归功于我的那篇学士论文，导致我的人大老师看过后认为我还算是个喜欢思考的人，而中央电视台正好又需要这样的人。就在我作为西部频道《新闻夜话》栏目的一名资讯人员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电视将会成为我将来乃至毕生奋斗的事业。因为在那之前，几份不太满意的工作，使我一直处于一种对自己定位感到困惑的状态中。

我想完全主观地把截止到目前走的这段《新闻夜话》之路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可以并称为资讯阶段，中间以“非典”划分，而第三阶段就是目前的编导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新闻夜话》开播前，我刚进栏目的时候，让我最为印象深刻的是一种强烈的学习气氛和一种坚定的新闻理念。这种感觉也许只有到了今天我才能够用比较准确的词汇来加以描述，因为当时我已被深深地淹没在其中，甚至有时会喘不过气来。这样的学习经历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它的难处在于学习与工作融为一体，而支持这种学习动力的，是每个人心中的新闻理想。这种理想，又来源于栏目本身的新闻理念，这种新闻理念的核心是，做中国最好的新闻。

就是在这种极端的理念诱惑下，每个人的热情都被极大地激发出来，每个人都废寝忘食，吃苦耐劳，优良传统被完全继承。大家都认为做电视就是应该这样的。作为资讯，我的主要工作是要随时监控新闻，向编导提供优质选题，同时还包括选题的背景资料和嘉宾的联系方式，但主要的工作还是找选题。直到今天，看到那个阶段的选题，仍感到触目惊心，全是一些重大的、时政的、有时效性的。也许当时正是这些选题，使《新闻夜话》在新闻圈里，开始渐渐引人注意了。还是在那个阶段，栏目的所有人员都被一个强有力的信念支撑并向前推进着。精神力量一直都占据着主导，以至于很多其他的方面都被掩盖掉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这辆驶向理想终点的列车上，却没有几个人能够坚持到最后，依然是频繁的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之所以我现在能够如此厚颜地在此加以评论，大概也是因为自己是少数几个没有下车的人罢了。

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中，浮躁和急功近利似乎快要成为主流，而信念却又显得如此遥远和



倪宏峰　杭州市公安局
西湖分局看守所所长



王擎坤　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杭州警方大规模刑拘患有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开创全国先例，《新闻夜话》就此事件独家专访艾滋疑犯，这也是艾滋疑犯第一次袒露内情。

2003 年 11 月底，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的看守所成了全国舆论的焦点，因为这个看守所一次性地刑拘了 14 名患有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这样大规模的刑拘艾滋病犯罪嫌疑人，在全国还是第一次。这些艾滋疑犯中很多人不是第一次被抓，但都不怕警察。因为按以前的惯例，只要确定疑犯患有艾滋病，公安局就会放人。结果，艾滋疑犯会继续犯罪，形成一个抓了放、放了抓的循环怪圈。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的提审记录显示，有的疑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竟然还会主动地感染艾滋病毒。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什么害了他们？他们又会给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呢？我们采访的犯罪嫌疑人是广西鹿寨县马鞍村人，当时只有 21 岁，他被查出携带艾滋病毒也刚刚才一年多。接受我们的采访，他经过了长时间考虑和反复斟酌。之后我们又采访了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王擎坤，和这次负责关押的看守所所长倪宏峰。警方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同时保护艾滋病人利益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不切实际。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很多问题都开始慢慢浮出水面，以致于越来越成为问题。也许当时存在的许多矛盾至今依然存在，也许并不准确，恕我妄自菲薄。首先是栏目的高定位和栏目人员的低水平之间的矛盾，我想这可能是目前的主要矛盾。作为一个有深度的新闻访谈栏目，栏目人员的年轻化是最致命却又最无法克服的弱点。包括我在内的栏目人员都严重缺乏新闻实践经验，尽管阅读大量材料却仍然感觉纸上谈兵。而我们经常学习的CBS《60分钟》的节目中，哪一位主持人和记者没有十年以上的新闻一线采访经验？我认为，想做好演播室的新闻节目而没有过新闻现场的采访经历，这是不现实的。解决的唯一办法是时间，实践。还有一个矛盾是新闻理想和新闻现实之间的矛盾。而新闻现实还包括环境条件、宣传口径等等。它则直接影响新闻理想的实现。这里面可能有规律的问题，还有管理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很少涉及业务，不再赘述。

2003年的4月，“非典”被正式确认为全世界的一场灾难。这场灾难不管对于国家、栏目还是个人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整个社会机器仿佛停止运转，这是一个考验一切的时刻，意志、责任、道德、秩序。对于一直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来说，这种灾难的经历，应该是刻骨铭心的。正因为不能忘记的记忆，我写下了自己的《“非典”随想》：

六月的北京似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一些关闭的功能也在逐渐开放着，随着渐渐降低的确诊数字，人们的心也在逐渐放松。大城市的面貌逐渐显露出来，无论是街道还是交通工具，抑或是已经开放的公共场所，仅仅一夜之间就又突然马上人满为患了。时间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东西，仿佛能检验一切，就像来临时的那么突然一样，恐惧走的时候也是那么的慌忙。认识是解除恐惧的最好办法，人类对于不认识的事物都是恐惧的，只是处理的态度和方法不同罢了。当认识染上非典就好比在下雨天走在街上被雷劈或者中六合彩那样的几率以后，人们的那份勇敢真让人担心。

因为现在没有人知道“非典”是真的走了，还是仅仅离开一会儿。也许人们真的以后会渐渐忘却一些东西，也许年轻人忘记得会更快一些，到最后也许会成为茶余酒后最好的谈资。但是，没有人否认的事情是，在曾经的那段特殊的日子里，确实是特殊，我们确确实实经历了，感受了，也改变了。在新生的这一代人里，也许无法从历史的根源去追溯国难当头的恰如其分的表现，每个人都在历史的车轮驶过的刹那间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只有少数才会飘扬起来。每一个渴望大时代大人物的人都在焦急的等待机会，乱世才能出英雄，这句话没错，但是大多数倒霉蛋在乱世没能成为英雄，反而成为了历史的畜粉。

英雄不是所有的人能当的，有的英雄是时势造出来的，有的英雄却能影响时势。英雄真的有一种潜质吗？我认为是有的，因为不是每一个想当的人最后都能够如愿以偿，我认为是潜质的原因。在这样的时期里，有别平常的日子里，有人镇定，有人慌乱，有人努力，有人懈怠，在一场本来就不平等的竞赛里，丝毫的懈怠和丝毫的努力足以体现一种英雄的潜质，但是对于大多数稍微略有理想但又极其软弱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悲哀。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风雨渐渐平息，彩虹似乎也渐渐浮现美丽的一角。不管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在这个时候只能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活下去，人类的渺小在这个时候表现的淋漓尽致。我想“非典”过去了，但是却留下





李斯璇 联合国环保顾问

2003 年的 8 月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选出了它的新一届环保青年顾问理事，全世界一共 10 个人，亚洲只有一个人，而且还是个中学生，她叫李斯璇，是四川省成都市盐道街中学的高三学生，环境规划署为什么会选李斯璇，她有什么过人之处，在对李斯璇专访之前，记者把电话连线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总部所在地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采访了联合国副秘书长 Mr. Klaus Toepfer。之后通过专访李斯璇，为观众展示了一位非常少见的在德、智、体、美、音、外交等各方面都全面发展的优秀中学生。

了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玩味和思考。

对于2003年的新闻界来讲，应该是空前热闹的，伊拉克战争，还有抗击“非典”，但是这些并没有给《新闻夜话》带来更多热情。新闻现实和新闻理想的尖锐矛盾，直接导致了对理想的怀疑和对一部分信念的丧失。而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不能冲在新闻一线的那种痛苦心情更甚于对于病毒的恐惧。

但是《为什么不能吃它们》成功了，虽然栏目发生了一些变动，但是这期节目还是成功了，而且这期节目反映了作为一个新闻栏目，在国家民族危难时刻应该表现出来的一种社会责任。这期节目的价值正好也反映了一个栏目和一个新闻工作者存在的价值。在困难的时候，信念的坚定挽救了栏目，也激发了人心。

但是还是有一种危险的新闻冒险精神存在于栏目，这是一种为了理想而可能违背现实的冒险精神。从开始学新闻到现在已经六年的时间了，我也时常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新闻？怎样才能做出真正的新闻？是不是简单地报道真相就是真正的新闻？是不是只要有一颗追求真相的心就能做出真正的新闻？真正的新闻是做给多数人看的还是做给少数人看的？如果单纯是为了名利、证明自己而做新闻，我想这不是真正的新闻。新闻报道永远是大局中的一环，只有符合大局了，才是适合的新闻，才有可能有条件做出真正的好的新闻。大局意识其实是很难具备的，这里面有太多的个人价值实现和竞争环境的因素，而一个栏目不具备或者忽视的话，就会很危险。这是一个做节目之前就应该确定的原则，而不是所谓的新闻技巧。

在传播学中讲到传播者、传播工具、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在国外是非常强调传播效果的，这是由于媒介产业化造成的竞争白热化的结果。而在中国，重视的是传播者和传播内容。在我作为编导的第三个阶段，受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栏目的选题方向发生了变化，但是收视率也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包括我很多编导的困惑在于为什么以前做吴仁宝的收视率还不如现在做警犬。现在好像不是在做新闻了，为什么看的人反而比以前多了呢？我想这正是以前都把时间花在了研究传播内容上而忽视了传播效果。我们追求高品质的新闻理念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实现新闻理想的方法。而且这种变化已经给栏目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同时也不能放松对节目质量的重视。这也是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的关系，而我们还需要思考和探索的东西还太多太多了。



李建华　云南药物依赖研究所副所长

美沙酮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麻醉药品，在临床上用作镇痛麻醉剂，止痛效果略强于吗啡，毒性、副作用较小，成瘾性也比吗啡小。美沙酮门诊确切的说应该叫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是一种用美沙酮来替代海洛因等毒品对吸毒者进行戒毒治疗的维持治疗的方法。这种替代治疗的好处是阻断吸毒者共用针具感染艾滋病，降低吸毒者因为缺乏毒资而造成的社会危害，最后达到逐步戒毒的效果。1994 年这种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方法就已经由云南药物依赖研究所提出，但是由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都不具备，所以直到 2004 年 4 月，云南省个旧市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才正式启动，这也是国家首批 5 个省、自治区的 8 个地方获准“对海洛因成瘾者进行美沙酮社区维持治疗”的试点之一。

美沙酮本身也是有毒的，如何防止吸毒者进入诊所吸毒？又如何防止在黑市价格等同海洛因的美沙酮流出诊所？针对社会上的一些质疑，我们采访了云南药物依赖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建华。

节目恰好在国际禁毒日期间播出，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不少观众打来电话，咨询有关情况。

我在《新闻夜话》的“第一次”

□ 曾 琳

时间飞逝,转眼间我在《新闻夜话》已经两年了。这两年我长大了,也成熟了。

初到《新闻夜话》,一切都要从助理编导做起。还记得我做助理编导的第一期节目《让蝗虫不再起飞》,这期节目是要送台领导审查的两个样片之一,节目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栏目能否开播,所以非常关键。由于新闻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使得我第一次体会到电视台所谓的“抢节目”。随即我在接手选题的当天联系好嘉宾,第二天约见嘉宾进行前期采访,第三天录制演播室,第四天领导审节目。那几天自己感觉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时刻都绷得紧紧的,真如同打仗一般,所以也有了我平生的第一次熬夜——跟着当时的编导荆慕瑶编片子。节目编完我终于体会到了“看自己的节目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心情。一点都没错,当看着自己的作品,可能它还称不上是自己的作品,但毕竟是我第一个全程参与的节目,而且也付出了心血,看它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最后节目由于某些情况没能播出,这也让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节目都能播出的,但无论结果怎样,它毕竟是我进入央视的第一期节目,自然意义也就非凡了。

当有一天你看着一件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作品诞生的时候,那感觉还不一样,因为你参与制作和你亲自制作的是不一样。《解读民办教育实施条例》就是我做编导的第一期节目,虽然节目还是留下了不少遗憾,第一期节目的遗憾也成为我今后做节目的动力。

两年的时间我在一点一点地改变,刚开始那个初出茅庐、不经世事的愣头青,正在慢慢地向处世圆滑、遇事不惊的职业记者蜕变;与此同时《新闻夜话》也在悄悄地改变。记得我初到《新闻夜话》,它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个团结的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在钻研业务,即使当时争得面红耳赤但过后还是好朋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业务研讨,有争议是很正常的事情,当面把业务说明白就好。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它的提问风格,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主持人一定要把嘉宾逼问到死角里,直到嘉宾无力反驳,这样犀利的提问加上主持人严肃的表情,我个人觉得对嘉宾是不礼貌的。虽然栏目的定位是犀利的提问和新闻的深度解读,但毕竟质疑不等于质问,尖锐也不等同于尖酸,在你提出犀利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式?可能你的语气缓和一些,以一种求证的方式提问,这样也许嘉宾是可以接受。而且作为一名职业记者,在你做节目的同时一定要给你的嘉宾留后路,这是你的一个基本的职业道德问题,你一定要切记,你就是记者,而不是法官,即使你对面的嘉宾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你只要把他所做的事情告诉大家就可以了,至于他将受到什么惩罚那是法院的事情了,你没有权利给他扣上任何罪名。最重要的是不至于在采访结束时让嘉宾说,以后接受谁的采访都行,就是不接受《新闻夜话》的采访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



尚立富　西部志愿者

尚立富出生于甘肃景泰，先后就读于甘肃省靖远师范学校和西北师范大学。自1998年一直关注西部农村教育。1998~2003年间先后4次以骑自行车、徒步等方式到东南沿海和西部农村实地考察，行程9万多里，走访了20多个省区，沿途记录了近百万字的考察日记，拍摄了5000余幅纪实照片，并于2003年精选了其中的130幅在甘肃、北京等地举办了《情系西部——尚立富西部农村教育考察纪实摄影展》，引起较大反响。著有《苦乐之旅》一书，并在《中国教师》、《未来导报》开辟专栏连载考察相关文章。尚立富通过讲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表达了一种对西部教育的独特思考。

做节目不是越做嘉宾越少吗?而且嘉宾出去一宣传对我们栏目的形象就更加不利了。另外,大多数观众在电视机前还是存在同情弱者的心理,一个过于强势,咄咄逼人的主持人很容易招致反感,也会破坏自身的形象。

当然谁都是从不成熟,慢慢成熟起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夜话》正在逐渐地成熟起来,现在虽然它的提问还保持着它犀利的风格,但主持人的态度明显缓和了很多,也让观众可以接受了,这样一来,嘉宾的回答就变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这也正好突出了谈话节目的核心人物——嘉宾,也符合了谈话节目的形式。另外,《新闻夜话》的选题也有很大的转变,从以前的舆论监督、揭黑幕到现在的贴近老百姓、贴近生活、关注身边的小事。选题的转变也使我们栏目的收视率一直在稳步攀升,这也看得出来,选题对于收视率的影响有多重要。

说到选题就一定要说说选题来的方式,无论是以前的资讯报选题还是现在的编导每天自己报选题,栏目的选题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而在这里特别要说的就是栏目的同事,无论是不是做节目的人,只要他看到比较好的选题都会和主编编导讨论,这就形成了比较好的业务学习的气氛,而且大家这样讨论更加有利于编导思路的打开。大家都是以普通观众的角度去看这个选题的,他们想知道的事正是观众想知道的,这无形中就给编导提供了很多问题,那么他在设计文案的问题时就自然会考虑进去。这样做出来的节目就会比较贴近观众,增加了选题的关注度。

我在拿到一个选题之后,经常会先询问自己身边的人对这件事的关注情况,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们最想知道的是什么,这应该也能代表了大部分电视观众的兴趣点。然后再和同事共同讨论一下选题,这样就会有一个大体的思路,根据这个思路再写文案列问题,最后把文案给主编,请主编提出修改意见加以修改,最后出来的就是演播室的访谈的文案了。有的时候在你写文案觉得山穷水尽的时候不妨试一下我的办法,也许家人的某个问题会使你豁然开朗。

如果说设计文案是一期节目成功的关键,那么联系嘉宾就是一期节目成功的前提。而联系嘉宾也是要有方法的。记得第一次联系嘉宾,听到对方拒绝的声音,一时间我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愣在那里,因为事先并没有想到对方会拒绝。这也是我第一次尝到被人拒绝的滋味。这以后每次联系嘉宾之前我都要想好,万一对方拒绝我该说什么。从那以后也知道了联系嘉宾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仅仅告诉对方你的身份和意图就行的,你还要尽你的所能说动对方,让他来参加你的节目,有的时候也不乏给他扣些高帽子、说些赞美之词。但你要说的不是很肉麻而且很自然,这就要看你的功力了。但大多数对方拒绝是有原因的,你最好是问清楚原因,如果是因为一些简单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你没问就放弃了,这不是很可惜吗?这也涉及到了执着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你再坚持一下,也许嘉宾就同意了;有的时候,嘉宾虽然拒绝了,但你依然坚持,也许嘉宾会被你的坚持感动也说不定呢!当然做节目不能只靠别人的感动,更重要的是要让对方知道你的诚意。这样即使节目做不成,也给嘉宾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下次如果还有机会,那么你在请他做节目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一些了。对待我们采访过的嘉宾更要和他们保持很好的联系,这也有利于栏目的对外宣传,因为嘉宾就是你的一个很好的宣传途径。我们不要做过一期节目就完了,还要和你的嘉宾成为朋友,如果他所在的单位有什么新闻要发布,那么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你,也许你能抢一个头条和独家也说不定,



王振耀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

2004年7月到8月，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台风、洪涝、干旱、地震、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多种自然灾害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面对这些灾情，民政部向全国灾区发放了十多亿的救灾款。对于灾民来说，救灾款就意味着救命钱，而在当年审计署公布的审计报告当中，2003年中央拨付的重大自然灾害专项资金，出现了严重的挪用挤占问题，那么如何保证在这一年，灾民都能够及时足额地领到这些救命钱？主管救灾款分配的民政部门，对于这一点，到底心里有没有数？《新闻夜话》专访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的王振耀司长，他回答了记者关于救灾款的监管等问题，同时强调要加强灾害发生前的预防工作。

或许我的想法有些功利,但最主要的就是作为一名记者,你一定要有自己消息来源的网络,这个网络怎么形成,就是靠你平时联系嘉宾的积累。

在《新闻夜话》这两年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开播时第一次喝醉;联系嘉宾时第一次被拒绝;做节目第一次被毙(没有通过);节目做得不好第一次哭……有太多的第一次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到外地采访,那次可真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

我刚刚得知可以到湖南当地去采访的消息时兴奋的不得了,因为我们是演播室访谈的节目,除非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我们是不出差的,而这次可以到当地也是因为我们要采访的嘉宾年纪太大了,如果他到北京来又不现实,而且这次是拍一个现代社会中的最后一个私塾,它也即将不存在了,一些关于私塾的画面只能到当地拍摄,所以领导考虑再三,决定让我们到当地拍摄。出发之前我们已经和当地镇政府的人联系好了,他会帮我们安排。当我们一行四个人经过坐火车再转坐汽车来到嘉宾家的时候,他的女儿告诉我们,我们要采访的嘉宾也就是她的父亲病了,所以不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了。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都愣住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样的结果,但随后我们的编导就和镇政府的人沟通,让他再和嘉宾说说,在不影响他健康的情况下,他是否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通过努力,也是嘉宾希望在关闭私塾之前留一些纪念,所以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不要以为这以后就很顺利了,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等着我们呢!

终于我们可以和嘉宾进行前期沟通的时候才发现,嘉宾的口音比较重、很难听懂,最后在采访的时候我们找了镇政府的人给我们做翻译,这才算是化险为夷。通过这次的教训我就永远的记住,在出差之前一定要想到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不接受采访、嘉宾可能有口音等等,那么你就要想好对策,一切准备工作在出发前都要做好,免得到当地手忙脚乱。经历过一次有如此多状况的采访对于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情了,它对于我今后的采访是一个很及时的提醒。

我很庆幸能有那么多的前车之鉴在提醒我,我也知道在央视工作一定会比在其他电视台要辛苦得多,虽然事先已经想到了,但当你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免不了要沮丧。当你发现做节目很吃力的时候;当你觉得知识不够的时候;当你很努力还是没有进步的时候,你就会想,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这行,你会迷茫、会矛盾、会犹豫,这些我都经历过,到这个时候就是看你的毅力了,你要是坚持那么就坚持下来了,否则就放弃了。不过庆幸的是我坚持下来了,这个过程很痛苦,而且没有人会和你分担,但是当你走过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曾经的坚持是有意义的,也是值得的。人活这一辈子总要做一些自己觉得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这样才不白活,也总算对得起自己。

在《新闻夜话》时间越长就越离不开《新闻夜话》,因为它的那种团队精神是你离不开的,每个人之间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利益之争,有的就是业务研讨和互相帮助。可以这么说我是和《新闻夜话》共同成长起来的,是《新闻夜话》培养了我,也是《新闻夜话》教会了我很多在大学里学不到的社会知识,它使我一点一点地蜕变,使我渐渐地成熟,要是真的说起我和《新闻夜话》那还真不是这几千字可以表述清楚的,总之无论以后《新闻夜话》是否还存在,但是毕竟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些记忆是永远也抹杀不掉的。

让我们记住一起走过的日子!



王极盛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

本期节目是在各省市陆续公布高考分数的时候做的，因为高考是当时社会的热点，而且各地又照例推出自己的高考状元，和往年一样，这些状元们马上又成了媒体和商家的宠儿。那么，年年都评高考状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当这些状元们进入大学，甚至是走向社会以后，他们能否依然保持出色呢？过度的炒作对高考状元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为此《新闻夜话》采访了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王极盛教授，他连续5年对全国300多位高考状元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研究，被称为是“中国研究高考状元的第一人”。

节目当中王教授告诉记者，其实这些状元们都是有才能的、肯努力的、而且成绩优秀、非常可爱的，和普通孩子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他们现在条件更好、更勤奋、更有学习方法而已。他对于现在女状元比例逐渐上升的现象也有一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现在的女孩子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发奋，因此在高考中往往成绩不亚于男孩。他还总结出一套高考成功的规律。第一，考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水平，是高考成功的硬件，是高考成功的基础，考生心态调节状况是高考成功的软件，起调解作用；第二，高考成功中的硬件——学习实力和高考成功的软件——心理状态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在节目当中他还坦言，面对越来越多的商业炒作，状元们已经是无力承受，他不希望这些状元过多地跟商家打交道。

我谈《新闻夜话》宣传推广工作的感受

□ 吴雪峰

2003 年的春天是不平静的，北京陷入了恐慌和白色口罩中，西部频道《新闻夜话》的所有人员也在惶恐和不安中度过了难忘的“长假”。我的宣传推广工作任命就是在散发着消毒药水味儿的办公室里宣布的，对于不善与人沟通的我，接受这样一份工作无疑是对自己的挑战。

宣传推广工作的重要职责就是宣传栏目、推介栏目，提升栏目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主要是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的沟通方式，将你的“产品”推销出去。那么，怎样提升栏目的影响力，这就成为我工作的核心。

要想推广出去你的“产品”，首先要先宣传。《新闻夜话》的“产品”就是节目。我虽然不直接参与节目的制作，但我总是最关心每一期节目内容、节目质量的人。从最初的选题策划，到演播室的录制，再到节目文案的最终出炉，每期节目的每个环节我都不能放松。只有充分了解了节目的内容，才能取其精华，抓住重点。因为《新闻夜话》的很多选题在制作播出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时效，而且有很多已经是第二、三落点了。那么，在每一期节目当中找到最有价值的新闻点、找到节目的唯一性，就是我在宣传推广时的制胜法宝。

记得 2003 年 8 月份，“皇马中国行”曾让许多中国球迷痴痴狂狂了好几天，毕竟皇马是世界足坛顶级的品牌，拥有众多超级巨星。当时所有的报纸、电视、网络统统对准了“皇马中国行”。《新闻夜话》的采访怎么才能不淹没在这众多报道中，尤其是一些体育专业报纸和网络？通过努力，栏目终于获得对于皇马队长劳尔的采访权，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当时皇马在中国接受的唯一一家电视专访。

于是我在采访前就迅速行动起来，第一时间将全国几大知名体育报刊、杂志，如《中国体育报》(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主办)、《南方体育》(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足球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中国足球报》(中国体育报业总社出版，另足协参与主办)《体坛周报》(足球周刊)等报社主要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和 E-mail 都拿到手了，并做好前期的宣传准备工作，将节目的形式、采访的内容梗概，及时地告之给这些媒体。

很多媒体在接到我的采访内容梗概后，起初并不认为西部频道的一个新闻访谈节目能将著名体育名人的采访作好，能做出比他们体育名记更有价值的采访。节目采访结束后，我和编导精心整理了文案，挖掘出其中很多非常有新闻价值的东西，例如：“皇马不是麦当劳”、“劳尔接受采访从不收钱”、“每年会有一千多家媒体要求采访劳尔，但上个赛季他只接受了 15 次采访。我们播出的是劳尔在中国期间接受的唯一一次电视专访，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也真实地感受到了劳尔的谦逊朴实，这位年薪 600 万欧元的足球巨星不但没有丝毫的架子，甚至亲自去为大家关上房门，好让采访不受打



刘清瑞　百合婚姻救助站经理

2004年,在吉林省长春市出现了全国首家婚姻救助站。这家救助站出现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少争议。在它成立一个月的时间里,受理求助20多起,成功挽救婚姻的只有3、4起。那么,这家婚姻救助站到底是不是有意义呢?为此《新闻夜话》记者采访了百合婚姻救助站的经理刘清瑞。

该救助站里只有四个心理辅导人员,针对他们都没有经过正规培训这个问题,刘清瑞经理表示,他在招聘人员的时候是开出了条件的,首先是要结过婚的,而且是懂得法律知识的,再有就是个人感情比较波折经历过坎坷的,他还表示这些条件也只是他个人的判断。而且他还告诉我们,他的父母说他是不务正业,他的朋友也不同意他做这个救助站,再加上社会上的争议,可以说,现在婚姻救助站是困难重重,他给自己定了一个一年的期限,在这一年当中,哪怕只有几个人来求助他都会坚持下去,一年之后如果还是负债经营的话,那么他就会考虑转移项目,也就是说他会放弃了。

在离婚率逐渐上升的今天,刘清瑞以他个人的力量开办了这家婚姻救助站,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离婚这种社会问题并不是仅靠个人力量就能解决的,是应该由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扰。”这些都是我后来成功将节目推广出去的很好的拍门砖。

最后很多专业的体育报纸、体育专版都转载了该期节目的文稿和图片。很多专业做体育专刊的记者认为,这次采访对足球、对皇马、对劳尔都是一个全新的注解;同时,也对《新闻夜话》这个栏目有了新的认识。宣传力度的加大,使得《新闻夜话》的影响力在不断提升。当时《中国体育报》、《体坛周刊》、《南方体育》以及北京的《京华时报》《信报》体育版都大篇幅地转载了这次的采访内容。当铺天盖地的样报纷纷飞至《新闻夜话》办公室的时候,那份成就感真是油然而生。这次很好的合作也好我后来宣传体育类节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后我们又做了《中国足球少年乌拉圭事件》、《专访陈忠和》都在这些体育专刊报纸全文转载。

对于栏目的建设和贡献,像我们的一位领导说的就很好:“分工不同,但每一个人的贡献都是不可或缺的”。有人说“做电视的,一不去采访、二不去编辑、三不作技术,这能叫电视人吗?”我把自己归了几次类,也没靠上谱;但,就是这份对电视的热爱,对新闻工作者这个称号地热切向往,对栏目建设贡献之后的这份成就感的迷恋,使得我依然乐此不疲。

《新闻夜话》2004 年 5 月份播出了《人造美女的难题》一期节目。可以说当时我们没有抢什么时效,在此之前网络、报纸已经炒作的如火如荼。我在这样的节目推广时应该抢占哪块领土?终于,我在采访后找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新闻点,嘉宾杨媛只在我们节目中说到“已经正式决定起诉”,这可以说就是我这次推广的卖点。我在当天给报社打电话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北京娱乐信报》立即决定采用我们的稿件。当然节目内容还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比如编导让当事双方同时出现在节目当中,给人的冲击力很大,观众愿意听到两方的声音,这个采访也是公平精彩的采访。这让我深深地感受到“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宣传价值寓于新闻价值之中,但两者又有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两者的统一和结合应该是我以后工作中努力追求的。节目播出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迫不及待地在地铁里买了一份《北京娱乐信报》,当读着“人造美女不堪歧视正式起诉”的大标题,看着《新闻夜话》的节目又一次变为铅字时,那份得意劲儿溢于言表,真是不亚于当期节目的编导。

《新闻夜话》现在的节目文稿和图片已经频频出现在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等几大门户网站上;北京、乃至全国各地很多纸媒体也经常引用我们的稿件,这个影响力,无疑对一个栏目进入主流媒体,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新闻夜话》,接受《新闻夜话》起到很大的帮助和推动作用。这个影响力,也是栏目开播两年来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因为他们的精彩,才有了节目的精彩,才有了《新闻夜话》的精彩!正如主任陈永庆说的“你的努力,大家的精彩”!



欧阳满满　私塾学生(左)



朱执中　私塾老师

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处，至今还存在着中国最后的私塾，那种炊烟袅袅中的朗朗书声，几乎是可以被保存在博物馆的景象。

这个地方就是湖南省平江县南江镇五角村，当地也仅存唯一一位私塾老先生，他叫朱执中，已经80岁了，他的家就是孩子们上课的学堂。教的内容是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和《古文观止》等等。私塾为什么能在这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一直存在呢？通过对这位80岁的私塾老先生和他的学生的专访，我们了解到，因为当地经济相对落后但是文风兴盛，每当婚丧嫁娶等红白事，都要有会做对联、写文章的“应酬先生”到场主持，年轻人学会这些本事之后就能靠“应酬”赚钱，维持基本生活了，所以有些初中毕业、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继续升学的孩子就来上私塾了。

但是根据我们最新的了解，朱老先生因为身体原因也即将封馆，中国最后的私塾行将落幕。而当地政府对私塾的态度本来就是不支持也不反对，只能随着一些老先生们的去世，让私塾自生自灭。

烙 印

□ 樊红叶

我不能想象她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看完了这期《新闻夜话》,又是用了多大的勇气,写完了这封信。拆开这封信,是一封叠得非常复杂、非常特殊的信件,让我不忍破坏它的完整,谁能想象她是带着多少期待把希望叠进了信的每一个边角,那叠成心形的信,只有懂得爱的人才能将它诠释。

急切的心情让我打开了信,信里写到:

"《新闻夜话》的全体工作人员:

你们大家辛苦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与你们播放的《新闻夜话》栏目相识了。那次的节目令我久久难以忘怀……那一期节目是你们采访特殊快递员——张进,还有他们成立的准时到达快递服务中心。播完之后,我激动万分,计划着也要把残疾的我改变改变,不再让生活的艰辛压迫我。我要改变成为有价值的人……"

看完了信,我这颗被是是非非折磨得早已麻木的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就像一把火红的烙铁在心上烙下一个印迹。那烙印是"心"形的,那种触动是发自心底的,那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毋庸置疑,拿起电话拨通了远在四川的她,"喂,你好,我是中央电视台《新闻夜话》栏目,你是粟红梅吧,收到你的来信了。"线的另一方声音有些颤抖,"我是,我是",我听出了她略带抽泣的声音中带着喜悦。我也感动了,有些语塞。我想这个电话对我来说只是举手之劳的一件小事,但是对于她来说,接通的却是一条新的生命线,孕育着新的生机。在简单的对话之后,她的情绪稳定了,她今年26岁,女儿一岁八个月,因为生的是个女孩,所以她受到了重男轻女的婆婆的冷落,自己的身体残疾、丈夫的平庸和生活的窘迫,使她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了,让她感到了生命的无奈。当看到这期《新闻夜话》,张进经理的一句"所有的残疾人都可以来"时,让她对生活又充满了信心,又找到了生存下去的希望,希望通过我们能给她提供帮助,到"准时到达"求职。

我不能承诺她什么,我把信的内容转告给了张进经理,并征求他的意见,能否把"准时到达"的电话告诉她,让她直接联系、沟通。张进经理非常恳切地说:"告诉她,不要用业务电话,把我们办公室电话告诉她,这样可以多聊一会儿。"我感到了张进经理的质朴和坦诚。那种同舟共济,在困境中相互搀扶的情景浮现于脑海,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战胜困难的信心。他们的身体是残疾的,但是他们的心理是健康的、是向上的,总比那些身体是健康的,心灵是残疾的人要强得多,他们有做人的尊严。这些身残志坚的人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了。

烙印深深地印在我心底,让爱的火种不断传递,让每个人的心底都打上爱的烙印,让爱就这样延续……

2003年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至今仍然活在民众心间。天安门上的主席像，就凝聚了人民对于主席的情感，而这幅巨幅油画画像的作者就是葛小光，他已经画了26年的主席像。他是如何被选中来画天安门上的主席画像的？从未见过主席本人的他是如何描绘人民领袖的？这种独特的绘画经验又是如何影响了他的性格与人生？《新闻夜话》专访了天安门上主席像的作者——葛小光，这是多年来他第一次接受电视专访。

画家葛小光讲述了自己如何根据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创作出一幅6米高，5米宽的巨幅主席像的创作过程完全是艺术家独立创作，并无任何机关来规定、来审查，葛小光将这视作一种认可，而他的作品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的情感悬挂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上，这也是艺术家的荣耀，葛小光将自己创作这幅巨幅画像的过程当作与毛主席无声的交流，从这个过程中他也可以体验到这位一代伟人的精神世界。当谈到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生涯时，他则谦虚地说：艺无止境，自己在不断地深化。



葛小光　画家



葛小光画室

电视新闻类节目合成初探

□ 宁小鸿

电视节目合成，就是对节目进行最后的包装，是节目上播出线之前的最后一道工作环节，这个工作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到节目的正常、安全播出。

不论哪种类型的电视节目，后期合成都包含四个大的方面：画面、声音、特技和字幕。

一、画面

电视是视听艺术的结合，对于电视而言，视觉所诠释的主要内容就是画面。“看电视”看的是画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画面就是电视节目的灵魂。

我们在进行节目合成时，首先对电视画面的幅形比要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对画面位置有准确的判断。我们知道幅形比就是标准的画面宽高比。但是，由于信号传输过程中的损失和接收机的调试误差，大多数家用电视机显示的图像并非整个扫描图像，而是在电视画面的四周各切掉了一个边。为了避免有用的图像信息也被切掉，电视工程技术人员又制定了两个与此有关的标准：即字幕安全区和动作安全区。字幕安全区相当于整个画面的80%，该区域的边界在家用电视接收机的扫描范围以内，保证能够显示出来。动作安全区相当于整个画面的90%，在摄像机寻像器或专业监视器上处于该区域内的图像信息也保证不会被家用接收机切掉。

在进行节目合成时，务必注意到电视幅形比，要掌握好字幕及角标的位置，在监视器中审看时要留有充分余地，在处理静止画面或活动画面时，这两个安全区的边界也是不可忽略的关键因素。

一般情况下，当节目制作进入到合成这个工作环节时，大多是编导已把画面内容粗编完成了，色度、幅度已基本定型，那就要求责编和技术人员在进行节目合成时，要注意及时调整画面色度及幅度，确保全部画面的色度和幅度限定在标准数值内，保证节目画面质量。

电视艺术的画面构图，虽然可以分解为主体、陪体、环境、空白等部分，然而在一幅画面中，它们往往是组合在一起来表现内容，构成形象的。所以在画面构图中，必然做到和谐、均衡，才能充分地表现出完整的语言形态。这样在进行节目合成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每一个画面所要表达的新闻内涵，所突出的人物思想，所展现的不同的时序变化等等，使合成后的节目画面影调和谐，人物鲜明，烘托主题，感染力强。

二、声音

电视是一门视听艺术，每一种声音都影响着观众对所看见的画面的反应，每一个画面都左右着观众对所听到的声音的反应。

既然声音在电视节目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在节目合成时就要格外注意声音的合成。编导提供的节目合成素材带中，有些



足球少年

马成全　中国足协联赛部副主任

2002年，一群去智利学习踢足球的孩子，在跨出国门的时候，国内有媒体评论，他们将书写新的史册。当时承办方公布的培训计划是把这些孩子分别安置在智利的各个顶级俱乐部里参加训练，最终参加智利的国内联赛，这样的安排在当时所有足球少年踢球项目中是级别最高的。先后有52个孩子参加了这个项目，被送到了国外。而记者采访时，这些足球少年已经有一半以上都回到了国内，其中一些人找到媒体，反映这家公司违约，甚至进行诈骗，这是当时国内关于足球留学事务最大的一起纠纷。

节目中事件当中的五位少年告诉记者，他们信任泛美亚公司的理由竟然是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时中国足协的一位官员和中国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米卢同时出现。而当时多家媒体的报道也明确地指出，中国足协是这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那么中国足协如何表态？他们与这件事到底有多大的关系？中国足协联赛部副主任马成全在节目中表示，足协会在这件事情上吸取教训，检讨一些不谨慎行为。采访结束以后，马成全告诉我们，中国足协将很快地下发一个通知，加强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自费出国培训的管理，其中特别提到要加强地方会员协会的管理。

节目的声音技术质量很差,会出现声音忽高忽低,杂音太大,声音失真,画面和声音两张皮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探究一下,有前期拍摄中出现的,也有后期编辑中形成的。

前期拍摄中声音问题表现如下:

1. 录像不录声。2. 录像机录音开关直接开至自动电平档 AVTO AVDIO LEVER。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能够依靠机器电路自动调整各种音响信号的大小,而实际上往往是有信号时录上信号,无主要声源信号时(例如讲话间歇处),则记录上很高的平均噪声,造成电视节目中音响噪声此起彼伏,令人十分难受。3. 录像机上录音开关及话筒基本正常,但是不论什么场合,有什么样音响素材,一律一成不变听其自然,信号大小不随时调整,造成了素材上音响信号有大有小,时常失真,给后期合成带来很大困难。因为当原录过小时,后期如大量加强,各种噪声会同时增大;而若原录失真,则后期怎么处理都无法改变。4. 话筒的距离、方向、位置不正确。

后期编辑中声音问题表现如下:

编辑在机器上有关音响的几个开关旋钮不注意或不熟悉。具体在下述三个功能开关上:1. 放像机的放音纽和录像机的录音纽位置正确与否不加注意。2. 限幅开关 TIMIT 处于常开状态。3. 声道混合选择开关(MIXING SELECT)。编辑在工作中只注意画面编辑而不重视声音编辑,只从画面上跳接、转换是否舒适考虑,而不兼顾音响是否连续、合理,造成同一场景音响忽有忽无,唱歌半句就断,讲话前言不搭后语等,给全片的音响后期制作造成很多麻烦。

杜绝出现节目声音质量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摄像、编导、负责节目合成的责任编辑以及技术人员同时努力,各司其职,每个人都把好自己工作环节上的关口:摄像在拍摄时做好准备工作,调整好机器;编导在后期编辑时,注意不要犯以上容易犯的错误,在编辑画面的同时,也重视声音的编辑工作;责任编辑和技术人员在合成节目时更要认真负责,仔细倾听,随时监看音量表。在进行节目合成时,对节目的内容要有一定的理解,注意声音与画面是不可分割的,声画要同步、对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三、特技

在进行节目合成时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方法,那就是特技的运用。“特技”就是特殊技巧的意思,它给人以不同寻常的感觉。

通常新闻类节目的合成最常用到的普通特技包括:直接切换、淡出淡入、叠加、快慢动作静帧、隐黑黑起等。

直接切换,是指一个画面瞬间变换为另一个画面的过渡方式。直接切换可使画面的情节和动作直接连贯,给人以轻快、利索的感觉。新闻类节目大多数画面和画面之间都是通过切换来完成。

淡出淡入,是指一个画面逐渐消失之后,另一个画面逐渐分明的过渡方式。淡出淡入是节目进行段落过渡的常用手段,可以连贯使用。淡出给人以前面一段内容已结束,将开台另一个意思的段落。淡入给人以节目或层次的开始,常常是字幕出现的一个手段。

快慢动作静帧特技,此类特技是在不改变电视标准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录像机放像时的磁带运行速度来获得。磁带速度大于标准带速时,即磁带快速前进或后退时,磁头与磁带仍接触,会产生快动作效果。快动作画面扩大了画面空间相对于时间的值,是对画面空间因素



周庆国　安徽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刑警

2004年5月底，安徽省公安厅破获了一起特大盗掘古墓葬和走私倒卖文物系列大案。在这个案件当中，境内外犯罪分子倒卖走私国家珍贵文物的数量之多，获利之高，作案时间之长，都是建国以来罕见的。《新闻夜话》采访了侦破这起文物大案的主办侦察员，安徽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的刑警周庆国。在节目中，周庆国分析了造成文物犯罪猖獗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暴利。一件文物几经倒手，从境内到了境外后，价格从几千元涨到两千万。其次，海关检查有漏洞，也是一部分珍贵文物流失到香港、澳门等地的原因。其实，破获文物案最大的难度在于抓获境外文物贩子，并且找到证据定罪量刑，因为境外文物贩子有广泛的人际网络，熟悉大陆法律，并且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以前即使能够抓到文物贩子，也很难将他们送上法庭，因为文物早已倒卖到国外，无法获取证据。安徽325文物大案最大的亮点就是，突破重重阻力，不仅抓获了境外文物贩子而且成功给他们定罪。由于这起文物大案的破获，极大地震慑了香港文物市场，一时之间香港古玩一条街上很多古玩店纷纷关门。

的强调和突出,对画面时间因素的浓缩。慢动作画面缩小了画面空间相对于时间的值,是对画面时间因素的强调和突出。慢动作画面突出了画面细节。静止画面是画面时间的流动静止,对时间值起夸大强调作用。

隐黑黑起,一个画面结束时慢慢黑下去,再慢慢黑起接下一个画面,一般用于表现一个段落的结束或者一段意思的表达完成。

在合成节目中,还要根据每个不同节目的不同情况来灵活掌握合成规定,比如每段访谈结束时,如果嘉宾在"笑"时或"动"时就要做自然隐黑,因为如果做静帧隐黑,就会使嘉宾突然定住,看起来很不舒服;另外做静帧时一定要注意嘉宾的形象,要找到嘉宾的最佳形象来做静帧。

《新闻夜话》节目是一档深度访谈类新闻节目,在每一期的演播室访谈中都会插入与内容相应的新闻画面,这些画面有时是自拍的,有时是用中央电视台其他节目或者地方台、各采访单位提供的素材,那么素材中就难免有一些台标、角标、栏目标志、唱词、标题或其他图形等,这些内容在节目合成时要打马赛克遮住,以便使节目看起来整齐、精致、和谐。

节目合成时特技的运用所产生的屏幕效果能给人以不同寻常的感觉。特技制作,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画面语言,丰富和扩展了画面语言,扩大了电视画面的表现力,使画面的表达越来越细腻。字幕和时间标志的加入,能对屏幕上的部分画面起强调作用,突出地提示与体现。改变画面的节奏,扩展或压缩动作的持续时间。即加快或放慢动作的速度,以产生抒情或喜剧效果等。以假代真、以假乱真,可以做到天衣无缝,消除或减轻制作工作中的危险性。能够进行电视画面的意境创新。具备创造性和修补性。总之,在进行节目合成时,电视特技的运用要有高度的技术性、艺术再创造性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进行特技制作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了解所要使用的特技系统的功能、特点。

2. 制定出所需特技效果的草图或构思。

3. 所需特技效果有几种实现的可能,哪种既省事,质量又高。

4. 构图问题。特技效果画面也是要符合构图规律的,有一定节奏感、平衡感。

5. 当使用压缩、合成等效果时,尽量用特写镜头为宜,否则,会看不清楚。

6. 注意主画面与分画面的和谐。

7. 不可无目的地滥用特技效果,哗众取宠。

四、字幕

电视字幕包括栏目片头、节目标题,文艺节目中的唱词、歌词、演职员名单,新闻或专题节目中的提示、注释、各种图表以及节目中的说明文字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字幕,好似条条纽带,贯穿于电视节目之间或电视节目之中,起着提示主题、画龙点睛、衔接画面和解释画面等多种作用。

字幕是一个电视节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常说的"声画合一,图文并茂"的"文",指的就是字幕,电视字幕就其性质和作用来说,大致可分为四类:节目预告字幕、片头字幕、演职员字幕和唱词字幕。

实践证明,有些电视节目只要在屏幕下方增加一行字幕,用文字弥补单纯看画面的不足,观众的收视率就有明显的增加。总结电视字幕的功能和作用,有一条是有普遍意义的,也许可以作为规律给以肯定,无论是新闻节目、专题节目还是文艺节目,在播出中,在不损

残疾人能跑快递吗？

北京一家名叫准时到达的快递服务中心的经理张进在采访时明确地表示："能行！"

2004年3月，几位腿脚有残疾，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共同创办了一家快递服务中心。这些残疾人平时走路比正常人要慢，上下楼梯都不方便，他们怎么干快递呢？很多顾客都不相信，所以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快递员到达后，顾客通常会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后，拿出10元钱，说：钱你收着，快递就算了，我们再找别人。几乎每个快递员都经受过这种自尊和自信的考验。还有每次迈进豪华写字楼时，白领们异样的眼光，都让他们觉得不是滋味。但是他们坚持下去了，准时、诚实和勤奋给他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客户，他们甚至开始有能力雇佣其他残疾人跑快递。更重要的是，他们变得越来越自信。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更是一项事业，自己也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残疾人找工作不容易，看到来这里工作的残疾朋友越来越多，张经理的脸上也越来越灿烂。他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来有一天让残疾人一提到"准时到达"，就觉得是咱残疾人自己的一个品牌！"



张进　北京准时到达快递服务中心经理



伤屏幕里每个组成画面的前提下，增加简洁必要的说明文字，不仅是观众所需要和欢迎的，而且可以加强节目的收视效果。通常节目字幕的设计、制作、叠加完成都是在节目合成时完成的，它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具体操作时，要格外注意电视屏幕用字的规范化问题。

通常每一个栏目的节目合成都有固定的格式，标题和嘉宾的名字、身份也都有固定的字体、字号，这样可以形成栏目的风格。《新闻夜话》节目主要包括标题、嘉宾名字和身份、主持人名字、唱词等，在标题、嘉宾名字和身份以及主持人名字的下面设计了一条由左至右渐渐淡下去的红线，在合成时，要根据标题字数的多少和嘉宾身份字数的长短来设置字号和字间距，使标题看起来更大方、漂亮，标题和嘉宾名字、身份下面的红线也要随着字数的长短来相应设定其长短，这样看起来比较协调，如果嘉宾名字和身份字数很多，就要做成两排，以便给右下角的动画角标留出足够的位置，方便观众的收看。

综上所述，在节目合成时，电视字幕的设计、制作，应该和节目的内容与体裁、画面与空间、构图与书法、颜色与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融为一体，更好地为节目服务。

五、节目合成要准备充分、密切配合

在具体的节目合成中，缺乏充分的准备是妨碍后期制作取得成功的最主要因素之一。编导要做的准备工作包括整理好素材粗编带；校对好字幕；核对片尾工作人员的名字，不要遗漏；对要合成的节目有全面了解；明确合成要点等。责任编辑要提前进入合成机房，了解和熟悉机器运行情况；准备好要使用的录带和包装带、商业广告带；尽早、尽快将节目所需字幕、图表设计、制作完成；了解所要合成节目的内容。无论编导、责任编辑还是技术人员，都要关注细节、不厌其烦。实际上，后期制作也是一种生产过程，因而要求各步骤之间的衔接到位。由于制作节目时大都时间紧迫、经费有限，每个工作人员都应该准备充分，避免因为准备不充分而过久占用设备超出预算；更避免因准备不充分耽误合成时间，该细致处理的画面和声音因时间紧迫而无法处理，使合成工作草草了事，从而损害节目质量。

电视是一门综合艺术，它讲究的是文学、艺术、技术相互渗透和密切结合，一个优秀节目的制作完成，是由许多部门通力合作的结果，也体现了艺术和技术的结合升华。由于技术人员在设备的功能等方面相对于绝大部分编导来说，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编导创作意图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人员，而后期制作的技术人员，如何领会编导创作的意图，在突出节目主题的基础上进行艺术的再创作，与他自身的艺术修养是分不开的。相对于责任编辑来说，从职业操守来讲要有耐心和细心，从业务程度来讲要熟练掌握音视频合成中的色彩校正、字幕与画面叠加、效果处理、元素布局、遮挡运用、声画融合、光影效果等各种应用技巧，并且自身具备必要的艺术修养，才容易与编导达成共识，运用掌握的技术优势，充分发挥自己的理解和想象能力，力争使合成后的节目有精致的画面，流畅的声音，纵深的层次感、段落感，在后期合成制作中达到艺术和技术的完美与和谐。



张兴国 绿色厨艺大使

张兴国，可能是失业频率最高的一位厨师，在几年内他12次丢掉工作，原因就是他拒绝烹饪野生动物。找工作对这位厨师来说，一直都是个难题。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仍然积极地去四处游说，试图让更多的厨师和他一样，成为绿色厨艺大使。

绿色厨艺大使，是为了保护野生动植物而设立的，是由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东方美食学院、东方美食杂志社发起并授予的。2003年为了推广拒绝烹饪野生动物的厨师的签名活动，张兴国来到沈阳，《新闻夜话》也赶往沈阳专访了他。节目中他告诉我们不去烹饪这些野生动物的理由是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他还介绍了他是如何劝说其他厨师拒绝烹饪野生动物的。

制片人访谈

中国的谈话类节目很多，从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也是各有特点。目前中央电视台影响比较大的谈话类节目有：《新闻会客厅》、《时空连线》、《对话》、《艺术人生》、《讲述》、《新闻调查》等。《新闻调查》栏目虽然是一档调查性节目，但它的特长是以访谈为主。

本章通过对上述几家影响力比较大的栏目制片人进行专访，揭示了这些栏目独有的话语机制，希望能够给大家以启示。

《新闻会客厅》制片人包军昊访谈

一、《新闻会客厅》的核心竞争力

欧阳国忠：我看你的经历挺丰富的，从中央电视台《时空连线》到《新闻会客厅》制片人这个转变大吗？

包军昊：转变挺大的。当时我们在《时空连线》，它是以谈论观点见长的栏目；而《新闻会客厅》是以谈论人物为主要对象的节目。我个人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我可能只是做单独节目的策划，到这里要负责节日运行，变化非常大。

欧阳国忠：新的开始、新的挑战。像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可能参照美国的《60分钟》，像《幸运52》也有向国外借鉴的形态，《新闻会客厅》有没有从国外的节目当中吸取养分的过程？

包军昊：据我了解，如果说《新闻调查》是参照我认为不是很准确，至少可以说是追求《60分钟》的目标。《新闻会客厅》从外观上看是谈话节目，可能大家会觉得跟其他节目有形似的地方，但是从神似的角度来说，至少在当初我们创办的时候是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完全一样的节目。

当然我们在创办这个节目之前，也是把国内外比较好的谈话节目都找来看了，也都相互做了一个比较，在做之前我们肯定要找一下自己的坐标系。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至少在我们创办的时候，脑海里是没有现成的模式和概念的。

欧阳国忠：您觉得《新闻会客厅》设计时有哪些原创的元素？

包军昊：当时创办这个节目，第一是从频道的功能和要求出发的，比如新闻频道在晚上8:30黄金时段需要一档每天播出的，对新闻人物进行采访的节目。我们点是从新闻频道的整体结构来考虑的。我们所诉求的新闻节目人物和节目形式应该是有先进思想和理念的。

我们节目是要以家庭的氛围、比较轻松、比较活泼的状态来对人物进行解读。说我们要依照一个什么参照系，我只能说国外和国内的一些东西，我们只是注意它关注它，有什么好的可以吸取借鉴，但是完全现成的模式也没有。我2003年和2004年也参加了两届谈话类节目的评奖，担任评委，基本上国内好的节目都看了。从新闻谈话类的节目来说，至少从理念上来说，我认为还没有一个完全一样的。

欧阳国忠：《新闻会客厅》还是有比较大的原创性，你认为《新闻会客厅》吸引观众的核心元素是什么？

包军昊：这其实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换句话说，你这个问题可以翻译成为一个节目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大家经常会提到，对这个事我也曾经思考过，我认为一个节目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它对节目解读方式的个性化。

这几年离婚率不断上升，让很多人都在问，是什么原因让婚姻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危机？人们都在寻找答案，2004年一部叫做《中国式离婚》的电视剧，也在尝试要找到这个答案。该剧编剧王海鸽对婚姻本质，男人女人有着独到而深刻的理解。

在她眼里，中国式离婚就是想合合不了，想离离不了，从而带来伤痛、无奈和叹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而男女之间彼此缺少对对方性别本身的了解，是造成很多夫妻间矛盾的重要原因。中国长期以来缺少性别角色教育，忽视了男女间的差异。我们一直强调男女是一样的，其实男女是不一样的，对感情的理解非常不同。比如，传统婚姻家庭教育我们，要在身心上忠于配偶，忠于家庭，身体的背叛就是精神的背叛。其实在男性身上，情和欲是可以分开的，而在女人身上情欲往往一致，这是一种人性上的差异。但是很多女性不能理解这点，看到男人在身体上出轨就会悲痛欲绝，不能宽容。

夫妻之间相处之道是什么？首先，要认清男女间差异，选择一个人，一种生活方式前要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接受这种状态。确信选对人之后，那么婚姻中就要宽容一点，糊涂一点，大智若愚是婚姻的一种最高境界。爱情就像手中的沙，攥得越紧，流失越多。爱是一种能力，要让你爱的人爱你。但是如果婚姻真的南辕北辙，那么当离则离，互相折磨只能是两败俱伤。



王海鸽 《中国式离婚》编剧



《中国式离婚》剧照

解读方式包括哪几个层面？第一是形式的个性化，作为电视节目形式是手段，但是它不是最终目的，它的个性化是非常重要的。

《新闻会客厅》的个性化应该是比较温馨的家庭氛围，在这里，来者都是客，对人善意的质疑，是一种比较融洽的刁难、一种疑问，这是它的形式。同时它的形式还包括多种秀的手段的运用、多种电视手段的运用，这是《新闻会客厅》手段的包容性比较强。

在这里面道具能用，连线能用，对新闻的演示、图板也能在《新闻会客厅》里用，这是形式的个性化。解读方式的个性化体现在主持人采访个性、采访风格的个性化，这也是核心竞争力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节目有没有个性，除了形式个性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主持人的个性。目前我认为这两个主持人沈冰和白岩松在栏目运行一年以后，需要到一个突出个性或者说打造这个栏目个性的时候了。

我们栏目倡导的个性是结合主持人本身的特性去粗存精，或者说更精细化。目前我们栏目在主持人采访个性上存在着不清晰的状态，表现在会见某位新闻当事人的时候是一种态度，在会见另外一个新闻当事人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态度。可能对不同节目是有好处的，但是对一个栏目的定位、个性化的固定是非常有害的。

第三点，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对新闻人物开掘方向的特定化。比如说主持人和形式的个性已经都解决了，开掘方向是整个团队，包括策划的意识。做客会客厅的这个人，我们要开掘他的什么东西？比如说《东方之子》开掘成功人士、精英人士成长的轨迹、他们的思想；《艺术人生》开掘的是成功艺术家对人生的意义。新闻人物特定的开掘方向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我目前不能用一个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的难题。

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新闻人物和《东方之子》、《艺术人生》人物之间的落差非常大，但是在来之前我也曾经试图总结一句话，希望在实践当中来验证这句话是不是准确的。

通过当事人和嘉宾对事实和细节层面的陈述来带动对新闻的表达。一定要是嘉宾在实践当中的亲历亲为亲感，从节目形成的状态来说，一定是大量的事实细节过程的陈述，而不是议论层面、感受层面占大量的篇幅，我们要的是事实和细节。我刚才说的核心竞争力这三个层面归根到底一点，不要忘了这是新闻节目，新闻节目的关注度、时效性是这三者当中不可或缺的。如果离开这个，其他三点都不成立。

二、寻找包容性和个性化的平衡

欧阳国忠：刚才你说的《新闻会客厅》三个核心竞争力，解读一下栏目的题目，《新闻会客厅》，新闻还是它的一个核心，会客厅是手段，新闻可以连线直接达到。作为会客厅来说，如何在新闻进程当中来突出栏目的个性？

包军昊：我认为这个问题分两个层面来回答，栏目的个性不仅仅是由细节、时效性所决定的，我认为细节和时效性是所有的新闻节目都应该追求的。至于以人物、谈话为主的新闻节目如何来追求时效、如何突出自己的细节，或者说它的细节跟别的新闻节目有什么不一样，这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我想重点说的是如何突出自己的个性。

首先从定位来考虑，我们的定位是什么？我记得当初在策划、筹备这个节目，时对我们的播出环境进行了了解，我们做的其实是新闻人物谈话类，目前在央视新闻栏目谈话类的节目都有哪些？《东方之子》、《面对面》，目前主要



许尚金 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2003年，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的检察院建立了全国司法系统的首份行贿黑名单，这份行贿黑名单是北仑区检察院重点针对当地建筑业建立的一份行贿记录档案，它收集了1998年以来在建筑领域内行贿者的相关资料，根据下面的情况罗列出黑名单：

一、因行贿罪而被法院判刑的；二、虽未判刑，但法院判决认定的，贿赂事实中行贿数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三、被检察机关查实，有两次以上行贿记录的或行贿三人以上的；四、检察机关已有确凿证据证明其有行贿事实，但本人未主动交代或拒不承认的。

检察院手里的这份行贿者黑名单将会提供给北仑区的招标单位，名单上的人如果参加这个工程的招标，很有可能会被取消资格。《新闻夜话》栏目专程到宁波采访了北仑区检察院主管这份行贿黑名单的副检察长许尚金。

就是这两个。播出形式和时段与我们类似的就是《面对面》。

要突出自己，首先定位要非常清楚。我们曾经画了一张新闻的大饼，有一部分是属于动态类、消息类的报道，这一部分我们不要。还有是专题类的，以影像和现场采访为主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这去掉，也不是我们的份额。剩下的部分是新闻人物，这是我们要做的。

但是在我们开播之前，《面对面》已经开播有一年了，这一块先划掉，它的特点是长篇人物访谈，一周以来关注度比较高的、比较有开掘深度的一些人物的访谈，我们现在排除一些。

但是我们发现在新闻人物这一块还有很广阔的天地，我们可以做的地方还有很多。我们主要是通过事件当中的人，嘉宾的亲历亲为亲感，通过人来解读新闻。

我们重在说的是人与新闻之间的关系，除了新闻当事人以外还有新闻观察人员，不仅有新闻当事人还有新闻当事人的关联人，包括嘉宾、专家跟当事人的组合，一同走进演播室，这样把新闻的丰富性、多样性就做出来了。《面对面》更多突出主持人个人的性格和风格——我要质疑。我认为它的个人化风格比较重，《新闻会客厅》栏目的风格和特性相对重一些。

欧阳国忠：作为一个谈话类节目吸引人的元素一个是冲突、悬念，看国外的一些谈话类节目时就会觉得，你想了解的是政要人员的生活或者是事件，我可以看某某谈话节目；要看女性方面的，可以看某某一档的谈话节目。如果是看《新闻会客厅》，我要在看什么节目时会选择它？

包军昊：在《新闻会客厅》开播之初，有一个对联“死磕 高官贵人；勤会 布衣平民”。我们想在节目里只会高官贵人、只是布衣平民会很单一的，如果我们是一个周播节目，这一点不成问题，但是做日播节目的话，节目的吞吐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新闻有淡季、有旺季的，在淡季的时候，你想做到人物的单一性很难。

所以包容性多了以后，造成了客观的结果是大家觉得我想看某一类的人不是特清晰。当然我不是说为我们自己开脱，说我们不清晰有模糊的地方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做到无论什么样的菜进到我们这个锅，都用比较一致的方式去炒这个菜。白菜也好，肉也好，到我这里出来的都是鱼香肉丝。但是要做到进入的人员落差不要太悬殊，今天是一个高官贵人，明天又是一个布衣平民，的确是有这个问题。

欧阳国忠：你刚才拿做菜来打比方，进来的菜我们做出来的全部都是湘菜馆，菜里有海鲜，有泡菜，进入鲁餐馆做的就是鲁菜。

包军昊：在入口这一块我很难把住，作为周播的“菜馆”，我能够做到只进青菜，不进荤菜，它的定位很清楚，我这里就是一个蔬菜馆，我这里就是一个荤菜馆，但是我们很难，青菜得做，鲍鱼也得做。

三、策划瓶颈和宣教思想

欧阳国忠：作为一个制片人，怎么样处理好播出量和质量的关系？

包军昊：当制片人之后，播出量的压力一直是最头疼的，今天晚上的客人是谁？要拉客进来，稍微一放松，就面临着无菜可做的局面，量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经常面临的痛苦是量做到了，回过头来质很难保证，保证质没有别的好的方法，只能通过管理，通过标准化程序，保证所有进来的菜都能够不走样，基本上一个



冯小刚　电影导演

2003年底，又到了贺岁片上市的时间，广大观众对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手机》期待值最高。

《手机》讲的是，电视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守一，因为有一次把手机忘在了家里，手机里的秘密被妻子发现，因而引起了一系列的麻烦。《手机》这部电影仍然是人们熟悉的冯小刚电影模式，讲的是人们熟悉的生活，用的是人们都熟悉的冯小刚电影老班底，像葛优、徐帆、张国立，但是《手机》这部片子还能像冯小刚往年的贺岁片一样受到观众的欢迎吗？在《手机》公映之前，观众的议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冯小刚是否在不断重复自己。对于这些评论，冯小刚表示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他很满意自己始终在不断创新中进步，不像许多导演只会模仿别人。

味。但是这只是能做到标准化的第一步。

我觉得这是给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现在第一年主要解决的只是做到了标准化，在标准化的基础之上，能够做到让这个节目更有生命力、更有活力。更有活力从结果上来看体现在节目上，其实在过程当中出现在每一个主创人员。不能说按照制度我给你做出来了，但是主创人员发自内心的创造力又需要团队的建设。

欧阳国忠：刚才你谈的节目只是一个表现，通过节目质量的高低体现的就是管理，管理是把整个团队朝一个方向发展的手段，作为制片人是一个栏目的管理者。《新闻调查》把栏目资源引入到这个栏目当中，《时空连线》在内部实行评委会的制度，作为《新闻会客厅》你们是怎么保证流水线质量的统一？

包军昊：首先我要谈两个对谈话节目的基本认识。第一个基本认识，谈话节目的龙头是选题，选题为王这是一个基本认识。对于谈话节目谈什么太重要了，要紧紧抓住这个龙头，为了抓住这个龙头，在考勤制度表上把选题的数量和你做节目的数量划等号，换句话说你一个月可以一期节目不做，你可以找四个选题，同样可以完成你的工分。

第二个基本认识，策划是谈话节目生命力的源泉。在工作流程、工作环节上相应也要做一些改变，比如说实行策划法人制，你要对这个节目的成败、运行，包括最终的结果负主要责任。

策划一个人的智力是有限的，要做到智力最大化，实行头脑风暴法。每期节目都有四到五个人参与风暴，提出意见这是必需的环节。我们的策划就相当于是申请立项的项目承包商，我要立项可行性在什么地方，风暴会的成员提出质疑的、批评性的意见，他要为自己辩护，最后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形成一个最终的意见来策划实施，不行的话要修改。基于以上两个基本认识，在管理上还实行了一个大的改变就是重心前置的工作流程。

很多专题节目在后期制作花的时间很长，后期提升的空间非常大。对谈话节目来说，后期可提升的空间非常有限，只要节目录完了，后期想修改很难，认识到这一点就要重心前置。等到节目录完之后或者是后期制作时就是无足轻重的工作，我认为70%在前期，策划、风暴会、跟主持人的讨论沟通、对嘉宾的选择、选题的筛选，这都是在前面的，这些工作完成了，该进入后期时，后期的节目可以不用看，我已经知道后期的节目是什么样了，非常清楚。

为了实现重心前置的流程，在考评、激励机制上也要做一些变化，比如说实行过程管理的方式。

以往的专题节目评论部的很多考评办法是“用片子说话”，实际就是用结果说话，这个结果的确能够反映出来策划、编导做了多少工作，但是对于谈话节目来说，这个结果很大反映出策划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多少工作。

由于一个策划出方案经过风暴会来修改，经过主持人现场发挥，再出来之后，很难看到策划在这个节目当中有多大贡献，考评的话要强调过程管理。要把策划的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摘出来，要分开。

欧阳国忠：中国的谈话节目可能是“伪谈话”，这和策划有没有矛盾？

包军昊：有，跟主持人也有关系。但是我认为目前《新闻会客厅》重要解决瓶颈也是在策划环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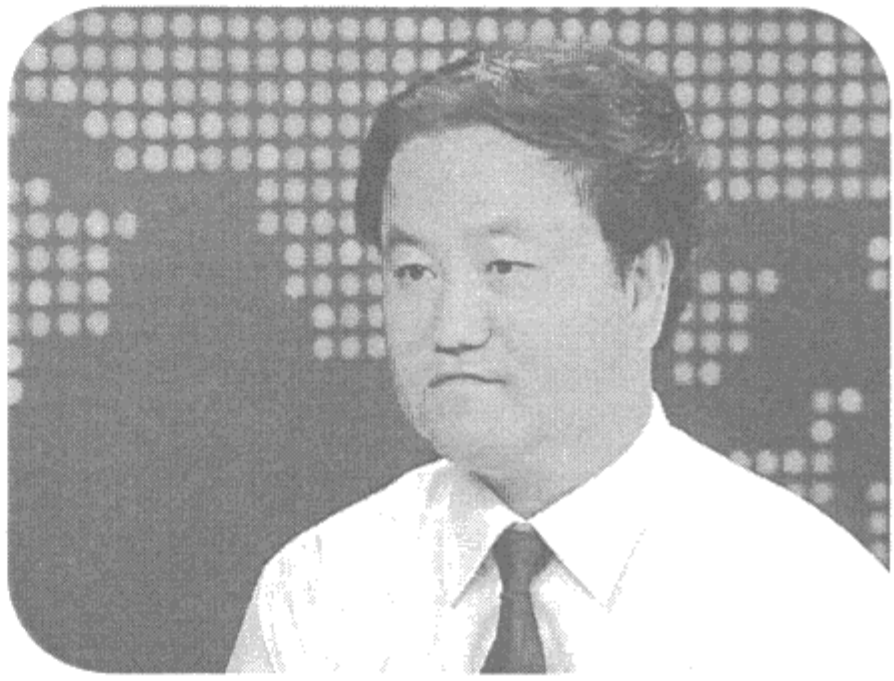
策划是大家整体平台要达到一个水准，有

到2004年，美国的9.11事件已经过去了三年的时间，但是人们对空中安全的担心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世界各国都在为避免这些事件的发生，想尽了各种办法。

中国的航空安全一直受到各方称赞，而且不断地加强，2004年7月，中国的“空中警察”队伍组建完毕、全面上岗更是受到全世界关注。但是出于安全考虑，这支队伍一直没有在媒体公开亮相，相当神秘。

但是，空中警察在飞机上有执法权，他们可以干涉乘客的一些违规行为，又随时会和普通乘客发生联系，人们需要了解这些“空中警察”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有什么能力，他们的具体职责有哪些，权力有多大，这些职责权力和普通乘客之间，会有多大的关系？

中国民航学院空防安全研究所的所长林泉，他曾经参与了“空中警察”队伍成立的论证工作，他在节目中终于揭开空警的神秘面纱，一一回答了上述问题。



林泉　中国民航学院空防安全研究所所长



空中警察训练中

一个共识，可以下一步来讨论主持人的问题。“伪谈话”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是一个认识或者是意识的问题。我作为一个策划、作为方案的设计者时不时地问问自己，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吗？是一个有效的问题吗？是一个老百姓能够听得进去的问题吗？有了这样的意识不难。

比如说最典型的是问一个金牌获得者，你拿到金牌时心里高兴吗？这其实就是典型的伪问题。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技术问题，重要的还是一个认识问题。认识问题要解决的话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接触过，比如对待新闻的立场要客观、中立，不要太贴，不要把进了会客厅的新闻人物都当成是正面人物，不要把他们都当成劳模来进行采访，这都是根子里的意识问题。

但是现在传媒的很多人员受了多年宣教思想的影响，很多方面不自觉地就要靠，不自觉地就要把进来的人往好人方面塑造。新闻节目的品格是无论你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好人或者是坏人，到了这里都应该以中立的态度对待你，可能我外在表现是非常热情的，来者都是客，我可以对你热情，但是提的内容一定是非常中立的，同时写解说词有时也非常头痛，我们编导在写那些形容词有时不由自主地往上贴，给别人脸上贴金，把自己的立场都贴没了。

四、节目的长远生命力在于主持人

欧阳国忠：谈话节目是一个提问艺术，主持人在这个节目当中是占很大比重的节目形态，白岩松、沈冰又是中央电视台非常有名的节目主持人了，他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目前的位置是什么样的？

包军昊：非常重要，一个节目的个性化、一个节目长远的生命力归根到底看主持人。这样一个说法大家都不会否认，谈话节目归根到底是主持人的节目。我现在做的工作，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自己像职业经理人，我要做到主持人品牌的保值和增值，不能说这两个主持人都是有一定的知名度，在这个栏目知名度有所下降，美誉度有所下降，这对我来说可能是压力非常大的，怎么强调主持人的作用都不为过。为什么我说目前的《新闻会客厅》下一阶段主持人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呢？

一个是从瓶颈的比较来说，我认为策划环境是比较重要的一点，解决问题分阶段，等这个阶段解决之后，主持人的性格特点前面也说到了如何来打造，如何解决提问有效性的问题，下一个阶段会跟主持人就个案不断地进行沟通。

欧阳国忠：你在全国的谈话节目当中也参加过很多评奖，也研究过国外的谈话类节目，你觉得国外非常成功的谈话节目，他们的操作流程和我们有什么不同？比方说主持人的问题是不是已经设计好了，然后再由主持人来发问？

包军昊：我认为国外跟国内很大的不同就是，对于谈话的禁忌非常少，如果有的话，非常明确就几点，比如种族等等要少说一些。

我们的新闻里尤其是热点新闻、敏感新闻，条条框框比较多，或者是一些规定性的东西。既有本身属于新闻的内在的知识性的规定，同时又有口径上的一些东西，要求主持人、后期队伍提供大量的知识准备，跟国外比起来，我们的策划团队做这方面的工作要比国外具体一些。

国外也是后面有一个团队为主持人服务，



徐光玮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

每一种新药，在吃到我们嘴里之前，都必须要经过四道试验。有一道试验是在动物的身上进行的，还有另外三道试验是在人的身上进行的。你会不会参加这样的试药试验呢？2002 年在北京的各大医院开始公开招募这样的试药志愿者，这也是建国以来国内第一次公开招募试药志愿者。

现在除了很多国内的制药厂商开始公开在医院里面招募试药志愿者以外，很多大型的跨国制药公司，比如像辉瑞和莫克也已经开始投入了很多的资金，在中国进行制药试验。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参加到试药志愿者的行列中来。

节目中一位试药志愿者为我们讲述了她的试药经历，同时中国抗癌协会的理事长徐光玮告诉记者，在试药行为开始时，医院会跟试药者之间签订一个知情同意书，也就是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会告诉这些参加试药的患者，他们可能承担的风险，他们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保证病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患者的利益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他是分小组，这个小组里有外联员，他们叫约请员，专门给客人打电话进行联系，可能也会有策划，大概会有几点，但是他们写的这几点不像我们是一个节目比较详细的操作方案。各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

欧阳国忠：举一个美国节目为例，包括哪几个工种？

包军昊：策划都有的，他们叫约请员，我们有的叫统筹或者是策划，因为策划需要有提前沟通，基本上环节都是差不多的。我觉得在主持人的环节他们的自由度更大一些，他们真正做到了主持人负责制，主持人是这里的核心环节，他会组织这个团队，按照他的意愿来进行生产。

欧阳国忠：中国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和国际上发达国家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差别在哪里？他们看起来很轻松幽默，看他们的谈话节目有哭有笑，非常自如。

包军昊：该哭的时候就能哭，而且要敢于哭，该笑的时候人家能够笑，而且笑得非常真实和自然，不同之处在哪里？CNN 的副总裁到北京来，我曾经也跟他进行过沟通。他说了一个印象，说你们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都非常的年轻，这是让我们想象不到的，他们那里的主持人一般都在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很多，这其实也是我们感受比较深的。

为什么能够做到该哭的时候能哭，而且敢于哭呢？这是有一种生活的底蕴、生活的阅历，他有这个自信，我认为在这个节目里我哭出来不会有问题，很自然，经验的积累非常多。目前我们新闻主持人偶像化、年轻化非常要命，背后只能靠一些团队来支撑，同时一些主持人社会活动非常多，不敬业，对新闻的投入不够，所以需要依赖于团队在背后撑着。

我认为一个主持人要想有所成就、要想走得远，新闻节目主持人必须先从一线干起，原来央视新闻评论部也是这样的想法，要从一线开始培养新闻评论员、新闻主持人，我希望这种想法和做法能够持续下去。

欧阳国忠：这个想法有开创意义，中国和发达国家谈话节目的差距，你说了国际上是以主持人责任制的，中国谈话类节目是后面的团队来支撑着主持人。

包军昊：主持人中心制，现在在中央电视台不是不能够实现，完全能够实现，重要的是主持人要能够，而且可以成为这个栏目的负责人。

欧阳国忠：还有一点可能是主持人自身的修炼是不是到了那个程度，能够完全实行这种角色的转换，请那么多团队给他做支撑工作，他能够担当下来，您认为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包军昊：我之所以说，目前重要的环节不在主持人，是因为我相信主持人会有一个自己的追求，他会比策划、比制片人更着急，因为他是节目最后的一棒，更要拼全力撞线，往前冲，基于这样，我觉得主持人不是问题，当然主持人有问题的话，我们也会想办法来解决。从长远来看，国外的经验是主持人一定是有生活阅历的，对社会的洞察非常自如，无论来一个什么样的人都能够挥洒自如。

欧阳国忠：对于一个谈话类节目的操作流程来说，一般的谈话节目是话题确定之后收集资料，对当事人进行广泛的了解，资料收集，之后是主持人和当事人见面，再进一步是请他到



陈忠和　中国女排主教练

1986 年中国女排在世界大赛当中完成了五连冠，然而在接下来的十七年当中，中国女排陷入了长期的低迷状态，几乎从观众的视野里消失。2003 年的 8 月——中国女排终于捧得了一个久违了的冠军，世界女排大奖赛冠军，这是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这项赛事的冠军，也是十七年来，中国女排在五连冠之后获得的第二个世界级大赛的冠军。在这次大奖赛的决赛阶段，中国女排五战全胜，并且以三比零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俄罗斯女排，最终夺冠。在赛后中国女排的主教练陈忠和接受了《新闻夜话》的专访。从 1979 年进入国家女排成为陪打教练算起，陈忠和已经在国家女排工作了有 20 年。

在采访中，陈忠和表示："这个还不能算扬眉吐气，因为真正的扬眉吐气应该是在今年的世界杯，或者是明年的奥运会。我们的目标就是今年世界杯能够争取这支女排第一次拿到参加奥运会的入场券，明年奥运会争取能够升国旗奏国歌，得到奖牌。最迟也要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夺得奥运金牌！"仅仅事隔一年，陈忠和对全国观众的承诺都已经提前兑现，2003 年的世界杯和 2004 年雅典奥运会都获得了冠军，一切都是那么完美。

演播室进行一些现场的录制，你们是这样的吗？

包军昊：主持人尽量不跟当事人见面。

欧阳国忠：为什么？

包军昊：经常有这种情况，主持人提前和当事人见面之后影响那种感觉，泄气了。

首先把那种气给泄掉了，如果见了一面再进演播室，说出来就显得假，就像是演给观众看，我们认为那种状态也不好。新闻节目要强调真实性，真实性要表现在内容、状态上比较真实。比如我们曾经纠正过一个细节，在演播室里沈冰介绍嘉宾时，要跟嘉宾握手，在节目研讨时就提出，首先你跟这个嘉宾握手，肯定不是在节目里第一次握手，你是在人刚一坐下来时就已经握了，这是人之常情.

如果给观众介绍一下再来握手，这代表你个人的握手，显然就有一点演的成本，后来就把这个细节拿掉了。为了尽可能真实，让对方对主持人保持一种新鲜感，主持人与对方也保持一种相对的陌生感。其实主持人对他已经不陌生了，到这里来主持人是假装未知，好多事情我不知道，要通过你在这里解读。如果之前主持人和他有很好的沟通，很多事我知道了，在这里假设不知道，双方都在演，那就很要命了，要演只能主持人一个人演，当事人最好别见。

欧阳国忠：现在国内的谈话节目，还有一个问题是对被采访者了解得太透了，我对他都了解，要反过来假装我对他不了解，进行追问，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你怎么演还是有痕迹的。国外的谈话节目有一些很意外，主持人脸上表现出一种很惊诧的表情，对被采访者了解到什么程度是比较合适的？

包军昊：我认为主持人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更多的信息，了解各得越多思路越清楚，提问时针对性越强。要纠正一个词，就是刚才说的演。演的状态最好要跟做假区分开，它还是一个真实的状态。主持人应该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去问当事人，如果你真的一点也不明白，没关系，这是一种真实的状态。你可以对他新披露出的信息和事实不明白，但是你绝对不能不明白整个节目是要干什么的。我明白的是一部分，不明白的是另外一部分。

五、《新闻会客厅》的借鉴意义

欧阳国忠：还有一个观点“细节决定成败”，地方电视台对中央电视台谈话类节目的操作经验是非常看中的。作为《新闻会客厅》在栏目操作上有哪些细节是有借鉴意义的？

包军昊：目前我认为《新闻会客厅》值得批判的东西还挺多的，值得借鉴的还真不好说，只能说是一堆的经验教训，可能要发展到一定地步时，我们再来谈这些。

欧阳国忠：节目好不好看关键在细节怎么样，为了挖掘出更多的细节，你们的编导、团队作出了哪些努力？

包军昊：一个是预采访，我现在是非常不满意，做得不够。我了解了一下《艺术人生》的编导要采访一个人，比如采访宋丹丹，他可以去找五个不同的人了解有关她的情况。我们的编导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往往是找一两个人打打电话就算了，所以这一点是我非常不满意的。

欧阳国忠：我了解到《艺术人生》采访一个人要见很多次面，想方设法从当事人身上获取很多具有信息承载能力的道具，你刚才也说了





赵廷显　北京密云石城镇村民

“愚公移山”的故事估计很多人都听过，但是相信没有几个人会真的认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有愚公。在北京市密云县石城镇石炮沟村有一位名叫赵廷显的老人被当地人称为“当代愚公”，这位老人已经七十三岁了，就凭着一双手一把镐头，花了整整十三年的时间，独自修出了一条山路，使得高山峻岭再也不能阻挡人们的脚步。据他的邻居讲：“他从来不计较自个儿得失。村里头决定给他补点儿钱，可他不要(钱)，‘要图这点儿钱，我还不修它’，就是为了这些孩子上学走着方便，使村里头村民上镇里买东西走着方便，上班这么多人走着方便。”为了修路，老人的腰直不起来了，手指也弯曲变形永远伸不直了。不仅如此，他还要求他上大学的孙子放假回家的时候也帮他一起修路。老人质朴的言语深深感动了电视观众，节目播出后很多观众打来电话，希望我们代为转达他们对老人的敬仰之情。

利用的表现手法要多元化、丰富化。

包军昊：秀，我想是这个节目极力主张的特点，但是这方面做的不够，问题在哪呢？主要也是日播节目强调时效，很多时候只要求最低标准，没有时间了可能就放了。我理解新闻是道具、谈话语言等多种手段和因素的综合运用，像秀。

比如有一期节目《家里有五胞胎》，有一个随机秀，他们在聊天，五个孩子在那里爬来爬去，这是随机秀，我觉得这些应该发扬光大，做的还不够。但是秀也有一个误区需要杜绝，就是把秀当幕了，秀是一个手段，一定要是朴素的、自然的，不能太花哨、太过了，毕竟是新闻节目，应该是跟内容结合紧的地方来运用。

欧阳国忠：你们的栏目定位是以新闻当事人来谈目前最关注的热点和新闻关系，这里面家庭很温馨的氛围有没有矛盾？氛围和新闻的冲突性？

包军昊：不矛盾，对我们来说主要是客人愿意进到演播室，愿意进到客厅就意味着他愿意接受客厅里各种善意的质疑、善意的为难，表明他已经愿意接受了。并不意味着主流的、硬的新闻就一定是元素的，一定是冷冰冰的，不排除有这样的因素，但是我们节目的特点是要给坐在家里的这些人看新闻人物的音容笑貌，同样不能西装革履非常严肃地跟他们谈，应该是一边喝茶一边来聊天的状态。这不矛盾，恰恰是要把我们的个性和特色进一步光大。

欧阳国忠：你看了东方卫视的《东方夜谭》，看起来比较轻松，在这方面你们有元素吸纳的计划吗？

包军昊：会客厅的包容性非常强，从形式上来说不会拒绝任何有效的方式和手段，都是可以的，目前我们在提倡主张，可能偶尔有些节目也都试过一些元素。但是最大的困难就是在于日播节目的量、速度上来之后，没有办法兼顾这些东西，在手段上我们一点也不拒绝。

另外说到轻松、活泼的引入时，我觉得谈话节目有一个特点叫形散神不能散，我可以是东拉西扯聊天，但是中间的神是一定不能散的，是一定要通过人物解读新闻的，一定要突出人物性。否则的话我们做的就不是会客厅节目了，我们做的是《锵锵三人行》，或者说我们做的是论坛，这一点我们一直是有警觉的。

第一，我们做人物不能把它做成话题，但是可以用话题的方式来破解人物；第二，话题不能做成论坛，论坛和人物类型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有一期节目，我们跟《央视论坛》的嘉宾是可以互换的，整形美容40年的专家，上《央视论坛》也可以，上我们这里也可以，这样的人做出我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其实非常简单，谈话节目永远是有三个曾经的东西，事实、感受、评论。

《新闻会客厅》主要是当事人注重说事实和细节层面，以这个为主的，整形美容专家要来跟我谈，同样是美容界的一些问题时就不能与事无关，你要亲历亲为亲感地来跟我说。这时当事人要坐到《央视论坛》时你说的是你的观点、看法和认识，观点在先，肯定也会举一些例子，但是这些例子是不是跟你个人经历有关，是不是亲历亲为亲感已经不重要了，我们是有你的叙述来论证或者是得出一个论点。

主持人的观点可能不是像《央视论坛》那么鲜明，我们要讨论什么，在会客厅里主持人是揣着我的观点，通过嘉宾的讲述来得出一个结论，验证一个结论。我们的主持人在这里是带着问号前行的，在论坛里是要带着观点，按





郎朗 钢琴家

郎朗，中国第一位受聘于世界顶级乐团柏林爱乐乐团和美国五大交响乐团的钢琴家，他的第一张唱片就冲上了全美唱片畅销排行榜的第一位，而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把他称为是炉火纯青的世界级演奏大师，他自己更是把自己看成是划时代的中国钢琴家。他张扬的个性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同时更需要人们的理解。

《新闻夜话》采访他的时候，他只有21岁。2003年8月31日，郎朗在北京的保利剧院举行他成名之后在国内的首场独奏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的门票卖到了1000元人民币，人们来看郎朗演出，同时想了解，是什么成就了这位少年奇才？我们在郎朗的专人休息室里，对他进行了专访。

采访中，郎朗依然出言不逊，充满自信。朗朗认为，作为一个演奏家中的领军人物，能在同一个时间内，把各种不同性格不同想法的人，能够把他们的情感聚集在一起，而且都来聆听你的音乐，这是最重要的。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在节目中，郎朗还回忆了自己的成长历程，讲述了自己演奏中的感受，也顽皮地展示了自己的手，表达了对这双手的格外关照。郎朗的嬉笑顽皮展露无遗，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好。

照观点来前行的，这是我们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是我们跟《央视论坛》的区别，是我们这一类人物谈话节目和很多谈资类、谈观点类的区别，因为人物来了有可能做成论坛，这是中间的要害。

欧阳国忠：你刚才说的这三点非常重要，一个谈话节目做不做的好，谁说、说什么、怎么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你的理想当中，你将来想把《新闻会客厅》做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包军昊：高关注度。谁说？由关注度非常高的人说。对我们来说是操作环节，如何把人第一时间请进来。谁说？这是比较关键的。怎么说？主持人的采访更有个性化，让这个人说得非常过瘾、观众听得非常过瘾，节奏的把握也比较符合现代观众的收视习惯，两三分钟一个环节就结束了，这样收视效果感觉会不一样。

归根到底新闻节目没有别的秘诀，我做了十几年新闻，我的印象是无论你是什么形式、什么花样，只要给大家在第一时间解决大家最关注的事，那你就成功了。



朱杰　成都市公安局刑侦局副处长

曾经有一段时间，成都的涉黑犯罪比较猖獗，这些犯罪团伙渗透到了交通运输、娱乐、电脑、农副产品等等许多市场和行业，但是经过持续十年地不断打击，尤其是2001年打掉了王勇、叶雏等等涉黑犯罪团伙以后，成都再没有出现新的社会犯罪，原因是，成都警方已经初步形成了打击涉黑犯罪的工作体系，善于从不同的案件当中，发现这些犯罪的关联线索，这在全国都是比较先进的。《新闻夜话》专访了成都市公安局刑侦局的朱杰副处长，他被一些人私下称为是“成都反黑第一人”，更有些犯罪分子内部悬赏50万要买他的人头。





《时空连线》制片人刘爱民访谈

一、《时空连线》关注正在进行式的新闻

欧阳国忠：你当时从部队出来，一下子跨入到《焦点访谈》，发生了什么故事？

刘爱民：我以前在部队也是做新闻，不是人们想象的拿枪子弹，我在部队做报纸新闻，有比较稳定的薪水、住房，超级保障。但是也给你超级的压抑，你感到精神上思想上很多方面无法实现自己的想法。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变成非常苦闷的东西，就需要突破它。

1996年正好有一个机会，访谈那时候刚刚开播不久，当时评论部的副主任袁正明，请我试着做更加大众化的传媒，不要局限在军队报纸一小块。那时候到中央台来，一做节目就非常喜欢，当时顺势就留下来了，没有特别的故事，就想改变自己的人生，换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做记者的生活状态。

欧阳国忠：当时吸引你的是不是一种责任感？

刘爱民：当时我来到评论部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评论部的八个字“平等、前卫、公正、求实”，当时是评论部的部训，看到这八个字对你是非常大的召唤力，八个字里面，每个字都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记者人的身份。《焦点访谈》国内第一个舆论监督栏目，你感到在那儿有话语权，你想说的东西，你感受到的东西，你思考到的东西，在那儿有表达的空间和权利，这在其争他媒体是得不到的。

欧阳国忠：我当时看到你在《焦点访谈》做了不少节目，非常有力度，最近看了《时空连线》播出的好节目，包括湖南嘉禾强制拆迁调查，非常过瘾，你能否用一句话来概括《时空连线》的新闻特色是什么？我作为一个观众要看《时空连线》，吸引我的最主要的理由是什么？

刘爱民：我们把《时空连线》定位概括为两句话，“以现场调查为核心的记者现场报道，以不同当事人争论为特征的多元化平台”，第一强调的是记者现场调查，第二强调的是多元化的平台，不是一种人、一种新闻当事人表述的平台，而是多元化的思考和判断空间。

刚刚说到《时空连线》近期播出的节目，嘉禾拆迁、沈阳拆迁，最吸引观众的是现场式的调查方式。嘉禾报道连续四期节目，每天都有新进展，是正在发生的突发事件或者重大事件，记者在进行现场调查，每天告诉你新的变化是什么，可能发生的变化是什么。以前做《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是回过头再去调查采访的情况偏多，《时空连线》针对的是正在进行时态的事件，跟生活是同步的，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将正在进行的事态揭破开，找到事实的真相披露出来。

欧阳国忠：同样关注新闻，新闻的调查性，《时空连线》是关注正在进行式的新闻，还有一





张淑琴 中途服务站创办人

西安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民间组织——中途服务站，专门来帮助那些刑满释放的人。中途服务站最早是在1997年创办的，创办人是警察张淑琴，到今天为止，服务站已经先后帮助了将近100位刑满释放人员。从2001年以后，服务站不再接受男性，转为专门救助女性刑满释放人员。同时张淑琴还在西安和北京两个地方，办起了儿童村，救助那些因为父母服刑，而没有人抚养的孩子。

本期节目采访了曾经在服务站里接受过救助的张秀英。张秀英是陕西宝鸡人，结婚之后，因为长期受丈夫的虐待，1998年她在自我防卫的过程中杀死了丈夫，被判刑。2001年出狱之后，张秀英曾经在中途服务站接受过救助，现在她是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另一位接受我们采访的，就是中途服务站负责人张淑琴，她同时还是陕西省少年管教所的助理调研员。在节目中介绍了服务站创办原因、对这些人员的帮助及面临的困境等。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是国家负责协调刑满释放人员帮教安置的政府机构，他们认为中途服务站的工作是具有创造性的，他们为那些刑满释放人员在监狱到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做桥梁。

个特点是多元化平台和连续报道。

刘爱民:这是《时空连线》特有的特征,这样做新闻记载国内包括央视包括地方电视台,很少新闻专题节目这样去做,这样涉及到投入,涉及到记者资源,使用的量非常大。嘉禾这四期节目,前方投入五个记者,后方三个人,加起来八个人,但是当成一个系列的话,社会效益是非常不错的。

欧阳国忠:这样一个报道能够缓解播出压力?

刘爱民:通常《焦点访谈》做节目就是两个人,一个摄像一个记者,不可能三四路记者拍一个事情。我们做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的时候,一路记者显得势单力薄,我们同时四个记者在现场,还派了一个专家到现场,多路采访第一能够保证在最短时间内把事实采访清楚,保证在对方说情之前把节目播出去。多路记者能保证连续性报道,今天一期明天一期凸现《时空连线》的特点。

欧阳国忠:前方记者和后方记者如何配合?

刘爱民:前方记者主要是新闻事实的采访,在思路上前后方记者是一致的,前方记者不负责编辑,只是传送素材回来,后方记者负责把所有的素材重新梳理和编辑,重新进行包装做成节目。《时空连线》有一个编委会,由主持人、主编、制片人组成,每期节目由编委会总控。

但是落实到具体节目,每个具体节目分给某一个具体的主持人、具体的编导和具体的策划来做,当一个选题编委会认为可以做的时候,就把选题方向分配给一个具体的工作小组,之后工作小组包括主持人包括前方编导、后方编导,参与这个节目所有人员组成临时的工作小组。

进入这个过程的时候,编委会完全靠他们的创造自主发挥做这个节目。完成之后编委会对节目进行预审,编委会是《时空连线》的灵魂机构,保证所有节目的水准不会大起大落,就像生产线一样,要保证生产线的每个产品都是合格的,节目生产出来永远质量比较均衡,这是专题节目比较成熟的标志。

二、《时空连线》运行机制

欧阳国忠:运行机制怎么样?

刘爱民:我们有一个议会制,每天有两次会,上午 11 点左右编委会有一个会商制度,每天坐在一起大家聊今天感兴趣的新闻。在聊天当中,在调侃当中,我们就定下来两三个选题可以操作,这两个选题怎么操作,基本的操作和方案确定下来之后,交给具体的主持人、编导、策划去做,每天下午 2 点钟左右这个时间正好是《时空连线》节目的重播时间,编委会召集所有《时空连线》在家人员看当天节目,主要是对我们节目本身的评议,评议当天的节目,主要以批评为主,非常不客气的批评都有。

通过这么一种制度提升团队的整体新闻素质,编委会平时非常即兴的会很多,一会儿新的选题来了,编委会要协商,节目做完编委会要进行预审。《时空连线》的会特别多,但是这种烦琐的会保证了《时空连线》节目质量的均衡。

欧阳国忠:在嘉禾报道当中引入一个专家,这个比较新奇。

刘爱民:嘉禾报道当时记者到了现场之后,完全陷入当地政府设置的情景之中,他会给你看很多材料证明当时嘉禾的拆迁活动是



罗伯特·盖勒普 美国魔术大师

罗伯特·盖勒普被全世界公认为是当今大卫·科波菲尔最有力的挑战者，他以九死一生的搏命逃脱震惊世界，不断爆出冷门，创造奇迹。

他是世界“逃脱术”的鼻祖、已故最伟大的魔术师胡迪尼的门传弟子，被誉为“现代版”的再世胡迪尼。6大洲22个国家的200多家电视台播放过他的节目，他的表演风靡全球，观众给予了最大的认可和追捧。

2002年8月14日，盖勒普来到中国长城脚下，为中国观众表演高空逃脱术，而且以“中国儿童基金会安康计划西部行”爱心大使的身份为西部失学儿童募捐，演出所得全部捐给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栏目借此机会对他进行了专访，在节目现场，盖勒普先生不仅透露了他演出的真实感受、追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还讲到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节目最后，盖勒普先生更是奉劝中国的孩子们一定要刻苦学习、完成学业。

本期节目另一大亮点是盖勒普先生在演播室现场表演了他的拿手魔术，不过，三台摄像机对准他的手，即使是事后慢放录像时仍没有发现任何破绽。

完全合法的。拆迁是很专业化、法律化的细节行动，我们记者到了前方以后，跟当地政府一接触看了文件之后，我们记者也懵了，这个都是好像不违法，都是合法程序内进行的没什么问题。当时面临非常大的困境，当时后方判断这个事情有问题，最起码株连九族的拆迁方式有问题，野蛮拆迁的现象存在的。

至于拆迁背后的拆迁招标活动是否正常、拆迁资金是否分配合理，是幕后更深的问题，要突破这些问题靠记者前方的经验和智慧难以完成。这时候需要专家，需要对中国的拆迁活动非常了如指掌的法律专家，这样的专家咱们国家有专门打拆迁官司的。我们马上找到王才亮律师，他在中国打过很多起著名的拆迁官司，找到这个律师之后，我说你能不能现在立即动身去嘉禾，帮助我们前方记者。律师当时正在武汉开庭，马上把这个事情停下来赶到嘉禾。

由于王律师的出现，使得嘉禾报道有了突破，他到了现场指出核心问题，株连九族这种完全违反《中国公务员法》和《中国干部管理条例》，没有这样处分干部的，处分首先是有问题的。关于拆迁费用的问题，关于野蛮拆迁的问题，关于所谓的拆迁项目是不是当时所谓国内贸易部投资的问题，几个核心问题全点出来了，这几个问题全是当地设置的障碍。

由于他到了嘉禾之后，记者一下子清楚了前进的方向是什么，他到了第二天《时空连线》的第一期节目出来了，打的就是株连九族，假如没有律师到现场，嘉禾这个节目我们很难做，非常困难。

欧阳国忠：每个领域专家的介入，能够使这个节目很快取得效果，这个节目是现在进行式的调查报道，记者不一定对每个领域都清楚，从这个事情上，聘请专家组或者建立这么一个组，今后可以随时进行互动的采访？

刘爱民：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外脑资源，我们做的很多节目，我印象当中一半以上的节目是需要外脑支援的，凭记者自身的智力是很难突破的。这个时候《时空连线》有一个外脑库，他不坐堂，但是我们随时可以找到他，农业方面的、市场经济方面的、企业改革方面的、拆迁方面的，我们有一个专家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马上在最短的时间内联系到他。

最起码电话上咨询或者能够作为你节目的嘉宾部分加入进来，或者可以给你其他方面的资源，甚至可以到现场去。一个新闻专题节目没有专家库的话，没有外脑资源库的话，很多节目根本无法做。

欧阳国忠：《时空连线》多视窗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东西，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刘爱民：多视窗有两个优势，视窗便于连线的快捷，拍片子毕竟是很困难的事情，我第一时间找到当事人迅速进行联系，比拍片子快得多。多视窗第二个功能，能够把不同新闻当事人同时在视窗里出现，进行争论，这是过去新闻专题节目里面没有的。这种多元化的平台，这种争论化的平台，展示给观众表达了新闻的全貌，这跟过去的新闻理念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过去的新闻媒体告诉观众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单向式的告诉你怎么回事，这件事情的价值何在，完全是告知型的。嘉禾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各方有不同观点，拆迁方有拆迁方的观点，政府有政府的观点，不同当事人的观点能不能平等展示出来。我们要听多方的声音，这种声音展示出来的时候，新闻不需



王焕良　北京UFO
研究会副理事长



李竞　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高维宏　UFO画面拍摄者

外星人和UFO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谜，相信没有人不想知道UFO到底是什么。在全世界每年都有几万份有关目睹UFO的报告，虽然这当中绝大部分都是误报，但是每一份看似真实的报告，还是能够让人兴奋不已。在2003年的2月10日到27日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家住北京回龙观的高维宏老人分三次用家用摄像机拍下了UFO。在27日傍晚第三次拍摄时，高维宏老人连续拍摄了长达7分钟的画面。有评论认为，这一次对这个不明飞行物的成功拍摄，很有可能改写UFO的历史。

在这之后不久，《新闻夜话》专访了拍下UFO画面的高维宏老人和北京UFO研究会的副理事长王焕良，王焕良先生退休前是中国航天设计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还有一位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竞教授，他研究天文已经有超过40年的时间了，被认为是中国最有资格谈论UFO的专家之一，他也是国际天文联合会的会员。

李竞研究员从天文学家的角度非常肯定地谈了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这一次拍摄到的绝对不会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UFO，以前肯定有过这样的先例，因此这一次不会成为人类观测、研究UFO的突破，也不会改写UFO的历史。"

要明确的结尾,但是一定给观众多元化倾听的方式,这里面隐含着媒体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不用表达出来,这是《时空连线》多视窗最重要的功能。

网友:听说你们多视窗是在后期做的,你们技术上怎么做的?

刘爱民:说到《时空连线》节目的制作方式,是用直播的方式做录播的节目。多视窗有甲乙丙三个人,连线的时候一次性完成,不会是先连一个后连一个然后再组成,主持人在演播室同时联络三方人,三方人的画面由于现在技术条件,可能画面不能马上同步进入演播室,但是声音可以同步进来。主持人和三方嘉宾可以同步讨论,保证了谈话的话场能够进行下去,要不然三个人没有交流节目就很麻烦,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首先解决了三方声音的同步,保证了同步进行一次完成。第二涉及到画面,三个人的画面,前方记者电话连线的时候进行拍摄,也是同步进行的,只不过画面后一点晚一点的时候传回到电视台,再插到刚才的声音当中去,用插画面的方式。声音已经存在了,三个人的争论已经剪好了,只不过没有图像过来,图像传回来之后再插进去,后期再增加一个插画面的过程。

三、实现直播需要技术环节的磨合

欧阳国忠:据业界、地方台的同事说,国外夜间连线有些是直接直播的,这种手段《时空连线》今后有没有可能运用?

刘爱民:不光夜线节目,连线是美国很多节目常用的形态,不像中国这么稀罕。连线大部分是直播的,也有插画面,但是这种方式用的少。我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要做直播,由于受到技术条件限制,我到了湖南嘉禾画面没法回来,那个地方没有卫星转播车,要么走卫星要么走光缆,中国广电光缆只铺到省会城市,县城或者更小的乡镇没有,必须走卫星,必须有卫星直播车跟着去,工程量非常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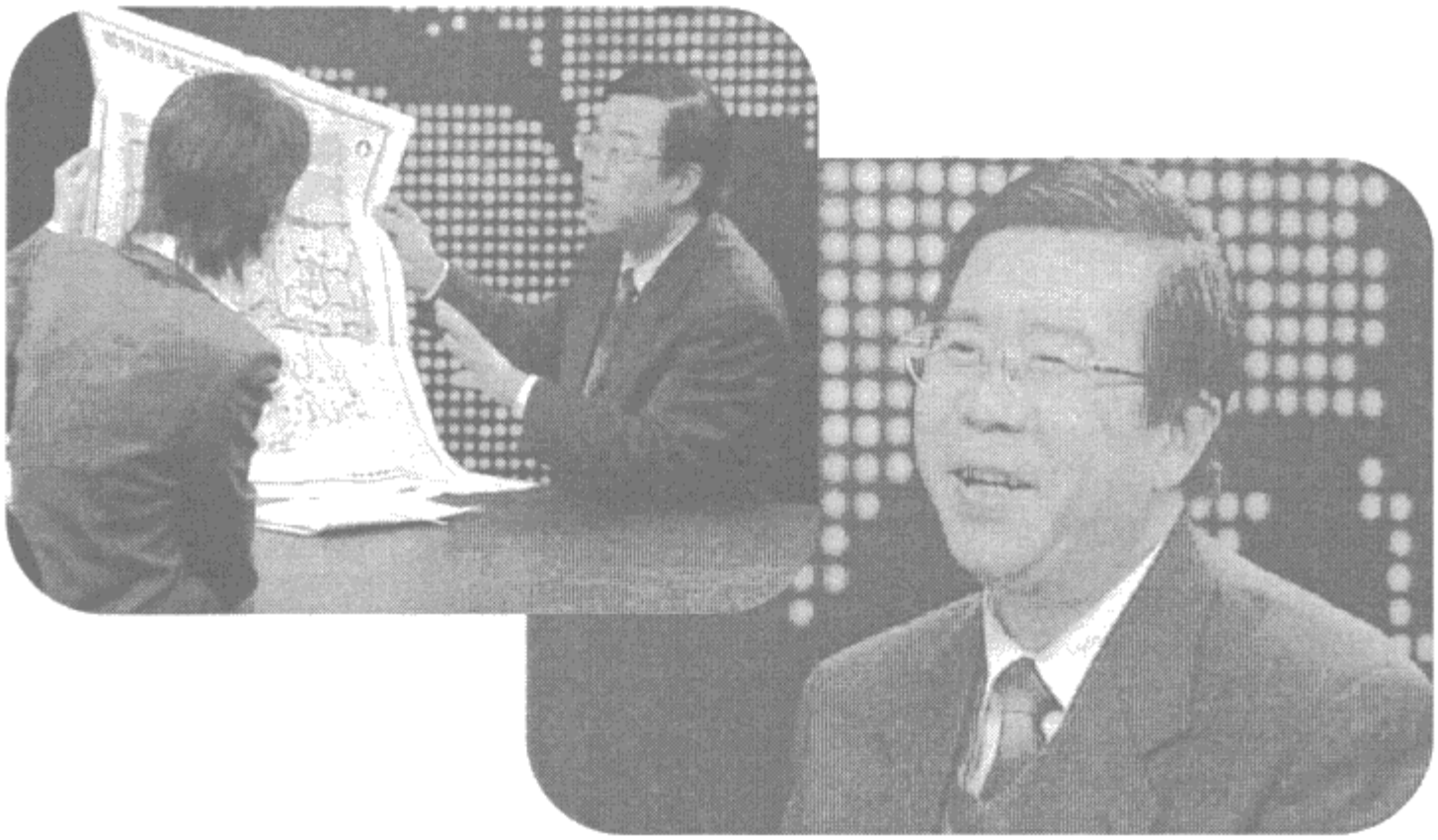
国外做是没有问题的,在中国这是比较奢侈的事情,中国电视新闻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我们现在只能够用这么一种插画面的方式暂时过渡。你说的直播是一个方向,《时空连线》很多节目已经这么做的,但是前提必须是在大城市。比如我们做过的非典直播、台湾东森的连线、台湾的SARS、台湾空难事件,这全部是走光缆或者卫星一次性完成,演播室完了节目就完了,不用后期再编辑,非常快捷非常有挑战性。

欧阳国忠:我看了台湾的新闻,后面架一个小锅就可以直播了。

刘爱民:我2002年去台湾的时候,东森电视台是五六百人,还没有中央电视台一个部门大。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下面任何一个部门都比东森台大,东森台通过大选已经成为非常有影响的台。我到台湾去的时候,印象当中大概有50多套还是60多套地面卫星传输设备,在岛内任何地点发生重大新闻事件的时候,它的直播车最多不超过十分钟就到现场了,这就是干新闻的。我们在省会城市都做不到这一点,不要说在乡村地区。

欧阳国忠:今后随着技术的提升,实力的增强,就会做到这一点?

刘爱民:现在不是技术提升,而是电视理念,即使这些设备给了你,你能不能用好?我们每个技术细节能不能运转自如,这是需要体制变革的。



宋天亮　圆明园管理处办公室主任

2002年的12月13日，圆明园遗址的修复工程正式启动。这是25年来我国第一次对圆明园遗址进行修复，也将是圆明园历史上最关键的一次修复。这次修复工作牵动了无数人的心，许多文化及建筑学者、专家更是心之所系，各方的意见并不统一。

首先我们采访了三位德高望重的文化名人，包括：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廷芳："关于圆明园要不要重修的问题，我持反对态度"。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我主张还是要把园林的一些东西都修得好好的"。梁思成之子，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如果是我们要重新加以整理和修缮，那么就把它作为一个遗址来修缮"。圆明园修复所依据的规划方案被公认是中和了各方面的意见，是一个折中的办法，那么到2008年，我们到底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圆明园？我们在演播室采访的嘉宾是圆明园管理处办公室主任宗天亮，他也是这次修复工程的项目负责人。

欧阳国忠：有了技术保障，你的人员能不能够达到很灵活或者很自如的运用，达到职业化的水平？

刘爱民：我们曾经和台湾东森电视台合作制作了台湾空难的节目。台湾有一架飞机在澎湖列岛掉下去了，我们当时决定做这个节目，并和台湾东森台联系，大概一个小时之内，台湾东森电视台把现场的直播车、直播记者、现场连线的方式，以及如何和大陆沟通信号传送的渠道，在一个小时之内所有的细节全部完成，一张单子传真到我们的办公室，马上可以直接连线到前方记者，可以连线到前方几号直播车，现场有什么东西，有什么画面清清楚楚。我们要做这件工作，没有一天是干不完的。

各个技术环节要磨合很长时间，这仅仅是技术设备的问题吗？不是。我们总认为我们是技术设备很不错的台，我们是国际大台，国际大台并不在乎人多和设备先进。

四、《时空连线》的选题定位

欧阳国忠：《时空连线》主攻方向是具有调查性的题材，这种定位不是一开始设想就这样的，而是经过发展和变化。

刘爱民：《时空连线》选题定位方向发生了两次比较大的变化。刚刚创办节目的时候，因为某种程度上学习了美国 ABC 的夜线节目，那种节目更多是观点争论的节目，当时《时空连线》想办一个争论性的节目。刚开播的时候，那时候的选题大部分都是这件事该不该做，中华牙膏该不该合资，扬子鳄该不该吃，那时候的选题多注重争论。但是这样做一段时间下来之后发现有一个问题，我们会陷入一种为争论而争论的怪圈当中，很多新闻事件不具备争论的品质，就是报道和分析品质，争论无意义。

有一段时间我们做了之后，发现进入这么一个怪圈，导致我们争论一些无谓的话题，争论一些特别小众的东西，离公众，离国计民生离主流越来越远的东西，这时候第一次调整，不能再这么争下去了。我们《时空连线》首先定下新闻品质不能变，在保证新闻品质的时候再强调它的分析和争论的特点。阿富汗战后北部发生大地震，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地震报道。

从那时候开始《时空连线》进入新闻性回归的时期，我们做了很多节目，包括阿富汗地震，包括大连五·七空难，一系列突发事件，开始关注新闻，关注突发事件。一批非常有影响的节目那时候出现了，但是这样操作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栏目所有的报道点过多地记录突发事件的话，你会发现突发事件不是经常有的，你有节目空档怎么办？没有突发事件的时候做什么？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今天没有突发事件怎么办？

《时空连线》通过嘉禾通过沈阳拆迁的调整进入第三个时期，强调记者的现场调查，很多事情不是突发事件，但是事情并不很大的时候，需要记者调查去挖掘它的新闻价值的时候，那么它会给《时空连线》提供新的空间。正在发生的重大的或者不那么重大的新闻事件，通过记者做大。嘉禾刚开始就是 27 户居民不搬家，政府强制搬家，导致政府和群众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在中国司空见惯，比起非典来说不够重大。

但是我们尽量做成中国头一号新闻，通过拆迁关注到中国的民生状态，中国政府的行政行为，这就是我们做出来的，这就是我说的第三种记者调查式的现场报道。《时空连线》现在进入这么一种状态，《时空连线》真正找到凸现自己报道优势的选题方向。

欧阳国忠：调查性和舆论监督这两个词是



王刚义 “冬泳之王”

本期节目采访的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他被称为“冬泳之王”，几天前他刚刚挑战了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海域。这个地方在加拿大的东北部，当年泰坦尼克号的乘客大部分都是在落水三到五分钟之后就被冻死了。因为这片海域在冬季的最高温度只有零上4度，人一旦落水，几分钟之后就会出现低温症，最后导致心脏停止跳动，能在其中游泳确实是对人体极限的挑战，而他在同样一个地方畅游了37分钟。这个人叫王刚义，是吉林长春人，刚刚拿到了吉林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现在王刚义已经拥有了4项吉尼斯记录，就是分别在四个低温水域里游泳，有南极的冰海、智利大冰湖、韩国汉江和日本的北海道，这次挑战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海域，让他又多了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相辅相成的，你在《焦点访谈》工作多年，在一线从事过很多有力度的报道，是不是对你和你的记者、编导沟通非常便捷，很好理解他们。

我过去做《焦点访谈》时间比较长，对这方面的报道情有独钟，批评类的、监督类的。我是2000年离开《焦点访谈》做《东方时空》的改版，两年多的时间内跟舆论监督脱开了。那时候过多做的一些争论类的，突发事件类的，做舆论监督类比较少，曾经有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够不做舆论监督而另辟蹊径做出更加有特色的节目。

但是经过将近三年的实践，我发现一个真理，原来大家都说过的事情，只不过我通过自己的磨炼更深刻认识到，做舆论做媒体离开监督就没有生命力，你不去做监督节目就是自寻死路。现在回过头来，还要强调它的监督色彩，只不过在做监督节目的时候，在形态上跟《焦点访谈》跟《新闻调查》要做出区别，做出不一样的形态来，这是你需要考虑的，而不是考虑是否要做监督节目，这样做新闻专题节目肯定不要做了。这是《时空连线》前期积累出来的经验。

五、判断力和新闻真实

欧阳国忠：中国调查性记者比较缺，你做《焦点访谈》记者时，影响你比较大的经历能不能举一下？是不是经常跟你的记者编导沟通？

刘爱民：《时空连线》特别最近一年当中，牵扯我精力最大的事情就是不断培养《时空连线》的记者在前方进行调查采访的能力。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调查采访是最高境界，一个新闻记者如果不会做调查式采访，这个记者基本就是一个简单的做短新闻的记者，成不了气候，做不出有品质的大新闻来。

《时空连线》的记者比较年轻，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这种调查式采访的能力，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怎么突破困境。记者在现场调查的时候，困境来自方方面面，他的知识面、个别人的阻挠、信息提供者不真实信息的提供，以及对新闻价值进行判断，这些东西需要一定的积累才能到一定的水准。《时空连线》坚持走调查采访的路线，现在最大的难题就在于我们记者自身，这是牵扯我精力最大的一件事情。

欧阳国忠：调查记者新闻的能力和技巧特别重要，技巧和能力在实践当中磨炼出来，你当年是怎么做的调查性报道？你是怎么做的？这种可学习性的东西来得更直接。你在做调查性报道的时候，你最难忘的一次调查性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

刘爱民：我做《焦点访谈》的时候采访非常多元，很难说哪一次非常难忘，因为难忘的时刻特别多。我觉得一个好的记者，现场采访经验的形成是一个积累过程，一个优秀记者最重要的品质不是读了什么专业，而在意他的生活阅历和他的采访阅历有多深厚，这是决定他对一件事情能不能判断的前提。湖南株洲是我1996年、1997年采访的事情，当时株洲一个啤酒厂的厂长酒后驾车撞死两个人之后逃逸，他说不知道死了人，去了按摩房做按摩。

当时披露出来，当地群众很不满意，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压死两个人，如果喝醉了的话怎么可能去按摩呢，按摩房的小姐说他当时并没有醉得不省人事。我当时去了株洲，跟很多人了解了情况之后有一个基本判断，这是记者要有的基本判断，这非常重要，首先判断这件事情他说的真话假话。第一，我会开车。第二，我也会喝酒，基本状态我都体验过，所以根本不相信他的话是真话，怎么可能撞死人不知道。

我到了株洲很快找到当时按摩的两个小



北京动物园



孟兆祯　中国工程院院士



马建章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一个动物园搬家为什么会引起全社会的大讨论，这种讨论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最后的结果？2004年5、6月间，无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网络，北京动物园该不该搬家，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讨论是由北京市发改委组织的一次小范围的论证会引起的，一个月以后，这场讨论波及到全国，大多数声音是不赞成搬家，这其中就包括五位院士，我们的节目专访了其中的两位院士，他们都是第一次就这个事件接受专访。

首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园林规划与设计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孟兆祯教授。他在节目中明确表示不赞成动物园搬家，并分析驳斥了主搬派拿出的四大理由。但值得思考的是他认为经济利益驱使下，专家的声音微弱。

包括北京动物园在内，全国有二十多个城市都对自己的动物园进行了搬迁或者正在酝酿搬迁，接下来我们又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林业大学的教授马建章先生，他是国内野生动物学科的带头人，同时也负责论证了哈尔滨动物园的搬迁工作。马建章先生以哈尔滨动物园搬迁的实践再次表明动物园搬家要慎重，并掷地有声地提醒决策者，哈尔滨动物园是北京动物园的前车之鉴。

2006年，是北京动物园的一百岁生日，这期节目算我们给这位老寿星的一份贺礼。

女孩，我去了解他当时说了什么话，当时状态怎么样。经过好几次的说服工作，这两个女孩说他当时非常清醒，一进来就说我闯祸了，压死人了。喝酒喝多了，四肢操作起来不是那么灵便，但是大脑是清醒的，他的逃逸是非常主观故意的。

后来通过很多采访之后，把事情搞清楚了，问题就是逃逸。我去他们工厂调查的时候发现很新的线索，撞死人的厂长一年前也发生过一起车祸，也撞毁了一辆车，这两辆车全是啤酒厂的，而且最后都是个人闯祸之后，公家承担了所有的损失费用，包括赔偿费用，包括报废费用。通过这个车祸之后，发现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之混乱，一个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居然能够这么随意使用国有资产，随手一批二三十万赔出去了，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缺少监管，为所欲为。

到了《时空连线》我经常和编导交流，其实你们在前面进行采访的时候，付出的精力比我多得多，我过去可能没有你们今天付出这么多精力，甚至在敬业程度上面不如你们，但是你们缺乏我具备的判断力。一个有经验的记者到了现场之后，当他掌握了很多信息之后，会很快地判断出来这件事是真的假的，突破点在哪儿，很快形成一个方向，集中精力猛攻那个方向。

现在年轻记者缺乏这种判断力，在现场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干扰，这里面需要基本判断。嘉禾拆迁株连九族式的拆迁，毫无疑问是有问题的，不考虑别的，政府有没有权利把不搬家的工作人员撤职，亲戚因为没有执行拆迁令株连到其他公务人员身上，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欧阳国忠：优秀的调查型记者判断力是首要的，他的韧性是不是也很重要？

刘爱民：以一个记者对一个事件采访的持续跟踪能力，还是取决于判断力，如果对于事情没有判断力和洞察力，很难有韧性。

欧阳国忠：舆论节目看起来非常过瘾，如果新闻专题类的节目失去了舆论监督功能，可能失去了受众。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人情猛如虎，这里面最关键是度的把握，《时空连线》的度是怎么把握的？

刘爱民：我首先必须了解这个节目的底线在哪里，我对一个事情进行批评曝光，首先得知道目前作为政府或者作为上级宣传部门，对这个事情有没有明令的红线不能逾越的，这是我作为节目的制片人必须要了解的。把握舆论导向是制片人非常重要的工作，当我知道红线在哪儿的时候，我尽可能靠近红线，但是不越过红线，把舆论监督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作为制片人要考虑到政策和上级宣传部门给你设的红线在哪里必须清楚，第二个度就是守住对这件事情自己内心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底线。有些批评监督看似很过瘾，但是可能伤及更多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社会效果。但是对有一些深恶痛绝的社会现象或者一些腐败现象，对它曝光的时候一定要坚决彻底，绝不能留情，但是必须注意社会效果。

我们经常做的一些突发事件涉及到未成年人的问题，打黄扫非当中涉及到女孩子卖淫等等问题，这类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们要保护她们。这里面很难说应该做到什么程度，但是肯定会有一种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在里面，不能在批判一种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使一些人受到伤害，使他更加和主流社会脱离，这是需要注意的。



袁世海演出资料



袁小海　袁世海儿子

2002年12月11日，国宝级的京剧大师袁世海先生逝世，享年87岁。噩耗传开以后，社会各界对袁世海先生的辞世深深地惋惜。袁先生一直想振兴京剧，在这一点上，他受到了三代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那么，他在京剧艺术方面的贡献有哪些？他的艺术精神是什么？留下和带走的又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继承呢？

我们有必要在这样的时刻再次总结和和回顾一代大师的艺术历程，把应该留存的用我们的节目保留下来。首先我们采访了袁世海先生的儿子袁小海，他在节目中公布了袁世海先生最后的心愿——把《三国演义》的剧目呈现在舞台上，献给热爱京剧的观众。袁世海先生说："这也是咱们国家的一份财富，艺术财富。"

第二个嘉宾是中国京剧院院长吴江，对于袁先生之于京剧界的价值，他说："不可估量，艺术的传承是靠人，尤其是表演艺术的传承更是要靠人，我们优秀传统艺术的表演经验，是带在老的艺术家身上的。如果不重视这种抢救工作，如果不重视这种保护工作，不重视老的艺术家存在的重要价值，那就很有可能走一位老同志，就带走一批艺术宝藏。"

网友：真正直播节目还是管理很严格的，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时效性和真实性，你们会将嘉宾的话都播出吗？

刘爱民：《时空连线》是在用直播的方式做录播节目，后期肯定有剪辑的，嘉宾的话不可能百分之百全部播出去，节目时长也不允许，肯定要进行剪辑的。如果一旦进入直播节目状态之后，嘉宾的话肯定是百分之百播出去的。

六、评价制片人的标准

网友：《时空连线》当初的制片人是白岩松，现在为什么没有做《时空连线》？

刘爱民：岩松是非常优秀的节目主持人，现在不光是《时空连线》还是《新闻会客厅》和《中国新闻周刊》三个栏目的主持人，他做主持人的优秀和智慧不应该过多分散，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说，让白岩松做一个栏目的管理者耗费他更多精力，对他的优秀才华也是一种浪费，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做主持人。

欧阳国忠：中央台很多主持人兼制片人的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分散，应把主持人作为核心重点？

刘爱民：现在央视主持人兼制片人的不是太多，但是还有。别的栏目我不是太清楚，像白岩松这么优秀的主持人，他平常承担主持节目任务非常重，同时为几个栏目工作，这时候要求他要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集中在制作节目和准备上去。了解电视新闻专题类的人都明白一件事情，一个主持人是一个栏目当中最优秀同时也是最辛苦的人，主持人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一个主持人一天要主持两三档节目，之前要做大量的文案准备工作，要和前方记者和后方策划进行大量沟通和新闻背景的了解，甚至和专家的沟通才能把新闻专题节目做好。不能拿着采访单子上去直接问嘉宾，那是花瓶主持人，大家不喜欢这样的主持人，像张泉灵、白岩松这样的好主持人大家喜欢，整个节目过程全参与了，要费多大的精力，再承担一份管理工作，不堪重负。

网友：《时空连线》经费怎么运作的？

刘爱民：电视节目是制片人的节目，制片人对经费对人员的管理要负全责，怎么运作选题以及用哪些人来做哪些节目，用多少钱来做节目，都是制片人决定的。毫无疑问，《时空连线》有一个非常好的编委会制度，制片人在《时空连线》不是完全一个人说了算，我们通过编委会制度集体形成一种决定，避免制片人专断独行，一个人脱离监督的情况下，制片人有可能会把一个栏目做偏了，有这种可能性。有一个好的编委会存在，编委会和制片人同时存在，互相监督。

欧阳国忠：制片人是中国电视的一个方向，原来没有这个制度，现在创立这么一个制度，省级电视台、地方电视台制片人制度，然而没有进行真正的制片人制度，有可能台里面管得太严，有的缺乏监督，你觉得在这方面，你自己做了制片人之后有什么心得？

刘爱民：制片人必须给予充分的授权，节目的经营权、人员的管理权和财务的使用权必须给予充分授权，制片人才能放开手脚做这个节目，才可能把这个栏目作为自己的栏目去经营。制片人制度本身是电视市场化的一种制度，现在很多电视台包括中央电视台一些对制片人制度了解比较片面，制片人就是一个班组长，给你十来个人做节目，人怎么定，怎么选题，完全没有决定权，这和新闻评论部实行的



王铁权　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物所研究员

马踏飞燕模型

2002年，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出访土库曼斯坦时，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将自己的一匹爱马赠送给了他。这可不是一匹普通的马，而是带有“贵族”血统的、俗称“千里马”的汗血宝马，在中国历史、中国战争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具有相当的传奇色彩。汗血宝马已经在中国消失了几百年了，而土库曼斯坦正是这种马的原产地。这次馈赠，使中国又重新拥有了“千里马”。

在节目中，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谈到：“我可以证明的是这匹阿赫达什(马的名字)可以代表非常古老的有非常纯正血统的阿哈尔捷金宝马。”

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所研究员、中国首席马专家王铁权介绍说：“为什么它被称作是最好的马、最高贵的马，一个是它的形象特别好，外观很漂亮，而且还有个特点，脖根比较细，带一个小弯，有曲线，这就是它名贵的地方。另外这种马擅长舞步，擅长跳舞，在汉代把这马引进以后，跟匈奴打仗的时候，这马就上前线了。因为它习惯于表演，它也不知道这里是战场。当时匈奴非常闭塞，没见过这么好的马，这么高的马它会跳舞，看到这些以后，他们就跑了，仗就不打了。这个有史实记录。”

著名作家金庸也在电话采访中兴趣盎然地表示：“我听到这个(赠马的)消息很开心，也更印证了我的小说中提到的这个事情。我想这个马一定是好马。如果下次要修改(我的书)的话，我可能把这匹小红马的三个蹄子是白的加进去，这些可以增加趣味的。”

制片人制度不是一回事。

人、财、物给制片人之后，制片人向他的老板负责，保证哪一段时间内把栏目做到什么程度，做不到这个程度做不到这个水准上，你有制片人的应聘制度，到了一年或者两年没有达到预期的话，解聘制片人。但是我必须给制片人充分的授权做这件事情，把制片人的才智发挥到极大，是一个管理者。制片人才可能在所管的栏目当中，把三个权利使用到极大化，最有限的资源最有限的人员用到极致。

沈阳拆迁我前方用了五个记者，后方三个记者，嘉禾拆迁也是八个人，新闻专题节目没有这么用人的，集中这么多人做一期节目，性价比来说非常不合算。如果在通常情况下，制片人没有充分授权的时候，也不敢这么去做，节目投资大量增加，两个人做的节目八个人来做，多出六个人的成本。我如果对节目负全责的话会这么做，这件事情的新闻性极大，可以拓展成系列节目，让最优秀的记者编导来做，把这个系列的品牌做出来。

从整体效果来看，节目效果出来了，嘉禾成为关注的热点，《时空连线》的品牌做出来，做成系列不光节省成本，没有超过原来的成本还节省了成本，使我的成本效益极大化。这几种权利授予制片人的时候才能做这件事情，如果给我权利，我就是一个班组长，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欧阳国忠：制片人制也是让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最早引入机制，而且运行当中也不断改善和完善，目前进入新阶段。制片人充分发挥能量要给他充分授权，同时也要监督，怎么使管理有一个评价体系，怎么样评价，怎么样进行监督，这方面有什么体会？

刘爱民：对制片人评价应该有几个指标，节目评价指标，确定收视率的标准，或者确定满意度标准，或者专家评议团的标准，首先有一个内容标准的评估。还有一个是财务评价标准，你给他的奖金你给他的钱用的是不是得当，有没有违规这是重要的。

没有违规的话，使用的标准是否按照规定在执行，财务标准特别注意一点，上面对制片人使用财务的标准绝对不能以省钱为标志来评价，一个好的电视栏目投入从投资方来说，也就是我们台领导来说不断增加投入，而不应该降低投入，既然是好栏目就应该增加投入。第二，看制片人能不能把有限资金最大化地使用，同样的钱办多少事，《时空连线》现在增加了链接部分，增加了外脑的支援部分，这种情况下没有多花一分钱，把投资效益最大化，这恰恰是应该鼓励的。

财务考核应该有一个效益考核，有没有把我对你的成本投入达到最大化，能够把握这两个标准的考核，对制片人的考核就应该比较完整了。至于用人完全交给制片人，用谁，怎么用人完全交给制片人。用人公正不公正，合理不合理是制片人考虑的事情，一旦和栏目利益挂钩的时候，不可能用庸才白痴，肯定用最优秀的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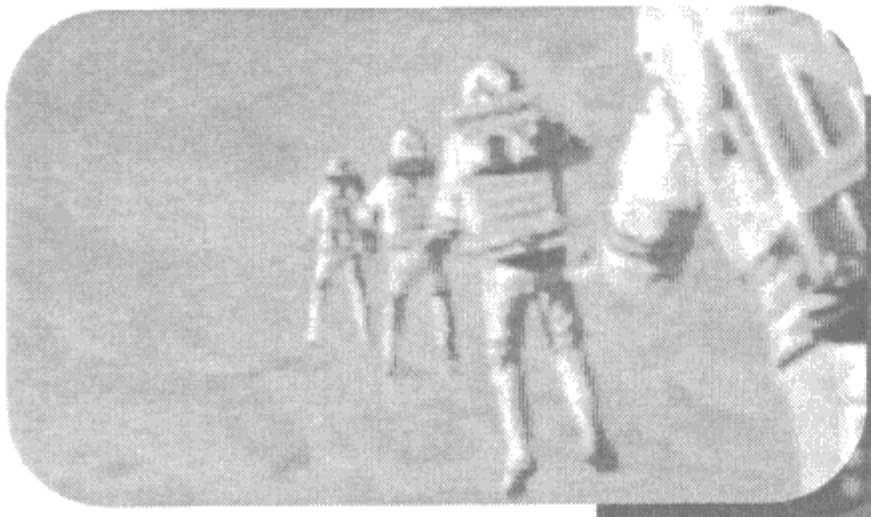
七、制片人是一个工作机器

网友：电视栏目采取哪种运行机制比较好？

刘爱民：各个电视栏目不一样，诉求不一样，采取的运行方式不一样，很难有统一的标准。

网友：改版和打成品牌两者如何处理好？

刘爱民：这里面有一个现象，这几年无论是央视还是地方电视台改版成风，这里面有一



人类登陆火星模拟图



刘振兴 中国科学院院士

火星是太阳系中离地球最近的一颗行星，也是环境与地球最像的一颗星球。火星和地球一样四季分明，火星上的一天大约是24小时，和地球也非常接近，所以火星一直被认为是除地球以外，最可能有生命存在的一个星球。

从1962至今的几十年里，人类已经向火星发射了十几次探测飞船。2004年3月，美国航空航天局和欧洲航天局公布了他们所观测到的最新发现，在火星的大气层中，含有甲烷气体，这个发现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火星有无生命的大讨论。火星大气含有甲烷，真的能够证明火星上存在生命吗？几百年后，火星会成为人类的第二个地球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采访了国内火星研究方面的权威，中国科学院的刘振兴院士，他也是中国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的首席科学家。

刘振兴院士认为，目前的发现只能说是为研究在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依据，而不能算作证据。只有找到不同时代的生物化石，“我们才可以清楚地确认，火星过去曾经存在哪些生命，哪种形式的生命，在哪些时代存在着这种生命。”

种陷阱，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在走一条从追求形式到追求形式的道路。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美国三大电视网 ABC、CBS、NBC，它有比较好的新闻栏目，如《60 分钟》，是 CBS 的节目，这个栏目 1968 年创立。

美国很多栏目 40 多年，50 多年的栏目都有，名牌栏目都不会在十年以内，绝大部分名牌栏目时间很长，为什么人家不改版？办一个优秀的电视栏目最重要是在内容拓展而不是形式变化，一定要内容拓展，坚定自己的信念，相信这个定位做下去做出品质来，一定做好它做到位。

一个电视栏目只开办两三年就改版了，两三年对于电视新闻专题节目刚刚起步.《时空连线》现在到了第三年，我们刚刚找到这种感觉，现在我就改版前面不就白做了？两三年对于新闻专题节目只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真正做出节目还是在后面，两三年就改永远干不出优秀节目来。这是为什么？中国的新闻专题节目永远没有优秀栏目，最主要的是浮躁，整天改版，先把自己现有品牌做好了，改来改去，整天换制片人换记者，再过 20 年中国不会有伟大的电视专题节目。

网友：作为制片人你一天时间安排是怎样的？

刘爱民：说出来很惭愧，我是睁开眼就是节目，到晚上闭上眼还是节目。我早晨 10 点左右到办公室，为什么去的这么晚，《时空连线》每天早晨 7:15 首播，当天晚上 12 点甚至当天晚上两三点还在办公室，回去比较晚，起得比较晚。早晨 10 点左右一直到晚上 12 点都在办公室。

我要做各种各样的选题分析、节目的评价、做好节目的审看，日常工作做完之后，还要抽出时间来跟我的摄像、编导进行沟通。如果哪个编导选题太软了，会告诉他注意事件性的报道，硬新闻的观察，把你的节目做硬了。有的编导可能这段时间调查能力下降了，我会跟他沟通为什么会下降，能不能在哪些方面有一些改进。个别交流也占用很多时间，这些工作做完之后就到了晚上，开始照顾到第二天节目的播出。整个时间几乎就是在办公室，从 10 点到晚上 12 点，一天在办公室呆十四五个小时。

欧阳国忠：一天在办公室呆 14 个小时。

刘爱民：制片人绝对是一个工作机器，从某种生活状态来说，不是非常健康的生活状态。但是制片人绝对是一个极有挑战性的工作，一个栏目在你手里面，一个团队在你手里面。一个栏目能不能成为中国最优秀的专题栏目，很大一部分任务在制片人身上。白岩松说“痛并快乐着”，我觉得制片人的工作也是痛并快乐着的。

欧阳国忠：《时空连线》理念有十点，其中有一点谈到快乐追求真正的目标，要不快乐是制片人错了，制片人不快乐是应该的，这个话怎么理解？

刘爱民：一个好栏目应该有一个好栏目的文化，所有人在《时空连线》工作，除了在一种理念下做节目，要在这个栏目得到一种实现感，就是能带来快乐的东西。这种实现感是什么？对于在一个栏目工作的记者，必须对这个栏目认同，《时空连线》有四十个人，分成五六个工种，每一个人的岗位、每一个人在《时空连线》受到尊重，即便是一个普通的统筹人员，也有权利参加编委会，提出做什么样的选题。

《时空连线》这个团队对人是非常尊重的团队，这种情况下《时空连线》虽然工作起来非



蒋岩　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参比实验室主任

李德钧　大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艾滋病试验负责人

2003年年初，大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推出了一种针对艾滋病的匿名邮寄检测法。这种办法推行三个月后检出了第一例艾滋病病人，这个消息经过很多媒体的报道之后，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公共卫生部门的关注热潮，但是各地反应并不一样，有支持，有观望，也有反对的声音。大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仍然认为这种办法值得推行。那么这种办法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们首先采访了大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试验负责人李德钧医生，这种方法就是他首创并且推行的。为了最大程度地让观众了解这种新型检测方法的利弊，主持人在节目现场用采血针挑破手指，亲身体验并为观众展示了检测过程。那么大连的新方法是不是值得推广？接下来又采访了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参比实验室主任蒋岩。

该期节目的更大价值在于，蒋岩主任科学分析了这种检测方法的科学性和局限性，指出这种方法不完善的地方，提醒医务工作者严谨对待这一事关百万人健康的事业。

科学的精神、严谨的态度，始终是《新闻夜话》栏目对待新事物的立场。

常辛苦，但是也是非常愉快的，这是制片人应该给连线团队创造的文化。制片人是不快乐的、痛苦的，制片人工作14个小时很难成为一个非常快乐的人，他这种快乐只是当一期节目每天7:15播出的时候，当你非常难完成的选题完成的时候，像嘉禾、沈阳拆迁报道几乎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完成了，这种快乐是此时此刻的。

欧阳国忠：《东方时空》走过了很多年，《时空连线》作为主打板块走过三年历程，将来有什么新的打算？

刘爱民：我曾经引用过一个媒体专家的话，“电视新闻专题节目它的生命期就是三年，第一年成长，第二年成熟，第三年死亡，所有超过三年的新闻专题节目都是苟延残喘”。我特别不认同这句话，我觉得《时空连线》要我做的话，我要做成30年，首先我要坚信《时空连线》这么一种新闻表述方式是有受众的，我觉得能做30年。未来《时空连线》守住我们的两条方向，要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毫不回避的报道，进行分析性调查性的报道，这个方向走下去就是我们的直播。

第二要走多元化平台，一定要把不同的声音通过《时空连线》发出来，媒体再也不是起简单的教育作用，媒体更多是全面地传播信息，这时候多元化平台是连线非常重要的方向。这两点只要做好了，《时空连线》一定会非常优秀。

十六大以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倡导政务公开政府信息透明化，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开始在全国建立起来。

当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宁第一次公开对媒体发布信息后，立刻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从看到新华社消息后，几乎在第一时间，我们和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同时联系到了徐宁，也是在当天徐宁走出《会客厅》进入《夜话》。

本期节目中徐宁介绍了新闻发言人的职责、任务和为什么现在除了外交部以外，各地政府、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在设立了自己的新闻发言人，目的就是希望新闻发言人能够通过媒体，向老百姓来传递更多的信息。同时面对媒体担心的由此制度的设立可能今后不能直接采访政府官员的疑问，介绍了新闻发言人平时的工作流程打消了媒体的疑虑。



徐宁　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



《讲述》制片人梁红访谈实录

一、《讲述》口述体的纪录片

欧阳国忠：我们一见到你感觉有一种侠气，特别爱交朋友是吗？

梁红：对。

欧阳国忠：难怪《讲述》有那么多朋友一起做的。

梁红：当时《讲述》是几个朋友一起创办的，肖晓琳、张国飞、黄海星还有我，想把人生当中惊心动魄的经历讲出来。当时社教中心主任高峰定下这个名字，这个设计当时在中国电视界比较大胆，看起来最不富有电视冲击力的很单调地讲述去表现一种完整的叙事，讲述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一段让人终身难忘的感情或者是表现一种让人奋然前行的力量。当时有人说广播也能做，为什么用电视做呢？认为《讲述》当时是反电视的。经过三年实践证明，从收视率上来说，《讲述》和《周末讲述》连续收视率排名第一位，包括过去一直这样，故事也源源不断，一天一个故事，当初很多人认为没有那么多故事可讲，而且又没有很具有电视表现力的画面，很难吸引人，收视率肯定比较低。三年证明，收视率是十套收视率最高的栏目，在中央电视台也是得奖最多的新栏目，我们2003年得过两个最佳长纪录片奖，做的《中国记者节风云榜》，得了政府特别奖一等奖第一名，最近有一个片子送亚广联2004年参评。无论从收视率、获奖、业内口碑来说，应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这个团队组合在一起就是完美的。

欧阳国忠：《讲述》成长性最快，跑步进入成长阶段，当初创办之初，你在《今日说法》。

梁红：当时我在《今日说法》做主编三年，十套2001年7月9日开播，需要从《今日说法》调主干来创办。当时我被作为主办之一调过来做样片，当时四个主编承担做样片的责任，唯一我来做日常版和周末版的样片，其他都是单独或者做日常版或者是周末版，最后送到编委会的是我的两个片子，在编委会获得通过，进入《讲述》开播。就像是自己的小孩，从孕育一直到成长，一直到现在飞速奔跑，包括去年央视大调整，《讲述》作为新锐栏目跻身一套，虽然时间段不是很好，但是对我们的团队是一种认可。

欧阳国忠：一套是精品栏目汇集的地方，《讲述》进入一套说明水平、收视率非常好。电视强调画面语言，强调现场感，这档节目，从节目当中可以看出来强调讲述。《讲述》讲究故事性，电视步入故事化的阶段，各种栏目想办法讲故事，《讲述》讲故事的手段，你们用什么样的因素来吸引大众？

梁红：任何技巧都可能是苍白的，做任何事情包括做电视也是这样，你想做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果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要吸引大众



王伟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



王尔铭　四川龙池景区管理局副局长

2002年两会期间，有关人和动物发生冲突如何解决的提案达到了15个，是建国以来数量最多的一年，而且数量一直是呈上升的趋势。

2002年的12月初，四川省龙池景区要枪杀5只袭击过人的猴子，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来到《新闻夜话》演播室的嘉宾是四川龙池景区管理局副局长王尔铭，就是他所在的管理局做出决定要处死猴子。他在节目中解释了人猴矛盾频繁发生的深层原因是人口扩张，人类生存领地不断扩大。到底谁有权决定一只猴子的生死？当人和野生动物发生冲突的时候，谁该负更多的责任呢？在节目下半场，我们采访到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王伟。他所在的部门，同时担负着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和执法的职能。他不仅详细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且透露：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条款将从现在的4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其中将更多地体现动物的权利和福利，并且将加大对捕杀野生动物、破坏生态环境的处罚力度。

视线反而得不到大众的认可。我们虽然年纪并不太大,但是也有自己生活经历中很难忘的经历,温暖鼓励你能够走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些经历我们觉得应该拿出来跟彼此分享,现在人心浮躁,有的道德缺失,信仰缺失,特别需要一种温暖鼓励彼此共同前行。我们希望在人生中和社会重要性寻找力量拿出来彼此分享,像一根火柴一样,把别人的人生点亮,当时想寻找这样一种定位故事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的初衷。人心都是向真向善向美,这种基础上选择的故事有吸引大众眼球第一位的功能,大家心里需要。第二位在电视技巧上帮助把这种力量把大家能够温暖的感觉表达出来,从电视上来说,首先认为口述或者讲述是反电视的我并不认可这种说法。我们在演播室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普通老百姓平时不善言辞,但是讲自己真实经历的时候会还原到过去的状态,会激动,会表达非常有声有色有感染力,平时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在那一瞬间有了一种光彩,焕发某种青春活力,因为又回到过去经历的状态。这个是镜头不能代表的。

有一段时间纪录片特别风行纪实拍摄,什么东西都拍,我刚才讲的人生经历是用这种电视镜头无法表述的,恰恰演播室里面的口述,他的神色、脸上的泪光,眼睛里面的身材,包括痛苦时的抽搐都是有画面表现力的,我认为《讲述》也是有电视画面的冲击力和感染力的,有电视特性的。我并不认为《讲述》本身是反电视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故事性的一种传达,而且是故事性的一种体现。从这个角度,首先我们注重内容,我们挑选的东西是观众所需要的,其次我们并不认可现在纪录片传统的做法,有很多人说《讲述》像初生牛犊不怕虎跌跌撞撞跑得很快,虽然会摔跤,比很多栏目都跑得快。我原来在《今日说法》呆了两三年,才会被大家认可,而《讲述》每一年有无数的业绩或者让大家惊奇新的举动,包括2004年新做的全国DV大赛。《讲述》用一种全的方法在做纪录片,我们自己认为并不是谈话节目,而是口述体的纪录片,或者用纪录片的精神做谈话节目。应该说很难归类,很多专家在争论《讲述》是谈话节目,有人说是纪录片节目,有人说兼而有之,什么形态不重要,观众需要是最有价值的,而且在追求高收视率前提下并不失掉自己的品牌和品质,节目的品质和高收视率是统一的。故事性来说,我们选择的是符合社会心理需求和审美需求的内容,主持人访谈方面,很多人说故事性依靠主持人去挑动,很多谈话节目,《实话实说》、《聊天》靠主持人撑着,《讲述》在这一点不一样,主持人主要是倾听,以讲述人的故事为主。每天换不同的讲述人,讲述人的经历是新鲜的,故事也是有独特性的,我们把点放在讲述人身上也是增加故事性的一种方式。

欧阳国忠:你们节目当中,主持人也不叫主持人,有一个新的名字叫访问人。从这一点来看,你们有不同的定位,谈话类节目是一个主持人的节目,靠主持人出彩,靠他的临场发挥和智慧幽默撑起一个节目,《讲述》是一个倾听者。你们开创了口述体的纪录片。

梁红:在我们之前也有,以前纪录片部偶尔拍一个片子,或者一年拍一个片子参评。我们在四川国际电视界金熊猫奖颁奖现场,大家非常惊奇,一个日播的纪录片栏目里面拿出的一个节目会得到两项国际大奖,也在探讨纪录片栏目化的生存方式。谈话节目一般以主持人和嘉宾的碰撞,情感冲撞或者谈话感为重点。《讲述》主持人更多是倾听者,是一个访问者,他的倾听和访问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在对话经



任志鸿　山东世纪天鸿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4 年 4 月 20 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宣布，授予山东世纪天鸿书业有限公司出版物国内总发行和全国性连锁经营权许可。这是自 2003 年 9 月，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出台之后，国内首家民营书业公司同时获得这两项资格。也就是说，民营书业开始享受与新华书店完全平等的政策空间和竞争平台。这一事件的发生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人们希望从这一事件当中解读出其背后所蕴藏的深刻含义，舆论普遍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我国出版物发行领域里，国有企业最后的垄断已被打破，图书市场的巨大蛋糕不再被新华书店所独享。那么，作为这一事件的当事人——山东世纪天鸿公司又是如何看待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它是如何拿到两权资格的？这背后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背景？企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面对年底即将全面放开的图书市场，企业将如何应对？带着众多的疑问，《新闻夜话》采访了这一事件的主角——山东世纪天鸿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鸿先生。

对于今后的发展，任总非常平静地描绘了企业的未来。他希望通过扎实的工作，充分利用好这次难得的机会，用三年的时间，销售额要达到 18 个亿，打造出中国最大的文教图书发行网络。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很多企业来电、来函询问合作途径和方式。

历之中抓住线索,铺展开整个人生经历。主持人是幕后的工作,幕前亮光给了讲述人。

欧阳国忠:你们的舞台就是一扇门,几把藤椅。

梁红:我们现在刚换了新的布景,节目做的不错,领导给了奖励。第一批布景是到家具店买点家具,现在演播室条件更好了。在我看来演播室条件好坏跟节目好坏没有必然联系,现在有了竹帘、水的布景,现在变得好看了,如果故事讲得不好照样还是激动不了人。每个人都有缺点,每个人都有劣势和优势,我们太注重内容忽略了穿着打扮。

欧阳国忠:从开播到一路走来到现在的成绩,你们的理念到现在有一些变化吗?

梁红:还是有一些变化。从主办者的角度,我们制片人也是换了两任,从我的前任制片人肖晓琳到我,当初定位的核心没有变,但是手段上更丰富了一些,包括编导的认知程度上不断加深。从一开始我们想做感动人的东西,大家做的都是残疾人题材,还有悲悲泣泣的题材,不是说残疾人没有感动我们的东西,但是如果都是这些范围内感动人的话,太局限了。我们发现阳光的、健康的东西,同样有感动的泪光在跳跃,认知上题材扩大了。过去我们对日常生活关注不是那么密切,讲的故事有时候没有年代烙印,在哪个年代哪个地方哪个月份都是可以的,现在《讲述》可能2003年到现在更加关注生活,关注老百姓,关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争取更多反映社会痕迹。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媒体是社会风气,是社会资源,中央电视台有这样一个平台在这儿做节目,应该为社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一种自我的满足,不是个人喜好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大众需要,怎么样才能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这一点开始,过去《讲述》第一年里面没有特别节目,第二年开始有了特别节目,2002年做了《新闻背后的故事》,当时雏形在试验,什么样是真正优秀的记者,我们应该是在优秀记者里面看到一些媒体人什么样的品质,2003年尝试推出中国记者风云榜,把本年度最有影响力的大事件中,有独到见解并且有独家专访的记者推到幕前。现在媒体非常多,记者非常多,我们推荐对历史有推动,显现记者功能的记者。2003年有非典期间的记者,有伊拉克战争中记者,促进法制领域,包括人权、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对社会有贡献,如果没有这些记者的报道,这个事件可能不会出来,社会因此可能往前迈的一小步不会那么顺畅。我们把这里面起了非常大作用的记者遴选出来,推介出来,变成中国记者风云榜,八位记者。领导们非常认可,尤其新闻业内口碑比较好,老百姓们认为震撼人心。汕头大学陈婉云老师把这个记者节拿到美国哥伦比亚播出,他们都很震撼,以为中国的新闻环境不是很好,其实一点不比国外记者逊色。他们现在问我们要碟,国外同行觉得很佩服。大专院校的老师把这期节目作为教材告诉刚入行新闻系的学生,我们优秀的记者在做什么,为社会推动着什么,我们很自豪,《讲述》平常日常节目的平台上,我们还能做一些特别节目,凸现媒体人的社会责任感。我们都是在慢慢找到尝试,包括我们也希望为中国社会做更多的不仅仅是讲情感故事,也讲大情大感的故事,讲一些在社会建构中起到主要力量人群的故事。

二、《讲述》书写草根百姓的历史

欧阳国忠:你们从被动记录参与到主动记录,有意识把主题加入自己的策划意识,你们



这期节目的嘉宾是一位72岁的老人，她立志要治理西北三个有名的沙漠：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专家认为这些沙漠是华北沙尘暴的源头，那里的沙尘十几个小时就可以吹到北京。这位老人叫奇琳华，来自北京。她在沙漠里呆了14年，先后治理和参与治理的沙漠面积已经达到五万亩。这位老人退休前的职务是中央民族大学教务处的主任，她的老伴生前是一位部级的干部，她的孩子在北京也都事业有成，生活条件非常优越。一个古稀老人，为什么要选择离开城市去治沙？她怎么适应被称为“死亡之海”的沙漠？她有足够的能力对抗沙漠吗？

我们带着无数问题采访了这位治沙老人奇琳华。我们被老人的执著感动、我们被老人的激情感染、我们被老人的自信折服，理想世界一定是由这样的人支撑起来的，我们盼望老人的风采被尽可能多的人看到，那样，这个世界一定会增添更多希望。



“治沙老人”奇琳华

那些精彩的故事从哪儿来的？

梁红：在团中央交给我们十大人物颁奖晚会上，杨立伟来问我们，你们怎么有本事找到那么多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是我们团队里面的编导，通过交朋友、看新闻，我们记者特别自豪，我们的记者编导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平常的故事比如别的台也做过，我们不是做到最首位的，但是我们有一个独家的角度。本台很多制片人很喜欢看我们的节目，说你们编导到我们栏目找故事，发现你们的故事做得比我们要好。这跟《讲述》三年文化有关系，刚开始发愁数量，往往在故事质量上下工夫，不仅仅找到故事跟别人一样，但是我们能够发现跟别人不一样的讲故事的方式，包括这个人在别的栏目没有焕发出来的东西，可能在我们栏目被激发了。这些东西跟文化，包括编导打交道的方式，主持人交流方式都有关系。遍地是黄金，看你怎么拣的问题，各人有各人的高招。

欧阳国忠：每个人心中的故事像矿藏一样，挖掘方式不一样，决定了能不能把矿藏找出来。你们找故事是什么途径？

梁红：我们开始定位讲人生故事，不是定位在漫长的人生过程中。漫长的人生过程中，年轻编导很难驾驭，我们每期节目往往选择人生的转折点，截取一个人生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件，遇到什么人发生重大的转折。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栏目往往跟别人不同的方式，大家可能都那样做，因为三年的训练，编导都能落实到操作当中，应该是起到主要作用。

欧阳国忠：整体队伍里面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选择方向，决定了你们的每个故事都是比较精彩的。挖掘转折点，挖掘人生的拐点，大起大落的时候人的情感容易迸发出来。作为制片人如何判断选题标准？

梁红：我不是属于博士制片人或者是高学历制片人，我这个人比较感性，一般会从我自己的角度，我平时特别爱看电视、电影，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普通观众的代表。如果我从这个故事里面觉得我能吸取到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别人可能跟我一样去吸取到一些东西。另外，媒体的功能来说，我们不应该讲全是自己感兴趣的很边缘化的东西，我们栏目还是追求大众性，尽量多给人一些收获，这样的选题在我看到的时候会想到这些。把自己的感受和社会媒体的功能定位结合起来，决定这个故事好还是不好。一般的故事到我这儿会毙掉三分之一，留下三分之二。刚开始的时候一半的选题被毙掉，那时候编导一两个月报不上选题。现在三分之一的选题会毙掉，另外三分之二，他们知道什么样的选题自然能通过。

欧阳国忠：很多观众喜欢看边缘化的栏目，有一些栏目做边缘化的人，比如街上乞讨的人，或者卖艺的人。还有做主流的人，你怎么看待边缘化和主流？

梁红：不以这个人的身份和职业来判断，而是这个题材能不能给大家共鸣，如果给大家比较多的共鸣就不是边缘化的人和事。媒体是社会公器，应该播什么样的东西，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是日播节目，我们一年有365个题材，如果我们以猎奇的做法得到今天的收视率，牺牲的是明天的收视率。《讲述》心态比较好，一直用平实心态做栏目，我们判断节目好不好不是猎不猎奇，我们以它能不能给别人带来很多心理的、审美的，包括人生的阅历的分享作为判断。有时候会有一些题材，天然带着非常好玩的传奇性，但是并不是我们的



梁擘　郑州市公安局
交巡警支队民警



司昌红　郑州市公安局
交巡警支队民警



张振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心理教研室主任

除暴安良、惩治歹徒是警察的职责，但是以前很少有人想过，警察也是人，当他亲手击毙歹徒之后，他是不是也会害怕、恐惧、焦虑乃至于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本期节目的上半场专访了两位刚刚有过击毙歹徒经历的警察，他们诉说了自己完成任务后真实的心理感受，包括恐惧、反复做梦等等，以及给自己带来的心理困扰。

节目下半场采访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心理教研室的教授，他不但回答了上半场嘉宾心理问题的成因和解决办法，而且用详实的数据分析了目前警察队伍中存在的各种心理困扰和对警察工作的影响。

方向，并不以这个作为判断选题的方向。猎奇的栏目应该说是杀鸡取卵的方式不可取，秉承新闻人或者职业媒体人的心态，平实做事情。我们栏目奉行的口号是简单做人，踏实做事。整个栏目比较朴实的风气，我们不提倡特别猎奇的做法。

欧阳国忠：品位向上眼睛向下，要和老百姓贴得近，但是要求高品位。

梁红：很多人总是觉得高收视率和高的品位和品质是打架冲突的，就我来看，这两者是合一的。我自己做了那么多年的经验，我在《今日说法》的时候做主编，领导一个小组主打《今日说法》星期天的收视率，星期天中午收视率最容易冲高，我带领小组做了大半年，冲了很多高收视率。当时有很多讨论，选择猎奇题材还是选择常规题材以质量取胜，当时大家有不同的说法。后来从《今日说法》经验总结，不是猎奇的题材获得高收视率。两年来，我们在做法上没有特别大的突变和调整，一直踏踏实实做栏目，找寻好故事，寻找这些故事给大家更多的共鸣和感动和一些收获，人生的智慧启迪或者人生的收获。当初我们也没有想到它是十套收视率最高的栏目，大家一直觉得深夜好多知识分子特别爱看《讲述》，有时候一套凌晨1:45才播，我自己睡觉都等不到。我们同行看得特别多，本来我们是为大众播出的，知识分子爱看，高收视率和高品质并不打架，既然是好的节目，既能打动大家，又能获得大家的眼球。

欧阳国忠：《艺术人生》以带有明星光环的人作为主打吸引眼球的方式，《对话》以企业家作为吸引眼球的方式，《讲述》能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梁红：以明星以精英人物作为主诉者，以百姓作为主角来做这个节目。大历史角度来看，包括叱咤人物风云的历史，更多是草根百姓的历史，这些历史往往被忽略，在大历史中没有被书写的。《讲述》就是在书写这些草根百姓的历史，他们的生活历史，从大历史观来说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不管一个节目能做多少年，很多年以后如果大家再拿《讲述》来看，那样一个时代有这样一群人是这样思考这样行为的，他们的心灵有过这样的挣扎，有过对社会的贡献，有过对别人的启迪。我觉得每个人在媒体中能够胜任的角色其实不是那么大的。作为制片人，我的能量只能说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一个栏目，我的栏目里如果能够为时代的百姓书写历史，包括心灵写照能够展示一些东西的话，可能大家能从里面得到共鸣，也是为什么《讲述》在十套那么受欢迎的原因。十套有30多个栏目，有以精英人物、大人物，历史深的大人物和现在的大人物为主角的栏目，收视率都没有《讲述》高。心灵的共鸣不以身份多么显贵为判断价值，我们节目的嘉宾无论社会地位多么卑微，无论表达多么木讷，我们这些人也是在草根中生长的，我们愿意展现草根中很普通但是很尊贵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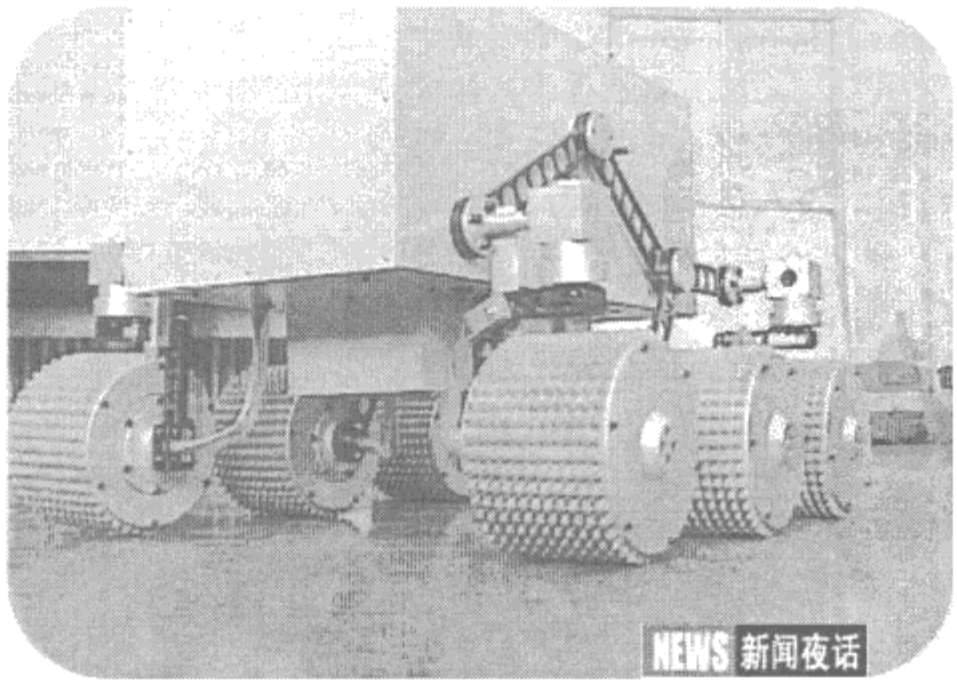
欧阳国忠：《讲述》的嘉宾学问不高，但是讲出来的话有哲理，有时候往往有这种触动。

梁红：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高中刚毕业的时候可以上很好的大学，但是林语堂和她说，你可以不要上大学，大学最大的课堂就是社会。这个大学是没有围墙的，要上没有围墙的大学，不要上有围墙大学。我并不是引导大家不要上大学，社会是大课堂能学到特别多的东西，不一定上了硕士或者博士是最博学的人。社会大课堂会教会你很多，嘉宾的生活经历很



邓宗全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

2004年年初，中国的探月计划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向媒体透露，中国探月计划首期的研制经费15亿元人民币已经到位，中国探月计划全面起动。为配合探月计划实施，全国有近10个单位抓紧研制月球车，为探月做准备。节目采访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邓宗全教授，邓教授带领哈工大科研人员已经研制出了三辆不同类型的月球车的样车，他们是中国最早诞生的月球车。这期节目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邓教授的实验室录制的，邓教授现场展示了不同月球车独特越障的能力，并详细介绍了月球车到月亮上的工作任务，复杂的月球环境以及月球车需具备的功能等等。



沧桑，他可能是最有人生智慧的东西，最能焕发出哲理的东西可能是书本上看不到的。《讲述》做这个栏目非常养人养心，我做了这个栏目也是有更多对人生的理解，心态更平实更平和，还是非常幸运的。

三、平常节目是家常菜，特别节目像大餐

欧阳国忠：讲述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出来的话最真实感人，以前用明星娱乐大众，现在用大众娱乐大众，你们举办的 DV 征集大赛，你觉得是不是转变的一个征象？

梁红：现在时髦的词就是娱乐。社教节目我们一开始定位就是有过这样的认知，我们现在做的《讲述》栏目不像新闻风风火火，也不像娱乐热热闹闹，我们用自己的视角展示人生百态，把人生经历与大家分享。没有必要用娱乐的做法做节目，现在有那么高的收视率是一种兴奋，也是一种意外。我们没有娱乐大众的追求，应该用大众的经历和大众一起分享，我觉得这个观念比较老，并没有赶上媒体里面比较时尚的观念。也许大家看的过程中会感到有娱乐的效果，过程本身就是娱乐元素，但是主观追求来说，我们还是比较老实的一个观念。

欧阳国忠：DV2004 我们的影像故事，征集之后反应怎么样？

梁红：凤凰卫视、三星、歌华包括各地方电视台都做过，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大型活动办公室和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共同举办的，承办是《讲述》DV 中国推广协会，这是广博会里面新增的栏目，过去有华表奖，金鹰的，这次第一次增加了这样一个 DV2004 我们的影像故事，渲染出更多的大众色彩。《讲述》2003 年 SARS 推出周六 DV 讲述版，这次总局和中央台社教中心交给《讲述》，原来参与过 DV 在我们栏目表现过的都能继续投稿。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接稿量仔细算起来有五六千份报名表和作品，接到的作品现在还源源不断，超过以前任何一次 DV 大赛。我跟一些同仁聊过，上海电视节和四川电视节接到的作品量可能没有我们这次这样多。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从专业角度来看不是特别好的专业作品，这次 DV 大赛降低技术门槛，或者不以技术为门槛，我们不以技术指标有多么高作为判断标准，希望每个人能够拿起 DV 表达自己的感受，这种感受能够与大家的分心，也是《讲述》理念的延伸。我们非常高兴承办这个项目，作品进入最后的评选阶段，9 月 19 日那一天推出整个颁奖晚会，中间 8 月底到 9 月上旬会集中两到三周的时间把全国优秀的 DV 作品在我们栏目进行展播。DV 还是非常可贵的，对专业是非常好的补充。不可能所有角落被专业捕捉，DV 有一个广度和深度记录的功能，大家在《讲述》的展播和颁奖晚会中会看到非常有震撼力的 DV 作品，希望大家能够收看。

欧阳国忠：有观众记录身边原生态的故事，降低门槛是不是一个趋势？最近湖南卫视推出《超级女声》的节目，零门槛进入非职业的歌手大赛。以前我们要设定一个标准，进入我的大赛一定有个标准，现在这种理念越来越平民化。

梁红：任何事情包括媒体的变化都是社会大背景的反映，从三贴近的提法包括很多平民化风格栏目的诞生，包括你刚才说的地方电视台的做法，都表明对电视媒体功能认识的转变。过去包括《东方之子》要有成绩要有业绩，要是模范人物才能上电视上电影，坏人只能在电影里出现是虚拟的，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人



刘嘉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事装备研究所
军用食品研究室主任(左)
周国泰　军事装备研究所所长(右)

你相信凉水、甚至是脏水也能泡出热腾腾的米饭和面条吗？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已经把它变成现实。在一次国际性的侦察兵比赛当中，我国侦察兵就是凭借这种野战食品，在短时间里补充了营养、恢复了体力，为中国代表团获得了团体第一名。那么除了野战食品，在现代战场上，中国军人究竟都吃些什么？他们随身携带的这些食物将起到什么作用？为此《新闻夜话》专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事装备研究所的周国泰所长，他也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以及该所军用食品研究室的刘嘉喜主任。节目中他们告诉记者研究这种食品就是希望在打仗和演习的时候，能让战士无论何时都能吃上热的食物，因为它不受任何环境和地域的限制，就是在没有水的时候甚至拿尿也可以。除此之外，士兵还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吃到不同的食物，比如：抗晕船、抗辐射、抗疲劳和抗缺氧的食品等。他们保证这些食品里绝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兴奋剂和化学成分，士兵吃了这些食品，不仅可以增强自身的营养，还能缓解疲劳，从而提高部队整体的战斗力。

平民老百姓不能作为主角。讲述老百姓的故事《生活空间》,一批纪录片的诞生受到大家的欢迎。现在平民到了一个前台,到了一个舞台的中央,跟原来讲述老百姓生活状态还是不一样,可能还带有一些观赏性,老百姓可以被观赏了,可以进入纪录片了作为主角。现在更有一种人民创造历史的感觉,不仅仅被观赏,人民也是一种创造的主角。现在包括我们栏目都是把讲述的主角给予讲述人,是对电视讲述的变化,电视不仅仅是我说你听,我说你看,大家可以在一起参与,就像画家画画,没有欣赏者参与就不能完成画审美需求的最终体现。老百姓不仅仅看,还可以参与,可以作为栏目的主角,都跟社会大的背景相联系。

欧阳国忠:审看那么多参赛的 DV 有什么新的发现?

梁红:DV 记录生活的一种广度和深度,在这次大赛里面让我感觉非常意外非常震撼。以前一些地区的同业者说,DV 爱好者的热情比我们要高,但是水平远比我们估计的要低。我们不从专业角度评判 DV,我们平时带着一拨人举着吊杆话筒采访的时候,老百姓不会把真实的东西展现出来,DV 大赛让我深刻感觉,拍摄者和被拍摄者距离不一样,影响到整个影像质量的呈现。DV 不是带着电视台的任务去拍,被拍摄者非常自由,非常容易展现自己真实的一面,健康、积极、有人性光辉的段落能在 DV 作品当中看到。有一些作品我们自己看了都感动,主编准备一堆餐巾纸在旁边,这次 DV 大赛很多参赛作品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把那么多真实美好的东西端上来。过去说 DV 是不是阴暗的、地下的、非主流的,过去理解在边缘题材里面以对抗的姿态才能拍到有价值的东西,这个完全是一种误区。只要大家有共鸣的作品,有感染力的作品不一定非得要靠边缘题材和对抗姿态才能展示。这次我们看到的作品,所谓阴暗地下的作品非常少,可能因为广电总局和中央电视台共同举办的原因,我们收到的作品非常有震撼力。希望大家到展播的时候和颁奖晚会看到,好的作品一定会跟大家共鸣,仅仅猎奇的题材上下工夫的作品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我看好 DV,在专业影像之外用民间影像,用老百姓的视角能够记录身边特别感染我们的有价值的东西,能够记录对我们社会飞速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因为专业影像不足而被失落的一些东西,被丢落的一些东西,他们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如果大家都能够拿起 DV,人们书写的历史会非常丰富,我觉得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欧阳国忠:《讲述》有意识推出大型活动,开始介入生活,不仅仅是感知生活,还推动社会上正面的力量。这一点变化是可喜的,2003 年做十大杰出青年颁奖,还有中国记者评选,还有 DV 活动。在活动方面有什么新的打算?

梁红:2004 年 DV 项目是我们栏目新增设的项目,团队也非常喜欢这个项目。来了五六千部作品,我们的眼睛都快看肿了,唯恐遗漏好的节目。我们组成巨大的评委会,有资深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包括社会文化名人从各个角度去看,我们在央视网站栏目都有一些展播,观众可以投票,我们结合专家意见,最后是大中型的评选,有一些作品会入围获奖。计划把记者节项目做好,新增加的 DV 项目也要做好。现在找我们做项目的人非常多,目前到年底还会推出一些活动,最重要的两个项目就是现在这两个项目,其他把每天一个故事讲好。我们有一个比喻,特别节目像豪华大餐,平常节目是家常饭,还是家常饭最好吃,偶尔吃一



迭戈·洛美 《探戈女郎》总制片人(左)
莫拉·戈多伊 《探戈女郎》编舞、主演(右)

2003年，第五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压轴大戏是来自阿根廷的舞剧《探戈女郎》。这让很多人吃惊，近年来，很多探戈舞团来中国演出，还没有一个能担当哪个艺术节压轴的重任，而上海国际艺术节又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国际艺术节。这次专门为“探戈女郎”安排了八天的专场演出竟然场场座满。探戈被称为阿根廷人的灵魂，是阿根廷文化的代表。2002年度阿根廷戏剧评选史无前例的把四项大奖颁发给了舞剧“探戈女郎”，这是探戈历史上第一部大型叙事性舞蹈，讲述了一个悲剧性爱情故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编舞兼主演莫拉·戈多伊，她被称为“探戈女王”，而她的丈夫迭戈·洛美就是这部剧的总制作人。我们在这位“探戈女王”演出之前采访了她和她的丈夫。在节目中他们解答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看一部来自南美的舞剧，“探戈女郎”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点大餐。

四、制片人更像车间主任

欧阳国忠：你 1990 年从复旦大学毕业，一个人独闯北京。

梁红：现在很多人独闯北京，现在人的勇气远远超过我们。我当时到北京来找工作，跑了十几家单位，我的材料比较硬，他们希望能够进入，但是因为进京名额的限制，到了《北京周报》，是一个对外宣传的，用英文呈现的。前面我们用中文写稿子，他们翻译成英、法、德、意，在那儿做了五年收获很多。中央电视台面向社会招聘的时候，经过好几关考试才进入到中央电视台。

欧阳国忠：当时为什么要进入电视？

梁红：当时《半边天》招聘，我觉得我从小特别喜欢看电影，对影像直觉比较好。当时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到电视台看一看，用影像表达和文笔表达是什么不同的状态，当时有这么一个机会就过来了。做了影像之后不能割舍，我在《北京周报》做得比较好，一直写封面故事，领导对我非常重视，送去培训。我觉得用影像表达更能够展现我的综合素质，我表达起来也比较顺畅。经过长期两年的拉锯战，进入了电视的行业。现在看来还是比较明智的，因为我不是那么博学，看的书也不是那么多，相比较来说我的优势不像在影像方面那么容易显露。

网友：制片人对栏目的人财物和栏目的方向负责，你一天的时间怎么安排？

梁红：早上 8 点钟起床，8:30 出门，9 点到办公室，有无数像雪球一样的事情滚过来。现在事情太多了，不是靠你调整生活的艺术能够解决的，这个栏目的片子看了三年，一开始开创到现在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都要看，多的时候要看五遍。前面经过主编看，我对片子要求比较严格，三年是摸爬滚打，现在改一两遍就出笼了，《讲述》节目不是做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我每天上午下午重要的工作就是审片，经过主编审完到我这儿审，有时候 40 分钟的片子要看三个小时，一边看一边说，怎么表达，怎么讲故事更好，传帮带的过程，对别人的创造力有所压抑。制片人是一个栏目的总负责人，做栏目不是考编导而是考制片人。经过制片人认知认可的节目代表制片人的水平，我们做的过程当中非常勤奋也非常努力。我一直在一线看片子，基本眼睛迷离，晚上十点多钟回家，这当中作为制片人还有一些行政事务，上午忙到 12:30，有盒饭端过来，一边吃饭一边说话，签很多财务报表和单子还有选题表。批选题、签设备清单、编导稿费、审片、开策划会和编导主编交流对节目的认识，安排日常事务和特别节目。人家说制片人像职业经理人 CEO，CEO 在我眼中都是很潇洒浪漫的，我的生活充满了忙乱、忙碌、疲劳，我做完 DV 大赛要调整状态，尽量把编导培养成熟，把我的压力分担一部分到他们肩上。现在主编非常能干，大家对人生观、价值观有相应之处，对节目认识相似，他们挺能够帮分担一些，在局部上尽量能够多培养我们的骨干队伍，我自己也能轻松。

欧阳国忠：中国的制片人引入不太久，从不成熟到成熟，现在制片人这种概念越来越被推崇，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梁红：既有惊喜也有压力，自从我自己做了制片人以后，制片人在承受越来越多的压力，荣誉感也比以前增强。因为过去制片人是属于科级干部，过去以行政角色看待制片人，



张歌真　北京海淀明圆学校理事长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到2003年已经突破亿人。这些人生活在城市中却不能享有同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按照惯例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有三个，第一，在正常缴纳借读费以后，进入市区的公立学校；第二，进入收费比较贵的政府批准的私立学校；第三，在非法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实际上在农民工人群中，选第三项也就是非法打工子弟学校的人超过了80%，因为这类学校收费低廉，但是这样一来就有十几万儿童上学拿不到国家承认的合法的毕业证。

从2003年新学期开始，在北京打工的外来人员有了第四种选择，北京有了第一家经政府批准的合法的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市海淀区明圆学校。当地的教育部门是经过几年的考虑才终于决定批准这类学校合法存在的，这是历史性的一个进步。

关于打工子弟学校合法化仍存在分歧，这类学校办学条件简陋，师资力量差，而且安全和卫生保障也存在问题。那么有了合法的身份之后，打工子弟学校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从此走出困境了呢？我们采访了北京海淀明圆学校理事长张歌真，得到的答案是：虽然困难仍然很多，但有了政策支持，民办学校进入良性循环、解决更多孩子受教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没有特别凸现制片人在一个栏目当中的作用，更多是干部管理的角度。从2002年到2003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制片人更赋予市场、节目生产管理经营一条龙的角色，荣誉感更凸现了，其实压力竞争越来越大了。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频道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多，更多是栏目与栏目之间的比拼，你一个频道如果没有几个栏目的话，这个频道没有竞争力。栏目是频道很重要的细胞，而这个细胞制片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制片人制现在不是很成熟，无论地方台、中央电视台，关于制片人管理，包括制片人管理别人，都还有很多亟待补充完善的地方，我们自己也在探索。比如制片人怎么管理员工和节目，怎么样在成本核算上控制，现在有很多探索的东西。制片人在体制内做得好和坏，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管理优化方案，怎么样去奖惩衡量制片人的价值，现在中央台和地方台都在探索，应该是渐渐走向成熟。

欧阳国忠：电视台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栏目的竞争，栏目的生产制片人是灵魂，对所有的环节进行统筹安排。制片人生产链条有很多环节，需要由管理的制度和方法来保证节目的质量。你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保证《讲述》每期节目播出后质量达到一定的水平？

梁红：我们规定了几个环节要有一些指标，比如选题，来了材料选题要有几个大概标准。不仅仅是一些我们的直觉和感受，它的故事性怎么样、主题是什么，画面感怎么样，这样一些指标已经耳濡目染到了这个栏目的操作中，这是从材料选择来说。从选材到加工，生产这个环节有一些步骤，选题经过策划之后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准，才能进演播室，我们有一些细化规定。到最后制作播出这一关，我们分成几档来验收。每一档有每一档的指标要求，更多是用规格化生产的管理方式在管理节目，作为制片人不仅仅像一个指挥乐队，高音部低音部要唱得很和谐，更像车间主任，要有一些硬性指标、量化指标去检查这些节目。虽然这个节目是精神产品，不像杯子一样那么有形，量化得那么外在外显。但是艺术产品毕竟还是有产品商品的功能，现在越来越市场化，我们现在把精神产品当作商品来对待，这个也还在探索中，很难说成型有效。《讲述》量化了一些指标，保证节目在一定的水准上。

欧阳国忠：《讲述》有多少人？

梁红：40多个人。

欧阳国忠：中国制片人逐步从过去单纯注重个别节目到注重整个管理方法，有栏目引进一些人才的评价机制，或者编委会制提高整体水平。你接触外国制片人，中国和外国制片人差距在哪儿？

梁红：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我和外国制片人交流过，并不觉得他们的节目比我们好多少。制作技巧我们一点都不差，包括美国《60分钟》节目的制片人，包括娱乐节目的制片人，英国老大哥还有好多我们都在一起座谈过。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要根据中国国情生产设计开发一些节目，国外有不同的文化环境和观众的喜好，根据他们观众的喜好量身打造一些节目。从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观众打造一些节目，操作理念来说，国外市场化倾向更浓，完全按照市场压力来做。中央电视台用市场的眼光来做，包括我们的角色定位，既然是中央电视台就还有央视宣传的任务和功能要完成。从理念包括制作方式，包括节目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质量上一点不比国外大媒体差。

国际传媒界主导的是美国、英国，有历史



刘正琛 阳光骨髓库创建人

这期节目报道的是一个白血病人，北大的研究生刘正琛。他有可能只能够再活五年，但是却在用有限的生命，建设中国第一个民间骨髓库。节目播出的前一年，刘正琛不幸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白血病，必须进行骨髓移植。但是国内骨髓库的数据太少，找不到合适的捐献骨髓的人。所以他决定自己筹集资金，召集志愿者，成立阳光骨髓库。这件事情被广泛地报道之后，刘正琛的名气越来越大，但是独立运作这个骨髓库还是非常地困难。采访中，记者能够真切地感到刘正琛身上蓬勃的生命力，无论有多么困难，他都会把自己的事业继续下去。

的沿袭，包括他们的电影业发展比我们要早。我们国内电影电视人也比较努力，很快吸取国际先进的理念和手法，如果现在在市场化的推动之下，将会有更多更好的节目出来，而且我们应该跟国际制片人站在同样舞台上表演，展示我们的才华。应该说互相取长补短，我们跟他们交流过程中，他们看我们的节目。过去他们对我们不了解没有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中国的节目没有在国际大舞台上大营销市场上占一席之地，卖给国外数量很少。大家印象中觉得中国的节目是不是做得不好？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节目，国际市场营销上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影响力。我们希望把和国际接轨的操作方式引入进来，这样我们会有更多的话语权在国际市场上。

欧阳国忠：栏目的生存是第一位的，生存需要资金，需要经营得好。一档节目经营好的话，目前中国的情况靠播出和广告吸纳。《讲述》生存法则有什么不同？

梁红：这个不是我自己能够决定的，中央电视台按照不同的频道战略分制，一开始科教频道就是没有广告，我们靠台里拨资金在做。科学教育频道里面基本实施的是没有广告，现在在台里播，将来随着变化不知道台里对整个频道定位有什么样的要求，如果靠自己，《讲述》这样高收视率的节目完全可以为台里创造效益。但是现在公益频道将来多大程度走向市场，这个可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肯定是领导怎么决定，我们怎么样去做。生存上《讲述》有这样一个理念，无论什么样的条件下，我们有生存能力，而且为社会制作更多更优良的节目，无论收视率还是口碑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

欧阳国忠：《讲述》从网站、报纸上可以看到你们的文字内容，你们也出了不少书，有没有打算将你们制作过的节目以另外的方式进行推广？使它的价值最大化。

梁红：我们没有特别注意这方面，我们出了两本书，到记者节第三本书。很多观众给我们打电话说晚上一点多钟太晚了，看节目等不到那个时间，十套又落不了地。视频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分享我们这些嘉宾的人生经历，不要把资源浪费，既然花了那么多力气做节目，就不要浪费掉。做了这样一些链接和平面媒体的互动和平面媒体的书籍，做得不是很充分。资源最大化，现在人力精力都有限，现在做得不是特别充分。

欧阳国忠：由于时间关系，看不到哪个节目可能有很大的遗憾，很多观众和我感受相同。

梁红：《讲述》现在尖锐一些，一开始像电视版的《读者文摘》，《读者文摘》既然能保存，你们也可以出书。电视到文字转换，怎么样转换得恰如其分，我们缺少这样的改编者，有这样理想的可以联合和我们一起来做。

欧阳国忠：一个栏目的创新是大家提的比较多的事，《周末讲述》把很多电视新的元素把常态节目做不到的事情发挥，你们在创作与形态稳定两者之间有什么取舍？

梁红：现在大部分从周一到周六是日常版，周末版都在十套播出。《周末讲述》是我们栏目、频道里面收视率的，日常版口述成分多一些，周末版加入很多外拍镜头变换。我们没相改动太多，有的嘉宾不方便来的日常讲述也会到外景拍摄，不会因为不能来把这个节目牺牲掉，主体形态还是那两种形态搭配为主。



2003年7月，全国第一家有偿失物招领公司在徐州成立，专门帮人们寻找丢失的东西，只不过如果要从失物招领公司拿回原本是属于自己的东西，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但是有多少人会花钱来买原本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呢？从有偿失物招领公司开办以来就引发了不少的争议，有人认为它有可能会成为小偷销赃的场所。



李茜　徐州有偿失物招领公司经理

但是之后全国各地的失物招领公司纷纷开业，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新的行业——报失业。全国第一家有偿失物招领公司的经理，只有22岁的李茜，她立志发展报失业，在中国市场填补一种空缺，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面临着许多困难。而且正在起草的《物权法》草案中也提到，捡到财物的人有权利请求失主付给一定的报酬，至于报酬数量要由双方来商定，但是最高不能超过财物价值的20%，同时如果失主不愿意支付报酬，捡到财物的人也应该无条件的将东西交还给失主。

《艺术人生》制片人王峥访谈

一、《艺术人生》发展三阶段

欧阳国忠:,《艺术人生》从开播到现在有三年了,你们第一期节目播的是童安格。当时为什么选择童安格?第一期节目很重要,这期节目推出有什么背景?

王峥:我们第一次在选嘉宾的时候,当时大家在中央台后面一个特别破的朝鲜烤肉小店里谈节目,在那里面把嘉宾确定了。当时做的时候,《艺术人生》只给了一个名字,到底做什么不知道,也没有定位,只给了时间段和名字。我们想做怀旧,什么人能让我们有特别强烈的怀旧情绪呢?当时想了很多歌手,突然一下子想到了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所有的人在那个破旧的小店里吃着特别便宜的烤肉,决定了请这个嘉宾。

欧阳国忠:我做过很多栏目,栏目创办的时候很艰苦,但是艰苦的同时也很值得怀念。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们从筹备到播出,中间经历了多长时间?

王峥:筹备到播出只有三个月,9月份筹备,12月份开播,做了三个月,时间非常短。

欧阳国忠:这当中是不是也充满了你们自己比较艰苦的经历?

王峥:筹备前不算艰苦,包括刚开播半年都不艰苦。《艺术人生》特别幸运的是,一开始就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定位,就是做人生。最初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动静,往后会有这么大的影响。那时候是做电视本身的快乐,没有这么大的社会责任感。任何成功的东西到后来,发现都是一样的,首先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再想能给你带来什么。《艺术人生》的成功验证了这一点,我们刚起步的时候很简单很快乐很轻松。

欧阳国忠:根据人性化的本质来做,这是受众的需求。

王峥:在2000年,大家看到的都是晚会这样的节目,看不到有血有肉的人。当时在跟台长们作这个节目的陈述报告的时候,脑子里面突然一下子闪出了"真善美",我听到这个词是1992年在大学里我们一个教美学的老师讲的。八年之后当我讲陈述报告的时候,突然出现这三个字,这个词现在没有人用,但是我当时一定要说"真善美"。

欧阳国忠:一般作为娱乐圈的人讲他的影视故事,讲一些打打闹闹的东西,但是让《艺术人生》做出来就是有品质感的作品。《艺术人生》经过三年的发展,经过了哪几个发展阶段?

王峥:以年算的话,每年都有一个发展规律,特别巧合。第一年我们基本是歌友会,像蔡琴、彭丽媛、李玟,这些节目非常成功,当时李玟来到现场狂欢。到蔡琴的时候,很多人是第一次看《艺术人生》,从来没有见过她的人,一

《云南映象》全国巡演的第一站是杭州，演出在那里大受欢迎，票卖得一张不剩，剧场外还聚集着很多等退票的人。我们在杭州市的杭州剧院专访了杨丽萍，她兼任这部剧的艺术总监、总编导和主要领舞，采访中就《云南映象》歌舞剧的创作初衷和她本人对艺术的独到判断力做了独家专访。

这部歌舞剧的最大特点是70%以上的演员来自民间，来自云南的田间地头，完全是非专业的，而且人们看到的表演中，有接近失传的打鼓手法，有在民间已经失传的民歌和原始的民俗。甚至有人干脆说，看《云南映象》你就等于走遍了云南的每一个村寨，云南有26个少数民族，不管是歌曲舞蹈的种类还是数量，云南都是全国最多的，所以这部歌舞剧又被称作民俗文化的活动的博物馆。



杨丽萍 《云南映象》总编导

看电视有一个节目在播蔡琴，她在谈自己的人生、婚姻、爱情，那一期节目把大批观众拉进来。当时我们请蔡琴的歌迷来给她唱歌，蔡琴在我们的节目唱了三、四首歌，最后播了两首。第一年基本是这样，嘉宾很兴奋，观众也很HIGH。

第二年，我们琢磨到底做艺术还是做人生，当时凤凰中文台台长刘春跟我们一起聊，他说做艺术的人生，就做人生。最关键的还有很多策划老师，在当时所有的人对我们栏目帮助都很大，在很关键的地方——做艺术还是人生，最终我们选择了人生。第二年做的时候我们沉静下去，不浮不躁，包括大家最喜欢的秦怡，她在节目中谈到了自己人生的三个遗憾。那年几乎每一期我们都很冷静地谈人生。

第三年，我们新闻化、主题化，今年刚录完的《无间道》，论坛里面网友们特别关注，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而且把大段现场的提问发到网上去。2003 年最重要的是经历了一次非典，那时我们没有停止录像，在非典之后谈人生，眺望生命的远处，谈人生和时代结合起来更有意义。现在的《艺术人生》不是做狭隘的人生，而是时代中的人生、变迁中的人生、热点中的人生，跟随中国社会发展不停在变化发展的《艺术人生》。

欧阳国忠：纵观《艺术人生》这几年的发展还在不断成熟，包括提出集体记忆的理念，录制了《花儿为什么这么红》、《红楼梦再聚首》，是不是代表你们理念的跨越？

王峥：我们前两天在陕西有一个人文谈话，或者是人文谈话研讨会，对我的感触很深。我是做电视的，首先有一个人文情结，但不好意思说是知识分子情结，我觉得做电视的有一些人，像我们这样的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而且浪漫主义，属于上个世纪的东西，但是这个世纪还在做电视。

如果给空间给平台的话，特别想做一点自己血液里面骨子里面的东西，一定要抓住机会来做这样的节目。我们想把国家、民族在发展过程当中逐渐被遗忘，逐渐被消亡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包括改革开放 20 年社会的变迁，通过我们的节目表现出来，不想让《艺术人生》成为纯粹的娱乐节目，

如果有可能我们想把它做成宣传片里面始终提的口号，最近一年多改的口号“记录时代人物”，开始是“真实记录明星心路历程”，《红楼梦》、《冰山上的来客》都是属于抓这样一些点。《冰山上的来客》完全超乎我们的意料，在提这个方案的时候是我们在化妆间里面，我们组的一个朋友跑来跑去，《吉林日报》的一个记者说怎么不录我们长春的人，我说谁啊？他说《冰山上的来客》。我当时听了没走心，过了两个月非典之后，人们特别需要一种聚会，当时火车不通嘉宾来不了，整个北京像孤岛一样。得请朋友来我们这里一起热闹热闹，欢聚一下，后来请了这几个人来，他们非常好，不怕非典，古兰丹姆从新疆飞过来，播出之后很成功。我们主任审的时候很感动，很激动地看完这期节目。这期节目本身的故事没什么，但是代表集体记忆的情绪很强烈，能一下子拽住人。

欧阳国忠：这个节目从一开播到目前的情况下是怎么样的轨迹？

王峥：我们在一套播出，加上一套的观众，《艺术人生》每年的观众群都在递增，递增速度很快。

欧阳国忠：现在有很多电视圈的人，他们



李国光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200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第一部关于证券民事赔偿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股民可以对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等作假行为提起诉讼，在这之前上市公司说假话投资者会蒙受损失，这个损失谁来赔、赔多少，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因此也没有人能拿到赔偿，这一解释一出台就引起股民极大反响，我们在第一时间请到了这一司法解释的制定者，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李国光大法官，李国光副院长围绕这一解释出台背景、适用范围、赔偿标准等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打击了不法上市公司，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规范股市起了重大作用。该节目因其重大性及时效性等获得了司法部颁发的金剑奖二等奖。

想通过《艺术人生》这个栏目的发展个案的剖析，来了解一下谈话类节目的共性问题。《艺术人生》有一个法宝，使进入演播室的嘉宾都能够情不自禁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且到最后都能够情不自禁流下热泪，这里面是一些什么方法或者你们的操作原则，使一个个艺术家或者大牌明星能够泪流满面？

王峥：我们开策划会的时候，从来没有谈到使嘉宾哭，而且这个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什么使他们泪流满面，观众特别关心。在节目里面感动也好，悲伤也好，哀伤也好，只属于这一代人，等到再过一些年，可能五年十年我们这一代人翻页的时候，不会再哭。

为什么说这是一代人的问题？中国社会从来没变迁这么快，20年，每个人回家连自己家都找不着，回到家乡的时候，家乡什么都在变。哭的问题不是我们节目让人哭，而是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变迁很快的情况下，现代社会需要链接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断裂的现象。但是现在关注这方面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电影作品几乎没有，太少了。

大家可能看电视剧能体验到这样一些感情，但是在别的方面宣泄释放探讨得太少太少。我觉得在我们节目里，突然一下子所有的人找到了情感宣泄探讨交流的场所，所以说我们嘉宾容易哭，观众也容易哭。如果我们像国外一样有很好的朋友聚会，有很好的交流途径，我觉得可能不需要电视栏目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在中国人们没有这样的场所，没有用文艺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探讨社会发展之后的人生问题、世界观问题。这个事情被我们做了，被明星做了。明星容易被人说，他走到台前的影响力会大，他探讨这些问题，我觉得对普通人的帮助会更大，非常非常大。

我一定要说说梅艳芳的问题，她是很好的香港艺人的楷模，SARS每次活动，包括刘嘉玲的事件，包括张国荣去世，他们每次香港艺人的事情她都会站出来。梅艳芳说我有癌症，在我们节目短片里面播出，我觉得香港艺人对于人生的看法比大陆要更加有自觉性，有社会责任感，和媒体配合可能会更好一点，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二、《艺术人生》的真情流露

网友：《艺术人生》别哭了。

欧阳国忠：这个哭是表层的现象，哭的背后更多透视着情感自由的表达，融入到这个场里面去，这个场营造得比较好。

王峥：我们经常说中国一些基本的人生哲理随心所欲，包括为和不为，希望我们做节目的心态放松，也希望观众看我们节目的心态放松。

哭和不哭，你可以不哭，但是爸爸妈妈可以哭。我们做节目因为做策划过程当中没有撺掇嘉宾哭，只是顺其自然，这样做电视我们做得很舒服，嘉宾很舒服，观众也看得很舒服，如果绷着弦的话，也不是观众愿意看到的。

欧阳国忠：节目能够使大牌明星也好，大艺术家也好，融入到一种场面里面去，各种结果是由哪些工序达到这些真情流露？你们有什么绝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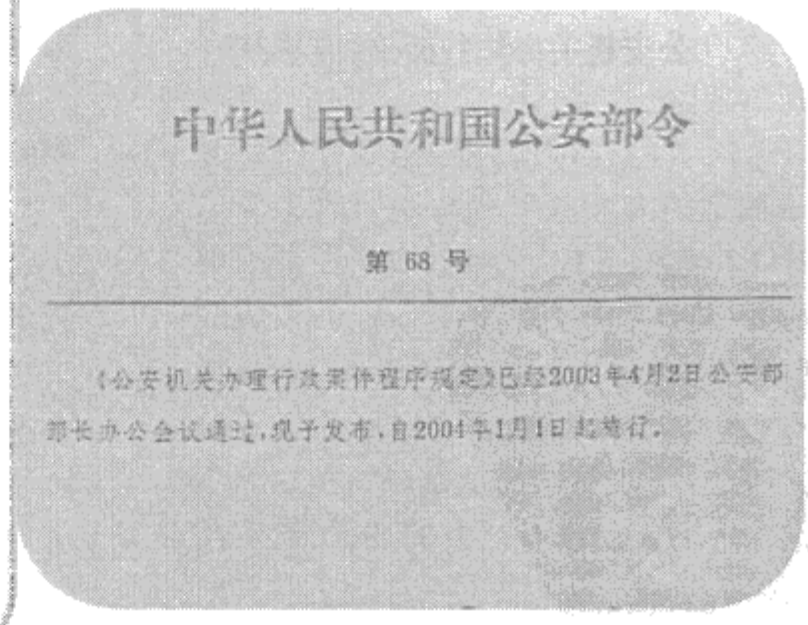
王峥：有两个，我不称之为绝招，别的同行也做得很好。如果说捷径的话有两个，第一个捷径是必须了解演艺界，第二是必须真诚。我们要求所有的编导要有很扎实的功底。很多明星见到我们的编导会感受到，我们不是娱记，而是理解他们的艺术，是一个具有很好文化素养的工作团队。

另外就是真诚，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探访



王永胜　公安部法治局行政法规处副处长

从2003年9月开始，公安机关在执法的过程中要受到更多的约束。8月26日公安部出台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要求公安人员在办理行政案件的时候要按照新的统一规范进行。这次程序规定的出台，完善了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的程序体系，它的宗旨和精神，用公安部门自己的表述就是减少随意执法的制度空间，维护公平公正，以及坚持便民利民，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这个程序规定中被公认的最大亮点在于它明确地提出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其他非法的手段来采集证据，以非法的手段采集的证据不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公安机关首次在执法的程序中明确排除非法证据的效力。但是程序规定中，并没有明确非法手段如何界定、谁来举证、怎么监督，为此我们采访了公安部法治局行政法规处副处长王永胜，他直接参与了这次程序规定的研究起草工作，这也是公安部法治局针对此事首次接受电视专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

第68号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已经2003年4月2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人生的,这样的栏目也没几个。做这种节目你必须有人文情怀,必须真诚。

欧阳国忠:刚才提到团队,《艺术人生》栏目团队精神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

王峥:团队精神我们没有总结过,基本还是我们的宣传口号,"用艺术点亮生命",这是我们的团队精神。每个人在《艺术人生》里面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希望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找到人生价值。激励机制可能和别的栏目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有一个季度评奖、年度评奖。

欧阳国忠:你们这个团队总共有多少人,年龄构成如何?

王峥:十五个人。朱军岁数最大,下面就是我,平均年龄二十五、六岁,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团队。我们团队里面只有编导、制片、责任编辑还有统筹,大概分为制作组和管理组两个组。

欧阳国忠:你们是不是首先在理念上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包括你们提出的宗旨,"用艺术点亮生命,用情感温暖人心",也包括你们所提出的制作手段方面,"要提出极端化的制作","极端"是什么概念?

王峥:我们岁数年轻,我们会看大量的国外包括港台的电视节目,包括看内地的电视节目。可能有的人认为一个栏目应该是固守你的制作方式,但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开放式兼容并蓄,我们会渴望看各种电视节目,把各种电视节目最好的制作手段拿到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来。

《艺术人生》不是单纯的谈话类节目,而是现场的节目,会吸收到很多别的节目的手段。我们的极端制作定位要准确,内容要鲜明,但是方式一定要好看,要符合电视节目的发展。

欧阳国忠:是不是把每个嘉宾的内心世界挖到极致,把故事讲到极致?

王峥:内心世界挖到极致倒不是特别准确,我们觉得内心世界是什么?我们永远无法了解,包括嘉宾他自己能挖到多深,这是嘉宾自己的问题。我们只是希望激发嘉宾的创造力,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就像现在我们谈话一样,互相激发创造力,激发自己对人生观、价值观的潜能,让他和我们栏目一起把故事讲出来。现在观众看节目,理性的不好看,我们就是想怎么把故事讲好。

欧阳国忠:您能不能通过一个故事,通过一期节目的运作讲讲团队合作,以《红楼梦》这期大的策划,牵扯的人很多,《红楼梦》选择了上百人,最后到场的有多少个?

王峥:到场的人有将近六七十位。《红楼梦》是我们一直想做的选题,已经策划一年多了,让我们决定来做《红楼梦》是当时编导去王扶林导演家拜访,最后走的时候,王扶林给我们助理编导演鞠了一躬说谢谢你们,当时满眼含着泪光,我们编导觉得后面肯定有太多不为我们所知的故事。

我们一直想找到合适的时间来做,我们有编导筹备了很长时间,从两个月之前开始筹备这期节目,先找到所有人的电话来通知,当时甚至动用了派出所,演巧姐的找来了。有一天我坐在车里面突然听到广播电台帮我们找人,北京 FM97.4,请知道宝钗下落的听众联系我们。

这个戏里面的演员分手已经十八九年了,我们找了三四天找不到宝钗,有一天我们在录像时突然有人给我打电话,我一看是国外的电话号码,里面传出特别温柔的女声:"请问是《艺术人生》栏目组吗?"我说是。当时我想肯定



郭兰英 CCTV 西部民歌大赛评委会名誉主席、歌唱家

2003 年 12 月到 2004 年 1 月间，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举办了首届西部民歌电视大赛，中国最著名的民歌演唱家郭兰英应邀担任了本届西部民歌大赛的评委会名誉主席。在中国，郭兰英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等等歌曲几乎家喻户晓，《新闻夜话》在比赛的间隙采访了她，对于怎么样来保护中国传统民歌的问题，郭兰英在采访中谈了她的独到见解。

郭兰英首先肯定了本次民歌大赛的重要意义，认为“这一次西部频道民歌电视大赛是办了一件好事，起码就在西部，我听说是有三十几个民族，在这挖掘了一些以往大家不知道的东西。”整个采访中，郭兰英表现得非常谦逊，不断地重申她是来学习的：“我们祖国的艺术用语言没法表达，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这次到这儿来，不是说我是评委我来评，我评不了，我是来学习的，我真是来学习的！”

采访的最后郭兰英再次强调，对民歌的挖掘和推荐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推荐是我们的责任，推荐的问题就是其中有创作、要提炼，精华的东西要留着，这样就不会破坏原汁原味。这次利用春节这么一个大好机会，推出去了，我认为是一件好事，我还希望如果咱们要搞得好的话，还要推到世界上，我相信能够推到全世界，让他们来接受。”

是宝钗的扮演者。我说:“你是不是演宝钗的?”她说:“是,我是张莉。”本来要回来,因为时间她没有回来,后来在那边拍了录像。包括板儿特意从英国回来到这里和刘姥姥见面,他们千里迢迢有从安徽来的,有从国外回来的,到演播室里来。

欧阳国忠:宋丹丹的那一期,导演为了解宋丹丹的细节,先后访问过五个不同的人,然后把整个细节搜集在一块儿,最终使宋丹丹那期节目非常好看。你们做的节目非常好看,把道具很好运用到节目上面去,以陈凯歌节目为例,你们用了多少道具?

王峥:我们连会议室当时都没有,这期节目做的时候是在梅地亚喝茶的地方谈这期节目。谈了好多天,离录像还有四五天的时候觉得陈凯歌能带来的东西太多了,到底怎么来谈,那么短时间里面真正能触摸到陈凯歌的内心思想。我们几个突然灵机一动,后来想到那包黄土,谈了这么多,他到英国好莱坞走了这么长时间,但是陈凯歌之所以被我们尊敬,还是因为他对汉语的把握能力,他是少见的对汉文化把握特别好的一个导演。这是他区别于其他所有导演的不同,奠定他在所有导演里面领军人物的概念,因为他对民族文化的熟悉。我们前两年和另外一个导演别航程和赵季平去过一次陕北,当时我们一进到陕西看到电影里面的黄土地,长河落日,的确深深震撼了我们。

后来我和小别不约而同想到了我们去过陕北,想到黄土,正好有观众和我们联系,观众把黄土给我们寄来,而且是真正的黄土。根据黄土我们又想,我们拿一个胶片盒装上黄土,后来凑了六个,每个胶片盒里面凑到打点的东西,陈凯歌人生之中最能反映出他的东西,他去云南下乡带的中华牙膏,包括法国电影手册评价他的文章,包括中西方的玩具,还包括最珍贵的他父亲的一段录像。

欧阳国忠:那期节目看了非常棒,那一捧黄土真的是用心良苦。现在把话题拉回到你这个人身上,这个事情的所作所为还是因为人的因素在起作用。

三、追寻表层现象的背后

网友:每期节目从策划到完成需要多长时间?

王峥:有三个月也有三天的。李玟那期我们节目刚开始录,因为春节晚会她什么时候到没有定,那期节目很快,那期节目是很少见的没有事先见嘉宾就开录。《无间道》是十天,时间稍微长一点。

欧阳国忠:王峥原来是在北广读的本科文艺编导,八九级。当时考分比较高,能够进北大。

王峥:1989 年北大专业没了,当时想上北大读国际政治,后来分很高但是没了那个专业,一转身看到北广文艺编导,就读了这个,我非常庆幸能读这个专业,非常好。

欧阳国忠:是不是对这个节目表现手法多样化有很大帮助?学校里面学的一些东西对现在有直接的用处?

王峥:直接用处没有,但是对人的素质教育很好,我特别庆幸广院是思想特别开放的。我们正好赶上 80 年代末,在 1989 年进校的时候还有。我们正好是承上启下,70 年代生人和这个概念差不多,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广院的几年我们用一个词叫做肆无忌惮,非常自由非常轻松,而且非常愉快地完成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奇附林　蒙古民歌歌手

世界歌王帕瓦罗蒂被称为是高音C之王，那么有谁能够比帕瓦罗蒂唱得更高呢？在中国的西部就有这样一位唱蒙汉调的歌王，他被人们誉为是“高音A之王”，比帕瓦罗蒂还要高出五度。他就是来自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奇附林。蒙汉调也被称为是漫瀚调，是内蒙古西部的一种民歌，既有蒙古民歌的特色，又有汉族民歌的音调，很多音乐专家在听了奇附林的演唱后，也都很奇怪，他到底是怎么发音的？

《新闻夜话》有幸在2004年1月中央电视台举办的西部民歌电视大赛之后采访到了这位民间歌王，他也在采访中再次为我们一展歌喉。这位纯朴的老人并不知道自己能唱到多高，因为他没有学过乐谱，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完全是民间流传的、自发的一种唱法。他还给我们透露了一个秘密：之所以他能够唱得这样好、这样高，一方面和他自幼就爱好唱歌有关，再就是他有别人没有的天赋：他没有喉结，像女人一样没有喉结！难怪他天生唱得这样高。节目中，他还给我们讲了很多与民歌有关的故事。

欧阳国忠：读完四年直接读了研究生。

王峥：对。当时学完文艺节目之后，看文艺晚会太多，不喜欢，后来喜欢纪录片，导师是王纪言，就读了研究生，很庆幸能做他的学生，做了三年。之后就到了中央电视台。

欧阳国忠：我直接面对的王峥是很文静的女孩，同时很有文化追求，这种文化追求是不是在骨子里面和你生长在西安的背景有关？

王峥：可能有关系，我也说不好。我们西安几个歌手，包括搜狐的 CEO 也是西安人，包括张艺谋、顾长卫都是西安人，西安人可能活得累，一根筋，老想追求点儿什么。

上次我们去陕西，说皇天厚土，人不是单纯的人，是和历史有点关系/因为我们在西安经常能感受到历史就在你身边，我们小时候去玩大雁塔，当时没有修围墙，金榜题名的石碑还没有修，就在身边。我们特别喜欢郑钧、张楚的歌，他们歌里面弥漫那种气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一定产生点儿意义出来。将来我可能不适合做电视。

欧阳国忠：从你的骨子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文化探寻的冲动，一定要去追寻表层现象的背后有些什么样的文化含义。这个是不是会影响你今后的行业选择？

王峥：不是今后的问题，目光决定世界，包括做《艺术人生》，日后可能会越来越影响我的生活。因为你慢慢越来越清晰，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感兴趣。我老说一代人伺候一代人，一代人给一代人看的东西，电视越来越浅薄浮躁，而且电视在国外也是完成这种功能，还是希望中国电视有自己的独创性符合中国的发展规律。

网友：电视是一个残酷的行业，你还准备一直这样发展吗？还是有更高的目标？

王峥：真的很残酷。因为电视正好处于特别大的过渡时代，面向观众服务，面向为国家还有责任感。我觉得中国电视属性特别多，的确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下，电视节目要做好特别不容易。能给更多的观众提供更加吸引住他们眼球的节目，这是我的目标，而不是说把文化弄得高高的别人都不知道，还是要把自己和观众能接上轨。

坐而论道是没用的，肯定需要把你了解的知识界的东西，和大众能结合起来/我就觉得我可能作为一个桥梁，作为一个纽带，能把文字的和电视结合起来，这个可能是现在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欧阳国忠：说到残酷性，电视是一个行业，确确实实大众传播性决定了我们处在这个位置，因为在传播一些价值的功能是面向大众的。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某些局部的个别想法，不可能自由或者全放开发展，还是要考虑整个社会环境的发展状态。娱乐性包括主流思想之间的把握度，怎么样使一个节目做得能够符合当今的价值取向？

王峥：我们《艺术人生》强调把握度，强调在人生的探讨而不是对作品的评价，不是对人的评价，而是探讨人怎样过得更有意义，国家也需要这个，我们一直提倡精神建设，提倡主流价值观，怎么提倡？现实化。

欧阳国忠：你们把一个个人的发展轨迹闪光的部分亮出来，每个人有不同的道路，但是能给你提供一点启示就够了。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公共。

网友：作为《艺术人生》制片人肯定对人生



景颇族演唱组成员



孔会英　景颇族演唱组主唱

2004年1月中央电视台举办的西部民歌电视大赛中，有一组非常特别的选手，他们可能是这次大赛上最不开心的。他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您可能听都没听说过的乐器，但因为时间的关系，他们无法在比赛当中一一来演奏。这就是景颇族演唱组，他们对自己在比赛中的表现也并不满意，主唱孔会英说：其实她最擅长的不是像比赛中规定的那样唱歌，而是边跳边唱。在节目中他们为观众展现了景颇族最有魅力的音乐。

在采访过程中，他们把带来的所有乐器，大大小小大概有几十件，摆满了整整一桌子，并且一一演示如何来演奏它们。大的乐器有一人高，声传十里；而小的只能用手指捏着，必须在耳边演奏才能听到。这么多的乐器，大多数都是在电视大赛中没能拿出来呈现给观众的。节目的最后，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在《新闻夜话》的演播室里，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围在一起又唱又跳，尽情展示了他们那极具民族特色的欢快优美的舞蹈。

有深刻体会,在过去时间里面有什么遗憾?

王峥:今天在我来之前,一个编导在机房里面晕倒了,她一直熬夜做元旦特别节目,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子,晕倒在机房里面,她身体不太好。来的路上我一直特别遗憾,这两年跟着我的这些编导还有制片们太辛苦了,对他们回报太少,这是特别特别大的遗憾,要求太严格了。

欧阳国忠:我刚才看了你们的全家福,很多是女孩子,你们一个月的节目一般一天就录完还是怎么样?

王峥:一个月的节目我们一次录两期,一个月录两天。一开始一个编导来做,后来两个编导来做,现在六个编导来做,经常会做一些特别节目。

网友:节目录制过程中你最受感动的是哪一次?

王峥:这个问题老问我,我总想不起来,我只能记住最近的。我们播的元旦特别节目,请的特别嘉宾是张悦,我们在策划会上讨论元旦特别节目,当时张悦作为节目的特约主持人。我们开了好多次会,大概有五六次七八次,张悦和我面对面的时候,我经常有所触动,而且深深被她的话所打动。

她当时给我讲了一个《我们仨》之中的一段话,杨绛和钱钟书和钱瑗在一起讲到老年居所,很快钱钟书、钱瑗去世,才明白现在他们赖以栖生的居所是一个驿站,而前途是归宿。当时我们把这个做成一个短片宣传片,把杨绛这段话做成宣传片。很多人看宣传片的时候,制作公司的人说请的配音演员有老太太,读杨绛这段话的时候抑制不住痛哭。我相信做特别节目的时候,有机会和你很尊敬的一些人包括张悦,包括我们不知道的配音演员,包括没有见过面的杨绛,这样交流起来,会被深深打动。

当时我们有一个策划撰稿写了一段话特别感动我,史航是中戏毕业的一个很著名的编剧。他当时给我们讲了一段话,后来张悦在节目里面用了他这段话,亚当和夏娃,当夏娃去世之后,亚当站在夏娃的墓前说:哪里有夏娃,哪里就是我的归宿,哪里是我的家。种种含义累计起来,在岁末做特别节目,特别有梅艳芳的事,有张国荣的事,有柯受良的事,特别受感触。

网友:你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什么?

王峥:做元旦特别节目的时候很辛苦,有一天正好有编导过生日,我们当时在屋子里面看莎拉布莱曼的 DVD。我们把灯全关了坐在地上喝着红酒,《今夜无人入睡》,那个晚上一下子非常投入,大家一起欣赏音乐,十几个合作伙伴都在听她的歌,那个夜晚真的是特别难忘。很平淡的一天,但是能找到生命中最快乐的地方,和工作伙伴一起共同分享一首歌一段音乐,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愉快的,大于爱情,大于你的儿女私情,真是精神上的享受,很难忘。

欧阳国忠:电视人平时比较忙比较累,时间上比较紧张,心灵上承担的东西很多。经常做完节目多少次的委屈也好,不理解也好,在节目播出之后,大伙儿在一块儿抱头痛哭,或者一起欢呼。这种心灵上的释放你们这个团队有吗?

王峥:我们不是做新闻节目,做文艺节目的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可能记者有更大的压力,我们还好一点儿。“温暖 2003”,每个人带一块木材来,我们相互取暖。这个可能是北欧



柴根　西部民歌大赛年龄最大的歌手

西部民歌大赛年龄最大的歌手柴根已经83岁了，来自陕西。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民歌的魅力——他唱了一辈子，唱了75年，小孩时候唱、出外闯荡时候唱、为振奋精神而唱、为打动姑娘的心而唱、高兴了就唱、伤感了也唱……83岁的老人，为能到北京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兴奋不已，他说："我来的目的是为了上到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更上一层楼，更好。我都是83岁的老汉了，得上奖也好，得不上奖也好，无所谓。"

民歌就像柴根老人的日常用语，一时半会儿也没法儿撇下，在节目中，老人说一会儿、唱一会儿，我们听到了75年前的民歌，还有幸听到失传的歌词、音调。但是说到传承，老人无奈的话语令人震惊和忧虑。

主持人：您不准备教给别人了吗？

柴　根：别人没有人学呀。

主持人：没有人学？

柴　根：没有那个功夫，这要下功夫，学这个不是一天两天，一阵阵两阵阵，我的侄儿他唱的都是现代化的流行歌曲。

我们祝福柴根老人，同样祝福中华民歌宝藏能被永远珍藏。

的一个说法，张悦说北欧在过节的时候所有人到朋友家做客，揣一块木材到朋友家做客，点燃木材互相取暖。这个意义用在我们团队，用在这个节目，用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朋友，包括爱情，包括所有的亲情。

四、做人生的节目会很长

欧阳国忠："温暖 2003"，你们首次尝试年终岁末做一个大策划，2004 年是第二次做，今年做和去年有什么不同？

王峥：我们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张悦的加盟，本来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觉得今年做得很辛苦。刚开始做策划的时候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温暖，后来张悦加盟，马上我找到做节目的乐趣。如果做节目找不到乐趣，自己没劲，观众看得更没劲，我和张悦都找到做节目的乐趣。

最大的不同，去年是无意识今年是有意识地做，今年我们请了许鞍华，我特别喜欢她，这次机会特别好，她到北京宣传《玉观音》，请她到北京的演播室来。这期节目没有收视率的压力，这期节目能请到我们喜欢的一些人来，非常好。

网友：你觉得《艺术人生》这个节目还能生存多久？

王峥：人们老觉得中国的节目特别短命，可能《实话实说》崔永元在的时候就六年，《东方时空》现在十年，像《东方时空》这么长寿的栏目都很少。不用和国内栏目比，应该和国外栏目比，我们和国外节目相比只是刚刚开始的三年。应该有好的机制，并且电视节目有很好的生存环境，我觉得百年品牌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做人生的节目会很长。

网友：《艺术人生》目前创作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对于嘉宾资源的枯竭有什么计划？

王峥：嘉宾枯竭是前两年会考虑的问题，最近嘉宾对各种人生侧面的感受是不同的，不同嘉宾谈不同的侧面感受。刘欢第二次来我们节目做客比第一次成功，他刚巧出了碟——《生于 60 年代》，刘欢这样著名的艺术家我觉得可以经常来我们节目。随着时间的发展，对人生的理解会越来越不一样。

像刘欢这样的艺术家，包括陈凯歌，我相信我们是需要他们经常来我们节目做客谈人生的不同感想，只要有新的人生感悟，不同的故事，就可以来我们栏目。

《艺术人生》现在不仅是过去凝固的人生，谈现在不停变化的人生，包括梅艳芳，我们会加入新闻热点，更加关注现在发生的故事，而不是历史的尘埃。

现在的嘉宾不只有内地的，也有海外的，也有港台的。随着文化艺术，随着演艺越来越发达，更加国际化，没什么枯竭的问题，枯竭只是我们不要做二流三流小歌星，不做四流五流的小影星，应该朝向世界海外，包括两岸三地，从历史中找答案。包括这次做刘诗昆觉得非常好。我们最近有收视率的压力，如果收视率的问题没有压力的话，像刘诗昆、郑晓瑛、黄永玉，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不会有嘉宾枯竭。不要再想二三流的小歌星、影星，这些人没有什么做的。

欧阳国忠：题材的问题从外延到内涵有极大的空间，原来认识这个问题是静态的认识，不是每个人进来这个栏目之后就不能再进来了，认识世界也是在变化的，人生认识是动态的过程，所以不会枯竭。

王峥：《艺术人生》不是益智类节目，是以



康恩·海斯(左)、乔安娜·多利(右)《大河之舞》主演

爱尔兰的国宝是什么?看了这期节目你就会知道,是大型踢踏舞剧《大河之舞》,2003 年 10 月 9 日,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上演了国际顶尖的大型歌舞《大河之舞》。《大河之舞》被称作是"世界第一踢踏舞",爱尔兰人把《大河之舞》当成是国宝,同时它也是世界上观众最多,赚钱最多的舞剧之一,得过音乐界最有影响的葛莱美奖,在百老汇舞台上长演不衰。本次是《大河之舞》第一次在中国演出,演出方宣布这将是它历史上最完美的一次演出。在演出之前,《新闻夜话》栏目专访了《大河之舞》的男女主演,康恩·海斯和乔安娜·多利,在舞蹈团里他们被称作是舞王和舞后。

在访谈中,我们了解了很多《大河之舞》演出的幕后花絮,比如他们所穿的特殊的鞋子是用柔软的布料、塑料和纤维玻璃制造的,这样才可以保证在跳舞时能撞击出清脆的响声;而在体育馆演出时,舞鞋里更要装上麦克风,以使坐在巨大空间里的观众也能听清楚踢踏舞特有的"踢踏"声。

康恩和乔安娜不仅对自己国家的传统保持着深厚的热爱,对其他国家的文化瑰宝,比如京剧,也怀着由衷的尊敬。看过本期节目之后,你会相信,《大河之舞》的舞王和舞后不仅拥有迷人的舞姿,在生活中也不乏优雅的魅力。

内容为王,形态不变。

网友:你在工作中是否有过心力交瘁的时候?

王峥:肯定有。他们对工作狂的定义是永远只记得晚上回家的路,永远不认识白天回家的路,白天没回过家。觉得特别累,我们做节目去过新加坡,去过台湾,海外这些人做节目从来不累。在中国用独特的生态环境做电视节目非常非常累,作为一个制片人,我们台里有三百多个制片人。第一线的人变得很辛苦,虽然你觉得发展下去将来会很轻松,电视逐渐走向市场化,电视就是电视,不复杂,但是现在搞得很复杂。

现在中国的环境太特殊了,变得很累,特别累。那天听许巍的歌《故乡》,夕阳西下,情境特别打动人,一下子就释放了。那天好像心力交瘁,因为什么事忘记了。

欧阳国忠:有没有开车的时候突然一下子热泪盈眶?

王峥:上次开车的时候听到《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一个女生翻唱的,我们马上要做赵传,那天听的时候,因为你在努力才有这种感觉。这两首歌是我一下子能想起来的。

欧阳国忠:纵观网友所提的问题,关于主持人的问题讲了很多,《艺术人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怎么看?

王峥:对于任何的主持人都有褒贬,朱军也不例外。朱军是西北人,我相信西北人就是实诚,可能现在网友们说的最多的是他的无技巧性。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想象《艺术人生》没有朱军主持会怎么样,如果我们找到一个主持人不像朱军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也看不到喜欢的栏目。我觉得网友们这些议论这些聊天是正常的,但是希望大家换个角度想想,如果没有朱军这个节目会是什么样,谁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欧阳国忠:目前他承担了中央电视台很多大型晚会的主持,和《艺术人生》这种主持有没有相冲突的地方?

王峥:一个主持人经验更多是好事,我们栏目需要明星制主持人。我完全赞成美国、港台包括凤凰的做法,主持人是幕前的,是我们的招牌,能够主持春节晚会或者其他节目也好,也是对我们栏目的认可。

欧阳国忠:目前媒介环境里面对很多娱乐的东西往往八卦化,讲到一个明星往往去挖他的隐私或者做得比较低俗,《艺术人生》很好把握了这一点,从另外角度挖掘了明星故事,你对娱乐品位的关系怎么看?

王峥: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将来我们所说的八卦、狗仔队不会减少,在未来在平面媒体包括电视媒体会越来越多,而且基本上是奔着世界领先地位去的。现在大陆内地这样的专业人才越来越多,呈高峰趋势,我觉得将来还会多,超过英国,超过香港。上次我和做媒体的人还说,这个可能是代表着人们现在对信息了解的知晓权会越来越多。

英国作为发达社会存在着对戴安娜的报道,《艺术人生》始终代表着制作人的兴趣,可能我自己的兴趣不在那边,而且我的兴趣不是做狗仔队赚钱,我的兴趣在于能通过自己所服务的电视台,自己所做的电视栏目能表达自己最想表达的事情,也可能过两年就变了。但到现在为止还是有激情的,因为没有机会通过电影,没有机会通过文学,只能通过电视栏目。如



张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安全保卫教研室主任

在2003年1月18日晚上6点左右，沈阳市商业银行一个储蓄所发生一起爆炸抢劫案，造成3人死亡，5人重伤，197万元现金被抢。案件发生后，中央各级领导对此表示了高度重视，并做出了重要批示。公安部也派出专家组，指导此案侦破，并协调全国公安机关配合侦破此案。沈阳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了“1·18”案件专案指挥部，全力组织侦破。《新闻夜话》栏目记者在事件发生后也立即赶赴沈阳，采访了现场目击者和受伤的押款人员。对现场情况进行报道，同时在北京演播室采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安全保卫教研室主任张弘，银行安全保卫工作是他研究的重要课题。节目全面探讨了银行安全问题，播出节目后不久，这一爆炸案成功告破。

果将来观众觉得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我们可以不做了,看观众需要不需要,如果大家都觉得所有人不需要探讨人生,不需要探讨人生哲理就不用做。

网友:有没有打算请普通劳动者来书写《艺术人生》?

王峥:不太可能,艺术思想是通过一些专业人士来表达的,艺术家演艺明星来表达的,普通人没有这样的社会分工,没有必要。

网友:你想一辈子做这个栏目吗?

王峥:你现在只是服务电视台,你不能说你一辈子都做一个栏目。作为一个制片人来说,我有这样的自信,不管做什么节目都会让这个节目带有强烈的我自己的风格,都能努力通过这个节目来表达对人的关注。我们经常开玩笑,为什么现在连好情歌都没有了,连一首情歌都记不住,好的情歌特别少。连拍爱情都没有拍得动人心魄的,包括做电影的写小说的可能都一样,需要对人本身更关注一点。

我们因为做媒体,选择什么样的节目,制片人主要是选择嘉宾给观众来看,我在选择的时候努力做到对人更加关注。

欧阳国忠:现在改版问题讨论比较多,节目往往停留在看到一定的时候非得要改版,你怎么看待改版?是坚守还是怎么突破?

王峥:坚守内容,突破形式,这是肯定的。

欧阳国忠:将来的《艺术人生》大体走向有什么样的描绘?

王峥:请嘉宾将有更多的海外和两岸三地的明星,不只单纯谈婚恋,谈亲情。我们会更加要求所有的制作人,来谈人生中不同的处境,包括他的个人也包括他和周围人的关系,包括历史上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是大东西不是小东西,我自己对这个很感兴趣。做刘诗昆,因为他这么多年的发展,他就没谈爱情,但是一样很有意思。我个人非常喜欢《鲁豫有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五、收视率不是绝对的

网友:你是不是可以再尝试创办一个新的节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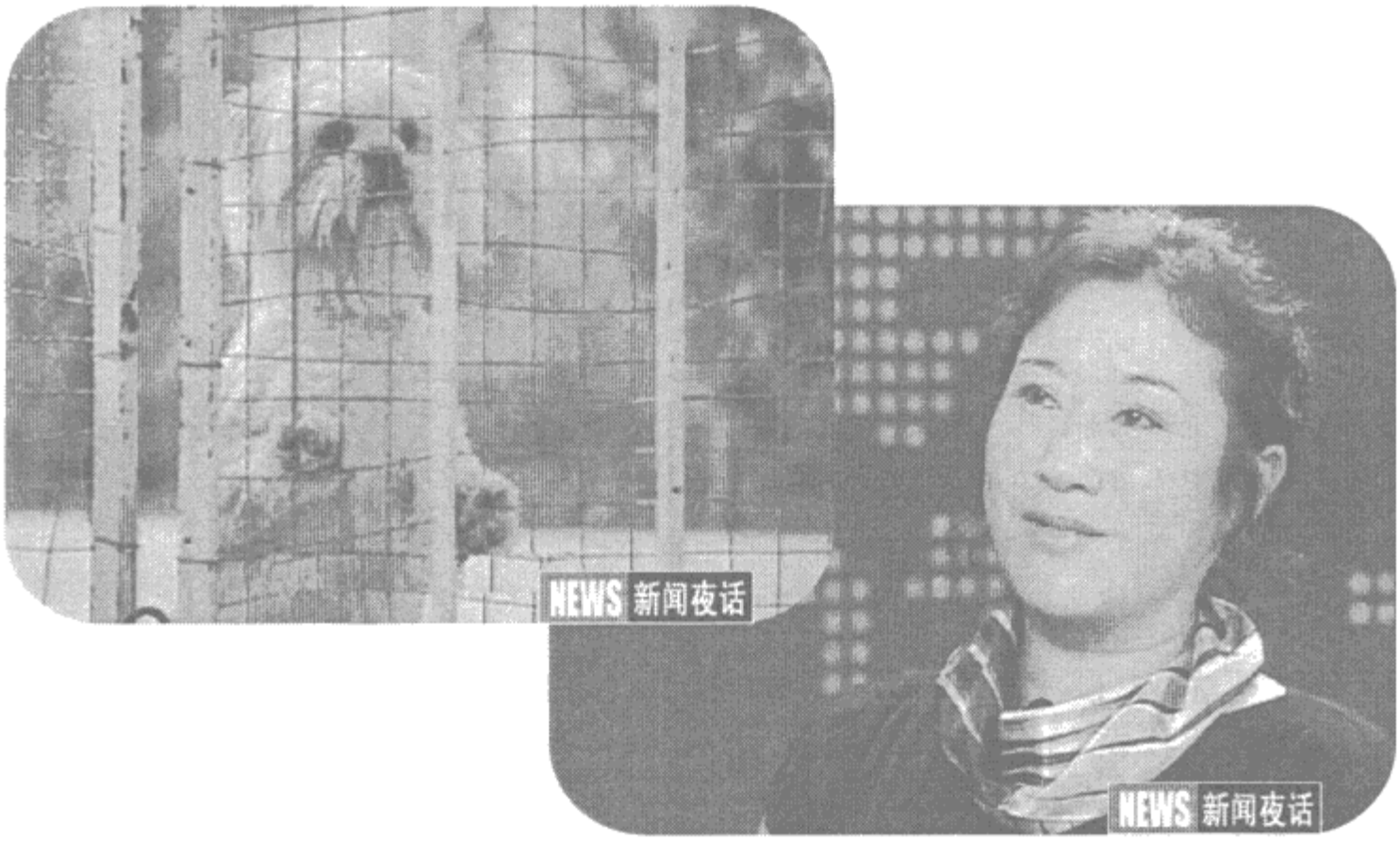
王峥:随缘,随心所欲,一个好节目的诞生可能就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样,需要一些能量的积累。现在我们还在继续发展,《艺术人生》也没到尽头,也没到我认为的巅峰时刻,水到渠成是最好的,做什么事情都要水到渠成,这个不急。

网友:《实话实说》、《东方时空》包括《正大综艺》收视率一直在下降吗?

欧阳国忠:我们把收视率看得非常重,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峥:收视率只是我们一个参考的标准,看你的节目放给谁来看?如果目标观众都来看的话,那么你的绝对数值很低那么无所谓。中央台里的纪录片《见证》,包括《人物》、《大家》,都是我喜欢的电视节目,但是给固定受众看的。国外也一样,会在收费电视里面做,我们电视还是卫星开路的节目,现在节目是给大众来看的。

我认为收视率不是绝对的,应该是你给你那部分观众是否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随着将来电视盈利模式的多样化,我觉得这个矛盾会克服的。现在中国还停留在卫星开路,收费电视没有进来,什么时候进来是很困难的一个问题。我们节目也提收视率,生存才能发展,不能



张吕萍　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负责人

有什么事情值得花十年的时间，每天20个小时以上坚持做下去，这期节目的嘉宾认为只有一件事情值得这么做，就是去照顾那些被遗弃的小动物。为了这件事情，她花光了做生意赚来的几百万资金；身患癌症但是坚持十年没有再踏进医院；她和亲人们住在同一座城市，但是连着7个春节没有回家过年，只因为她要和400多只猫和狗在一起。她叫张吕萍，她和她的动物们住在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这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家养动物收养救助基地，是由张吕萍个人筹建的。这个基地建成以后，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人们把张吕萍看成是爱心大使，北京市政府还授予她“三八红旗手”的称号。

到2004年张吕萍和她的基地已经走过了11个年头，但她却不止一次地奉劝朋友们别走这条路，而且公开表示，基地已经不再打算接收新的猫和狗了，为什么呢？

在本期节目中，张吕萍回顾了10年艰苦历程，第一次以亲历者身份分析这种公益救助组织良性运转的困难和障碍，呼吁更多人尊重动物们的权利。

生存的话如何发展？

广告商谈收视率，台里谈收视率，先把收视率维持住保证住，没有平台做，媒体就非常残酷，只有有平台才能做，没有平台的话一无所有，不像作家，不像别的艺术家。

网友：你怎么看待和你的节目类似的《超级访问》？

王峥：我和李静是很好的朋友，我很喜欢他们的节目，他们做的节目收视观众比较城市化，比较年轻。他们的模式是走市场，这是我个人很羡慕的一种模式，他们做节目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没有那么多复杂的需要兼顾的问题。

欧阳国忠：《艺术人生》不只在中央电视台播，别的卫星频道也看到过。

王峥：这是中国电视总公司给全国播放，有六个城市落地，包括电台节目都是他们来销售的。像《艺术人生》，我个人很骄傲，因为给台里面创收特别多，贡献很多。这两年领导特别支持，我觉得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不错。还是很自豪地在各地方播，这样使更多观众可以看到，可能会带来节目的收视率。做节目收视率不是目的，让别人看到你的节目，这是特别好的地方。

一支乐队能适合多少种口味，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现代的，民族的流行的，原生的电声的，再加上爵士、拉丁、摇滚还有交响乐，把这些都揉在一起然后用二胡、琵琶等等这些民族乐器演奏出来，还能够听吗？听过女子十二乐坊的音乐可能就会找到答案，我们在节目中首先采访了国内著名的乐评人《人民音乐》编辑部主任金兆钧，他这样评价这支乐队："这类音乐，中国只有他们一个，你也很难说出现一个这样的形式就能在音乐里划出一派来。但是十二乐坊无论在音乐上的这些做法，还是通过商业的推广和运作很快地能够在日本取得极为巨大的成功，在这个意义上她们引起广泛的注意和研究，可以说是一种现象，那么她们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乐队，十二乐坊有十三位乐手，接受我们采访的是二胡手蒋瑾、孙婷、殷焱，管乐手孙媛，以及十二乐坊的制作人王晓京，没有他，这支乐队就不会诞生，也不可能生存下去，他是发起者、组织者、是这支乐队的灵魂。



女子十二乐坊制作人王晓京(中)与乐手们



女子十二乐坊演出资料

《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访谈

一、做电视投入和产出是成正比的

欧阳国忠：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说过一句话，最崇高的职业是记者，最优秀的记者是调查记者，最出色的调查记者是让害人者难受的记者。《新闻调查》现在播出了几年？

张洁：1996 年 5 月 16 日开播，八年了。

欧阳国忠：在中国一个栏目播出八年很不容易。

张洁：我们现在还是在成长期，没有达到最理想的境界。

欧阳国忠：有一些人士说，国内节目三年就有困惑，就撑不住了。但是《新闻调查》走过八年，还是上升的感觉，这个缘由是什么？

张洁：最主要是我们对这个栏目有自己的一套理想标准，用这套标准衡量我们自己还有差距。作为这个栏目的特色要求，它是 45 分钟的深度报道节目，在这么大的节目里面无论从市场内涵到表现技巧，都要达到一种非常高的指标，努力的过程会非常长，我们才做了八年。我们把我们的节目要和国外一些同类优秀节目相比较，我们的差距还比较大，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现在还在成长期。

欧阳国忠：有人说《新闻调查》是新闻电视节目当中的航空母舰。它的画面、音效很过瘾，可以反映出来我们国内新闻制作的理念和职业化的水平，你们对这方面有什么要求？

张洁：《新闻调查》当初创立的时候，从技术硬件上到人才配备上，都是按照一流标准来做的。我们是最早设置双机拍摄和专业录音的电视新闻栏目，而且我们一个栏目的设置是两个摄像，有主摄像有副摄像，有录音师，有编导，有编导助理，正宗配备五六个人。最早加入《新闻调查》的编导也好，录音师也好，在电视专业方面有着相当的经验和积累，由一些纪录片的高手做这些节目，这样我们的节目有比较高的起点。专业上把画面拍摄、声音质量保证作为非常重要的要素来运作。同时我们参照一些同类栏目，比如我们看美国的《60 分钟》，以它的技术质量标准，画面标准、声音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认为我们做的还是有差距。观摩国内节目，甚至国内优秀的深度节目，在专业品质上，我们还不一定是最高的。比如十套纪录片的一些纪录片栏目，还有一些人物栏目，他们在画面上做得也很精致，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只是在新闻节目里面，我们的采访在拍摄上比较专业，但是和国外同类栏目相比，我们还是有差距，我们在努力把它做到最好。

欧阳国忠：这个节目有专门的录音师。

张洁：栏目的三个录音师都是电影学院录音专业毕业。

欧阳国忠：你们每次出去采访一般多少



夏叶子 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

艺术品的价格常常令人惊叹，在拍卖场上，一张字画，一件古玩的价格动不动就可以卖到成百万、上千万，而这样的买卖行为如果有人背后操纵从中牟利的话，后果将是可怕的。2003年底，有人公开指出，在国内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存在着大量违规操作的行为，遭受损失的不仅仅是个人资金，还可能是国有资产。关于拍卖市场是否存在操作黑幕，曾经有过几次大的争论，也发生过几起拍卖公司征讨名誉权的诉讼官司，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面对公众说出他们所了解的具体情况。这一次有人站出来说明情况，就是完全公开的。这些情况是记录在一本书里的，就是《艺术品投资》，作者是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夏叶子，这本书由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史树青先生题写书名，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采访中，夏叶子详尽讲述了他了解到的情况并分析了这些黑幕的操作规律，同时也对人们的质疑作出解释。最后，嘉宾提出了他个人思考得到的解决办法——推动了法律的出台。这是第一次有人在媒体公开透露这一行业的黑幕，第一次检讨这一行业的弊病，我们的舆论监督再次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节目播出后不久，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第一部行业自律条例开始实施。

人?

张洁:五到六个。一个采访记者,一个编导,两个摄像,一个负责拍摄主持人,一个负责拍摄嘉宾,另外还有一个录音师,有时候带一个编导助理或者一个策划出去。

欧阳国忠:你们出去是超豪华型的阵容,凤凰卫视没有这样的阵容,中央电视台对这方面是不是特别重视?

张洁:《新闻调查》栏目的诞生,作为央视新闻改革的第三步,深度报道栏目对于大的电视访谈,无论思想内涵还是专业品质,都是比较高的标准。当时台领导之所以花那么大的代价设置这样的栏目,首先肯定是参照国内同类栏目,另外期望我们这个栏目在思想内涵上和专业品质上做到国内最好。做电视、做电影大投入和最后出来的产品是成正比的。

二、好的电视节目首先必须有一个好的故事

欧阳国忠:刚才说到,你们的节目有45分钟,你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把观众吸引住?

张洁:一个好的电视节目,首先最主要必须有一个好的故事。从选题方面来说,调查选题的时候,新闻性、故事性是很重要的元素。有了故事不一定能成为好节目的标准,故事能够反映时代的特征,能够承载一些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能够对我们的体制有哪些启示,这都有一些标准。我们运作节目的时候,有好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必须是有意义的,另外作为电视技巧来说,悬念的设置、采访的到位、编辑节奏的整体把握、悬念的层层递进,也有好多标准。可以说一个好节目选题上要求有好的故事,采访上希望步步紧逼,到位,有调查感。从节目整体情节上一层一层像剥笋一样往里走,这些是构成节目好看的要素。

欧阳国忠:《新闻调查》选题标准要求是什么?

张洁:我们对选题的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难,因为一个新闻事件太简单了不行,有的新闻事件有意义也有一定的故事,但是故事太简单了也不行。我们一般说好的《新闻调查》的选题起码有三个回合,一期节目10分钟或者15分钟一个高潮,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三、四个回合,要有这个情节线,这样才能吸引观众来看。有的故事有一个回合或者两个回合就完了,这样的片子更适合《焦点访谈》去做,我们要求故事有曲折性。

欧阳国忠:符合你这样要求的选题多吗?

张洁:不多。

三、真实调查是《新闻调查》的核心竞争力

欧阳国忠:美国的《60分钟》有一个报道,为了揭穿一个保险公司内部的欺诈行为,记者在保险公司卧底三年,最后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作为《新闻调查》有过卧底的经历吗?

张洁:我们做过一个传销的节目,记者曾经卧底到一个传销组织内部,过程比较短,也就一个星期。投入三年时间做一个深度报道,主要还是跟成本有关,我们试图做这样的节目,投入大量的时间来获取一些最有利的证据,但是因为涉及到成本问题,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步。另外我们也是日常经营的栏目,播出是第一位的,每周得有一个节目来播出。我们有所考虑,但是时间一年两年三年还不一定。



沈景炎 建设部地铁与轻轨研究中心总工程师

2003年2月，韩国大邱市发生了严重的地铁纵火案，造成126人死亡，300多人失踪。地铁安全问题突显出来。中国拥有地铁的四个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的相关负责人都出来表态，我国不会发生这样的灾难，但是同时也有专家认为单纯从地铁的设备上来看，各个国家的情况都差不多，所以都会面临同样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应付突发的灾难性事故。本期节目电话连线到韩国，还有北京、上海、广州的地铁专家，谈了各自城市的地铁安全情况，同时请来地铁与轻轨研究中心总工程师沈景炎到演播室接受采访。

沈景炎负责了全国主要城市的地铁设计，他在节目中详细介绍了地铁的各种安全措施，比如地铁中的座椅等材料是阻燃的、发生紧急情况时工作人员会采取的措施、乘客可以走的逃生通道等，有很强的时效性和服务性。节目播出后受到了广电总局“收听收看”专家组的表扬。

欧阳国忠:《新闻调查》的记者肯定也在采访当中经历风险,有过这样的经历,能给我们说说吗?

张洁:我们摄制组出去一般都是五个人,所谓的兵强马壮,要说风险方面,我们跟兄弟老大哥《焦点访谈》的记者比,他们的风险更大。他们出去就是一个编导一个摄像,而且经常是孤军深入,加上暗访的形式。而我们的阵容比较大,仅仅靠隐性采访也成就不了一期节目,舆论监督必须跟他们正面交锋,这是我们栏目的特色。这种面对面的接触使我们的行为不像他们有那么大的风险性,但是被威胁甚至被利诱或者被跟踪等,这些都是家常便饭。

欧阳国忠:你曾经经历过这些被威胁的事件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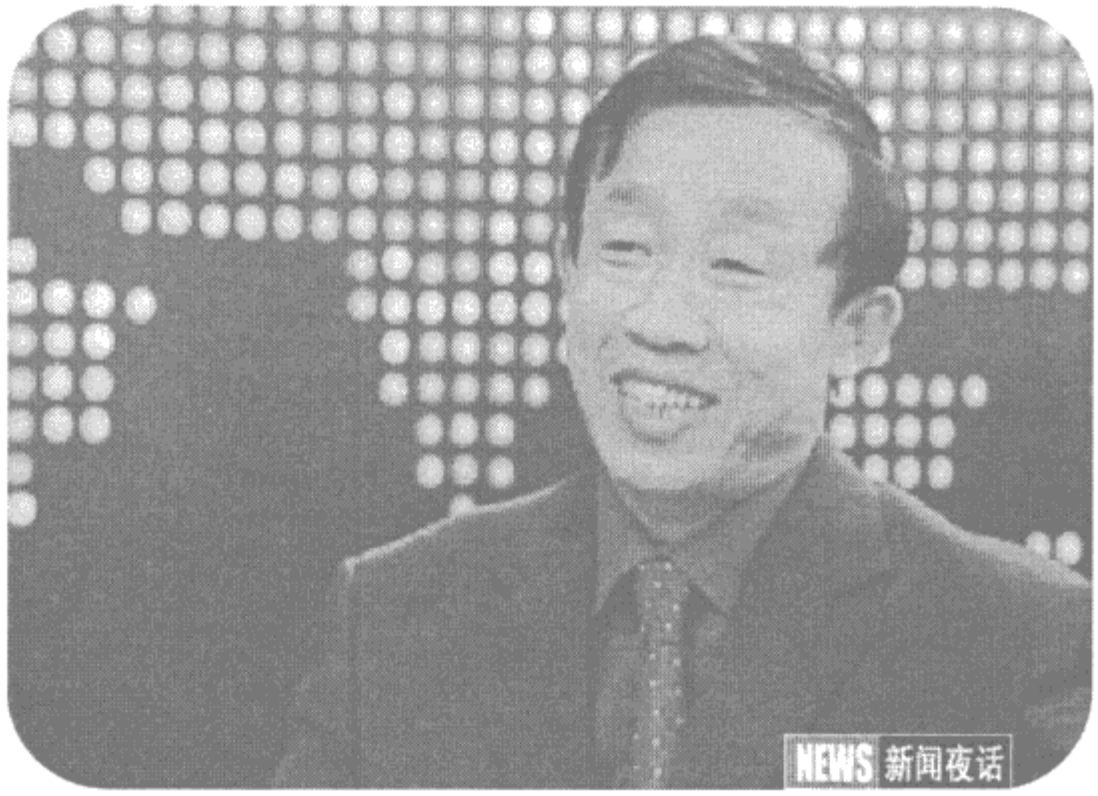
张洁:早年做节目的时候有过,但是由于那时候做舆论监督的力度没有现在大,遇到的风险比现在要小得多。1996 年做农村村干部贪污粮食的一个案子,涉及到县乡一些黑幕,在拍摄期间经常受到阻挠跟踪。

欧阳国忠:《新闻调查》有点像侦探,揭露真相和掩盖真相实际上是一种较量,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对方想掩盖的真相揭露出来?《新闻调查》这些年来积累了哪些技巧?

张洁:做舆论监督肯定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去纠正、监督一些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违反公共利益的现象。我们以前说过一句话,如果把我们当成一个深度节目的话,深度意味着现场的抵达,深度意味着记者的追问,深度意味着证据的确立。这种证据的确立对调查性报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素。你能不能通过记者的调查,通过你的取证,这个取证可能包括语言上的证据和实物上的证据,拿来证明他的确是在侵犯公众利益,干些违反法律和法规的事情。

欧阳国忠:你们是最早引入新闻策划这个职位的栏目,策划在《新闻调查》当中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张洁:《新闻调查》在借鉴思想、成就节目这方面,我们在央视做得比较靠前,借助一些媒介和思想界的精英参与节目的策划。策划在《新闻调查》生产力当中起到三个层次的功能:第一个是选题策划,我们根据某个信息,这个信息也许凭着媒体,也许凭着网络,也许是观众来信来电,我们了解相关背景,根据这个信息看看可以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升华,把选题的意义以及它的大概脉络做一个梳理,成为一个选题,这是选题策划。选题策划报给台领导批准之后进行运作。第二是节目策划,刘春以前是我们节目的策划,我们曾经搞过策划负责制,比如赛纳,比如刘春,他们根据选题带着编导到现场对选题进行初步论证,看看从制作上怎么设置结构,从采访上怎么定位一些问题,调查点、切入点,最后节目的出口是什么。整个策划拿出一个方案提供给编导,编导按照这个方案把节目的精髓反映出来。这样的策划不仅需要你有思想,同时还要求你有较高的电视业务水平,能够把握电视摄录画面,包括采访方面整体的构架功能,这样的策划我们称之为节目策划。第三层策划是栏目策划,比如我的工作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栏目策划,栏目的总体发展在运作上有哪些考虑,比如栏目的选题,栏目的发展方向,包括我们一些重大的项目立项,包括对整个栏目以后的编导也好,摄像也好,主持人也好,他们业务上的一些提高,包括培训包装等等这方面,这是栏目策划应该起到的功能。2003 年对《新闻调查》进行比较大的



常德明　平遥县常务副县长

2002年，中国第一次为了保护文物，开始大规模地搬迁城镇居民，这个地方就是山西的平遥。为了保护平遥古城，当地准备在四年之内，搬出一半以上的人口，达两万多人。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会太原市以南九十公里。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时评定委员会认为，平遥古城能够充分地展现明清时期汉民族城市全貌，保存了当时的所有特征，是世界建筑中独一无二的珍宝。但是专家同时指出，影响古城保护的症结就是人太多了，这也是这次大规模搬迁的原因。居民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污水，甚至对建筑的磨损，都会破坏古城的整体风貌。但是搬走的人数是有限的，一个地方一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它所吸引的游客量会成十倍百倍地上升，大量的游客会不会对古城造成更大的破坏？到时候古城怎么实现保护的目的？针对这些问题，《新闻夜话》专访了平遥县常务副县长常德明。常县长表示，到2005年平遥古城将成为一个集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票号文化为一体的明清小社会。

改革，我们的媒介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深刻变化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媒介的市场化，导致了现在在央视提出收视率，提出末位淘汰，整个栏目的生存，要求你对收视率的关注，和以前的重视程度不一样。另外，最近几年媒介发展非常快，像新闻频道的出现，相关的深度栏目就特别多。我们以前做过主题性调查、记录性调查、历史揭秘调查、一对一的专访调查等等，到了今天你回过头再看，很多当初是你的特色和要件，相关的栏目都有了。我们可能会为一个观点性的事件做一期节目，现在观点性的栏目有《央视论坛》，而且又是一个日播节目。在已经变化的新闻资源面前，哪些节目是我们《新闻调查》最擅长不能被取代，我们称之为核心竞争力，我们通过七年多的梳理，认为真正调查性的报道，是应该由记者到现场通过自己的调查去印证事件的真实，这种调查是《新闻调查》的核心竞争力，这是其他节目无法替代的。

《新闻调查》的提问在新闻节目当中是最好的。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把这些优势发挥到极致，在调查节目里面，我们这个优势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从2003年开始我们提出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根据中央的要求、台里的要求和中心部的要求，舆论监督最符合做调查性报道，我们进行了选题的大调整。以前我们做宏观政策分析，现在这些题目基本很少做了，我们做的大量来自现场的一线内部调查，侵害公共利益行为的调查。从民众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维护他们的权利，把他们所遭受到的不公正，通过调查把事实挖掘出来，应该说这种选题的调整，既符合栏目的品质，也符合我们对调查记者的要求，凸现新闻的正义和良知。这种节目也应该是好的收视率。这块选题，占我们选题的量比较大。另外我们去年把人力资源管理引进到栏目当中来，我们搞了一个绩效评估体系，质量高的报道、揭黑的报道我们给他的分值高，记者做挑战性越大的节目，只要做成了以后，他的报酬远远超过以前的报酬，从机制上保证舆论监督性节目的生产运作。另外我们还搞了主持人中心制，以前是编导负责制，在电视节目操作上，西方国家比我们早走了很多年，他们的主持人中心制在节目里面有很好的经验，我想我们应该借鉴过来。一个记者只要发挥得好，那么这期节目就好，保证记者的主导作用，在节目当中能够发挥得更彻底。这样的话这个节目出来以后才会带来魅力。

网友：最近一期关于法院院长案子的节目让人气愤难平。

张洁：这期节目是星期一晚上播出的，发生在云南地区，一个法院的副院长对一个幼女实施了侵害，逍遥法外将近50天，最近才被拘留，证据确凿，而且公安取证基本明确，抓的当天晚上就被放了，因为他的背景。我们节目调查的就是在这么一个证据非常确凿的事实面前，法院的副院长为什么没有得到处理。

欧阳国忠：当时接受新闻线索的时候有过疑虑吗？阻力会大吗？

张洁：有过，凡是类似的报道都有一些阻力。但是我想我们采访曝光一个事件，首先我们不是为了炒作一个新闻，我们在做舆论监督，这也是《新闻调查》和其他节目有所不同的地方，我们在进行某一项监督或者揭露某个问题的时候，更多是从建设性的角度考虑，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的记者到了现场以后，在取证的时候过程非常严谨，非常细致，做得非常到位。我们做过一个天灾人祸

吆喝，说穿了就是大声叫卖，是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市井文化。据说，老北京的吆喝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不过，现在北京城里会吆喝的人已经不多了，臧鸿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吆喝大王”。数百年的吆喝，到了臧鸿的嘴里就变成了炉火纯青的艺术。他的绝技是一口气能喊出170种老北京的叫卖声。一大批反映老北京生活的电影、电视剧中，高低错落、京味十足的叫卖声大多数出自他之口。在人们的婚丧嫁娶仪式上，往往是他的一嗓子，就把人们飘飘悠悠地带回到了老北京的往日岁月。本期节目采访了72岁的“京城吆喝大王”臧鸿老人。据说他的“京城吆喝大王”的称号，就是老舍夫人胡絜清先生听了他的吆喝后题的。欣赏完臧鸿老人的精彩吆喝之后，我们也为今天这种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感到忧虑和惋惜。



臧鸿 “吆喝大王”

的节目，讲的是当地一个镇在洪灾到来之前有行政过失，预警方面做得不到位，但是这被遮掩了。记者到当地还原当时的情况，他们来到特别偏远的镇里面，搭了帐篷自己做饭，拒绝了当地政府的接待，也不去打扰老百姓，在村里面住了八天八夜，就是为了把当初的情况一点一点还原。我们做舆论监督的时候，凡是能够看得懂这个栏目的人或者单位，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最基础的认识，他知道我们不会去歪曲或者放大，一说到炒作这个词，公众非常反感。这样在采访有一定难度的时候，使对方容易接受我们的采访。

欧阳国忠：你们采访的时候客观冷静，保证了节目播出的时候是公正的，采访对象和被采访对象不会认为你们把这个事情歪曲，有品质的保证。

网友：你们栏目进行一些改革，记者的报酬跟报道的难度有关。一般一个节目成本是多少？记者平均能拿多少钱？

张洁：节目成本不一样，我在北京做一个节目成本非常低，有的节目要跨好几个省操作，这个成本就非常大。一般操作节目的成本在 10 万以内。

欧阳国忠：有人说你们的节目策划一个月，拍摄一个月，制作一个月。

张洁：我们一般是两个月做一个节目。做一个节目要求前期的论证工作相当深入，包括对选题的分析、判断、印证到开机拍摄到后期制作。后期一般是半个月，这样能保证品质。对于突发性的事件，我们有另外一套机制，能够在十天或者一个星期做出来，特殊情况下我们也有快速的机制。

网友：没有一个新闻制度保障，记者很难有所作为，你们怎么做的？

张洁：在新闻法没有出来之前，我们还是有很多保障的。比如说我们出去做隐性报道，从舆论监督来说，中央高度重视，特别现在对舆论监督的要求进一步强化，从《焦点访谈》到我们栏目，包括到新闻中心的其他栏目。舆论监督也是净化社会环境。为改革发展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法制环境的重要内容，中央这种要求就是我们的一个保障。在进行这方面制作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有自身的一些职业约束。比如说现在听说有一些媒体记者利用监督的名义进行敲诈勒索或者有偿新闻，这样的话，使舆论监督变成不受监督的舆论。繁峙矿难，由于我们节目的播出，引发了记者受贿的事实，这样一种自律对我们做舆论监督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另外一个标准是客观、公正、理智、平衡。我们对待一个事件是比较严肃的态度，而不是炒作的态度。这都是我们做舆论监督的保障。

欧阳国忠：你们是怎么自律的？有什么规定吗？

张洁：有。在《新闻调查》员工手册里面，我们对各个工种有很多要求，杜绝有偿新闻，不能以权谋私，这些都不用说了，而且中央电视台也公布了对有偿新闻举报的规则。现在大家知道做监督越来越难，对方越来越会保护自己，比如我们的兄弟栏目《焦点访谈》，现在如果不用隐形采访几乎很难成就一期节目。对于这样的偷拍《新闻调查》做不做？为什么节目里面不太多？我们对偷拍的态度是可用，但是必须慎重。因为偷拍毕竟是隐秘性的行为，我们必须有几个前提，比如说偷拍的主体是正在实施侵害公众利益，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另外，



欧阳自远　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3年8月份，适逢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飞船完成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处子秀，航天、探月成为全国关注的最“烫”的话题。此前不久，中国的探月计划也已经正式启动，为此《新闻夜话》特别专访了中国的探月工程计划的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欧阳自远先生，他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勤于做科普工作的科学家，善于把高深的问题讲的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欧阳自远院士在采访中介绍了中国整个探月工程计划的三个目标。另外，欧阳先生还提到了中国人登陆月球的梦想：“我们大约要花十几年的时间，实现三次月球的探测，这都是非常跨越式的发展，第一步，我们派环月的卫星探测，第二步要进行软着落和月球车的巡视探测，第三步，我们也要软着落，派机器人探测月球，还要取回样品，返回地球，这是一个更为艰难的工作，在实现了这些目标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进行载人的登月。”

这个行为必须经过我们一级领导的认可，我们的记者如果用偷拍的手法必须经过他的制片人同意，这种东西要慎用，但坚决杜绝也不合实际，揭露事实拿到证据只有在隐藏的状态下才能做到。传销这期节目我们就有很多偷拍的画面。

四、《新闻调查》栏目的人格化

欧阳国忠：美国三大电视网竞争主要是新闻竞争，树立一个王牌新闻栏目，对于频道对于台的形象提升有很大的作用，作为国际大台是不是要做到这么一个位置，一定要做出最好的新闻栏目？

张洁：对。而且像一个小时左右的深度报道栏目，据我们所了解，国外大的媒体包括在美国的三大广播公司，都有自己的深度报道节目，这种节目最重要的是把握思想的深刻性，这个媒体这批传媒人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你们对整个世界的宏观把握，从这个节目里面都能够看得出来。他们的思想载体就应该是这个栏目，这就意味着对电视从业者的要求非常高，这个栏目如果做到理想当中的境界，必须要求非常专业的电视工作者。

网友：记者最大的特征应该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没有做过舆论报道的记者不能称其为完整的报道记者。

张洁：舆论监督报道。作为一个媒体，作为一种社会良知的体现者，应该遏恶扬善，对真善美的维护和赞扬，对假恶丑的鞭挞。我们做的有舆论监督报道，也有符合我们价值理论标准的一些好的事情的报道。根据最近选题调整方向，我们加大了舆论监督这方面的力度，与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进步相关。

欧阳国忠：舆论监督的比例占多少？

张洁：我们现在没有明确播出的节目要达到多少，2003 年的统计结果显示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有影响的舆论监督报道达到十多期，超过五分之一。

欧阳国忠：怎么样成为一位优秀的调查记者？

张洁：我们对调查的八年有一个梳理，题目是“从调查节目到调查性报道”。栏目叫《新闻调查》，并不意味着我们做的节目都是调查性报道，调查性报道从传统新闻学定义来说有两个本质的涵义，我们认为是必须坚守的。第一，内容是侵犯公众的利益，有的集团或者个人，这种行为被掩盖；第二，记者揭穿这种行为的过程是记者独立的调查。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要素。我们所说的调查节目很有可能用调查的手法来做各种选题，包括正面选题、中性选题、负面选题，我们称为调查性报道，这两个要素必须确立。我们和司法部门合作制作被司法部门定了案或者已经处理的案件，我们在他们的配合下做节目，这应该不算是调查性报道，你依靠的是行政力量或者是司法力量，调查性报道是调查节目当中的极品。打一个活老虎通过自己的努力，揭露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这个过程是要冒很大的风险，这样的话，记者的行为、记者的素质是要有很高层次的。我们通过对节目的梳理，努力多做一些我们认为的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但是同时也要把其他的调查节目在经营指标上达到很好的标准。经过梳理就非常清醒，什么样的节目按照调查节目的要件处理，什么节目按照调查性报道的要件处理。国内对调查性报道和调查节目经常混为一谈。

怎么样才能做一个调查记者？素质要求非



吴祖光与夫人新凤霞



丁聪　著名漫画家

吴祖光是著名学者、艺术家,被称为20世纪中国在国际上影响最大、最著名、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人之一。主要代表作有《风雪夜归人》、《闯江湖》、《花为媒》、《吴祖光选集》(六卷本)等。但更让人崇敬的是他和妻子新凤霞多年来相濡以沫的感情。从1998年4月他妻子新凤霞去世后,吴祖光的身体就一直不太好,曾两次中风、失语,最终因心脏衰竭而死,享年86岁。

本期节目分为上下两集,上集我们专访了吴祖光与新凤霞之子——吴欢,他追忆了父母的爱情与各自成就及子女们的思念之情。下集我们专访了吴祖光与新凤霞的多年好友——著名漫画家丁聪,从朋友角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真性情的大才子形象。



吴欢　吴祖光之子

常多,最基本的,必须有责任感,必须有一种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精神,勇敢、坚定、执着、有韧性,这些都是基本的素质。另外还必须具备比较成熟的政治经验,比如在现有的环境里面怎么样操作这个题材,按照你的预设能够把这个节目采制成功,前期的拍摄、后期的把握要求比较高。另外做调查性报道必须有很多的专业技巧,包括你的拍摄上,你的采访上,怎么样能够拿到你想要的东西。我们认为要做一个好的调查记者,大的理念思想素质方面,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优秀的调查记者应该是几种要素的集合体。

欧阳国忠:做一期节目的周期大概是两个月,但是《新闻调查》是三个出镜记者,怎么能够周转过来?

张洁:按说我们应该有四到五组记者才符合良性运转的条件,但现在由于对出镜记者要求比较高,三个人基本是他跟这个编导回来又跟另外一个编导出去,我们节目后期制作比较长。三个出镜记者疲于奔命,甚至从这个节目点做完马上飞到另外一个节目点,高速运转,主持人长江做云南法院这个案件拍回来之后病倒了,在医院就诊好几天。

欧阳国忠:《新闻调查》最开始的时候是编导负责制还是策划负责制?

张洁:编导负责制,搞过一个阶段的策划负责制。

欧阳国忠:现在是主持人负责制,把主持人包装成一个节目的品牌,这是国际同类节目的模式,还有收视率的压力。《新闻调查》对主持人要求非常高,同时也培养了不少的人,王志、董倩以前都是《新闻调查》的主持人,现在在做《面对面》和《央视论坛》。《新闻调查》一方面对出镜主持人要求很高,出镜率高了之后可能又有条件单立门户做新的栏目,这种矛盾怎么克服?

张洁:这个没有办法,当有一个更好的平台出现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成全大家。因为每个人对他自己的发展期许有更高的平台,这也是《新闻调查》的用人观点,我创造一个平台提供给你,如果你有更好的平台,那个时候我也会放你出去。不能说你走了我的节目受损失,我不让你走,这也不符合市场人才的配置。王志到《面对面》,这种栏目填补了中央台的空白,但这种事情不会经常有。相对来说《新闻调查》还是比较好的平台,因为据我们所知,在美国新闻记者新闻主持人里面,华莱士的地位非常高,华莱士在《60 分钟》做了 30 多年。我们认为一个记者在《新闻调查》这个平台里面,一年要做十多期深度报道节目,每期节目里面深度采访的人数将近 20 个,这样一种积累对记者来说是一种相当大的财富/对一个事件的深度认知,对事件当事人的深度认知,几年下来,我觉得对他们的专业技巧,对他们的经历、思想各方面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这样一种机遇、机会是不多得的,我觉得对于一个有心做真正的记者的电视人来说,这个平台是非常好的。在一个急功近利的媒介环境当中,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新闻,我想在观众当中的公信力是不可预料的。大家对《新闻调查》这个栏目还有一些好的口碑,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希望做让公众信赖的新闻,希望我们记者的新闻也是让公众信赖的新闻。从行为上到节目上,我们都希望具有公信力。目前信息报道当中有很多新闻可能是不严肃的,不客观的,《新闻调查》作为央视的重头深度报道栏目,让新闻变得有力量,变得有尊严。在我们的栏目团队核心理





2002 年是驼峰航线开辟 60 周年。10 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赴美国举办题为“历史的记忆”的展览，纪念驼峰航线、飞虎队以及中国军民营救杜利特尔轰炸机队飞行人员的行动。当时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还专门为一位在驼峰航线执行任务时献身的美国飞行员铜像题了词。

曾营救过美国飞行员的罗光甫老人

为了配合这次纪念活动，《新闻夜话》采访了当年曾经在日本侵略军重重包围之下营救过美国飞行员的中国英雄——云南大理 73 岁的罗光甫老人。在将近 60 年前，他曾经亲自营救过 3 名美军飞行员并照顾了他们几天几夜，直到他们康复离开。

罗光甫老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过深山，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英雄。他只是觉得美国人帮助咱打日本鬼子，咱就应该帮助美国人。虽然美军飞行员疗伤的住所距离他的家只有两分钟的路程，但是为了照顾好伤员，他却几天几夜没有回家。救这几个美国飞行员的事情，过去之后他也就忘了，从来没有和别人提及，当时他只是希望这些美国飞行员能够早日平安回国，能够生活安宁，能够“多子多福”，因为这是“一颗普通的中国农民的心，我对得住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

在 2002 年中美华盛顿“历史的记忆”展览酒会上，罗光甫老人幸运地见到了一个当年曾被他营救过的已经 84 岁高龄的美国退役飞行员，两位老人在时隔 60 年后拥抱在一起，老泪纵横，久久无言。这一段感人至深的录像在我们的节目中重复播放了许多次。

念上，我们提出一个观点叫做栏目人格化，人格化是什么东西？今天是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很多东西被颠覆，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以及什么样的行为是能够让你信赖的，让你去热爱的，我们就把它变成我们记者的行为。一个勇敢的人，一个疾恶如仇的人，一个公正的人，一个有着博大同情心的人，这种人绝对受到社会甚至受到群体尊重，比如你是这样一个人，你周围的同事肯定对你是尊重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员工对人是善意的，对周围的环境是善意的，另外一个方面你疾恶如仇，你有良知，这也是我们所强化的。如果我们做人是这样一套标准，在节目当中你做一个记者才会受到社会的信赖。这种记者，尊崇客观真实的理念，用平衡的手法，又冒着一定的风险，这些行为在今天的媒介环境当中是比较高贵的记者行为。《新闻调查》力争做这种记者，我们做出的新闻力争承载这种精神，这样把我们营造成在中国深度报道当中一个有影响力的栏目。影响力的前提首先是公信力，如果你的新闻让人信赖，曾经被批评过的对方对你的新闻事实，对你摄制组整个的精神面貌、工作作风都有一种认可或者评价的话，那么我认为你做新闻就做到一种极致。我们在村里住了八天八夜的记者，当地政府对他们好评如潮。现在是炒作的时代，眼球的时代，好多东西丧失了，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团队的努力来恪守捍卫这些精神。

网友：《新闻调查》记者平均年龄多大？

张洁：30 多岁。但是随着电视的发展，我们做了七八年，老同志比较多，最近一两年吸收了一些年轻人当中的佼佼者，充实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我们现在有 20 多岁的编导，尽管他们可能是 70 年代、80 年代出生的，都是属于新新人类，但他们非常热爱新闻，认可我们的价值理念和这套专业方式。而且他们的外语特别好，网络资讯掌握特别快，在我们的队伍里面一两年就可以独立做节目，这是我们队伍当中的新鲜血液，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网友：策划负责制为什么不继续了？

张洁：当初策划负责制是由最优秀的几个老编导做策划，以前做助编或者刚进来的，让他们挑大梁作记者，我们想用策划带编导。节目的整体水准起来了，不会特别高或者特别低。《调查节目》是获国际大奖最多的节目，台领导要求我们每隔一两年就要有优秀的节目出来。骨干编导还是要做节目，带新编导半年左右，素质提高了以后，他们还是去做节目，基于这样的考虑。

我们用舆论监督的概念也好，用调查性报道的概念也好，这只能成为栏目的主导追求，但是不可能说每期节目都是舆论监督，那是不现实的。电视毕竟还是一个产品，节目从选题到播出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我们必须保证每周都有一期节目安全播出，跟公司的经理一样，必须有产品卖出去，然后在产品当中实现我们的含量。我们把这个作为主导追求，其他还有别的一些节目也要做，比如远华大案，贪官成克杰都可以做。这样的节目我们不仅可以做，也是我们要强调做的。另外我们做的《与神话较量的人》，这种行为也是我们栏目应该做的。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冒着风险和损害公众利益的金融集团作斗争，这种节目的影响力度远不是一些揭黑节目能够做到的。刘姝葳带来两个月收视率的持续走高，这期节目到现在还是有社会影响力的。这期节目制作非常简单，找了一个环境，采访，然后到她家拍东西，成本非常低，但是它的影响特别特别大。而远华大



吴际　饭店总经理



这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新闻事件：在2002年1月6日，陕西省西安市有十二个人一顿饭吃掉了三十六万六千块钱，如果粗略地计算，一顿饭花三十六块钱的话，那么这桌子饭菜等于吃掉了一个普通人二十年的饭钱。在春节临近之时，这种奢侈浪费之风不仅引起街谈巷议，而且受到媒体的大肆批评，很多人说：就是吃金子也吃不了那么多钱。连西安市委书记、市长也被惊动，指示有关部门对用餐的情况进行调查。

《新闻夜话》栏目在电视媒体中独家采访到了新闻当事人：饭店的总经理吴际。在访谈中吴际透露吃饭的全部都是港商外商，并无政府官员；客人选择36.6万这个数字纯粹是图吉利。他所谓的满汉全席吃不到任何山珍海味，而是拿豆腐等普通食品替代。在主持人的追问下，还暴露出这家饭店卖的天价酒竟然是三无产品，而这家西安分店的饭价，居然比北京的正宗满汉全席还要贵。当主持人质问饭店的总经理吴际，问他是否“为浪费和穷奢极欲提供了舞台和道具”的时候，吴际则回答：指责他的人“思想还是停留在五六十年代，没跟上形势。”

在节目播出后，这个新闻事件的结局是：西安这家饭店的日营业额几乎等于零，几个月后，它终于关门大吉。

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但是它的影响力和这个节目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后来我们发现如果仅仅一个栏目或者一个媒体曝光、揭露，那么也许它会让人愤怒震撼，这是它好的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一个事情只曝光却没有得到解决，没有得到处理，相对来说给公众带来的反而是一种压抑一种痛苦。我们在做这类节目的时候还有一个追求，就是去表现那些在为了捍卫公众利益在和这些侵害公众利益作斗争的勇士，像刘姝葳，它的发扬光大对社会非常有益。不仅看到黑幕，而且看到一个真正的人怎么样，刘姝葳树立了社会合格的公民的形象，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两手我们都会抓。

网友：你上次说过强调记者的主体意识，是否意味着记者有决定权，跟西方很像。

张洁：我们现在记者中心制或者叫主持人中心制，指的是主持人包装，可能哪类选题适合他，就让他多做这类，他穿什么样的衣服，从外在形体应该有一种包装的手法。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深度新闻报道记者而言，要对记者中心制的核心要件，提出更高的要求，他必须对新闻要敏感有热情有冲动。以前我们强调编导中心制，记者的主动性会被抑制，编导找题，记者到时候采访就行了。现在经过我同意报批台里，编导做这个题必须经过记者。以前我们每个编导可以轮换使用这些记者，现在每个记者手下固定三、五个编导为记者服务，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核心团队。编导找选题的时候，考虑柴静可能比较适合这类选题，可能帮助她找这方面的选题，摄像录音也固定这几个人。2003 年 9 月 18 日我们搞了一个改革，引进了团队竞争的概念，柴静一个组，杨春一个组，长江一个组，三个主持形成竞争格局。九月份改革，大家从屏幕上可以看到节目变化非常明显，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另外记者在镜头前的表现也通过制度的确立上了一个台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记者已经达到我们所期望的地步。《新闻调查》也有淘汰制，我们末位淘汰更多的是编导，编导群体比较大，大概有十五、六个。摄像、录音比较固定，做了七、八年，不可能淘汰掉他们。编导淘汰比较大，首先理解新闻热爱新闻，对新闻有主动性，同时具备很多的公共关系技巧，以前记者可能跟着编导，编导把什么都安排好。反过来记者你要有一种向心力，你的思想素质、你的待人接物，你在现场脑子清不清晰，采访提问到不到位……所以说记者中心制是一把双刃剑，推着你往前走，你不适合就把你淘汰，这样对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欧阳国忠：你们出镜记者是不是就是网友所称的主持人？

张洁：国外主持人是指坐演播室的，这类叫主持人，出外景的记者，我们延续了美国的叫法称出镜记者。

欧阳国忠：国外出镜记者的工作相对稳定，作为一个职业一直做到老，是不是有这种情况？今后《新闻调查》出镜记者是不是也有这种趋向？使之职业感和职业精神不断得到加强？

张洁：我们希望是这样。在国外一般来说，主持人都是从记者开始做起，有的主持人从编导做起，一步步做外景记者到最后四、五十岁做演播室主持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出镜记者做到持续发展。但是首先要看我们这个平台，我们这些理念是不是让他觉得在这里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美国《60 分钟》从 1968 年到现在发展了 36 年，我们希望这个栏目一如既往做下



李谷一 歌唱家

在2002年春节的时候，《新闻夜话》栏目制作了春节系列节目《我在那里过年》。在采访中李谷一告诉我们，她最怀念的就是小时候过年，那时候总有一种期待，而且家家过年都吃糍粑，觉得那会儿在家过年很幸福。因为是湖南人，在过年时还有一道不能少的菜就是红辣椒。

在节目中李谷一还讲述了自己第一次离家，在外面过年的故事。那是到西部地区去演出，虽然天很冷，但是观众的热情却很高昂，男女老少都穿着棉衣在外面看演出，也就是这种热情，让演员们忘记了寒冷。她说："他们看我的演出，那种心情啊，觉得好像从天上降下来的那种幸福。"确实，演员们在过年的时候，把最美、最好的一面都呈现给了观众，但是他们背后的辛酸却是没有人知道的。

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李老师还清唱了《乡恋》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拜年！

去。在央视所有的栏目里面我们开玩笑说,《新闻调查》是生命力最长久的节目,它的最高境界很难实现,记者采访也好,编导业务也好,要求做到在40多分钟里面——40多分钟是一个电视剧的概念——把你的节目做到好看,把理念传达清晰特别不容易,对各工种都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意味着我们的发展空间特别特别大。

欧阳国忠:《新闻调查》揭露社会阴暗面比较多一点,你作为制片人每天接触这些话题会不会感觉到心头压力比较大一些?

张洁:我接触阴暗面,观众来信来电多一些,《焦点访谈》的来信是用麻袋装的,习惯了可能就好了。另外用职业的眼光来看的话,你刚才所说的影响会小一些。做这类选题的时候,当通过记者的努力使这些内幕得以曝光,甚至行为得以纠正,使问题得以解决,那个时候作为一个调查栏目创作者来说,那种快乐的成就感和幸福感也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每当我们播出一个特别优秀节目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那天是《新闻调查》的节日。

欧阳国忠:你们有自己的压力,也有自己的释放方式。我曾经碰到一个人,一个女孩刚刚大学毕业,当时选栏目的时候,选择了调查栏目,做了一、两个月之后受不了压力,就去做轻松快乐的节目了。所以说,走过这一关的人心理承受力比较大。

张洁:前面提到记者的素质,其中韧性也是特别珍贵的一点。比如说你的节目中途流产了,最后不能播出了或者怎么样,你能不能承受。能坚持下来的肯定是最优秀的,需要不断淘汰。《新闻调查》这批调查人有一种共同的特点,有可能我们不是和身边的人较劲,我们是和自己较劲。从专业上来说,我经常对编导说,你不要老跟别人较劲,你跟自己较劲,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当中,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你很清楚你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比如我是一个胆怯的人,我是一个不愿意得罪别人的人,你做这种舆论监督节目必须战胜自己的怯懦,这个较劲是你自己跟自己较劲。另外你可能是一个不冷静、容易冲动或者不拘小节的人,你可能会犯很多错误,我要求你客观冷静从容精确,这个毛病的克服要靠你自己。你的产品是什么样的质量,取决于你对限制你发展的因素到底能不能超越,再上一个台阶。我们一旦确定一个人发展的最终障碍是克服自己的障碍,任何困难出现的时候都是对自己的挑战。

说到环境的问题,我们是有一些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但是允许做的事情里面,你是不是做到最好?任何一个时代的发展进步都会有时代发展所具有的历史局限,不可能超越时代。并不是说这个时代没有给你前进的空间,改革的发展始终在推动这个空间不断扩大。从1993年《东方时空》开播到现在,中国的媒介环境发生多大的变化,这种进步是谁给你的?是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作为一个媒介记者的话,受不了挫折改行那没问题,他是一个个体可以按照自己的原则去选择。如果真正热爱新闻,愿意通过新闻为国家民族做一点事情的人,他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既看到时代的进步,也认识到目前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然后再慢慢通过自己的平台一点一点和其他的力量整合起来,推动往前走。无论政界也好,经济界也好,文化界也好,包括科技界、产业界,一个国家往前走总得有一批这种人在里面。我们希望我们栏目的员工是推动这个进步的其中一分子。



牛群　相声演员

2003年春节是牛县长在蒙城走马上任的第二年，从一个普通的相声演员到一县之长，牛群这个年过得怎么样？蒙城的年与北京的年又有哪些不一样，《新闻夜话》采访了时任蒙城县副县长的牛群。

已经是县长的牛群还是不改相声演员的幽默风趣，与主持人谈笑风声。在采访中，牛县长坚持要讲他在蒙城的年，因为那个年可以说是多年以来最难忘的。每逢过年，领导总要走村串户，问寒问暖，牛县长也不例外。蒙城县都知道是全国有名的养牛大县，他挑了一户养牛大户，一边唱歌，一边包饺子，着着实实过了一个“与民同乐”的年。据牛群介绍，当时他不仅跟老乡们唱着歌过年，还在蒙城办起了春节联欢晚会，自己又当主持又演相声，这一招也让蒙城的老百姓真切地感受到这位明星县长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欧阳国忠：你在做记者的时候也有被枪毙的节目，你被枪毙的节目有多少期？

张洁：三期。

欧阳国忠：当时被枪毙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受？

张洁：那是我到调查的第一期节目，为农民讨公道，农民受到不好的村干部的欺负，后来节目没能播出。我们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后期花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可以说呕心沥血做出40多分钟的节目不能播出，打击非常非常大。我觉得痛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但是你必须超越、必须战胜，我们后来在评论部的手册上有一句话，如果节目没能播出，那就洗个澡接着找下一个选题。

欧阳国忠：第一期节目被枪毙，越战越勇，现在做到《新闻调查》的制片人，你有什么招，尽量使记者的调查节目不被枪毙？

张洁：我有三个节目被枪毙，每一个节目不能播出总有不能播出的理由，这种理由可能是我们没有把事情做好，包括我做的第一期节目后来反思，如果我用另一种方式来操作的话，这个事件是能够公布于众的，当时太感性太冲动太不够冷静，必须在这方面反省自己总结自己，你会越来越成熟。专业技巧是你必须自我挑战的，而政治技巧也是你必须挑战的东西。但是我们所说的成熟并不意味着我们变得圆滑，新闻变得没有力量，不是这种概念，我们说的成熟是在这种环境下，把我们节目该传递的东西能够以安全的形式传播出来，这就需要很高超的经验。对于记者、编导来说要求更高，我特别认可一个人说过的一句话：巨匠在限制中产生。

网友：曾获国际大奖的《大官村里选村官》，很多人称它是纪录片而不是调查性报道，你是如何介入这一题材的？

张洁：我们把大官村获国际奖的节目和《第二次生命》这两个节目相比较，如果说它是调查片的话仅仅是使用了一些调查的元素，比如使用了调查记者，使用了印证的方式，而整体仍是纪录片，我们给了它一个概念叫纪录式调查，基本靠纪录片的内容撑下来。栏目固然是越纯粹越好，每期节目都是揭黑幕都是舆论监督的，但是不可能。我们在符合栏目品质的调查报道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可能会向其他领域扩张，比如我们做一对一的专访，我们称之为心理层面的调查；还有如大官村纪录式的节目；另外主题性调查，那就其实是宏观立论找素材印证。无论做什么样的节目，我们用调查的因素来包装它，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是真正的调查性报道。我把调查节目广义上的概念和狭义上的概念解释得比较清楚了，为了播出，可能其他元素的节目也要经营，我还没有奢侈到做了一个好的纪录片不播，但纯纪录片的样式我们是拒绝的。

欧阳国忠：你去过海南，中间回过云南，1993年来到北京，这些经历对你选择《新闻调查》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洁：当初不到北京来不会在《新闻调查》，首先得益于央视人事变革。社会上各界人才，无论是不是北京的，有没有户口，只要有能耐就能来到这个平台上，你能做摄像就做摄像，能做编导就做编导，能做主持人就做主持人，王志就是这么过来的，当时央视很多元老也是这么来的。央视这十年最伟大的革命就是人事制度改革这块，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也没有后来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新闻调查》正式员工五、六位，大部分是招聘人员，来



蔡明　小品演员

2003年春节，小品演员蔡明做客《新闻夜话》演播室，谈一些关于过年的趣事。在节目中，蔡明讲印象最深的一次过年是在西安，她和郭达在西安拍片，当时大雪纷飞，演员们一起在街头吃羊肉串，演员们的很多春节都是这样在工作中度过的，蔡明还回顾了一些她童年时的过年趣事，并在节目现场用各种方言跟观众拜年，整个节目轻松愉快，充满节日的喜庆气氛。蔡明的喜剧天赋尽显无疑。



自全国各地，没有北京户口。他们是我们的核心主体，没有他们我们这个栏目支撑不下来，人的解放是第一位的。

欧阳国忠：你从骨子里面是一个爱打抱不平的人，调查社会真相的栏目和你的性格有什么关联吗？

张洁：我不是爱打抱不平，我这个人的个性是温和善良，与人为善是我的一大特征，但是疾恶如仇，眼睛里揉不得沙子。我经营的团队里面，如果有违背我对人的要求的行为出现的时候，肯定是要受到制裁或者受到抨击的。如果有一些好的，比如特别包容别人，特别能够克制自己成全别人，克制自己的私欲，就会让团队越做越好。我对人的要求太高，大家可能觉得跟着张洁干太累。

五、解决不公正的事情还是要靠法律的力量

网友：这个节目我很喜欢，算是冲昏了头的冷静剂。希望《新闻调查》进一步加强曝光社会黑暗面的力度，为百姓呐喊，为当局者警醒，为推动法制中国助威。

张洁：谢谢。我们会尽量朝这个目标去做。网友对我们有这种期待可以理解，但是现在民间、在非常广泛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底层的百姓对媒介的期望值太高，总觉得新闻是包青天，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他们来信的诉求，希望通过媒体干预处理，对我们的要求过高。我们认为真正能够解决这种不公正的事情主要还是要靠基层的司法力量，还是要靠法院。我们特别希望在国家整个环境里面，这些工作能够做得越来越好。到中央台门口告状的人比较多，某种程度来说是求助司法得不到解决才求助于媒体，从我们内心深处来说，我们希望大家把法律看得最重，法律毕竟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仅靠媒体，《新闻调查》一年52期节目，就算全做舆论监督也只能做52个案子，但是每天我们所收到的各种求助信绝对不止52封。我们有很多年轻的记者来到《新闻调查》，他们一开始带着一种理念主持正义，来了之后感觉到无能，帮不上忙。有一个学生接了电话回去之后号啕大哭，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太有限了。对每个有冤屈的都提供帮助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使命在哪儿？如果你做一个记者，如果你的选题得以立项，得以到操作层面，你尽可能把节目做好。拖欠民工工资有一百个案例，我们只能做一个，这个点选好，我们花所有精力把节目做好，这是应该能做到的。另外做这类报道的时候也尽量加大我们的整体力度，在我们的舆论监督下制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但是有一点作为观众来说应该看到，舆论监督毕竟是曝光一部分人，他们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或者是侵害公共利益，作为这些人来说，他肯定会用很多力量来使这个节目不能播出，这是我们实施舆论监督当中最大的障碍。经常很多节目记者到了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公关的就到了北京，每个有影响的监督节目的播出都是上上下下抵抗公关的结果。地方的一部分人动用国家资源住着高级宾馆上上下下活动，其目的就是使他们的行为不要曝光。我认为这种行为其实也是一种腐败行为，因为他在利用公共资源而目的是维护少部分人的利益，用这种手法给电视台施加压力，使我们的节目不能播出。但是好在我们现在舆论环境越来越好，从中央到各级领导，对舆论监督这块越来越重视，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以后可能会从数量上到质量上，尽量使我们的舆论监督节目上一个台阶。

对普通公众而言，外交部是一个神秘而庄重的地方，没有人能想到自己会有机会到外交部作客。但从2003年开始，外交部陆续举办了三次“公众开放日”，邀请普通公民走进外交部，了解外交、表达民意。而总是在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则在外交部的会客厅里接受了《新闻夜话》栏目的独家专访。

在访谈中，孔泉声称，举行外交部“公众开放日”是外交部从人民中吸取“营养”，而“营养”是指关于公众对于外交工作一些好的思想，好的思路，好的方向。中国公民假如想参加“公众开放日”活动的话，可以写信，打电话，发电子邮件与外交部新闻司公众外交处联络。2003年以来，外交部解密外交档案、部长上网、公众开放日等活动都体现了外交部进一步的开放与透明，公众对外交的意愿也会在合适的途径，得到外交部的反馈，甚至被采纳到外交工作中。

孔泉还强调，外交部“期望着和公众有更多的沟通”，使公众更多地了解、支持和认同外交部的工作，因为“外交部门所工作的目标，是维护我们民族的最高利益，国家的最根本利益”。

在节目中，这位外交部发言人兼新闻司司长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公众开放日”活动将逐渐机制化，也就是说每一个普通公民都将会有机会走进外交部。



孔泉 外交部发言人兼新闻司司长



《对话》栏目操作流程

●《对话》具体实施工作标准

一、策划阶段工作标准

1. 所建人物库按一定方式分类，并列出其特色，发现新的人物应尽快收集进人物库，人物库应为主嘉宾和次嘉宾提供大量后备人选，以便及时更换。

2. 选题确定后必须与制片人一起确定主席嘉宾人选，并联络到主嘉宾。

3. 准备初步的策划案、资讯。

4. 每周开至少一次选题策划会，时间地点自己掌握。

二、实施阶段工作标准

1. 在“说什么”和“怎么说”两轮策划会上应有较为完整的文字性的电视化阐述，主持、组织策划会。策划会的总次数控制在四次以内。

2. 每次策划会后由导演选择可利用的建议和办法，与制片人、主编协商后形成操作性文案。

3. 策划会外请人员名单、开会时间由导演与制片人、主编商量后确定。

4. 录前会导演确定并主持。

5. 严格按导演工作流程逐项处理。

三、录制阶段工作标准

1. 进入演播室工作状态后，节目录制前由导演协调处理一切与节目有关事务，包括嘉宾进退场次序、形式、时间、具体责任人。处理不了尽快与主编协商。

2. 录后会总结应具体指出工作中的失误。

3. 演播室录制过程中由导播指挥，其他各工种配合导播工作。

四、制作阶段工作标准

1. 制片人审看意见导演应做记录并一一修改，如有不同意见可陈述和协商，但最后决定修改的部分必须逐一修改。

2. 工作版原则上只能是一盒带，在合成之前再次检查有没有跳点，有没有声音问题、时长如何。

五、验收阶段工作标准

1. 与部里联络，及时申报节目计划，申请代码及有关播出事宜。

2. 合成节目中再次对跳点、声道把关，如有问题，及时向导演指出。合成节目后如果仍有跳点，声音有问题，责任由责编负。

3. 检查字幕，责任由责编负责。

4. 送值班主任审片时，应用专门笔记本认真记录主任原话并向制片人汇报，同时与导演一起逐一按值班主任的意见修改。对于这些修改意见没有商量的余地，只能执行。

5. 节目入库时需认真填写入库清单，并反复核对，入库完后应通知部办和制片人。

6. 负责节目包装一切事宜。

7. 送中心导演组和《电视你我他》宣传片，



王立军　锦州市公安局局长



王立军现任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闻名遐迩的打黑英雄，是警界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位英模。从警20年，他打掉多个黑社会团伙，把800多名犯罪份子送上刑场，其出生入死的经历被写入很多文学作品；电视剧《铁血警魂》就是根据他的事迹改编的。王立军获得过两次二级英模、一次一级英模，而一、二级英模获得者牺牲的比率非常高，他是仅有的几个还活着的一级英模。王立军还当选过全国人大代表，在刑侦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是国际颅面鉴定协会副主席，也是国内多所公安大学的客座教授。

《新闻夜话》对王立军传奇经历做了专访，而王立军一再强调千万别把他树立成英雄，他也是弱者，多年与犯罪分子作斗争，他自己和家人常常身处险界，但他表示为官一任就要保一方平安。

并负责监督是否播放。

●《对话》栏目策划流程

节目策划分为选题策划和节目策划两个部分,选题策划实行栏目策划制,节目策划实行导演负责制。

第一级选题策划

选题和栏目方向策就是对与《对话》栏目相关的世界各地和国内谈话节目进行比较研究,时时掌握最新动向和潮流。随新闻事实的发生、发展确定选题方向和具体选题。对每一个选题都要问下列问题:

1. 本选题是否有新闻时效性;
2. 本选题是否有独特的新闻视角;
3. 本选题是否有二次开掘的可能性;
4. 本选题最关键的嘉宾是否能请到,是否有应急措施;
5. 本选题在嘉宾搭配上是否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二级说什么

节目策划　对已确定的选题进行脑力振荡。

1. 有哪些可利用的人物元素;
2. 有哪些不可舍弃的内容和观点;
3. 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
4. 有哪些形式设计;
5. 有哪些道具可用;
6. 有哪些提问技巧和特别的问题设计;
7. 观众要求。

第三级怎么说

根据脑力振荡的结果,由主持人或编导拿出文案,由编导或主持人召集本期节目主编、制片人,进行操作前的推敲和细化,并确定执行方案。内容包括:

1. 把资讯内容分开明确层次,至多三、四个;
2. 设计转场和小结;
3. 确定特殊观众,了解观点;
4. 设计现场应急措施。

●《对话》栏目策划案基本格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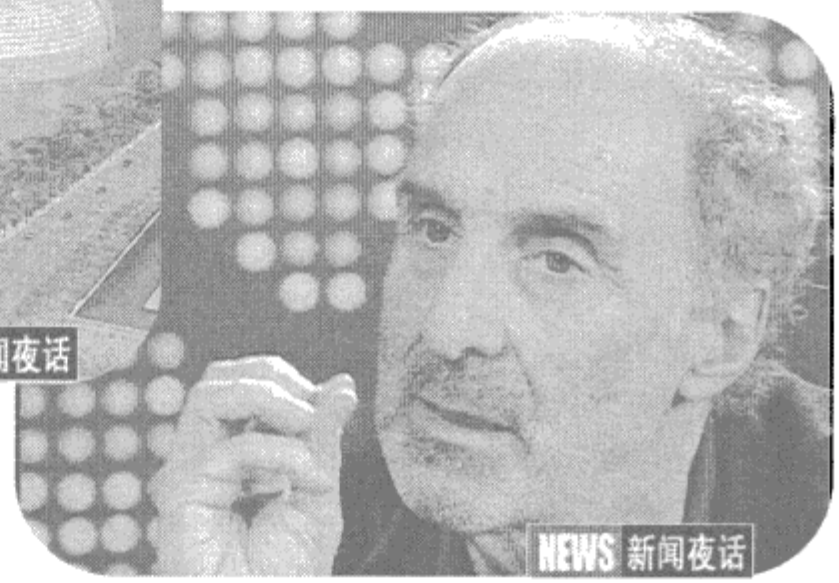
节目的表现目的
节目的切入角度
节目的新闻性
节目卖点设计
节目高潮设计
嘉宾介绍方式设计
表现形式创新设计
戏剧化因素设计
节目的基本话题设计(争论点、对话点、或说什么的话题设计)
开场设计
结尾设计
人物组合设计
特殊观众设计
主持人总结设计

●《对话》栏目导演操作流程

第一阶段



国家大剧院效果图



安德鲁 国家大剧院设计师

2003年12月2日，国家大剧院壳体钢结构最后一根钢梁吊装完成。此次吊装的穹形钢结构屋顶是整个大剧院工程的核心和关键，它也同样是设计中争议最大的部分。它的设计师法国人安德鲁说："这是我整个设计的核心……如果没有这个穹形屋顶，就不是我的设计。"

保罗·安德鲁曾荣获法国建筑大奖、佛罗伦萨、古德基金会大奖和阿加汗大奖，并且是法国建筑学院和法兰西建筑科学院的院士。戴高乐1号、2号机场都是由他主持设计的，在国际上他还设计了雅加达机场、开罗机场、达累斯萨拉姆机场、文莱机场、大阪关西机场以及我国的上海浦东机场和广州新体育馆。

采访中安德鲁就有关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近30个提问都进行了细致、耐心的回答，包括那些尖锐且不好回答的问题，他都没有回避而且回答坦诚、直接。从见到安德鲁到采访顺利结束，这个和善的法国老头的确表现出了真正的国际大师的谦逊和真诚。

1. 接受选题和节目录制时间

2. 确定主嘉宾人选，不真诚的人不考虑，如嘉宾是外籍人员，督请制片协调进台事宜

3. 去主嘉宾所在地向相关人员了解情况

4. 与策划一起收集资料

5. 形成最初的导演阐述文案

6. 列出节目倒计时表，并递交使用演播室报告

7. 与主持人召开第一次策划会：说什么会后形成方案，交制片人和主编

8. 确定大屏幕短片内容，外出采访并安排拍摄

9. 制定观众构成方案并各渠道征集观众

10. 督请制片联系特殊进车问题（递交嘉宾车型、车号和随车人数）

11. 确认景样及现场需要道具，并督请制片及时制作

第二阶段

12. 召开第二次策划会：怎么说，话题层次不多于2个，每个层次尽可能多角度（并与财务联系，准备策划劳务费）

13. 与主持人一起形成演播室剧本（电视化）

14. 确定特殊观众人选，特殊观众沟通（打电话或在必要时面谈）并将演播室所需观众提问落实到具体人选

15. 向观众强调着装问题（大方、整洁、有领有袖，不允许穿吊带衣、圆领衫、毛衣、短裤、拖鞋、白色或斜纹衣）

16. 编辑完成大屏幕短片，并送审

17. 选定开场、结尾音乐，以利后期编辑采用

18. 再次与嘉宾、观众确认录制时间、地点及进场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19. 设计嘉宾和主持人的演播室形象（包括服装色彩、款式、坐姿、谈吐等）

20. 落实贵宾车台内停放车位，包括外请嘉宾及特殊观众的接待（住宿、接站等）

21. 落实景样及室内喷绘

22. 联系演播室摄像

23. 交演播室登记表

24. 通过制片与视频、音频、灯光等技术工种联系，提出具体要求

25. 务必在节目进入录制前两天结束大屏幕短片和所有策划流程

第三阶段

26. 召开录前会，明确栏目内部各人员分工

27. 确认观众总人数

28. 根据主嘉宾的兴趣习惯，准备主席嘉宾喜欢的音乐、饮料

29. 预备观众入场券和嘉宾进门条

30. 准备栏目赠送嘉宾的礼物

31. 通过制片协调并预定贵宾室

32. 通过制片与化妆师联系，到贵宾室给嘉宾化妆

33. 通过制片与音频人员联系，到贵宾室给嘉宾别话筒并调试音响效果

34. 联系同声传译公司，同传翻译须专业人士（不少于两人）

35. 与主持人就演播室剧本进行充分沟通

36. 提醒音频人员主嘉宾的无线话筒与同传机不能同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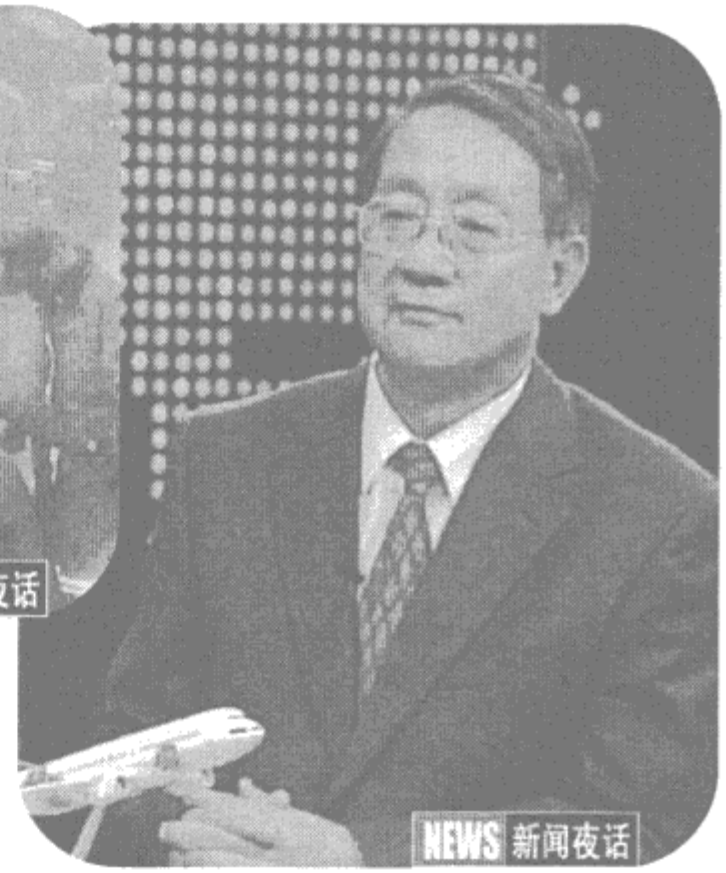
37. 安排主持人熟悉大屏幕短片内容

38. 同声传译公司进场并安装和调试同声传译设备

39. 演播室进景及布置

40. 到演播室确认主嘉宾位置（主嘉宾位置不能同边，避免U形排列，嘉宾人数不超过4





五·七空难飞机坠毁抢救现场

钟群鹏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安全生产专家组综合组组长

2002年5月7日，中国北方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大连坠毁，机上112人全部遇难，举国哀悼。7个月后，该次空难的调查结果公布。这一份调查报告的出笼应该是当时国人最为关注的重大事件之一，然而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媒体中，只能见到新华社刊发的一篇百余字的稿件，除此之外，尚没有媒体有能力发表与此次空难调查报告相关的报道。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安全生产专家组综合组组长钟群鹏，虽然没有参加此次五·七空难的调查，但却参加过多起空难调查的全过程，是国内在这方面研究最为权威的专家之一，在五·七空难调查结果公布后的第二天，《新闻夜话》对他进行了专访。

在采访中，他介绍了一般空难的调查过程，并提到首先就是要找到飞机残骸中的“首先破坏件”。空难调查结果的认定至关重要的就是现场证据，“人证只能作为参考依据，最重要的是物证，物证是越确切越好，确切的只要有一个就够（确定空难原因）”钟群鹏说，“目前全世界的机场检测液体爆炸物还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飞机上的洗手间现在来看的确是飞机监控的一个盲区。”他还提议有必要设立空中警察部队，现在在世界各大航空公司里还没有空中警察，如果中国创建的话，“这当是一个首创”。节目中几乎所有的采访内容，在国内都是首次披露，也使得钟院士的每一句话都成为了新闻。

这期节目经过紧张的剪辑工作，在五·七空难调查结果公布后的第三天顺利播出，《新闻夜话》成为当时国内所有媒体中首发和独家深度报道这一事件的媒体，采访内容被国内纸媒体和网络媒体广为转载。

人)、调试灯光

41. 准备录制所用道具

42. 擦拭桌椅及景片

43. 督请有关人员准备嘉宾演播室和贵宾室的饮用水,消毒嘉宾所用水杯

44. 督请有关人员准备工作人员饮用水

45. 特殊的场上设计要彩排，如音乐的配合、道具的使用

46. 督请有关人员调试主持人无线耳麦

47. 安排主持人彩排走台

48. 安排主持人化妆

49. 安排有关人员在中央电视台西门集合观众进场(带上准备好的“对话”牌子)

50. 安排有关人员在圆楼门口接应观众，指挥观众存放衣物和包裹

51. 安排有关人员在演播室门口接应嘉宾及观众

52. 安排有关人员在演播室内为观众领位

53. 安排有关人员为贵宾车领位

54. 督请相关人员在贵宾室欢迎嘉宾,并与嘉宾简单交流节目意图

55. 督请相关人员在贵宾室给嘉宾化妆和别话筒

56. 分配现场导演及领掌

57. 导播室切换导演及调机，录制过程中指挥各技术工种

58. 携带节目录制所需的空白带 (90 分钟 5 盘)、大屏幕 logo、短片

59. 确定现场摄影人员(普通相机、胶卷和数码相机)

60. 确定大屏幕放带人员

61. 写出分镜头本

62. 确定游机拍摄的对象

63. 召集摄像会，并与摄像沟通导演意图确定机位和切换流程

64. 确定嘉宾进场方式和指定摄像拍摄主嘉宾的进场,落实到人

65. 试放大屏幕

66. 播放《对话》LOGO 的抓桢带和进场音乐(录制前半小时开始)

67. 主持人热场(不宜让观众群起站立)

68. 确定专人负责带领嘉宾从贵宾室进场并就坐

69. 确定专人负责导播室与现场的上下联通,道具上场避免凌乱和穿帮,控制录制时间不超过 2 小时

70. 确定专人负责嘉宾签名留念

71. 确定专人负责疏散观众

72. 确定专人负责送主嘉宾返回住地

73. 召开录后会，总结录制成败和各工种完成情况

74. 关于外请嘉宾及特殊观众的接待 (住宿、接机等)

第四阶段

75. 收集栏目内部人员和观众的反馈意见

76. 跟踪节目涉及嘉宾的动态，挖掘与他相关的人物,寻找进一步开掘的机会

77. 录制结束后一天内完成场记

78. 场记结束后三天内完成粗编并送审

79. 粗编改正为一天,并再次校对字幕

80. 录制结束后第五天完成包装、并送审

81. 交责编播出带

●《对话》栏目切换导演职责

1. 切换导演应在节目前期尽量熟悉节目内容和详细进程;

2. 特殊节目应当有特殊准备,提前列出录制机位安排，并列出镜头串联单，并与摄像沟



被称为“神童”的窦蔻

窦蔻可能是2002年最小的新闻人物，这个孩子出身在江苏的农村，在小的时候就跟着爸爸妈妈在外面漂泊打工，一岁的时候就能够认五六百字，而且可以做简单的加减乘除；五岁的时候写童话，到现在已经积攒了六十多篇；六岁的时候，写了十万字左右的一个长篇，而且已经出了书，就是《窦蔻流浪记》；六岁半的时候进入了南京东方中英文学校，直接从五年级开始，半年后退学。

《新闻夜话》栏目采访窦蔻的时候，他已经被几十家媒体采访过，其中也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为他做了一整集的节目。但是在我们采访他时还是说出了一些在别的媒体上没有说过的内容，比如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神童，也不承认自己说过要创造奇迹。面对主持人犀利的提问，他大胆反驳，是诡辩还是机灵？看过这期节目之后，让人不禁要担心，这个早慧的孩子拒绝了学校教育，成年人又没有为他找到合适的教育方式，他的未来会怎样呢？会不会是一出新的《伤仲永》？但愿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通；

3. 根据节目要求提前进行彩排，及时调整相应的镜头、机位安排；

4. 节目录制过程中，负责与音、视频和各工种配合

5. 节目切换原则：

A、开场应有具有对话品牌特色的全景方式、主持人开场白应正面面对镜头、开头部分就要有观众反打和交代各方参与人员的镜头；

B、节目进程中应尽量保证正在说话人的近景，适当配合全景和小全景；

C、应当非常注意抓取观众的反应，特别是掌声和笑声与特殊表情；

D、节目录制应当有主路切换和辅助切换，以保证镜头质量；

E、节目中的特别设计，应当有流畅的机位和拍摄流程，使之得以最佳表现；

F、节目结尾应该留有余地，尽量抓取场外细节，并将所有的机位调动起来；

G、节目结束后应当进行录后总结，与摄像沟通。

●《对话》栏目找观众的程序

1. 第一次策划会后，在网上发布信息招观众。

2. 和导演、主持人沟通观众的组成，根据我们对观众的要求和条件，联系观众。同时对观众进行筛选，一些不符合节目要求的观众要被淘汰掉。

3. 同观众尤其是特殊观众进行交流和沟通，沟通彼此的想法——重点是观众的意见，及时和导演和主持人商量是否能够充实到节目中去，以备下次策划会讨论。

4. 根据我们几次策划会的策划，已经能够逐步确定对特殊观众和一般观众的要求，在同导演和主持充分沟通的前提下，做到同特殊观众重点沟通，同导演和主持人商量确定他们各自的问题和他们各自所扮演的角色，把特殊观众的工作做好。同时，对于一般观众，要交流我们这期节目的想法，并倾听他的意见，看是否有有价值的东西能够充实到我们的文案中。

5. 把特殊观众和一般观众沟通交流的情况做总结同导演和主持人讨论，看是否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并做再次确认。

6. 在三次策划会后逐渐确定参加节目的人数和时间，并根据情况做适当调整，向观众提出我们的要求，包括时间上的准时，服装上的要求，所带人数上的要求等，并要在录制的前一天再次确认。

7. 对观众的座位安排同导演和主持人讨论确定，做到让导演尤其是主持人心中有数。

8. 按照我们规定的人数适当可以多出几人，这样我们可以在最后西门这一道关口把关，如果此时仍有不符合我们规定的观众，为了节目整体的需要仍要淘汰。

注：观众工作的具体要求由助理导演负责实施。

●《对话》栏目杜绝错别字管理办法

错别字的出现，对节目是一个巨大的损害，尤其是当节目正在上升时期，它对节目的伤害更为突出。当观众正兴致勃勃看着节目，突然一个错别字飞出，那滋味真是扫兴。像我们这样以经济和社会前沿思考为主打内容的栏目，错别字对栏目品质的影响非常可怕。籍此，我们特订以下办法。



赵本山　小品演员

每年春节前后，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都会掀起一个娱乐新闻报道的持续高潮，晚会前，大腕们谁上谁下永远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赵本山在小品界的地位无人能撼，所以他永远是焦点中的焦点。

2003 年 1 月底，离春节只剩 4 天时间，关于赵本山拒上春节晚会的传闻闹的沸沸扬扬，但是赵本山本人一直拒绝接受任何采访。记者长时间与赵本山沟通，赵本山几番考虑和犹豫，终于决定坐在记者面前。

在这期节目中，赵本山第一次袒露自己的心声——这些年的疲惫、困惑和坚持；家人的支持和期盼；第一次在春节晚会之前，点评自己即将亮相的作品，同时也分析了将演出的其他一些演员的小品；更重要的是，赵本山对春节晚会的运作提出中肯的意见，再次引发人们对保护艺术生命的思考。

节目播出后，舆论哗然，赵本山再次成为那段时间的谈论焦点。

一、层层建立责任制，由助编、编导、责任编辑和栏目主编负责四道关口。

1. 第一关，助理导演负责从场记到播出字幕的整理，并负责初步校对。

2. 第二关，编导负责对助理导演的字幕进行检查。

3. 第三关，责任编辑在整个过程中重新检查字幕，这是主要的校对检查程序。

4. 第四关，栏目主编进行最后检查。

二、奖惩办法：

1. 如果节目没有字幕错误，每期节目奖励200元。

2. 如果出现错误，根据具体责任进行处罚。

3. 责编发现编导错误，每字扣25元。

4. 主编发现责编错误，每字扣25元。

5. 台总编室监看发现错误和观众发现，扣主编每字50元，制片人按台里规定。

三、应对措施：

1. 相关人员需要及时学习业务知识。

2. 配备工具书和相关业务书籍。必备的有新华字典两本，现代汉语词典一部。主要参考书·有《咬文嚼字》等，其他业务书籍随时选购。

3. 及时印发台总编室关于防治错别字的相关学习材料。

注：

1. 所有错字都以书面认证为准，有关责任人要在流程表上签字确认。

2. 以上所述限于节目除人名字幕外的所有字幕。

3. 节目人名字幕实行编导一人负责制。

此字幕的准确包括职务和姓名两部分。

此项惩罚参照上述有关编导的惩罚标准执行。





瓦尔德内尔 世界著名乒乓球运动员

谁是世界乒乓球赛场上的传奇人物？很多人认为，这个称号非瓦尔德内尔莫属。中国人喜欢叫他老瓦，老瓦还有很多外号，比如说“游击队长”、“乒坛莫扎特”和“冷面杀手”，因为他的球术变幻莫测，并曾摘走了乒乓球世锦赛、奥运会和世界杯的冠军奖杯，让中国乒乓球男队留下了很多遗憾。老瓦鏖战乒坛 20 多年，和中国五代乒乓选手交锋过，这在新老运动员更新换代很快的中国乒坛简直就是一个神话。

采访时老瓦刚从第 25 届世界杯上归来，这次他和蔡振华最年轻的得意弟子王皓交锋，在 1/4 决赛中以 0:4 惨败于王皓。有人说老瓦毕竟是老了，在走下坡路。不过老瓦并不这样认为，他说自己只是因为状态不佳才输了。他相信，自己在 2005 年的上海世锦赛上还可以拿冠军，如果有人认为他老了，不行了，事实会证明他们想错了。老瓦屹立乒坛 20 年，一个是因为对乒乓球的热爱，一个是因为后继无人。老瓦的退役时间是一个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但是老瓦以他一贯的“狡猾”避开了这个问题。他说，2005 年的上海世锦赛后，他未必退役，唯一能肯定的事情是之后不会再为国家队效力了。

老瓦在北京新开了一家餐馆，选择北京是因为他爱中国。

后 记

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不光是因为它常常晴空万里,色彩斑斓,更诱人的是各种果实都下来了,粉嘟嘟的苹果,黄灿灿的柿子,白闪闪的水晶梨……,它们纷纷出现在大街小巷,把这个古老而现代的城市点缀得富有生命力和生活味,使人的心里涌起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收获的季节来了!

从去年底开始,我就一直想对电视新闻类谈话节目做一些微观的研究,探讨它们的操作规律,这种想法的产生一方面来源于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来源于在实际工作中深感谈话节目研究资料的缺乏。在《新闻夜话》的审片过程中,我常常和编导们要讨论许多新闻谈话节目所遇到的问题,有的问题还不止一次地谈到,为了让更多的编导形成共识,我便把看完节目后的一些感想和要求写在一个审片意见本上,这个意见本是公开传阅的,只对节目发表评论,主要是讲问题,讲不足,讲对策,每一个编导在来审片时必须带上它,我写完后他们再拿走,就这样日积月累,一方面使编导们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尽量少犯同样的错误,另一方面,也迫使我在审片时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必须不停地思考,快速地作出反应,因为绝大多数时候,我是刚看完节目,就要当场把意见写上,编导在旁边等着拿本呢,想偷懒也偷不成!

后来,我觉得光我一个人写还不行,于是发动《新闻夜话》全体人员都来写,都来思考电视谈话节目中遇到的问题,于是便有了这本集子的雏形。

再后来,我邀请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研究处的王甫主任给《新闻夜话》的同志们讲课,想起在几年前他组织过一批非常有价值的课题研究,其中就有有关电视谈话节目的,很全面,很实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征得同意,这次把它放在本书的首要位置,相信它能给有志于研究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人提供一个宝贵的全景视点;欧阳国忠是一位勤于思考的电视工作者,他对几位电视谈话节目制片人的访谈具有浓厚的学术气氛,许多问题直指要害,犀利而深刻,几位制片人的回答也充满了睿智的思考,征得同意,把它们也一并收集进来,相信这些访谈肯定会给正在从事电视谈话节目制作的同行们以启迪。

明媚阳光中,看着树枝上挂着的一个个柿子,鲜艳可人,心想,这本集子也算一个果实吗?如果是,那就应该感谢每一个为这颗果实付出心血和汗水的人,也感谢每一个关心和支持这颗果实从孕育到长成的人!

陈永庆

2004 年 10 月 22 日于北京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电视谈话节目研究
作者=陈永庆主编
页数=355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
SS号=12046688
DX号=
URL=http://book.szdnet.org.cn/bookDetail.jsp?dxNumber=&d=20401835 0E153ABB9B73FEBC82B567 15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电视谈话节目概说
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三种基本类型
电视谈话节目的主持人
电视谈话节目的选题与嘉宾
电视谈话节目的现场与后期制作
电视谈话节目的可持续发展
《新闻夜话》三好论＆陈永庆
《新闻夜话》三度论＆陈永庆
《新闻夜话》三段论＆陈永庆
新闻访谈的魅力——突破平面追求纵深＆魏鸿
我们要什么样的新闻类谈话节目＆杨红叶
我们将走向何方——对《新闻夜话》选题定位的一点思考＆胡彩阳
论电视新闻访谈的原生态＆董雯嫣
论访谈节目的气场＆刘昊天
论新闻采访中“霍桑效应”的发生与应对＆庄庆陬
论质疑式采访风格＆荆慕瑶
论“道具”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的运用＆陈永庆　　蒋乐进
我看《新闻夜话》＆崔亚卿
论访谈节目中嘉宾角色的多元化选择＆宋楠
寻找“接近点”＆杨燕怡
构筑《新闻夜话》的谈话语境＆崔亚卿
山重水复中的柳暗花明——新闻角度浅析＆刘进
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外观形象与自我表达＆黄刚
随笔：由一次聊天想到的＆李品华
我和电话＆宋楠
难舍《新闻夜话》＆魏鸿
我的《新闻夜话》之路＆李东明
我在《新闻夜话》的“第一次”＆曹琳
我谈《新闻夜话》宣传推广工作的感受＆吴雪峰
烙印＆樊红叶
电视新闻类节目合成初探＆宁小鸿
《新闻会客厅》制片人包军昊访谈
《时空连线》制片人刘爱民访谈
《讲述》制片人梁红访谈
《艺术人生》制片人王峥访谈
《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访谈
《对话》栏目操作流程
后记